



当代社会与政治思想译丛
尹树广 鉴传今/译

领导权 与 社会主义的策略

——走向激进民主政治

[英]恩斯特·拉克劳 著
查特尔·墨菲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当代社会与政治思想译丛



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当前左翼思想的危机？在何种程度上它导致了对支撑马克思主义和许多其它社会主义潮流的那个“社会整体”观念的怀疑？“领导权”这个概念意味着超越“正统”马克思主义中本质主义思想的新逻辑吗？新社会运动的崛起已经怎样改变了传统政治空间概念？它允许我们以激进和多元民主控制新左派的前景吗？本书对这些问题作了回答。沿着 19 世纪后期关于工人阶级统一的讨论到出现新的对抗和斗争形式这一发展过程，本书追溯了当前危机的系谱。前两章勾勒了第二国际社会主义造成的历史真空，这一历史真空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关键的“历史必然性”概念形成了挑战。尽管这一真空从列宁到葛兰西逐步发展，还是被传统的本质主义范畴所限制。第三章探索了会使领导权话语自由运作的理论话语条件：放弃实证的和被缝合的社会这样的概念，接受基本的对抗特征。最后一章通过重新开垦早于当前的社会斗争及其对于民主理论的意义，检测了所接受的这一点。

后马克思主义不意味着在马克思之外或反马克思主义，而是重视其他社会斗争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这些斗争形式从 19 世纪以来已经发展了性、性别、民族、种族等方面的特征。后马克思主义意味着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但是它加入了所有社会构造特性中的多样化方面。

——引自拉克劳 2002 年 12 月 19 日致中文的译者

ISBN 7-207-06011-4



9 787207 060112 >

ISBN 7-207-06011-4/D·784

定价 15.00 元

2001.11
11.25

领导权与 社会主义的策略

——走向激进民主政治

[英]恩斯特·拉克劳 著
查特尔·墨菲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17724

1973年9月，在瑞士日内瓦，查尔斯·曼宁和埃米·拉克在瑞士大学合影。背景是著名的圣彼得大教堂。曼宁穿着深色西装，拉克穿着红色上衣。他们站在桥上，背景是日内瓦的湖水和建筑。

1973年9月，在瑞士日内瓦，查尔斯·曼宁和埃米·拉克在瑞士大学合影。背景是著名的圣彼得大教堂。曼宁穿着深色西装，拉克穿着红色上衣。他们站在桥上，背景是日内瓦的湖水和建筑。



Watch her write
for 2003

Charles Manning
and
Emory Lacker.

当代社会与政治思想译丛

中国博士后科学研究

黑龙江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科研 **基金项目**

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

策划：尹树广

主编：衣俊卿

编委会(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立群	孔明安	尹树广	衣俊卿	刘振怡
李久军	李秋零	李 兵	陈春江	赵敦华
赵 林	柯锦华	姚大志	黄惠珍	韩东晖
靳希平	鉴传今	霍桂桓	魏杰恒	

恩斯特·拉克劳 是一位政治理论家，曾经就读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和牛津大学，从 1973 年开始在艾塞克斯大学政治系授课，并且一直是多伦多大学政治经济系、芝加哥大学历史系以及多所拉美大学的访问教授。他的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NLB, 伦敦 1977 年)，曾经发表过多篇政治理论和社会主义政治方面的文章。

查特尔·墨菲 是一位政治哲学家，曾经在卢汶大学、巴黎大学、艾塞克斯大学、伦敦大学学习，一直是哥伦比亚国立大学哲学系的教授，在过去的几年里还一直在伦敦的城市大学和伦敦大学的韦斯特菲尔德学院任教。她编辑并参加撰写了《葛兰西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伦敦 1979)，发表过多篇关于当代政治思想、新社会运动和女权主义理论的文章。

译丛总序

20世纪末的最后20年是中国哲学理性异常活跃的时期,我曾经从实践理性的复兴、主体意识的成熟、发展观念的更新、文化精神的重建几个主要方面揭示这一时期中国哲学的进展。这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1980年代关于真理标准、人的主体性、传统文化的命运、传统哲学体系改革、哲学观念更新等一系列大讨论,1990年代发展哲学、交往理论、新儒学、后现代主义、文化哲学、人学、经济哲学、公共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科学技术哲学等一系列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生长点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哲学界的空前活跃和繁荣。然而,“热点”的频频出现和快速更替、新领域的相继开出和转换、新术语的不断涌现和流行,在推动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学术研究的深度开掘和理论的厚重建构。

令人欣喜的是,世纪之交的几年,我们在中国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看到了某种“学术回归”的迹象。其标志之一是学术研究的心态开始走向平和与深沉。从对宏大的理论框架的追求转向细微的文本解读和思想的深度探索。一些有影响的学者开始把积淀多年的学术思想转化为一些深度的、厚重的学术著作。其标志之二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真正的跨文化对话和学术交流开始成为可能。如果这两方面的发展趋势紧密地结合起来,有希望回归到本真的哲学形

态,即文化批判层面上的批判性的对话和反思活动。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我们在二十世纪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西学东渐和东西文化之争,1980-90年代又经历了逐步的对外开放,并且在世纪末汇入了全球化进程,但是,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交流和对话并没有开展起来。全球化进程中的跨文化交流和对话包含许多层面。一般说来,日常生活层面的文化全球化的进程相对快一些,以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足球、牛仔、卡通等消费文化符码为标志的大众文化可以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流动,并很快形成本土文化和全球文化之间的共处格局。然而,理论层面的真正的跨文化交锋和交流则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实际上,如果我们冷静地审视一下,就不得不承认,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相对封闭地面对国际范围内的各种学术和理论思潮。无论是对西方思潮不加区别地一律冠以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潮加以彻底拒斥和无情批判的年代,还是以我们固有的理解框架对国外各种思潮和理论加以剪裁并批判地借鉴的年代,甚至在普遍进行翻译、介绍和研读的对外开放的年代,我们与国外学术界实际上保持着一种单向度的“独白”的状态,常常是既未进入西方学术思想的语境和文化关联,也没有进入西方学界的视野,更谈不上直接的对话、交流和交锋。在国际学术领域,我们往往自我“边缘化”。

基于对上述状况的清醒认识,目前中国学术界许多有识之士通过各种方式开始探索在全球化背景下建立直接的、同时代的、近距离的、甚至面对面的跨文化交流和对话机制,并通过一些高质量的国际学术会议的举办、一些有远见的期刊的海外原创性学术论文的刊发,特别是通过对

同时代的国外著名的理论家和学者的新著的高水平翻译和文本解读,进行了非常有意义的尝试。我们在这里选译当代著名理论家在二十世纪90年代前后一批关于国家、民主、现代性的文化批判著作,包括《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拉克劳,墨菲著1985)、《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拉克劳著1990)、《民主的悖论》(墨菲著1996)、《批判的国家理论》(巴罗著1993)、《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雅索普著2002)等。此举的宗旨也是推进一种直接的真正的跨文化交流和对话机制的确立。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我们所选取的几位当代理论家和思想家,大多同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相关,至少具有“家族相似性”,并且受到马克思的理论遗产的深刻影响。当然,任何“命名”都注定是残缺的和不完备的,并且具有误入歧途的可能性。重要的不是“命名”,而是这些理论家的深层的共同关切,他们在不同层面上,以不同方式关注困扰着我们时代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即现代性的机制、基础、命运、困境和未来。而且他们共同代表着当代西方学术界中传统政治学、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之间界限的消解,深刻体现了理论的批判本质和开放性特征。记得在二十世纪70—80年代,随着阿多诺、卢卡奇、霍克海默、马尔库塞、萨特、弗洛姆等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巨星相继陨落,我们似乎已经看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终结的开始。但是,在二十世纪后20年,一方面是哈贝马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新一代领袖人物开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晚期资本主义批判的新视野,并且积极同后现代主义等当红理论思潮展开开放式的批判性对话,另一方面是德里达、利奥塔等后现代主义者向马克思“致敬”

或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积极对话,以及詹姆逊、吉登斯、拉克劳、墨菲、波德里亚等兼有后现代色彩和“后马克思主义”特征的理论家向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加盟,这些在我们面前又展示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的地平线。

因此,翻译和解读这些同时代的理论著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一,有助于我们打破哲学研究内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等研究领域之间存在的僵硬的学科壁垒;其二,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西方发达国家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中各学科之间更大范围的交融和相互开放,从而能够真正进入国外学术研究的语境,在深刻的文化批判的含义上开展真正的国际学术交流,同时,在这种交流中确立我们的话语权;其三,有助于推动我国学术界关于现代性研究走向深化。我们发现,这些思想家在探讨现代性问题时,并没有停留于宏大的叙事方式,没有仅仅从学理层面挖掘现代性之根基,而是像福柯的微观政治学那样,在社会机制的各个层面上反思现代性,这对于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思考现代性的命运,并探讨中国社会转型中现代性的前景,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

翻译工作常常是异常艰难的,而又是“出力不讨好”的劳作。考虑到译者自身学术功底和语言能力的局限,这种困难就更加明显。好在翻译本身就是一种最难得的文本解读和思想对话,因此,无论如何,我们的劳动都不会是徒劳的。仅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够开辟跨文化交流与对话的一种可能的途径,有助于发扬哲学的文化批判和开放式对话的本性。

衣俊卿

2003年1月26日

中译者前言

翻译本书的目的是想为研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认识当代全球化发展中的发达社会内部冲突提供参考资料。拉克劳和墨菲是当代英国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这本《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是他们的代表著之一,最初发表于1985年,2001年再版。中文版的翻译以第一版为准,同时翻译了第二版的序言。

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受葛兰西、阿尔都塞、德里达、拉康的影响较多,尤其是他们更多地在方法论上接受了后两者的影响,强调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复杂构造的、没有被充分固定的逻辑同一性。在他们看来,应该接受社会的多样性和非实证性,认识到对社会进行最后缝合的时刻永远也不会到来。尽管如此,在他们看来,这绝非是放弃当代社会斗争的领导权要求,相反,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和新左派应该对多样的反对资本统治的力量进行连接,把构造发达社会激进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作为当代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急迫任务。

这些主张与他们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判断有关。这一判断的思想背景是结构主义与主体实践哲学之间的争论。西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一直面临着方法论上的分歧,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其核心是现代社会究竟是奠定在

何种原则之上。争论实质上围绕着人的主体实践自我疏离与回归、社会结构的非主体实践特征两个不同方面展开的,这场争论并没有得到最后的结果。关于这两个原则的争论实质上反映了个人与社会、个别与一般、主体与结构、科学与实践辩证法之争,其结果是走向了后结构主义。

后结构主义强调的是,追求这些对立终极的统一只能退回到抽象主义的乌托邦之中。走出困境的选择自然而然就是承认超越性的相对性和事实性的经验超越性。用一个显得悖谬的术语说就是“相对的一般性”、“有限的无限性”、“个别的一般”、“多样化的普遍”。主体中心理性的原则必须意识到自身的有限性,同时社会的抽象一般性也必须放弃它的绝对透明性。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之上,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往往掩盖其意识形态和利益关系的真正背景,以此消除反抗资本主义的对抗力量。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不能彻底消除社会生活世界的多样性构造,这些构造因素之间在结构上的矛盾是难免的。反抗资本主义统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强调连接的可能性和其不充分的同一性,应对相对主义的指责,这些基本思想与后结构理论有着紧密的关系。后结构理论拒绝主体中心化的理性,这种理性既把它的对象夸大为绝对实体又把自身的话语和思想夸张成绝对真理,没有看到思想、语言和现实之间的复杂多样关系。后马克思主义正是建立在对这种关系复杂性的认识之上,他们不是要维护绝对的同时性逻辑,而是要强调同时性逻辑的多样性前提。同时性不再被看成是在抽象原则上被封闭地构造起来的。后结构主义要揭示的具体性、中介性是

反对绝对先验总体的虚假性和主观性在先验领域把握和支配现象世界,那个被当成对立的现象世界,在解构的思想看来根本上是差异的流动、凝聚和分化、替代和置换,总体和局部不可分割地交织和转化的。后结构主义把机械主义和理想主义置于同一个层面上,反对主观构造的、主观理性主义或客观唯心主义的绝对原则,要把“总体”置于差异和区分、对抗和不断的转化的基础上。解构小心谨慎地拒绝重新引入绝对的总体,它利用形而上学话语,又不不停地瓦解这种话语,在辩证和修辞之间有意识地策略运作。

后结构理论强调的是,规定性源于区分和差异相互交织运作的效应,一般性是不稳定的并且带有某种必然性。忽视这种多样性过程中一般性的效应,才是新型的彻底相对主义,例如一些符号结构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它们在反对绝对主义的过程之中,辩护的就是彻底的相对主义,其结果是:“解构扩大的结果是连接这一概念变得完全不可思考了。”^① 后结构的策略意识来自反形而上学的教训,要拒绝的是反形而上学向形而上学的各种倒退形式。后结构主义首先在方法论和本体论的层面上运作了这种策略,进而把这种逻辑推进到西方传统的政治、道德、伦理观念上。然而在社会政治的现实结构、构造和历史形成领域,这种策略的分析到了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那里才进入到当代资本主义政治斗争领域。与德里达在西方哲学和文化传统话语中实施解构不同,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直接从第二国际开始梳理西方马克思主义,

^① 《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英文版 1985 年,第 99 页。

力求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和丰富性,回到思想和现实的真正关系之中,从而扩大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和理论基础,使其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以保持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影响力。

与全面转向微观现实领域和伦理道德文化的批判不同,拉克劳和墨菲的理论并没有放弃社会现实冲突和对抗的宏观领域。在他们看来,葛兰西是最早注意到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实践复杂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也就是说,在他看来,西方社会的无产阶级革命并非依靠简单的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或消极的机械主义历史过渡就能取得成功。西方社会的文化和市民社会的复杂结构,决定了政治斗争的重要性、复杂性和长期性。他详尽地阐述了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革命实践的文化特征,并且影响了后来一批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包括阿尔都塞、波朗查斯、奥菲、雅索普、奥林,在他们那里,实践哲学和科学的结构功能分析逐渐走向结合。应该说拉克劳和墨菲不仅仅是强调社会生活的结构分化,他们更为强调的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多样化的对抗力量,这些对抗力量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上连接起来的可能性,使领导权问题成为必须认真对待的对象。在这一点上,他不同意哈贝马斯,而是主张领导权的前提不是生活世界中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文化和交往的根本内在一致性,相反是根本的差异性。

拉克劳对发达社会新的斗争形式的回答是:

“后马克思主义不意味着在马克思之外或反马克思主义,而是重视其他社会斗争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这些斗争形式从19世纪以来已经发展了性、性别、民族、种族等等方

面的特征。后马克思主义意味着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但是它加入了所有社会构造特性中的多样化方面。”^①

在他看来,在发达社会中,社会、阶级内阶层的分化使反资本主义大众一极的建立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如何适应这种社会多样化形式建立反资本主义斗争阵线,已经是传统二元对立方法不能解决的了。从波朗查斯那里我们看到重新在立场和意识形态上规定阶级的尝试,力求建立新的统一形式。而拉克劳和墨菲运用解构的思想强调实际斗争中的有限度的领导权,而不是阶级二元对立的领导权或者在某种程度上依赖绝对同一性逻辑的领导权。他所力求的是在各种反对资本主义的力量基础上同等地“连接”起更多的斗争形式。我们说这是在当前资本全球化形势下,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左派为了应对自由主义挑战所作出的选择。

尹树广

2002年冬

北京大学承泽园

^① 2002年12月拉克劳与中译者的通信。

第二版序言

《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最初在 1985 出版,并且从那以后一直是英语世界和其它地区许多重要政治理论讨论的中心内容。从那时以来,许多事情在当代背景下已经发生了变化。至于最重要的发展,提到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就足够了。对于这个发展,我们还应考虑到作为社会政治同一性构造中新典范基础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变革。要认识 1980 年代初本书写作之时与当今时代的差别,我们必须记住,那时欧洲共产主义还被认作是充满活力的,超出了列宁主义和社会民主,而且此后吸引左翼知识分子的主要争论一直是新社会运动、文化多元主义、全球化、非领土化经济、与后现代有关的所有问题。象霍布斯鲍姆所说的那样,我们可以说,短暂的 20 世纪在 90 年代就已经结束了,今天我们必须面临的是全新的问题。

如果说时代的这些变革如此巨大,当再次读完这本不算很新的书时,我们的惊奇在于,不必对它所揭示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前景提出疑问。从那以后发生的大多数事情非常切近地按照我们书中提出的模式发展了,而且那时我们关注的核心问题已经在当代的讨论中变得更突出了。甚至可以说,我们看到这些问题的理论方面被发展和中心化了,正如这两个问题在葛兰西主义的根源和领导权范畴的核心处被中心化了一样,研究当代的问题要比近来关于

政治主观性、民主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及其政治后果的讨论相伴随的知识分子组织问题更容易。这是想扼要重述一下我们理论介入的中心点并且把某些政治结论与近来关于民主的讨论中存在的倾向相对照的原因,我们以此作为本书第二版的介绍方式。

让我们从知识分子领导权设计以及表达它的理论观点开始。197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化已经陷入僵局。在1960年代特别富有创造力的阶段之后,再继续下去受到的限制非常明显。1960年代这种扩展的根源是:阿尔都塞主义、对葛兰西兴趣的重新恢复、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在当代资本主义现实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能够合法包容的东西之间存在着日渐扩大的裂痕,这足以让人记住围绕着象“最后决定”和“相对自主”这样的概念发生的日渐让人绝望的扭曲。这种情况基本上体现在两种类型的观点上:否定任何变革,让人难以信服地退到正统的堡垒中去;以一种特别方式对新的趋向进行描述性分析,这种趋向没经过任何综合就被简单地与没有变化的理论主要部分并置在一起。

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方法是完全不同的,也许可以用胡塞尔的“沉积”和“再激活”之间的差别这种形式来表示。被沉积的理论范畴遮蔽了它们原初的创造活动,而再激活因素使它们的行动再显现出来。对于我们来说,与胡塞尔不同,再激活应该显示综合的原初偶然性。马克思主义的范畴试图建立这样的综合。与“阶级”、三个层面(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或者作为被沉积下来的盲目崇拜对象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关系这些方面无关,我们要复活使它们的话语运作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并且

自问那个关于它们在当代资本主义之中的偶然性和断裂的问题。结果是马克思的理论化领域更加不明确和多样化了,而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描述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所具有的整体化怪癖。必须明确说明的是:列宁主义的理论内容在马克思主义多样化方面一直非常贫乏,而在第二国际时期要结束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话语一直在其中运作的多样化领域正在变得更加多样化,特别是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那里,从知识分子问题到民族问题,从劳动价值论的内在矛盾到社会主义与伦理之间的关系问题,国际工人运动以及围绕着苏维埃的经验对这一运动中革命派的再认识,表现了这个多样化特征。随着第二国际时期的结束,这一多样化过程中的创造性中断了。卢卡奇对于理论和政治结合起来有不可否认的判断力,但是那没有超出整个第三国际的陈旧话语领域。卢卡奇的情况远不是孤立的一个例子。值得一提的是,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策略遭遇的问题已经被包括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核心之中,但是在内战时期这个理论发展失去了连续性。只有葛兰西——其在墨索里尼的监狱中的著述——这个孤立的例子,能被用来作为一个新的出发点,他的著述中包含的阵地战、历史集团、集体意志、领导权、知识分子和道德领导这些新概念,是我们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中进行思考的出发点。

依据以上一系列新的问题,回到(重新激活)马克思的范畴必然导致对这些范畴的解构,即置换它们可能性的一些条件,发展那些超越具有范畴应用特征的任何事情的新可能性。我们从维特根斯坦那里知道,不存在象“规则的应用”成为规则本身的一部分这种情况。为了从当代的问

题出发重新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包含对其理论核心范畴的解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后马克思主义”。在本书的序言中,我们并没有发明这个标签,它仅仅边缘性地显现出来(并不作为一个标签)。但是,由于它使我们的工作具有了一般化特征,我们才能说,就它被完全地理解为重新占有知识传统以及超越这个传统来说,我们并不与这个传统对立,并且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重要的是指出不可能只在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历史中来认识它。许多社会对抗和对于理解当代社会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外在于马克思主义话语领域,并且不能被已有马克思主义范畴和术语(特别是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令人怀疑的封闭理论体系的术语)概念化,而且,这些问题导致了社会分析的新出发点。

在此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任何研究领域实际内容的重要变化,都会通向新的本体论典型。阿尔都塞过去常说在柏拉图哲学背后,有希腊数学;在17世纪理性主义背后,有伽利略的物理学;在康德哲学的背后,有牛顿的理论。如果以先验的方式进行论证,那么严格的本体论问题要求回答:本质如何必然存在,才使特殊领域的客观性是可能的。在一定的时期,新的客体领域的结合与进行控制的一般本体论范畴之间存在一个相互反馈的过程,这可以在一般客观性领域内得到思考。例如,弗洛伊德学说之中固有的存在论,与生物学是不同的和矛盾的。从这个观点看,我们深信,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之中,变化不只是实际存在的而且还是本体论的。全球化问题和信息社会问题在控制马克思主义的话语——首先是黑格尔主义的,其次是自然主义的——之内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进行研究的基础在于给予政治连接因素以优先权。在我们看来,政治分析的核心范畴是领导权。在此情形之中,从我们上面提到的先验问题来看,本质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存在的,才能使领导权关系变得可能?条件是特殊的社会力量代表着完全不能与它相通约的总体。这样一个“领导权普遍性”的形式是政治社会唯一能够达到的。从这个观点看,我们的分析应该与在其中社会领域普遍性得到直接地、不经过领导权中介表达的那些思想区别开来,也与在其中特殊性不经任何媒介就被累加起来的那些思想区别开来(这些思想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的)。但是如果领导权的代表关系要成为可能的,它的本体论内容就必须受到限定。对于我们的分析来说,社会概念被理解为话语空间这样的观点——它使物理主义或自然主义典型范围内的代表关系成了完全不可思议的——具有高度的重要性。换句话说,我们已经说明了,“话语”范畴在当代思想中有一个谱系,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三个主要唯理智论流派:分析哲学、现象学和结构主义。这三个流派的出发点是,直接性,不经过话语中介接近事物本身——它们分别是所指、现象和符号这些幻觉。然而,在这三种流派中,直接性这个幻觉在一些点上立即瓦解了,而且必须被这个或那个话语媒介形式置换。这就是分析哲学中后期维特根斯坦著作、现象学中海德格尔对存在的分析、结构主义中后结构主义对符号的批评所包含的内容。在我们看来,它也是认识论中——在波普、库恩、费耶阿本德的理论中——发生的多样化。在葛兰西的著作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完满阶级同一性必须被非辩证媒介构成的领导权同一性替代。

在某种程度上,所有这些流派一直滋养着我们的思想,不过,后结构主义是一个我们在其中发现了主要理论思考源泉的领域,而且在后结构主义之内,对于我们阐明领导权来说,解构和拉康的理论是决定性的工具。在解构那里,非决定性概念一直是至关重要的。正如德里达著作之中所表明的,非决定性渗透到先前一直被视为由结构决定控制的领域,人们可以把领导权看成是包括在非决定性领域的决定性。更深层面的偶然性所需要的领导权,是偶然的连接,这个偶然的连接是再激活的因素的另一种言说方式,它所意味的不过是重新找回政治机构的行动,这种政治行动不是在别的地方,而是在自身之中发现了自己的源泉和动机。出于相关的理由,拉康的理论为阐明领导权的理论提供了决定性的工具。这样一来,这个范畴或者主要的能指,在某些话语领域包括承担了“普遍”结构化功能的特别要素这个概念,那个领域的任何组织只是这个功能的结果。那个要素的特性没有在本质上预定这样的功能。以类似的方式,在主体之前,主体概念建立起“同一性”范畴的中心性,并且使其成为可。在此意义上,要思考的对象是:完全依赖政治连接而不依赖在政治领域之外构造的本质——例如“阶级利益”——的领导权转换。无疑的是,与决定论相反,政治领导权连接创造了它们所声称的被代表的利益。

从关系需要被理解为领导权性质这个观点来看,并且从领导权主体构造的方面来看,“领导权”有非常明确的可能性条件。就第一个方面来说,已经被提及的结构非决定性维度恰恰是领导权的条件。如果社会客观性——通过它的内部规律决定了任何结构安排——存在(就像在纯粹

社会学的社会概念中那样),那将不会有任何领导权再连接的余地,也不会有任何作为自主活动的政治。为了获得领导权,所需要的是作为外在的和连接实践结果的要素接合起来,这些要素并不被它们自己的本质预定要纳入到某种而不是另一种类型的配置,在这个方面,原初制度行为在其特殊偶然性中的可见性才是任何领导权形态必备的条件。但是,谈论偶然的连接就是宣称主要的“政治”维度,政治因素在社会结构化中的这个特权是我们要研究的基本方面。我们这本书说明了,领导权范畴是怎样从一开始就在俄国社会民主党那里被详细阐述为进行自主政治介入的尝试,由于后发展的俄国资本主义造成行动者与民主任务之间结构上的错位,这种介入才成为可能;我们还说明了“综合的不平衡发展”怎样扩展成为帝国主义时代的一般政治条件,并且进一步指出,在葛兰西那里,这个领导权维度何以成了历史参与者主观性的基础(参与者因此不再仅仅是阶级的行动者)。我们可以补充说,在当代世界中,偶然性的维度和伴随其的政治自主性是更加明显的,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领导权再连接比葛兰西时代更为普遍化。

对于领导权的主观性,我们的观点是与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间关系的整个讨论相呼应的。特殊主义近年来已经变得相当中心化了。无疑,领导权关系具有普遍性维度,但是它是非常特殊的普遍主义形式。指出这种普遍主义形式的主要特征是重要的,它不是契约决定的结果(就像在霍布斯《利维坦》一书中的情形那样),因为领导权联系转变成了领导权主体的同一性。与黑格尔的“普遍等级”概念一样(见《法哲学原理》[德]黑格尔著,范扬、张企

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12-214页。——中译者注),从公民社会层面出发的领导权连接并不必然地与公共空间有联系。最终,与马克思主义作为普遍阶级的无产阶级概念不同,因为它并不来源于国家消亡和政治终结带来的人类最后和解;相反,领导权连接是根本性的政治。

在此情形之中,什么是内在于领导权的特殊普遍性?我们在本文中指出,它大内容来自于差异逻辑与等同逻辑之间特殊的辩证关系。社会参与者在构造社会结构的话语中具有不同的立场,在此意义上严格地说,他们是个性化的。另一方面,与压制力量相对抗,存在着构成社会内部边界的社会对抗力量,例如,一系列参与者在他们自身之间建立起等同关系。然而,超出等同关系中的不同参与者来代表链条整体是必要的。代表的方法是什么呢?正如我们所说,单一的特性被分裂了,它没有不断地去实现自己的特性,在代表超越了它的普遍性(等同链条的代表)时改变了自己。某个特殊性得以成为它自己完全无法与之相比的普遍性的代表所凭借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领导权关系。结果,它的普遍性是被损害了的普遍性,在这个普遍性之上,(1)生活处在普遍与特殊之间不可消除的紧张中,而且(2)它的领导权普遍性的功能并不是永远可以得到的,相反,总是可以被消除的。尽管我们确实在某些方面使葛兰西的洞察力激进化了,我们还是认为,在葛兰西对社团和领导权阶级之间所进行的区分中,有些东西或多或少是固有的。我们所说的受到损害的普遍性概念与象哈贝马斯那样的概念分离了,对于哈贝马斯来说,普遍性有它自己的内容,独立于任何领导权连接。但是,我们的这个概念也避免了另一种极端,利奥塔德的排他主义

所代表的也许是这个极端的典型,他的社会概念由不可通约的多元化语言游戏构成,在其中,相互作用只能被理解为侵权行为,任何政治上的再连接成了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的研究,是把普遍性当成政治普遍性的结果,也依赖于社会的内部边界。或许这会把我们引向本书的主要观点,其与对抗这个概念有关。在我们的观点中,已经解释了为什么现实的对立(康德的现实矛盾 *Realrepugnantz*)和辩证的矛盾都不能解释我们叫做“社会对抗”的特定关系。我们的主题是,对抗不是客观关系,而是在其中显示了所有客观性限度的关系。社会围绕着它的限度构成,而且这些限度是对抗性的。对抗性的限度这个概念必须不加夸张地被理解,即,不存在通过对抗关系意识到自己的“狡黠的理性”,也不存在任何类型的使对抗服从规则体系的超级游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认为政治不是上层建筑,而主张它具有社会本体论的地位。

对于我们来说,从这一论证中得到的是,社会划分是内在于政治可能性之中的,而且,就像我们在本书最后一部分中所表明的,也内在于民主政治的可能性之中。

我们要强调的是,在理论和政治层面上,对抗确实是我们当前研究的中心内容。本书出版后的15年里,就深刻变革的主要后果之一来说,看来荒谬的是,对抗这个概念从左派政治的话语中被抹掉了。但是与把这看做是进步的观点相反,我们相信,正是在此存在着主要的问题。让我们分析一下这是怎样和为什么发生的。人们可能希望苏联模式的崩溃会重新推动民主社会主义复兴,最终消除过去的对抗给社会主义计划造成的消极形象。然而,随着各种各样共产主义的失败,正是社会主义的观念变得令人

不能再相信了。新生活并没有形成,社会民主陷入混乱之中。在最近十年中,我们一直目睹的是新自由主义的胜利,而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的重新铸造,新自由主义的领导权已经变得那样普遍深入,以至于对左派的同一性产生了深刻影响,甚至被证明的是,今天左翼的计划比我们80年代初写作本书时陷入了更深的危机之中。在“现代化”的借口下,越来越多的社会民主党已经放弃了他们的左派同一性,委婉地把他们自己重新定义为“中间-左派”。他们声称,左派和右派的概念已经过时了,现在所需要的是“激进中间派”的政治。“第三条道路”的根本宗旨在于:随着共产主义的失败,社会经济与信息社会、全球化联系起来,对抗消失了,没有边界的政治将成为可能,“双赢的政治”将使社会之中的每个人都满意。这意味着,政治不再围绕着社会划分被结构化,而且政治问题已经变成了纯粹技术性的了。按照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的新政治理论,我们现在生活在“反思的现代化”条件下,在其中,政治的对抗模式,我们与他们的对抗模式,不再适用了。按照他们的说法,我们已经进入了新的时代,需要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想象政治。激进政治应该涉及到“生活”问题并且是“生成的”,允许人民和团体使事情发生,而且民主应该被想象为“对话的”形式,争论的问题应该通过相互倾听得到解决。

今天有很多关于“民主的民主化”方面的谈论。原则上来说,这方面没有什么不对,而且乍一看来,它似乎与我们的“激进和多元民主”是不矛盾的。然而,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至关重要的差别,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把我们正在提倡的东西想象为这样一种激进民主化过程:它发生在布局

不会受到影响的中立领域,而是把它看成是现存权力关系的深刻变革。对于我们来说,目标是建立新的领导权,这需要创造新的政治边界,而不是使它们的消失。当然,左翼最终接受了自由民主制度和多元主义的重要性是件好事,但是,问题在于,这伴随着错误的信条:以为它意味着放弃任何改变现存领导权秩序的努力。因此,才有舆论的神圣化、左派与右派之间边界的混乱以及走向中间派。但是,这是从东欧共产主义崩溃中得出的错误结论。要肯定的是,认识到自由民主并不是为了通过革命创造新社会所要摧毁的敌人,是非常重要的。这确实是我们已经在本书之中论证过的。当时,我们坚持重新以民主的“激进化”限定左派的设计具有必要性。在我们的观点之中,“实际存在的”自由民主问题,根本不是它们体现为自由平等原则中的基本价值问题,而是限定和限制那些价值发挥作用的权力体系问题。正因此,我们的“激进和多元民主”设计被理解为加深“民主革命”的新阶段,也被理解为争取平等和自由的民主斗争扩展到社会关系更为广泛的领域中。

尽管放弃雅各宾主义的朋友/敌人这一政治模式作为民主政治的典型,会导致对自由主义的接受,我们从没有考虑,把民主看成是发生在中间领域的利益之间的简单竞争——即使可能强调了“对话”的维度,但是现在,这完全成了许多左翼实践想象民主发展过程的方式。这就是他们不能掌握权力关系结构,并且无法想象恢复新领导权的可能性的原因。结果,在左翼和各种各样的右翼中,社会民主一直固有的反资本主义要素现在已经从它的现代化版本中被根除了。因此,对于被看成是当前唯一可行的经济秩序,他们的话语没有提供什么可以选择的东西。就像

承认完全结束市场经济必然排除不同形式的市场调节力量的可能性是虚假的一样,无选择地完全接受它的逻辑也是如此。

通常对“没有选择可能性的教条”所进行的辩护理由是全球化的,而且这个辩护不断对重新分布社会民主力量加以拒绝,其强调的理由是,在全球市场不允许任何背离新自由主义正统的当今世界,对政府进行严格财政限制是唯一可能的选择。这个观点得到了意识形态领域的赞同,这个意识形态是新自由主义多年霸权带来的结果,它还把事件的连接状态转变成历史必然性。全球化力量由于被当成是完全由信息革命驱策的,与它们的政治维度分离开来,并且表现为我们必须服从的命运。因此,我们现在被告知,不再存在左翼或右翼的经济政治,只有好的和坏的。我们以领导权形式进行思考要终结的正是这些谬论。

确实,通过本书中所详细阐述的领导权范畴来观察所谓“全球化世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前的危机远不是唯一自然的或可能的社会秩序,而是权力关系特征的表现。正是领导权转向特殊的社会力量,才导致资本主义企业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革,这个领导权将受到挑战。针对新自由主义的秩序,左翼应该开始详细阐述如何进行令人信服的抉择,而不是以更仁慈的方式简单地接受它。当然,这需要划出新的政治边界并且承认:如果不确定新的对手,就不可能有激进政治,这就是说,需要接受对抗的不可根除性。

存在着另一个领域,在其中,本书所发展的理论观点能够有利于重建政治的中心性,使当前被看成是尚有缺陷的,但是最有前途和经验的政治改革洞见力——哈贝马斯

和他的同事提出的“协商的民主”——发挥积极作用。比较一下我们的研究与他们的研究是有益的,因为,在我们提倡的激进民主概念与他们所辩护的概念之间,有实际存在的类似之处。与他们一样,我们批评了民主的集成模式,它把民主过程还原为利益和偏爱的表达。我们也批评了对以选择执行既定政策的领导人为目标的投票选举的偏爱。与他们一样,我们拒绝把这样的民主看成是贫困化:政治同一性不是预定的,而是通过公共领域的讨论被建立和重构的。我们认为,政治并不简单地是现存利益的表现,而是在塑造政治主体的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与哈贝马斯是一样的,而且,在需要考虑民主社会包含的许多不同声音以及拓宽民主斗争的领域方面,我们和他们之间是一致的。然而,我们的观点与他们的观点之间存在着以理论框架为转移的重要分歧点,不同的理论框架带来了不同的概念。在我们的工作中,扮演核心角色的对抗概念排除了任何最终调和的可能性,也排除了任何类型的合理一致的意见和完全包容性的“我们”。对于我们来说,一个并非专有的合理辩论的公共领域是不可能的。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斗争和分化,既不是不能排除的骚乱,也不是使我们要实现的和谐成为不可能的实际障碍,因为我们永远不能为了与我们合理的自我——被看成是我们为之奋斗的和谐理想——相互一致而完全把我们的个性搁置在一边。相信对斗争的根本解决最终是可能的——即使这种解决被看成是对调节性合理一致的意见的接近——远不是为民主设计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而是把它置于危险之中。以如此方式来进行理解,多元民主就变成了“自我驳斥的理念”,因为正是它的实现

因素将与它的瓦解因素相一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强调：承认任何形式的意见一致都是领导权连接的结果，对于民主政治都是至关重要，而且这个一致总是阻止民主政治被充分实现的“外界”。与哈贝马斯相反，我们没有把这看成是削弱民主设计的东两，而是看成为它的可能性条件。

最后要说的是左派所面临的最急迫的任务。近来一直可以听到一些人的声音，他们要求：“回到阶级斗争”。他们主张：左派已经变得与“文化”问题过于密切了，而且它已经放弃了反对经济不平等的斗争。他们说，现在是把“同一性政治”放在一边的时候了，而且是要再次倾听工人阶级要求的时候了。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样的批评呢？今天，我们难道不是处在与提供了我们反思背景的事态相反的情况中吗？这一反思的基础在于批评左派没有考虑到“新运动”的斗争。真实的东西是左派政党的发展已经变得主要与有损于工人的中产阶级有关了。但是，这是由于他们没有能力正视对新自由主义秩序进行选择的问题，而是非批判地接受了“灵活性”的强制，选择了所谓对“同一性”问题的迷恋。答案不是放弃“文化”斗争，回到“真实”的政治。《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的核心原则之一是需要把等同的链条与各种反对不同从属形式的民主斗争联系起来。我们认为，反对男性至上主义、种族主义、性歧视的斗争以及环境保护，需要与左翼领导权设计中的那些工人连接起来。用最近变得时髦的术语来说，我们强调的是，左派需要应付“再分配”和“再认识”这两个问题。这就是我们的“激进和多元民主”所意味的。

今天，这样的计划仍然与过去一样是中肯的——并不是说它已经变得更容易实现了。确实，它有时好象不是

“激进化”民主的思考,最急迫的是要保护它,以防来自内部的威胁。与要加强它的制度化相反,看来民主的胜利已经削弱了它的共产主义对手。对民主进程的不满正在变得令人担心,而且对政治等级方面的冷嘲热讽开始广泛地蔓延开来,以至于削弱了议会制度下公民的基本信任。当然,对于自由民主社会中当前的政治状态并不存在高兴的基础。在一些国家之中,这种形势正在被右翼平民主义政治煽动家所利用,而且象海德尔和贝鲁斯科尼那样发迹的人在那里证实了:那些花言巧语可以吸引许多的追随者。只要左翼放弃领导权斗争并且坚持占据核心领域,这种局势就很少有希望能被扭转。可以肯定,我们已经开始看到,出现了跨国公司企图把它们的权力强加于世界的抵制。但是如果没有关于什么是组织社会关系的不同方式的想象,不恢复政治对于市场力量统治的中心性、那些运动就仍然会是防御性的。为了在民主斗争之中构造等同的链条,人们需要建立一个边界,也需要规定一个对手,但这是不够的,还需要知道为什么斗争,要建立的社会类型是什么。这需要左派充分掌握权力关系的本质和政治动力学。处在危险中的是新领导权的大厦,因此我们的座右铭是:“回到领导权斗争中去”。

2001年7月

导 论

左翼思想今天处在十字路口之上,过去“鲜明的真理”——经典的政治分析和推理形式、斗争力量的本质、左翼斗争和目标的真正意义——受到了瓦解这些真理基础的巨大历史转变的挑战。这些转变无疑相应于这些失败和失望:从布达佩斯到布拉格和波兰政变;从喀布尔到越南和柬埔寨共产主义胜利的余波,使得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构想以及实现它的道路越来越产生疑问。这已经导致了对左派思想传统上构造的理论和政治基础进行批判思考,它是腐蚀性的也是必要的。不过还有比这更多的,构成那些转变的所有新的积极现象使得对下面这些现象进行理论再思考的任务更加急迫:新兴起的女权主义,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和性少数的抗议运动,人口边缘阶层发动的反制度化生态斗争,反核运动,资本主义外围国家非典型化的社会斗争——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社会斗争存在于更广阔的区域范围,它们正在开创潜在的、甚至不只是潜在的,而是更自由地走向民主和平等社会的趋向。

斗争的增殖首先是相对于合理化和组织化社会结构即社会秩序而言的社会对立过剩的表现。许多声音,特别是来自自由-保守主义阵营的,一直坚持认为西方社会面

- 1 面临着控制危机^①和平等主义威胁带来的解体危险,然而,新的社会斗争形式已经使本书要与之对话的理论和政治系统也陷入危机之中。这些系统涉及到左派经典话语、已有的理解社会变革原因的典型模式、政治空间的结构化以及历史变革的特定方向。现在正处于危机之中的是整个社会主义概念,它停留在作为大写革命角色的无产阶级本体论中心之上,作为从一种社会类型到另一种社会类型转变的基本因素,依赖于会导致要素空洞化的完美整体和同质化集体意志的幻想前景。当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化特征不可改变地消解了那种政治虚构的最后基础。充满普遍主体和围绕单数形式概念化的虚构一直把社会假定为能够在某种阶级立场上被理智掌握和重构的概念结构,即假定通过缔造性政治实践可以确立的合理化和透明秩序。今天,左派正在目睹雅各宾派幻想最终瓦解的一幕。

当代社会斗争的极大丰富性已经导致了理论危机,正是在理论与政治之间双向运动的中间点上,我们自己的话语才得以定位。我们一直努力防止印象派和社会学家经常不顾本身话语条件的描述去填补危机带来的理论真空。我们的目标一直是严格的对立:集中在那些乍一看来是被赋予特权的许多危机方面凝聚点的话语范畴上,以及在多样折射的各个层面上解释可能的历史意义。所有话语折衷主义和摇摆从一开始就被排除了。正如开创古典时期的“宣言”所说,当一个人进入新的领域时必须参照旅行者的例子,“当旅行者们发现自己迷失在森林里时,他们知道

^① 页边框上的数字为英文版页码——中译者注。

不应该从一个方向到另一个方向地徘徊,更不必说停留在一个地方,而是明白,应该继续在一个笔直的方向上行走,不因为轻微的原因改变方向,即使这个方向是他们最好的选择机会。用这种方法,即使他们没有能准确地达到他们想去的地方,至少也会最终到达某个地方,那里总比要离开森林中心地带更好些。^①

我们进行分析的线索一直是领导权概念的变化,这一概念被视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化的话语层面和关节点。我们的主要结论是在“领导权”概念背后隐藏着比增补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范畴的政治关系类型更多的东西,事实上它提出了与那些范畴相反性质的社会逻辑。面对那种把社会历史当成理智上可以把握的、围绕概念化规律可以解释的总体这一经典马克思主义理性主义,领导权的逻辑从一开始就扮演了补充和偶然作用的角色,要求在本质和形态学有效性不受任何怀疑的进化典型中引进事态的不平衡(本书的中心任务之一是确定这一特殊的偶然性逻辑)。从列宁到葛兰西,当这一概念的应用领域逐渐拓宽时,偶然的表达领域也扩展了,而且那个一直作为马克思主义基石的“历史必然性”范畴退回到理论地平线上。正如我们将在后两章中讨论的,“领导权”概念中固有的社会逻辑扩展和规定性——在超出葛兰西的方向上——将为我们提供一个切入点,由此社会斗争的特性可以被思考,而且它允许我们为以激进民主为基础的左派勾画出新的政治学。

有一个问题仍然需要回答:为什么我们要通过批评和

^① 笛卡儿,《方法谈》,选自《哲学作品》,第1卷,剑桥1968,第96页。

解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各个话语层面来提出这项任务？首先，我们说，并没有一种通过它们“真实”可以不需要媒介来加以谈论的话语或范畴体系，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内解构地运作，并不要求书写“普遍的历史”，把我们的话语描述为单一要素和知识的线性过程。正如规范认识论时代已经趋于终结，普遍话语的时代也是如此。与本书中所提出的那些相类似的政治结论一直从完全不同的话语构造方面被估计——例如从基督教的某种形式、从与社会主义传统不同的自由主义话语方面——这些结论没有一个可以指望成为社会真理（或萨特提出的“我们时代中不可超越的哲学”）。然而，正是由于这一原因，马克思主义是那些通过它们阐明新政治概念才得以可能的传统之一。对于我们来说，这一出发点的有效性完全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构成了我们自身的过去这一事实上。

难道不是这样吗？在打了折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性的资格和范围内，我们正在终结深深内在于理论中的一些东西，即凭借一元论的范畴寻求获取本质或深层历史意义。答案只能是肯定的，只要我们拒绝优先化的普遍阶级本体论立场基础上的任何认识论特权，就可能真正讨论马克思主义范畴的现实有效性程度。在这一点上我们明确地指出，现在我们正处于后马克思主义领域，不再可能去主张马克思主义阐述的主体性和阶级概念，也不可能继续那种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过程的幻象，当然也不能再继续没有对抗的共产主义透明社会这个概念，如果本书的认识主题是后马克思主义的（*post-Marxist*）的，它显然也是后马克思主义的（*post-Marxist*）。[斜体字强调的是，如果本书一方面是后马克思主义的（*post-Marxist*），另一方面，它确实仍然把马克思主义

(Marxist)作为出发点。——引自拉克劳2002年12月与中译者的通信,中译者注]在马克思主义之内,正是通过某种直觉和话语形式的发展,以及禁止和消除其他的话语形式,我们才构造了按照我们的观点看可能是激进、自由和多元的民主斗争形式有用工具的领导权概念。这里涉及到葛兰西,尽管部分是批判性的,却具有首要的重要性。在本书中,我们一直力图恢复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它几乎被斯大林时期和后斯大林时期流行的、枯竭化的单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形象淹没了,而且现在——尽管带着对立标志——几乎原封不动的地被某种当代“反马克思主义”形式重现。显赫的、均质的、无懈可击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辩护者以及新式的反马克思主义专家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辩解或诽谤同样植根于教条主义角色从属的、粗糙的概念的程度,也没有认识到其基本的信仰从属于斯大林主义幻觉的一致性程度。相对立地,我们在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研究中试图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多样性,在相当大的不同种类和相互矛盾的程度掌握众多话语序列——它们构造了自己内部的结构和丰富性,使自己有幸成为政治分析的参照点。对伟大理性传统的超越从来不会发生在突然崩溃的形式之中,但是河水流动的方式在于:形成于共同的根源,在各个方向上扩展并且与别的源头流下的河流汇合。这就是为什么那些经典马克思主义领域中产生的话语能帮助新左派进行思考的原因:通过它们遗赠的一些概念,改变或废弃另一些,并且在塑造社会多样性的无尽解放话语的交互文本中冲淡自己。

4

5

目 录

中译者前言/1

第二版序言/1

导 论/1

1 领导权:概念的谱系/1

罗莎·卢森堡的两难困境/2

危机,零度/10

对危机的第一个反应:马克思主义正统的形成/16

对危机的第二个反应:修正主义/30

对危机的第三个反应:革命的工团主义/40

2 领导权:新政治逻辑的艰难浮现/48

综合发展与偶然性的逻辑/50

“阶级联盟”:在民主与权力主义之间/58

作为分水岭的葛兰西/70

社会民主:从停滞到“计划主义”/79

本质主义的最后堡垒:经济/83

面对结论/95

3 超越社会的实证性:对抗与领导权/100

社会形态和多元决定/104

连结和话语/114
“主体”范畴/127
对抗和客观现实/137
同等和差异/143
领导权/152
4 领导权与激进民主/165
民主革命/169
民主革命和新的对抗/177
反民主的攻势/192
激进民主:新左派的抉择/197
索 引/218
译后记/227

1

领导权：概念的谱系

我们将从追溯“领导权”概念的谱系开始。应该强调的是这不会成为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积极性的概念谱系学。事实上，用福柯的措辞直率地来说，我们的目标是要建立“关于压制的考古学”。领导权的概念并没有界定新型关系的详细特性，它不过是要填充历史必然性中被打开的裂缝。“领导权”将暗示缺席的总体，并且暗示重组或重新连接的不同尝试，这些尝试在克服本源缺席中使斗争有可能赋予意义，使历史力量被赋予充分积极性。这一概念出现于其中的语境会有断层（在地质学意义上）、有不得被弥补的裂缝和必须被克服的偶然性，“领导权”不会是对同一性的宏伟阐释，而是对危机的反应。

甚至在政治影响有限、出身微贱的俄国社会民主党那里（指工业不发达社会中的社会民主党——中译者注），由于危机和普遍历史发展的崩溃，已经间接要求领导权概念的暂时介入。随后，由于帝国主义时代阶级斗争的具体形式需要政治思考的新形式，它成了列宁主义的拱心石。最终，在葛兰西那里，这一术语需要超出战术和策略性运用的新的中心性类型，“领导权”成为理解具体社会形式中统

- 一的关键性概念。然而，这一术语的每一次扩展都伴随着我们可以暂时称为“偶然性的逻辑”的事物的扩展，在它的变化中，这一表达从破裂处滋生出来，并且退出作为第二
- 7 国际马克思主义拱心石的社会“历史必然性”范畴的认识地平线。在危机的发展中，领导权理论的转向以及对它的不同反应构成了我们研究的对象。

罗莎·卢森堡的两难困境

让我们回避任何返回到“本源”的诱惑，在此刻及时地洞察和尝试着去发现领导权逻辑所要填补的真空。这个在多样化维度上给出的随意性开端，即使没有运动轨迹的含义，至少也给我们提供了危机的维度。正是在“历史必然性”这一破碎镜子的多样化复杂折射之中，新的社会逻辑开始迂回地表达自己，设法通过怀疑它所说的条件的准确性来思考自己。

1906年，卢森堡出版了《群众罢工，政党和工会》，这一文本中简洁的分析——已经向我们展现了对于我们的主题是重要的那些不确定性和重要的批判领域——给我们提供一个参照性的起点。罗莎·卢森堡处理了这一特别的主题：作为政治手段的群众罢工的作用和意义。对于她来说，这些主题意味着对社会主义中两个关键性问题的考虑：工人阶级的联合和欧洲革命道路。作为首次俄国革命主要斗争形式的群众罢工，在德国被当成有精确机制和可以设计的工人斗争。罗莎·卢森堡的主题是众所周知的：在关于德国群众罢工作用的讨论几乎已经完全集中到政治罢工上时，俄国的经验早已经证明了群众罢工的政治和

经济维度之间存在的相互作用、共同性和经常的相关性。在俄国沙皇专制国家压制的环境下,满足局部需要的运动不可能局限于自身之中,它必然被转变成抵抗的一个典型和标志,点燃和催生别的运动。这些情况出现在无法预期的时刻并且以无法预料的形式扩展和普及开来,结果是它们超出了任何政治或工联主义领导者的控制和组织能力。这就是卢森堡“自发主义”的含义。政治与经济斗争之间的统一即工人阶级的统一是运动中反馈和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一循环运动正是革命过程。

8

罗莎·卢森堡认为,如果我们从俄国转向德国,情况会更加不同。在不同种类的工人中间,在各种运动的不同需要之间,在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之间,主要的趋向是分裂。“只有在革命时期的激烈氛围中,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局部小规模斗争才能变成一场总的爆发。在德国,每天中发生的工人与雇佣者之间极端暴力的、最残酷的冲突没有超出个别因素的限度……这些情况没有一个突然转变成共同的阶级行动,而且当它们无疑变成具有政治色彩的局部群众罢工时,并没有形成一场大的风暴。”^① 这一局部和分裂不是偶然事件:它是只在革命中被压倒的资本主义国家结构性作用的结果。“即使是被历史决定的,政治与经济斗争之间的分离,以及它们各自独立的事实也只是议会时期人为的结果。一方面,在和平与‘正常’的资产阶级社会发展过程中,经济斗争被分成许多个别的、在每一个生产分支中的斗争;另一方面,政治斗争并没有被大众自己引向直接的行动,而是处于同资产阶级国家一致的形式之中,

^① 罗莎·卢森堡《群众罢工,政党和工会》,伦敦(未注明出版日期),第48页。

采取了代表、合法的表现形式。”^①

在这些条件下，如果按照完全不同国家中存在的因素：政治自由的缺乏、俄国工人阶级的贫困可以解释的俄国革命爆发，那么它不是无限期被拖延的西方革命的前途吗？在这里，罗莎·卢森堡变得犹豫了，并且有些相信的提出了典型化道路，即试图使俄国和德国无产阶级的差别最小化。这一差别表现在贫困、德国工人阶级各个阶层缺乏组织以及相对照的俄国无产阶级最先进部分的存在。但是相反在德国有什么呢？他们难道不是被资本主义扩张一扫而空的残余部分吗？在那个情况下，什么能保证革命形势的出现？回答这个疑问的答案——罗莎·卢森堡的书中并没有在任何地方阐明它——在后边的几页中却突然和毫不含糊地给予我们：“（社会民主党）现在并且永远必须加速事物的发展、努力去促成事件。他们没能这样做，而是随时随地地突然为群众罢工提出‘口号’。但是第一位的和重要的是使无产阶级的广大阶层明白革命阶段的必要冒险，社会内部构造和政治结果。”^② 因而在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必要的规律”本身作为未来革命形势的保证被建立起来。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清楚了，由于再不可能有资产阶级民主的变革（原文如此），即将来临的革命形势只会被确定在社会主义的方向上，在成熟的世界资本主义——它妨碍了在资产阶级阶段无产阶级稳固它自己的斗争——控制的历史环境中，与专制主义斗争的俄国无产阶级是欧洲无产阶级的先锋并且指出了德国无产阶级自己的

^① 罗莎·卢森堡《群众罢工，政党和工会》，伦敦（未注明出版日期），第73,74页。

^② 罗莎·卢森堡《群众罢工，政党和工会》，伦敦（未注明出版日期），第64,65页，原著中有加重号的。

未来。从伯恩斯坦到葛兰西讨论的欧洲社会主义策略中非常重要的东西方差别问题被放弃了。^①

让我们分析一下这一著名段落的各种构成要素。关于阶级统一的构造机制,罗莎·卢森堡的立场是清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是必然分裂的,并且重构它的统一体只是通过革命过程才出现的。然而,革命重构的形式由特殊机制组成,这一形式与机械论的解释没有任何关系,正是在这里自发主义在发挥作用。人们可能认为,“自发主义”的理论只是由于革命采取的形式多样性和复杂性而确信预见革命方向的不可能性,然而这一解释是不充分的,因为危险的东西不仅是分散斗争中固有的复杂性和多向性——当这些情况被分析家和政治领导人观察到时——还有建立在复杂性和多向性基础上的革命主体统一体的构成。这向我们表明,在试图确定卢森堡“自发主义”的意义时,我们不只是必须集中在斗争形式的多样化上,也要集中在它们在自身之中建立的关系以及由它们而来的统一作用上,在此,统一的机制是清楚的,在革命的形势中不可能确定每一个孤立斗争的真正意义,因为每一个斗争都超出了实际状况并且在群众的意识中代表反对体系的世界性斗争的一个要素。因此,在稳定时期,工人的意识——围绕着其历史利益构造的世界意识——是“潜在的”和“理论性的”,在革命的情况下,它变成活跃的和实践的。可以说,在革命的情况下,每一个运动的意义以分裂

10

^① 记住伯恩斯坦关于德国群众罢工中的干预这方面的讨论是重要的,它涉及东西方两个基本的差别——西方市民社会的抵制和复杂性以及俄国国家的软弱——这些后来成了葛兰西讨论的中心。关于这次讨论的总的评价,见萨尔瓦多里的‘La socialdemocrazia tedesca e la rivoluzione russa del 1905. Il dibattito sullo sciopero di massa e sulle differenze fra Oriente e Occidente’; E·J·霍布斯鲍姆等编的 *Storia del marxismo*, 米兰 1979, 第 2 卷, 第 547 ~ 594 页。

的形式表现出来,除了它的特别需要,每一个运动还代表了整个革命过程,而且在由多种别的因素决定的那些斗争中,这一总的作用是明显的。不过,这一象征的典型意义在于:所指超出了能指。^①阶级的统一因而是象征性的统一。无疑这是卢森堡的分析达到的最高点,它最大化地拉开了与第二国际正统理论的距离(第二国际把阶级统一仅仅看成是经济基本规律的结果)。在这一时期许多其他分析中的主角是偶然性——超过了“结构的”理论化——很少有文本像罗莎·卢森堡的一样肯定这一偶然性的特殊机制并且认识到它的实践作用。^②

现在,一方面,罗莎·卢森堡的分析已经增加了对抗点和斗争的形式——从现在起我们称之为主体的立场——达到了超出工会和政治领导人控制这些斗争能力的程度;另一方面,它已经使象征化的多元决定作为这些斗争统一的具体机制。然而在这里,开始出现了问题,因为对于罗莎·卢森堡来说,多元决定的过程构成的正是严格的统一:阶级统一。然而自发性理论并没有在逻辑上支持她的结论,相反,正是自发性理论的逻辑意味着被统一起来的主体类型仍然会极大地处于不确定之中。在俄国专制国家的情形中,如果对抗点和多样化斗争的多元决定条件是压制性的政治环境,为什么阶级限制不能被超越并且导致以

^① 参照 T·托多洛夫:《符号理论》,巴黎 1977 年,第 291 页。“应该说,有一个浓缩,每一次单独一个能指都引导我们去理解更多的所指;或者更常见的是:每一次那个所指都比那个能指更丰富,伟大的德国神话学家克罗伊策已经以这种方式定义了符号:‘存在和形式的不适应,并且内容超出了它的表达。’”

^② 尽管罗莎·卢森堡的著作是对群众罢工机制的最高理论说明,后者被整个新左派作为斗争的基本形式,参见 A·潘内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革命战略》,选自 A·萨马特编的《潘内克和哥尔特的马克思主义》,伦敦 1978 年,第 50~73 页。

大众和民主为根本基础的、部分上被统一起来的主体？甚至在卢森堡的原文中——尽管作者教条僵化，对于她来说每一个主体必须是阶级主体——还是在许多地方超出了阶级范畴。“贯穿整个 1905 年春天并且到夏天的中间阶段，整个无产阶级反对资本的罢工几乎使整个帝国持续地陷入动荡之中。这一斗争一方面使所有的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职业者卷入进来，另一方面也渗入到家庭服务人员、小警官甚至流浪无产者阶层中，从城市扩展到乡村地区，而且甚至敲开了军营的铁门。”^①

让我们来说明一下我们这个问题的意义：如果工人阶级的统一是在革命的多元决定过程之外形成的基础性事实，关于革命主体阶级特征的问题就不会产生。确实，政治和经济斗争会成为先于斗争本身的阶级主体的对称表达，但是，假如统一是一个多元决定的过程，就应该提供为什么政治主体与阶级立场之间必然一致的独立性解释。尽管罗莎·卢森堡没有提出这样的解释——事实上她甚至不理解这个问题——她的思想背景还是使资本主义发展客观规律的必然特征方面的主张变得清晰了，即这一规律促成了中间阶层和农民的无产阶级化，并且导致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直接对立，因此，自发论规律的创新

^① 罗莎·卢森堡，第 30 页。

作用看来一开始就受到了限制。^①

无疑,这个创新作用受到限制,因为它们发挥作用的领域完全被划定的,但是在第二个并且是更重要的意义上来说,原因还在于:自发论的逻辑和必然性的逻辑作为两个不同的确定原则并没有汇集起来以便解释某种历史情况,而是通过它们交互限制的作用,彼此相互影响的不同逻辑功能来进行解释。让我们细致检查一下它们的分歧之处,自发论的逻辑由于正是通过每个实际意义的瓦解而发挥作用的象征逻辑,而必然性逻辑是这样的事实逻辑:它通过决定来发挥作用,消除了任何偶然性变化的意义,因为它们都是必然的。既然如此,两种逻辑的关系是边界关系,能够在相互的方向上扩展,但是却永远不能克服引入分析中的不可消除的二元论。

事实上,我们在此证明了两重真空的出现,从必然性范畴来看,逻辑的二元性已经与决定/非决定的对立相融合,即它仅仅指出这一范畴运作的限度。但是自发论的观点中出现了同样的事情:“历史必然性”领域本身扮演了象征活动的限度。这个限度事实上是局限性。如果作用的局限性特征并不是直接明显的,这是因为它被当成两个明确和不同的解释原则的汇合,两个原则在各自的领域中是

^① 近来有大量的文献讨论了罗莎·卢森堡自发论宿命论或非宿命论的特征。然而我们的意见是,这些讨论过于强调了相对次要的问题,例如在机械式的崩溃和有意识的阶级介入之间的抉择。就我们所知,关于资本主义将机械式崩溃的主张是那样的荒谬,以至于没有人再赞成它,相反,决定性的问题在于:理解反资本主义斗争的主体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是否构造它的完整同一,而且在此方面罗莎·卢森堡是毫不含糊的。由此原因,正像诺曼·赫拉斯主张的,关于社会主义不可避免性的主张不是对时髦的话语或心理需要的结果所作的让步(参照 N·赫拉斯:《罗莎·卢森堡的合法性》,伦敦 1976),而是给她的整个理论和策略结构提供意义的关节点。因为按照罗莎·卢森堡的观点,社会主义的到来必定完全建立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上,革命主体只能是无产阶级。(《论卢森堡独断地坚持作为工人阶级革命觉醒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贫困化理论》见 G·巴迪亚的 *L'analisi dello sviluppo capitalistico in Rosa Luxemburg*, Feltrinelli 学院, Annali, 米兰, 第 252 页)

有效的并且相互不同,互相是对方真正的否定面。这个二元论创造的两重真空由此可以变得明白了,然而,弄清楚真空并不等于填补了它。

在我们分析双重真空的变化形式之前,我们可以把自己暂时放在它之内并且练习它惟一允许我们玩的游戏:即在两个对立的逻辑分开的边界上来回穿越。假如我们拓宽与历史必然性一致的领域,众所周知的抉择在于:我们选择通过必然规律,资本主义走向无产阶级化和危机,还是选择这些必然规律没有像期待的那样起作用。在此情形中,正是按照卢森堡的话语逻辑,不同主体立场之间的分裂也不再是资本主义国家故意制造的结果,而且变成了持久的现实,对于整个经济和还原论的概念来说,它本质上是零和博弈。相反,假如我们在另一方向上移动边界,在政治主体的阶级本质失去其必然特征的地方,显示在我们眼前的景象根本不是幻想的:它是第三世界社会斗争采取的多元决定的独创形式,构筑政治的同一与精确的阶级分界没有多大关系。正是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残酷地驱散了某种阶级联合必然性特征的幻觉;它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新的斗争形式,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过去的几十年间,我们见证了新的政治主观性形式超出社会和经济结构范畴的界限不断出现,领导权概念将正好出现在不同斗争和主体立场间不确定联合以及分裂的经验控制的地方,它将在证明了“必然性”范畴已经退出社会地平线的政治话语领域中给社会主义者提供新的答案。面对通过二元论的扩散——自由意志/决定论、科学/伦理、个人/集体、偶然论/目的论——来解决一元论实在主义危机的企图,领导权理论将把它的回答置于使一元论/二元论的抉择成

为可能的领域置换基础上。

在离开罗莎·卢森堡之前，最后一点，在她的话语中“必然规律”作用的局限性也在另一个方向上——即发达资本主义“显著”倾向这一政治结论的局限性——发挥作用，理论的作用不是去理智地解释破碎和分散的显著倾向，而是去确证那样的倾向具有暂时的特征。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的分裂是危机明显的征兆，这个危机——马克思主义“正统”提供的惟一答案——是我们进行分析的起点。然而它需要我们把自已置于先于开始的地方，以便去识别陷入危机的典型。为此我们可以参照特别清楚和系统的文献：考茨基 1892 年对爱尔福特纲领的评论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宣言。^①

危机，零度

《阶级斗争》是考茨基提出理论、历史与策略之间不可分离地相互统一的典型文本。^②当然，从我们今天的观点看，它显得特别天真和单纯，但是我们必须探究这个单纯性的各种维度，因为它们让我们认识到这个典型的结构特征以及在世纪更替时产生危机的原因。

这个范例在原初的文字意义上是简单的，考茨基在其中相当明确地提出了关于社会结构及其对抗日益简单化

^① 考茨基：《阶级斗争》，纽约 1971 年。

^② 考茨基反对修正主义全部斗争的目标是要保护纲领的概念不作为一定政治需要的综合——在斗争的特殊阶段被指定去建立党的积极性，并且有时同样是可以更改的——但是，作为稳定的理论和政治集团，是在两者失去了各自的自主领域以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决定性意识形态的范围之内。（L·帕吉：‘Intellettuali, teoria e partito nel marxismo della Seconda Internazionale.’介绍 M·阿德勒的文献见 *Il socialismo e gli intellettuali*, 巴黎 1974 年。）

的理论。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向贫困化和少数几个企业掌握财富发展,而且伴随着工人阶级的日益贫困,大量不同社会阶层和职业类型迅速地无产阶级化。这一贫困化和作为其根源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规律是工人阶级内部真正自治领域及其功能的障碍:经济斗争只能有适度的和不稳定的成功,并且导致了工会事实上对党组织的附属,党可以通过征服政治权力来单独地充分规定无产阶级的立场。结构化的资本主义要素或情况也缺乏任何相对自主的形式,例如国家以最粗暴的工具形式出现。因此,考茨基的典型的简单性首先存在于对资本主义充满结构性构造差别的体系的简单化之中。

14

不过,在很少被提到的第二种意义上,考茨基的典型也是简单的,它对我们的分析来说也具有至关重要性。在此,这一点没有达到那样的程度,以至于这个典型减少了相关结构差别的数量,而是通过归因于被理解为总体内部精确位置的个别意义使它们固定起来。在首要的意义上,考茨基的分析只是经济主义和还原论的,但是假如这是惟一的问题,矫正物就只会是必须提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相对自主性”,并且通过社会地形学中的例子的增加提出更复杂的分析。然而每一个增加的例子或结构要素就会有与考茨基的典型一样被固定和单一化的特性。

为了说明这一意义的单一性,我们来分析一下考茨基怎样解释经济和政治斗争的关系:“有时候,一些人试图把政治与经济斗争对立起来,并且宣布无产阶级会对两者进行唯我独尊的解释。事实在于这两者不能被分离,经济斗争需要政治权力而且它们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为了赢得和维持它们,在最终的分析中,最有力的政治斗争在另一

方面是经济斗争。”^①

罗莎·卢森堡也肯定两种斗争的统一性，但是她是从最初的多样性开始的，并且统一性是联合——任何事先没有被固定的连接形式的分立要素多元决定的结果。然而对于考茨基来说，统一是起点：工人阶级靠经济计算的力量在政治领域进行斗争。通过纯逻辑的转变不可能由一种斗争过渡到另一种，在罗莎·卢森堡那里，每一个斗争都超出单一的意义，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它在第二个象征维度上是加倍的。它的意义也不是固定的：因为它依赖多变的、从她的自发论来看是抵制任何先验决定的连接（在我们先前所说的限度之内）；另一方面，通过向按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已经被固定的特殊结构位置还原，考茨基使每个社会对抗的意义或要素简单化了。在《阶级斗争》中，资本主义历史被看成由纯粹内部的关系构成。我们可以从工人阶级到资本家、从经济领域到政治领域、从制造业到垄断进行过渡，不必立即从内部关系和被封闭的典型的可理解性出发。无疑，资本主义被他当成客观的社会现实，前者只是在与后者联系的基础上瓦解。资本主义的变化不过是后者内在的倾向和矛盾的展开，在此，必然规律没有被任何事情限制，这就是使《阶级斗争》陷入危机的根本原因。

最后，在第三个维度中的简单性——涉及理论本身的角色。如果拿考茨基这一早期著作与其他更早或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它包含着相当惊人的特点：它不仅把自身表述为对历史根本意义的阐明，

^① 考茨基，第 185、186 页。

而且表述为所有经验的系统化和普遍化。由于没有社会象形文字的解码,工人运动与理论之间被看成是完全相一致的。亚当·普鲁泽夫斯基已经指出,在考茨基的文本中阶级统一体构造方面的特点是:尽管马克思从《哲学的贫困》起就把工人阶级的经济介入和政治组织之间的统一看成是一个未完成过程——这是一个要被填补的“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之间的裂缝,考茨基还是认为好像工人阶级已经构造了自身的统一。“看来考茨基相信,到1890年,最下层构成了一个阶级是既成事实;它已经形成为一个阶级并且将在未来维持下去。组织起来的下层阶级除了实现他们的历史任务外什么也没有,而且,党只能参与到它的实现之中去。”^①类似地,当考茨基涉及日渐增长的无产阶级化和贫困化时,对于资本主义危机的必然性或社会主义的必然发展,他要说的并非是通过分析揭示出来的潜在趋向,而是具有可以观察到的前两方面的经验现实和第三方面的短期变化。尽管在他的话语中必然性事实上是支配性的范畴,它的功能也不是要保证一个超出经验的意义,而是要使经验本身系统化。

16

目前,尽管支撑这个乐观主义和简单化的要素结合被描述为阶级构成普遍过程的一部分,它还是仅仅代表了德国工人阶级特殊历史构造的完成。首先,德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自主性是两个失败的结果,一个失败是1849年后,德国资产阶级使自己成为自由民主运动的支配力量;另一个失败是拉萨尔的工团主义企图把工人阶级整和到俾斯麦的国家中去。其次,1873年到1896年的大萧条以及伴随

^① 亚当·普鲁泽夫斯基:《贫困者成为阶级,从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到近期关于阶级形成过程的争论》,引自:《政治与社会》,第7期,1997年。

的使所有社会阶层产生的经济不安全感,滋长了关于资本主义即将崩溃和无产阶级冒险革命的乐观主义。第三,工人阶级只有较低程度的结构复杂性:工会是初级的并且在政治和财政上从属于政党,而且在20年压迫的这个环境下,期待通过工会活动改善工人的条件似乎相当有限。只有1890年建立的德国工会总委员会艰难地提出它对工人运动领导权的要求,它处于地方工会权力的抵制和社会民主党的全面怀疑主义之中。^①

在这些条件下,工人阶级的统一和自主、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实际上看来是经验事实。这些都给考茨基话语的可读性提供了条件。然而在现实中,严格来讲这一形势只出现在德国,或者,至多出现在某个典型的欧洲国家,在那里自由资产阶级是软弱的——并且当然与那些具有强大自由(英国)和雅各宾民主(法国)传统的、伦理和宗教同一性控制那些阶级的(美国)国家中的工人阶级形成过程相比。但是由于在那些马克思主义者心目的圣经中,历史发展趋向越来越简化的社会对立,具有特别孤立和遭遇的德国工人运动过程获得了其他国家形势必然趋向的典型的威望,而且他们被看成是只能不充分地接近它。^②

萧条的结束使这个典型开始出现了危机。转向“组织

^① 例如在1893年社会民主党的科隆会议上,利吉恩在抗议《前进报》的声明时所根据的是:“政治权力的斗争在任何时候都仍然是重要的,而从经济斗争中可以发现工人阶级总是深深地分裂的,小规模斗争当然也会有它的利益,但是那些利益对于党的最终目的来说只有次重要的意义。”利吉恩问道:“这些来自党的机关的论点足以吸引不同的工人们参加到运动中来吗?我对此真的怀疑。”引自N·本文努蒂的《关于党和工会的文献选,Partito esindicali in Germania 1880-1914》,米兰1981年,第70,71页。

^② 在这种探讨阶级统一问题的方式中,偏离典型以对于典型的充分有效性是“偶然”和“妨碍”的形式被概念化了,它继续控制着编史工作的传统。例如迈克·戴维斯,在一篇有趣的鼓动性文章中,当揭示美国工人阶级形成的特性时,把这些概念化为偏离了在历史的某些时刻最终会实现自己的标准模式。(《为什么美国工人阶级是不同的》,《新左派评论》1980年,第9-10期)

资本主义”以及确保了延续到 1914 年的繁荣,使得对“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某种期待变得不确定了。在新的条件下,成功的工会经济斗争浪潮巩固了他们组织的权力以及在社会民主党内的影响,但是在此,工会和政党领导权之间也形成了持续的紧张状态,以至于统一和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决心之间日渐变得成问题了。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形成了自发的领域——它意味着任何类型的统一只能通过不稳定和复杂的连接形式获得。从这一新的观点看,一个重要的未知因素出现在考茨基 1892 年典型的各种结构要素简单顺序以及表面化逻辑之中,而且由于理论与纲领之间的关系是总的牵连之一,政治危机在理论上被加倍扩大了。1898 年托马斯·马萨瑞克启用了不久以后开始流行起来的表达形式:“马克思主义的危机”。

这一危机,作为从世纪转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其间马克思主义者讨论的背景,看来已经被两个基本的因素控制:对社会不透明性、日渐组织化的资本主义复杂性以及对其进行抵制的新意识;根据正统典型应该被统一起来的社会代表的不同立场之间的分裂。^① 在一封致拉加代勒的信的著名段落中,安东尼·拉布里奥拉陈述了修正主义争辩的开端:“不假,在所有关于这一论战的谣传背后,有一个重大的和基本的问题:前些年激烈的、活生生的、有些早熟的希望——那些对过于精确的细节和轮廓的期待——现在正遇到最复杂的经济关系和最难以理解的错综复杂的政治世界。”^②

^① 我们必须弄清楚,当我们谈论“分裂”和“分散”时,总是涉及要求分散和分裂因素统一的话语。假如这些“因素”在不涉及任何话语时被考虑,对它们的术语的运用,例如“分散”、“分裂”,无论如何都缺乏任何意义。

^② A·拉布里奥拉: *Saggi sul marxismo storico*, 罗马 1968 年,第 302 页。

把这一点当成只是暂时的危机将是错误的，相反，在那时马克思主义最后失去了它的清白。至于它的范畴的典型顺序则遭遇到了日渐增长的非典型局势的“结构压力”，把社会关系还原到内在于那些范畴的结构因素变得更加困难了。停顿和不连续的增加开始瓦解那些自认为是造诣深的一元论者的话语统一。从那时起，马克思主义一直在思考那些不连续性问题，而且同时要找到重新构造分散和不同种类要素的形式。在不同结构要素之间的变化失去了他们本来的逻辑鲜明性并且显示了偶然和艰苦构造的关系的不透明性。对这一对典型危机的不同反应存在于理解这些关系因素的方式中——它的重要性增加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它的本质变得不明显了。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要分析的。

对危机的第一个反应：马克思主义正统的形成

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正像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所构造的那样，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简单的延续，它涉及到一个非常特别的变形，以赋予理论新的角色为特征。替代了对可以经验观察到历史倾向的系统化——就像 1892 年考茨基所做的——理论把自己看成是这些倾向最终会与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中的社会关系类型相一致的保证。换句话说，正统被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民主党政治实践的分离上。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所保证的下层基础运动的规律，提供了克服这些断裂并且担保已存在倾向的暂时性特征和无产阶级未来革命重建的领域。

在这方面，我们来分析一下考茨基对党和工会之间关

系的立场——例如他与工会运动理论家们争论中所说的。^① 考茨基意识到德国工人阶级中存在的强烈分裂倾向：劳动贵族的形成、联合与没有联合的工人之间的敌对、不同工资水平之间利益的对立、资产阶级故意分裂工人阶级的政策、隶属于教会平民论(a church populism)的大量天主教工人的存在使得他们拉开了与社会民主党的距离。他同样意识到更为重要的直接物质利益以及更严重的分裂倾向不可抗拒的事实，而且纯粹的工会行动既不能保证统一也不能保证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信心。^② 只有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服从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Endziel)并且这预示着经济斗争从属政治斗争、工会从属于政党，它们才能得到巩固。^③ 但是党只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宝库内提出这一总体要求，工人阶级并没有追随社会主义方向——英国的工会就是一个十足的例子——导致考茨基提出对列宁的《怎么办》有重要影响的知识分子新的特权角色。那样的知识分子媒介作用的设想局限在它的影响上，因为，按照斯宾诺莎的观点，它仅有的自由存在于对必然性的认识上。然而，它确实需要连接关系，不再仅仅求助于一元论所理解的必然性链条。

19

在阶级同一性中打开的裂缝、日渐增加的工人阶级不

① 考茨基论此事的主要作品包括在本文努蒂编的文选 *Partio Sindicati* 之中。

② 考茨基说：“工会的本质因此不是从一开始就被确定的，他们可能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但是也可能成为它的羁绊。”引自本文努蒂的文选，第186页。

③ 考茨基说：“党试图达到消除资本主义剥削的最终目标。关于最终目标，尽管它重要并且绝对不可缺少，但是工会的积极性可以被看成是西西弗斯的劳动，不是在无用劳动的意义上的，而是从来不被终止并且总是被重新开始的工作。强大的社会民主党从这里产生并且必须被认真对待，它比工会有更大的能力去建立工人阶级斗争的阵线，而且指明个别无产阶级组织并不直接服从于党采取的行动方向。这样，不可分离的阶级斗争统一体才能得到保障。”引自本文努蒂的文选，第195页。

同主体立场之间的分裂只能被未来经济基础的运动克服，它的到来只能由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保证。因而，所有的事情都以这一科学的预言能力以及它的必然性特征为基础。“必然性”范畴被断言为具有致命性不是偶然的。众所周知第二国际是如何理解“必然性”的：它被看成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与达尔文主义结合基础上的自然必然性。达尔文主义经常被描述为取代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庸俗马克思主义，但真理在于，在正统的概念中，黑格尔主义与达尔文主义结合起来构成了一种可以满足策略性需要的综合。单独的达尔文主义并不提供“对未来的保证”，因为自然选择并没有开始就在预定的方向上发挥作用。^①只要黑格尔式的神学加在达尔文主义之上——它完全不适合于达尔文主义——革命过程就能扮演未来变革的保证。

通过不可避免的规律的作用得到确保的、作为未来统一体的阶级统一这个概念，在大量的层面上发挥作用：因分散的主体立场而形成的连接类型、不能被吸收进典型之中的对待差异的方式、历史事件分析的策略。关于第一点，很明显，假如革命主体在它的生产关系层面上建立了它的阶级同一性，^②它在别的层面上的存在只能是外在性的，而且它必须采取“利益代表”的形式。政治领域只能是

^① 参照卢西奥·葛莱蒂在 *Tramonto dell'ideologia* (罗马 1980 年, 第 173 ~ 178 页) 中的评论; 雅克·莫诺在 *Le hazard et la nécessité* (巴黎 1970 年, 第 46, 47 页) 中的辩论。“在企图把他们的社会学大厦建立在自然规律上的企图中, 与斯宾诺莎所做的相比,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不得不更加弄清楚并且深思熟虑地运用泛神论的预测……黑格尔假定控制宇宙的普遍规律具有辩证的秩序, 发现了它存在于并不承认比心灵更具有现实性的体系之中……但是为了保存这些‘主观的’规律同样支配纯粹的物质宇宙, 要从放弃客观性的假定开始, 来实现这一泛神论计划的全部意义和作用。”

^② 这与我们先前主张对于考茨基来说直接的物质利益不可能构成统一和阶级同一性并不矛盾。这一点即科学的事实, 作为单独的因素, 决定了工人阶级介入生产过程的意义整体。因此, 科学承认不同的阶级分裂的利益在他们各自的特殊立场上并没有充分的意识。

上层建筑,它属于其同一性按照“利益”形式来理解的代表之间斗争领域这个范围,已经在另一个层面上把自己建立起来了。这一基本的同一性是如此断然地被确定,就像各种政治形式和工人阶级分享的意识形态代表方面不可改变的事实一样。^①

其次,令人怀疑的还原论运用两种理性——我们可以称其为根据现象的推理和根据偶然性的推理——去对付不能被吸收进自己范畴中的差异。根据现象的推理:被当成差异的每件事情都能被还原到同一性上去,这可以采取两种形式:现象只是隐蔽的技巧或者它是表现本质的必然形式(第一个形式的例子:“理性主义是掩盖资产阶级利益的掩蔽物”)。根据偶然性的推理:社会类型或部门不可以被还原到社会某种形式的主要特性上,但是在那种情形下,与历史发展基本线索相比,它的极其边缘化允许我们把它当成不相关的加以放弃(例如,“因为资本主义导致中间阶级和农民的无产阶级化,我们能够不理睬这些并且把我们的策略集中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上”)。因此在根据偶然性的推理中,同一性在历史的总体中被重新发现了:无情的阶段连续允许已经存在的社会现实按照社会所达到的成熟性的阶段被分成必要和偶然的现象。历史因此是一个连续的抽象具体化,对既显示意义又显示过程方向的典型纯洁的接近。

最后,作为对现在的分析,正统的典型提出了认识策略,既然马克思主义声称自己知道根本上被确定的历史过

^① 在把利益清楚和透明地还原到“理性”选择的理想化条件之中,这明显地简化了问题的推理过程。米歇尔·德·塞尔托近来说到:“从主体被孤立于环境的时刻开始,我把‘策略’看成是力量关系的计算是可能的。”

程,对实际事件的理解只能意味着把它当成已经先验地被决定了的现实演化过程的一个因素,因此,才有这样的讨论:在某个国家之中某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吗?或者,在这个或那个国家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转向社会主义的方式?

上面对三个方面影响的分析给出了一般特点:具体被还原到抽象,不同的主体立场被还原为单个立场的表现,差异的多样性既被还原也被当成附属的东西加以拒绝,在场的意义通过它在先验演化阶段上的位置被表现。正是因为具体以这一方式被还原到抽象,对于正统来说,历史、社会和社会代表是作为统一原则起作用的本质。由于这一本质不是直接可见的,区别社会的表层或现象与每一个具体存在的最高意义必然要来源于它的根本的现实(不管中介体系的复杂化程度)是必然的。

很明显,策略概念来源于这种关于资本主义进程的见解,这一策略的主体当然是工人的政党。考茨基强烈地拒绝修正主义提出的“人民党”概念,因为按照他的观点,这会把别的阶级利益带到党的内部,使革命运动丧失其特征。然而他所假定的激进立场建立在拒绝任何折衷或联合之上,根本上是保守策略的主要装饰品。^① 由于他的激进主义依赖于并不需要政治主动的过程,只能导致无为主义和等待。宣传和组织是党的两个——实际上是惟一的——基本任务,宣传没有适应广泛的大众意志的创造性,以赢得新的部分加入到社会主义事业之中,却首先加强工人阶级的同一性。至于组织,它的扩充并没有包含更多大

^① 参照 E·马蒂亚斯: *Kautsky e il Kauskismo*, 罗马 1971 年,在此书中处处可见此观点。

量政治阵线的参与,而是把工人阶级引向自我中心和孤立存在的一个少数人具有的领地。运动的逐渐制度化正适合于这样的观点:资本主义体系最后的危机将产生于资产阶级自己的工作,而无产阶级准备在合适的时候进行干预。从1881年开始,考茨基就曾经说:“我们的任务不是去组织革命,而是为了革命去组织我们自己;不是制造革命而是利用革命。”^①

很明显,对于考茨基来说,联合并不代表基本的策略性原则。在具体情况中,种种联合在经验性的战术层面上是可能的,但是,在长时期内,正因为革命具有纯无产阶级的特征,所以无产阶级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拥有独立的立场。考茨基对其他阶层中内在矛盾的分析正好证明了不可能与他们建立长期的民主和反资本主义的联盟。在农民方面,他力图证明他们是分裂的部分,所以无产阶级保护它的利益是与一般经济进步道路相对立的一个保守政策。同样,在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之中,中间阶级在金融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控制下逐渐联合起来。考茨基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个政治和意识形态控制危险地强化了工人阶级的孤立,而且面对资本主义的攻击,工人阶级会以反攻击来赢得中间阶层去反对资产阶级的目标。他的思想之路是封闭的,因为在他的分析之中,中间阶层日渐增长的反作用特征符合客观的和不可改变的进程。出于同样的原因,工人的孤立对社会主义不是威胁,因为这是由历史已定规律保证的,在长时期中,历史将

22

^① Symmachos(考茨基), 'Verschwörung oder Revolution?' Der sozialdemokrat, 1881年2月20日,引自S·J·施泰因贝格: Il partito e la formazione dell' ortodossia marxista. 见E·J·霍布斯鲍姆等编的 Storia del marxismo, 米兰1979,第2卷,第190页。

证明所有资产阶级的诡计是无能为力的。

一个很好的例子将说明考茨基怎样理解无产阶级的斗争可以建立在他的“消耗战”概念上。这不是指特殊的策略,而是指1860年以来无产阶级所采取的政治行动的总体。消耗战包含三个方面:(1)预定的工人阶级同一性,它逐渐破坏敌人力量,但是在斗争的过程中没有重大的改变。(2)同样的资产阶级的预定同一性,它增加或减少它的控制能力,但是在任何情况下绝不改变自己的本性。(3)指定的发展道路——也是“无情的规律”——为消耗战提供了定向化的趋势。这一策略曾经一直被拿来与葛兰西的“阵地战”相比较,^①但是实际上,这两者是根本不同的,阵地战以领导权的概念为先决条件,这一概念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它是不能与单线论、预定的发展以及考茨基的预先构成的主体概念相比较的。

正统马克思主义分派对理论作用的认识使我们面临这样的怪论:一方面,由于阶级的“当前意识”与“历史意识”之间裂缝的扩大只能通过政治介入来外在地弥补,它的作用增加了;另一方面,由于支撑政治介入的理论被表述为机械决定和必然性的意识,它的分析变得更加决定论和经济主义了,以至于到了这样的程度:历史力量的构成更加依赖理论媒介。这一点普列汉诺夫比考茨基更为明显。早期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成功地创造资本主义文明,其结果是俄国现实的内涵只能通过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相比较来解释,因此,对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他们国家的社会现象是那个超越了他们自己本身的文本

^① 参见佩里·安德森的《安东尼·葛兰西的自相矛盾》,发表在《新左派评论》第100期,1976年11月和1997年1月。

符号,这个文本符号只在资本主义西方可以得到充分和明确的阅读。这意味着理论在俄国比在西方更重要:假如“历史必然性规律”并非普遍有效,罢工、示威和聚集的队伍短暂的现实有消失的威胁,像格哥列奥莫夫·弗洛奥^①那样的改革者会对正统所主张的连贯和一致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嘲讽起来。最终,如果学说是折衷和不规则的,就不会影响无产者的直觉所认可的社会实践实质。这种实践是这样的,在修正主义的论战之中它开始建立自己与理论的外在关系。然而,这不可能是普列汉诺夫的立场,因为他面对着的现象并不自发地指出明确方向,相反这些现象的意义依赖于它们在解释体系内的介入。社会意义越依赖理论的明确表达,正统的辩护就越会转变成为政治问题。

记住这些要点,普列汉诺夫比考茨基更严格地解释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就没有什么令人惊奇的了,例如,众所周知他创造了“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另外他也对导致基础与上层建筑严格分离的自然主义负有责任,后者被看成不过是前者的各种必然表现。普列汉诺夫的经济基础概念听任取消社会力量的介入,经济过程完全由被理解为技术的生产力决定。^②这一严格的决定使他能以作用程度逐渐减少来把社会描述成一个层次化的事物:“(1)生产力状况;(2)作为这些生产力条件的经济关系;(3)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发展的社会政治体系;(4)部分由已经获得

^① 古列尔莫·费雷罗: *L'Europa giovane, Studi e viaggi nei paesi del Nord*, 米兰1897年,第95页。

^② 参照安德鲁·阿拉托: *L'antinomia del marxismo classico: marxismo e Filosofia*, 在E·J·霍布斯鲍姆等编的 *Storia del marxismo*, 米兰1979,第2卷,第702-707页中。

的经济条件决定,部分由在基础上已经产生的整个社会政治体系决定的社会人的思想状况;(5)各种表现了那种思想状况性质的意识形态。”^① 在《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差别》中,普列汉诺夫提出了俄国革命发展必须通过的同样严格的阶段过程,由此任何不平衡和具有多种性质的发展从策略领域中被消除了。整个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析——从彼德·司徒卢威的“合法马克思主义”到作为过渡阶段的普列汉诺夫,再到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倾向于抹去对特殊性的研究,他们把这些特殊性当成根本现实的外在表现或偶然形式,而这一根本现实就是每一个社会发展都必须要通过的抽象的资本主义发展。

现在让我们来最后评论一下正统。正如我们所见,这一理论主张,在最终的目标与现实的政治实践之间不断扩大的分裂会在将来某一时刻由于对立面融合(*concordia oppositorum*)的作用被解决。然而由于这一重构的实践不能被完全抛给未来,不管怎样,反分裂倾向的斗争现在都必须被发动。但是由于这一斗争具有的关系形式并不自发地产生于资本主义的规律,引入不同于机械决定论的社会规律就成了必要的。也就是说,要提供重建自发的政治主动性的空间。虽然在最低限度上,这一空间在考茨基那里被提出,它由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之间外在的关系构成,需要知识分子的政治介入。这里存在着一个只能被“客观的”历史决定加以解释的联系。这一空间必然向那样的方向上拓展,在这些方向上,为了征服日复一日的实

^① G·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纽约 1969 年,第 80 页。

践与最终目的之间的分裂,努力斗争以便去结束无为主义并且实现当前的政治影响。^① 罗莎·卢森堡的自发主义,甚至更一般地说,还有新左派的政治策略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正统中最具创造性的倾向试图限制“必然性规律”的影响,但是他们的话语总是难以避免陷入二元论:一方面是“必然规律”,在政治实践方面根本没用;另一方面,“偶然性的规律”,由于不能确定其特性而不能使它理论化。

我们来看一下由这些“游戏未决化(open the game)”的企图而产生的两个二元论的例子。第一个是拉布里奥拉所使用的形态学预言,他说:“历史预见……(在《共产党宣言》中)没有像各种新旧类型的启示和预言那样,指出年代学上的日期或预定的社会构造图景……在批判的共产主义理论之中,正是整个社会,在发展中的某一时刻,发现了必然过程的根据以及它的曲线上的突出点,使其本身清楚地显示出来并且展现了运动的规律。《宣言》中首次提到的预言不是——具有预期和允诺那样特性的——年代学的,按我的观点来说,它是形态学的,简洁地表达了每件事情。”^② 拉布里奥拉在此发动了双重的战斗,首先是指向了克罗齐和金蒂莱^③ 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倾向,他们把历史的不可预言性置于事件的非系统化特征上,指出了单一秩序仅仅存在于历史学家的意识之中。而在拉布里奥拉方

25

^① 必然规律与无为主义之间的关系由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被清楚地感觉到了。索列尔相信:“阅读社会民主党的著作,人们被这样的事实震惊:他们随意支配自己的未来。他们认为世界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革命,他们认为自己知道一般的顺序。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自己的理论中有那样的信心,以至于他们走向无为主义。”乔治·索列尔: *saggi di critica del marxismo*, 巴勒莫 1903 年,第 59 页。

^② 安东尼·拉布里奥拉:《纪念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引自 *Saggi del materialismo storico*, 第 34, 35 页。

^③ 关于拉布里奥拉对修正马克思主义的讨论的介入,参见罗伯特·拉奇纳罗, *La crisi del marxismo nella revisione de fine secolo*, 巴黎 1978 年。

面强调的是历史规律的客观特征。然而，这些是形态学的——即它们有效性的领域是受到某种根本趋向限制的。拉布里奥拉的第二个战斗是反对直接把普遍趋向转到历史生活表面明显事实的教条主义形式。现在是清楚的，双重战斗被发动的方式中不得不引入二元论，在拉布里奥拉那里，在作为叙事和形态学的历史发展的相对立场之中，二元论找到了自己的表达；而且更一般地说，在降低恩格斯辩证典型解释历史的能力之中找到表达。^①此外，这一双重性呈现了我们在罗莎·卢森堡那里发现的双重真空，因为，“叙事”的要素以它自己的内在必然性、而不是作为形态学必然性的偶然反面与并非实际事物的形态学要素是对立的，根据巴达洛尼所说，“事件真正的发展（对于拉布里奥拉来说）能够引起难以理解和不可预见的变迁兴衰。虽然如此，所要考虑的是，理解这些变迁兴衰会出现在普遍假设之内（阶级矛盾和它的进步意义）。因此，无产阶级不是被置于不可决定的历史时间中，而是被置于由资产阶级社会形态危机决定的特殊历史时间中。”^②换句话说，“形态学上的必然性”不仅构成了包含它自己的特殊领域也构成了包含排除它自己——偶然性的理论的话语领域。如果“事件”的集合被概念化为偶然性的，除了在形态学的趋势中它们所缺乏的与它们对立的某个现存特征，它们就根本没有被概念化。然而，由于社会生活比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形态学的范畴更复杂——而且这种复杂性是拉布里奥拉的出发点——惟一可能的结论是：理论变成了与

^① 参照尼柯拉·巴达洛尼：Il marxismo de Gramsci, 都灵 1975, 第 27, 28 页。

^② 同上, 第 13 页。

认识具体社会过程日渐不相关的工具。

因此,为了避免陷入完全的怀疑论,在一些点上引入其他的解释范畴是必要的。例如,拉布里奥拉这样做了,在他的具体分析之中,各种社会范畴不只在它们的“可能性”中被概念化,而且每一个都被赋予了某种必然性或合法性。这些“实际的”结构复杂性与作为形态学预言目标的结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第一个可能的答案就是“辩证的”:主张把复杂性视为中介体系的一元论观点。^①拉布里奥拉不可能采用这个答案,因为这会逼迫他把必然性的作用扩展到历史生活的表面——这正是他要从中把它们转移出来的领域。但是假如辩证的答案被拒绝,从形态学分析到局部总体特别的合法性是不可能合乎逻辑地变化的,变革因此假定外部特征——就是说,这些合法性的概念化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外在的。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不能是普列汉诺夫提出的“完整和谐的世界体系”,并且只能是在封闭模式中被思考的。必然/偶然的二元论打开了通向多元结构合法性的道路,它的内在逻辑和相互关系必须得到承认。

如果我们分析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这一点可以被更清楚地看到,它是我们关于“开放的正统”的第二个例子。在这里我们发现比拉布里奥拉更激进和系统的努力,它要使起点多样化,要增加理论范畴以及使特殊决定的社会领域自主化。奥托·鲍威尔在马克斯·阿德勒的讣告中指出这

^① 根据巴达洛尼的观点,拉布里奥拉要遵循的答案是:“或许由他提供的选择是错误的而且真正的选择存在于历史形态的更深处和发展中,在恩格斯的说明中,历史形态被过于简单化了。”巴达洛尼,第27页。对此,二元论当然一直被禁止,但是代价是排除了形态不确定的领域,它的存在对于拉布里奥拉的主题来说是根本性的。

学派的开始时期：“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黑格尔开始，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从唯物主义开始，最近以来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是以康德和马赫为出发点的。”^①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到在双重君主政治中无产阶级统一的障碍以及这样的事实：那个统一依赖不断的政治主动。因此他们很好地从列宁主义传统的不同方面理解了“不均衡的综合发展”。在奥匈君主政体中存在着在欧洲包括土耳其可以发现的所有经济形式的例子……社会主义宣传在这些不同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之中到处传播。这创造了一幅极其多样化的图画……那些在国际上有序发展中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手工业者、临时工、制造业工人、工厂工人和农业工人，与政治、社会和知识方面在任何时候都占支配地位的运动一起经历了变动——同时发生在奥地利。^②

在这个马塞克式的社会和民族形式中，不可能去思考作为“上层建筑”的民族同一性以及作为基础结构必然结果的阶级统一。确实，那样的统一建立在复杂的政治结构上，奥托·鲍威尔说：“正是主张统一的知识分子力量……今天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作为统一的结果和维持统一的力量不过是工人运动统一的意识形态。”^③

阶级统一因素因此是政治因素，我们称为社会关系结构的或连接形式的构造中心被上层建筑领域置换，所以正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差别变得模糊和成问题了。

^① 奥托·鲍威尔：《什么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Arbeiter-Zeitung，1927年11月3日。译文见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文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汤姆·波特摩尔和帕特里克·古德编，牛津1978年，第45～48页。

^② 在Der Kampf，1907-1908年第1期的时评上，再版于波特摩尔和古德编的文选，第52～56页。

^③ 同上，第5页。

三种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介入形式与新的策略观的紧密联系中：试图限制“历史必然性”的有效领域。新斗争阵线的主张以社会复杂性——这是成熟资本主义独有的特征——为基础，而且努力以不可还原的方式去思考主体立场而不是阶级的特殊性。第一种类型的介入主要与马克斯·阿德勒的哲学重构和他的新康德主义特殊形式有关。新康德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再思考产生了大量的解放作用：它扩展了社会主义的听众，在它的公正要求范围内，能被置于超出阶级束缚的普遍性形式中。它打破了自然主义的社会关系概念，通过详细阐述“社会的先验”把严格话语要素引入社会客观性的构造之中。最终，它允许马克思主义去把上层建筑的形成理解为建立在意识形式上，而不是自然主义的生产力运动形式上。第二种类型的介入也把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区别置于疑问之中。在讨论考茨基的《权力之路》中，例如鲍威尔，^① 他试图表明：把经济理解成由内在逻辑控制的同质领域，在垄断帝国主义时期政治、技术组织和科学的变革日渐成为工业机构的一部分是非常错误的。按照他的观点，如果竞争的规律先前作为自然力量发挥作用，它们现在必须通过人们的精神才能起作用。强调国家与经济之间结合的发展，在二十世纪20年代导致了关于“组织资本主义”的讨论。关于资本主义新结构产生的破裂和对抗点方面的观点也发生改变：它们现在不再被单独放在生产关系之中了，而是被置于大量的社会和政治结构领域之内。因此新的重要性也被归于既

28

^① 关于这次讨论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政治——知识分子发展的轨迹，见贾柯默·马拉马奥编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原著选中精彩的介绍，*Austro-marxismo e socialismo di sinistra fra le due guerre*，米兰1977年。

非在进化也不是在改良主义上的分散的日复一日斗争 (revolutionäre Kleinarbeit),^① 以及通过政治关系因素获得的新的意义(在新提出的党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方式中,这一点得到反思^②)。最后,关于新的主体立场和确保与阶级简化论断绝关系,提到鲍威尔关于民族问题的著作和伦纳关于法律制度的著作就足够了。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策略介入的一般模式现在应该是清楚的:在自主政治介入的实践作用被拓宽的范围内,“历史必然性”话语失去了它的适用性并且退回到社会地平线上(在正好同样的方式内,在自然神论信仰者的话语中,上帝存在的作用彻底被还原了)。这转过来需要更多新的话语形式去占领左派留下的真空。然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成功突破二元论并且消除形态必然性因素。在马克思主义 fin-de-siècle(世界末日)的政治理论中,只是索列尔通过混合体(mélange)与集团(bloc)之间的对比采取了这一决定性的步骤,下面我们要转向这一点。

对危机的第二个反应:修正主义

正统对“马克思主义危机”的反应是企图克服“理论”与“可以观察到的资本主义趋向”之间的分裂,它通过不妥

^① “为了理解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过程不再遵循统一和均质的逻辑——历史机制下的发展速度,而是生产关系和权力变化的内在因素增加和扩散的结果——这意味着在理论水平上,马克思的形态学预言中的经验分析各个构成部分具有的主要成就,以及在政治水平上,改良与革命之间困难抉择的结束。然而它没有以任何方式包含革命类型的选择,好像社会主义通过顺势疗法可以实现。”贾柯默·马拉马奥:Tra bolscevismo e socialdemocrazia; Otto Bauer e la cultura politica dell'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在E·J·霍布斯鲍姆等人编的文选中,第3卷,第259页。

^② 见马克斯·阿德勒:Il socialismo e gli intellettuali.

协地确认前者的有效性和后者虚假的、短暂的特征来实现这一目标。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看来是很简单的：修正主义的反应是正好对立的，特别是伯恩斯坦本人在许多时候坚持他与社会民主党从爱尔福特议会后已经实现的计划和实践不调和，而且他介入的惟一目的是要实现使理论适合具体运动实践的现代化（aggiornamento）。然而，这样的结论会掩盖他介入的重要方面，特别是它会让我们把改良主义等同于修正主义。^① 作为社会民主党内真正改良主义政策代言人的工会领导人对伯恩斯坦的理论主张没有多大兴趣，而且当时他们没有公开支持正统，只是在争论中保持严格的中立。^② 此外，在对至关重要的群众罢工^③ 和对待战争态度的政治讨论中，伯恩斯坦的立场不只是不同，而且还与工会改良主义和党的领导人完全对立。因此，在力图正确认识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差别时，我们必须强调：改良主义政治实践中根本的东西是政治无为主义和把工人阶级局限在社团主义之中。改良主义领导人试图为阶级的直接利益和获得的财富辩护，并把它当成是被分离的部分，这一部分具有可以被完美解释的一致性和限度。但是修正主义的理论对于这些是没有必要的，无疑，通过使工人阶级离开不明确的未来并且怀疑任何已经存在的

29

^① “当修正主义被非批判地置于同改良主义一样的平面上，或者从1890年开始它只是被看成党的社会改良实践时，其特性被误解了。修正主义的问题因此必须充分地限制在伯恩斯坦个人那里并且不能被扩展到福尔马尔或霍赫贝格那里。”见H·J·施泰恩贝格的 *Il socialismo tedesco da Bebel a Kautsky*，罗马1979年，第118页。

^② 关于修正主义与工会之间的关系，见皮特·杰伊：《民主社会主义的两难》，伦敦1962年，第137~140页。

^③ 伯恩斯坦对群众罢工的辩护作为防御性武器引起了工会领导人博梅尔堡下面的评论：“爱德华·伯恩斯坦有时不知道应该向正确的方向走多远，有时他谈论群众政治罢工。这些 *litterati*……在危害劳工运动。”引自皮特·杰伊，第138页。

权力结构,革命理论在很多情形下能够较好地满足同样的角色。我们已经指出考茨基革命主义的保守主义特征,改良主义既没有认同修正主义的条件也没有认同正统提供的办法,而是超越了两者。

修正主义和正统的理论家们面对的基本问题因此并不是改良主义的问题,既不是和平也不是暴力地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问题——正统并没有清晰和无异议的立场。主要的分歧点在于,尽管正统认为资本主义新阶段的分裂和分化特征会通过基础结构的变革被克服,修正主义认为这种克服将通过自治性质的政治参与实现。来自经济基础的政治自治形式是伯恩斯坦论点的新鲜之处,事实上在伯恩斯坦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中一直被强调,^① 在其中存在着恢复特殊领域政治主动精神的企图。修正主义在鼎盛时期代表了结束工人阶级社团孤立状况的真正努力,然而,另一方面也是真实的,正如政治是作为自发情况出现的,它过去常常验证很大程度上与它相对立的“改良主义”实践。这是我们必须要解释的自相矛盾的地方。它使我们涉及到伯恩斯坦所受的经济主义限制,而这一局限正是葛兰西急于要克服的。对于政治的自发性和它的限度这两个方面,我们必须分析它们是怎样被构造的。

要比正统所描述的更清楚地认识伯恩斯坦是非常重要的,他认为资本主义受到其自身进入垄断阶段的影响,在此意义上,他的分析更接近希尔弗丁或列宁,而不是那时的正统理论。^② 伯恩斯坦也抓住了资本主义重组的政治

① L.帕吉,第29页。

② 参照L·葛莱蒂:《从卢梭到列宁》,伦敦1972年,第62页。

结果,即三个主要的变化:企业的集中和财产集中之间的对应;中等阶层的存在和增长;经济计划在防止危机方面的作用。在社会民主党迄今所依赖的假定中,它们只能包括在一个总的变化中。但是这种情况并不存在:经济进化是中产阶级和农民的贫困化、社会无产阶级化的扩大;也不可能期待严重的经济危机会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在此条件下,社会主义必须去改变它的领域和策略,而且关键的理论因素是结束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严格区分对任何政治自发性的妨碍。在修正主义的分析中重构的要素和分裂的克服被转变成的正是后面的情况,“科学、艺术和一系列的社会关系今天比以往更少地依赖经济,或者说,为了不向错误概念让步,今天已经具有的经济发展观给意识形态,特别是伦理因素提供了比以前的情况更大的活动空间。由于原因和结果相互依赖,技术、其他社会趋向的经济进化正在变成更为间接的,而且由此,首要的必然性正在更多地失去指导间接性方面权力。”^①

正是这个与经济基础的指令相对立的政治自主性,扮演了与基础结构趋向相对立的重组和再统一的角色,这种基础结构的趋向如果放弃自己,只能导致分裂。这一点可以在伯恩斯坦关于工人阶级统一和分化的辩证法概念中清晰地看到,在经济上,工人阶级总是表现得越来越分化。现代无产阶级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被剥夺的群众,“正是在最发达的制造业中,可以发现所有被分化的工人层次,在这些群体之间只存在着普通的同样情感。”^② 这一利益分化情况——在英国是最明显的

31

① E·伯恩斯坦:《进化论的社会主义》,纽约1978年,第15,16页。

② 同上,第103页。

——并不只是过去行会的残余，正如库诺夫曾经一直争辩的，而是建立民主国家带来的结果。尽管在政治镇压条件下，斗争中的统一把部分的利益放在次要的层次上，在自由的环境里，它们会再度兴旺起来。

现在，假如在现代资本主义结构中存在固有的分化倾向，作为对立因素之根源的东西以及趋向于联合的力量是什么呢？按照伯恩斯坦的回答，是党。因此他谈到阶级斗争的组织具有必要性，组织将把整个阶级统一在一起，避免由于不同的雇佣导致分裂，这一机构就是社会民主党。在其中，经济团体的特殊利益淹没在有利于那些以劳动为主要收入的贫困阶级的普遍利益之中。^① 正如我们先前在考茨基那里所见到的，党还代表了阶级的普遍因素。不过在他那里，政治统一要通过下层基础的运动实现现实的统一是科学预见到的，而在伯恩斯坦这里，政治联合的要素不能还原到这一运动上去，政治联合的特殊性逃脱了必然性链条。在考茨基那里被限制在知识阶层中介角色之中的不可还原的政治空间，这里明显地被故意扩大了。

然而，在伯恩斯坦对构造阶级统一的政治中介的分析之中，明显的概念模糊一直没有使他的整个理论构造无效。这一模糊性在于：如果工人阶级在经济领域日渐被分化，并且假如它的统一在政治层面上自发形成，在什么意义上政治统一是阶级统一呢？问题不是提给正统观点的，因为正统观点认为经济与政治同一性之间的不一致最终由经济本身的进化解决。在伯恩斯坦那里，必然的结论似乎应该是：政治统一只能通过克服不同部分工人的阶级局

^① E·伯恩斯坦：引自皮特·杰伊，第207页。

限性来构造,而且会有经济与政治主体之间持久的政治裂缝存在。然而,伯恩斯坦从来没有在他的分析中得出这一结论。一方面,他坚持社会民主党必须是所有被压迫者的党,而不仅仅是工人的党;但是另一方面,他把这个统一理解为“接受了工人阶级观点而且认为他们是领导阶级的各个部分的集合”。正如他的传记作者皮特·盖伊指出的,^①伯恩斯坦从来没有超越这一观点,因此,阵线在他的推理之中消失了,政治与经济统一的阶级特征在这两个领域都没有形成,争论仍然毫无意义的拖延下去。

这一结论可能有些过分,因为它假定伯恩斯坦的推理走向了考茨基和卢森堡的层面——他正在涉及不可避免的历史过程的必然性主体。然而真理在于,通过否定历史被决定论的抽象逻辑支配,伯恩斯坦完全使讨论离开了这一层面。在他的概念中,工人阶级的中心性看来代替了历史偶然发展道路问题的争论——例如,在已有的集中和组织程度上,工人阶级已经比其他阶层更好地准备实现领导作用。然而仍然存在的问题在于,伯恩斯坦把这些长处——至多是与别人共有的——当成是不可取消的成就。在伯恩斯坦的格言中还可以发现同样的模糊性,“过程就是一切,目标微不足道。”传统上,这已经被当成是典型的渐进论口号,^②然而,它在修正主义话语内产生政治和理论影响的某些意义,并没有被渐进主义必然地继承下来。

^① 皮特·杰伊,第120页。

^② 以前,我们区分了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现在我们必须建立两者间的第二个区别,根本的差别之处在于改良主义是政治的和工会的实践。尽管渐进主义是关于转向社会主义的理论。修正主义在以政治自主性为基础批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内不同于两者。在我们本书的讨论中,这些区别是重要的,它们中的每一个并不必然意味着另外一个并且有一个理论领域和政治作用可以在完全不同的方向上引导另一个。

这个声明的必要意义是工人阶级可以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得到具体的收获,而且由此,在从彻底被剥夺到彻底解放的过程中,革命不能被当成是绝对要素。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渐进论缓慢的、单线的、不可逆转的前进,尽管伯恩斯坦关于民主前进道路的争辩与渐进论的观点有联系是真实的。我们必须再一次提出这一领域的问题,将那里根本不同的结构因素联系起来。

这将使我们研究伯恩斯坦陷入正统决定论的具体形式以及他为了填补决定论的崩溃带来的真空所使用的概念。当伯恩斯坦怀疑是否一般机制能有效解释历史过程时,他的辩论采取了特别的形式;他没有批评正统所提出的典型历史因果关系,而是企图去创造一个主体在历史中可能自由行动的空间。由于接受了正统的客观同一性和机械因果关系,他只能尝试限制它的作用。^①他没有否认马克思主义部分的科学特征,但是他拒绝把这个特征扩展到形成一个封闭体系以便覆盖整个政治预言领域。他对正统教条理性主义的批评采取了康德二元论的形式。对于伯恩斯坦来说,有三个方面拒绝作为封闭科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思考:首先,马克思主义没有成功地表明社会主义将随着资本主义的崩溃到来;其次,因为历史不单纯是客观过程起重要作用,这一点是不能被证明的。因此历史只能被解释为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第三,因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党的纲领并因此建立在伦理决定上,它不可能是完全科学的——不可能完全建立在真理或谬误必须完全被接受的客观陈述上。因此,伦理主体的自发性是

^① 因此他对天真的和技术专家的经济概念的接受,是可以发现的与普列汉诺夫相同的最后例子。参照葛莱蒂,第6页及其下。

伯恩斯坦终结决定论的基础。

现在——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引入伦理主体并不能驱散我们前面所发现的伯恩斯坦话语的模糊性。伦理主体的自由选择至多可以在历史领域开创一个不确定性领域,但是它不能成为渐进论主题的基础。正是在这里,新的基本假定——人类历史进步和上升的特征——参与提供了政治和经济在其中结合的领域,给出了指导获得每一个具体成就的意义。进化的概念,Entwicklung,^①在伯恩斯坦的话语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事实上,他的全部计划从中获得了连贯性。政治与经济领域的统一没有发生在由理论规定的连接基础之上,而是依赖为它们两者提供基础的进化规律规定的有倾向性运动。对于伯恩斯坦,这些规律并非与正统体系的完全相同,它们不仅包括敌对的还包括和谐的过程。不过在两种情形之中,它们都被当成先验确定了每一事件意义的总体化环境,这样一来,尽管“事实”摆脱了正统观念中把它们连接起来的本质联系,它们后来还是在与任何决定论的机械主义没有任何联系的一般进步理论中被再结合起来。与把阶级当成超越性主体的机械论客观主义的决裂,是可以通过对新的超越性主体——利用人性的优势地位逐渐摆脱了经济必然性的伦理主体——的假定实现的。^②从这里是不可能走向连接和领导权理论的。

34

^① 关于伯恩斯坦的概念 *Entwicklung*, 见 V·L·利科特: 'Le premesse teoriche del socialismo in Bernstein,' Feltrinelli Institute, *Annali*, 第15个年刊, 1973年, 第155-158页。

^② 我们的批评的含义不应该被误解。我们在社会主义政治的探索中并不怀疑伦理判断的需要——考茨基对此的荒谬否定以及他把坚持社会主义还原到只是坚持历史必然性的企图一直属于破坏性的批评。我们的论点是:从伦理判断的存在来看,它并不遵循那些应该被归于在每一个话语出现条件之外的先验主体的东西。

这就澄清了为什么在伯恩斯坦那里，政治的自发性可以与接受改良主义和渐进主义的策略联系起来。因为，假如每一个发展都是不可逆转的——已经给定的进化(Entwicklung)假定——它的巩固就不再依赖不稳定的力量联合并且不再成为政治问题；另一方面，假如全部民主的发展依靠力量之间偶然的相互关系，那么抽象地考虑每一个需求的正义性对于确证它的进步性将是不充分的，例如，可能由于极左的要求或它的对立面——在急需的联合中缺乏基本的政治主动性——产生了力量的消极再结盟。但是假如整个民主的发展只是建立在进步规律之上，那么，任何斗争或联合要求的进步特征就可以独立地解释为与其他特定时刻起作用的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工人运动的要求被看成是正义的和进步的以及他们与其他力量的关系被分别地加以估价这一事实，消除了对社团限制工人阶级进行批判的惟一基础。这里存在着理论上的修正主义与实践上的改良主义之间相互一致的前提：政治主动性扩展到大量的民主阵线从来不会与工人阶级的无为主义或工团主义相矛盾。

如果我们考虑到修正主义的国家理论，这一点可以被清楚地看到。对于正统，问题直截了当：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且社会民主党只能以扩展它自己的意识形态、辩护和组织工人阶级为目的来参与到国家机构之中。这样的参与因此以外在性为标志。伯恩斯坦从相对立的方面看到了这个问题：工人阶级日渐增长的经济力量，社会合法性的发展，资本主义的“人道化”，所有这些都导致了工人阶级的“国有化”。工人不仅仅是无产者，他还变成了公民。从而，按照伯恩斯坦的观点来说，国家之内的社会

组织功能比那些阶级控制有更大的影响,国家的民主化把国家转变成了“所有人民的”国家。伯恩斯坦再一次比正统更好地理解工人阶级已经处在国家领域之上这一基本真理。正是毫无结果的教条主义企图继续维持国家的纯粹外在性关系。然而,在伯恩斯坦的话语之中,这一点立即转变成了完全不合理的预言,即作为历史进化的必然结果,国家会逐渐地变得民主化。

35

由于已经达到了这一点,现在我们可以运用我们曾经对卢森堡进行过的考查去认识伯恩斯坦思想发展的逻辑线索,它排除了限制其作用的本质论假定(在此情形中,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统一的倾向)。首先,在国家之内民主的发展不再是累积式的,而且开始建立在不能被先验决定的力量关系之上。斗争的目标不是简单地按期实现的,而是允许这些实现得到巩固的连接力量的形式,并且这些形式总是可以被取消的。工人阶级在战斗中必须从实际的情况开始他们的斗争:既在国家之内又在国家之外。但是伯恩斯坦聪明地打开了令人不安的更大可能性,假如工人不再只是无产者,而且还是公民、消费者、国家文化和制度机构内部多元立场的分享者,再假如,所有这些立场不再被进步规律统一起来(当然也包括正统的“必然规律”),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变成不再被先验保证采取某种确定关系的开放型关系。还存在着一种可能性,矛盾和相互抵消的主体立场将会形成。在那种情形之中,民主的发展将比以往更加使各个社会领域的政治主动增长成为必要——就像修正主义所需要的,但是存在着每个政治主动性的意义开始建立在它与他者的关系之上的差别。考虑到这些分散的要素和对抗的观点,并且认识到它们在先验的

统一计划之外的连接，那么就会看到有些事情远远超出了修正主义领域。尽管正是修正主义在他们的一般术语中首先提出了这一问题，但只是在葛兰西的“阵地战”这一概念那里才开始出现充分的反应。

对危机的第三个反应：革命的工团主义

我们对修正主义的考查把我们带到这一点上，在其中伯恩斯坦和所有正统的潮流（包括他的主要对手罗莎·卢森堡）一样矛盾地面对着进退两难的局面：经济基础现在不能保证阶级的统一，而现在政治作为可以构成统一的惟一领域，却不能令人信服地保证一元主体的阶级特征。这种自相矛盾在革命的工团主义那里可以更清楚地被看到，它构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危机的第三种反应形式。在索列尔那里，这一自相矛盾特别清晰地表现出来，因为他比伯恩斯坦或任何正统理论家更清晰地意识到真正的危机尺度，并且他还意识到为了让人满意地克服矛盾必须提出的价值理论。在索列尔那里，我们发现不仅“偶然性”和“自由”领域的基本原理代替了破碎的必然性链条，而且还有关于重构总体化作用的新领域、“偶然性逻辑”的特殊性的努力思考。在这一意义上，提到他的进化这一关键因素是有益的。^①

甚至在索列尔较为正统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涯开端

^① 在现代论索列尔的作品中，我们发现下面这些特别有益：米歇尔·马吉：La formazione dell' egemonia in Francia, 巴黎 1977 年；米歇尔·沙尔扎：Georges Sorel et la révolution au XX siècle, 巴黎 1977 年；格雷戈里奥·德·保拉：Georges Sorel, dalla metafisica al mito, 见福布斯鲍姆等人，第 2 卷，第 662 ~ 692 页；泽夫·施特恩赫尔：Ni droite ni gauche. L' idéologie fasciste en France, 巴黎 1983 年。

中,在他的理论分析背后存在的政治兴趣和理论假定的根源就显示了一个标志性的来源,以及比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更加故意的曲解。他远不是要保持已经建立的根本历史机制这个观念,这种观念统一了社会形式并且支配着不同形式之间的转变。无疑,索列尔主要的兴趣点——并且因此他对维柯的经常参照——是保持社会统一和上升过程的道德性质,由于没有积极性的保证,社会变革渗透着作为他们可能命运之一的消极性。不只是特定的社会形式被目的在于代替它的不同积极形式所反对,正如在古代历史上所发生的,它还面对着自己本身衰败和瓦解的可能性。索列尔发现在马克思主义之中更有吸引力的不是历史进化必然规律的理论,而是新的代表形成的理论——无产阶级可以作为凝聚性力量起作用,这种力量会围绕着它本身重构更高的文明形式,并且取代衰败的资产阶级社会。

索列尔思想的这一维度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来了,然而,在修正主义论战以前的作品中,它被结合在所接受的正统思想假定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观点之中。在这些作品中,索列尔把马克思主义理解成“真正的新形而上学”。他论述道,全部真正的科学是建立在引入人为要素进行分析的“表现性证实(expressive support)”上的。这可能是乌托邦或神话谬误的根源,但是,在工业社会的情形之中,社会领域逐渐按照机械主义的形象统一起来。马克思主义的“表现性证实”——逐渐消除了性质差别的劳动的社会特征和商品范畴——并不是专断的基础,因为它是社会关系的模式和构造的典型。社会主义,作为集体占有形式的生产方式,代表了劳动社会化和平等化发展的必然性

37

顶点。生产力典型越来越多的摇摆建立在资本主义运动规律上，索列尔在他的一生中对这一点并没有怀疑，但是尽管如此，代表对其自身利益的意识——它将会使社会转向更高的形式——并非是客观运动过程导致的。这里索列尔的分析加入了另一个要素：马克思主义对于他来说不仅是对社会的科学分析，它还是统一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且提供了斗争方向。“表现性证实”因此作为被索列尔称之为集团的聚集和凝聚历史力量的要素起作用。很清楚，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相比，这一分析已经在至关重要的方面转移到这样的领域：即所谓的“客观规律”领域已经失去了它作为合理的社会基础这个特征，正在代替它的是各种形式的集合，通过它一个阶级把自己构造成统治力量并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社会的其他部分。然而，由于这些规律的有效性没有被怀疑，与正统的差别最终就没有得到考虑。

从修正主义争论开始，当索列尔全面接受了伯恩斯坦的集团和格罗斯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时，分离就开始了，但是他的目的在于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在索列尔那里，所谓罢工是激进主义的，他以此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危机”的结论。与伯恩斯坦不同，他根本没有用选择进化观取代正统历史理性主义的意图，而且文明形式会分解的可能性在他的分析中总是存在的。作为提供合理基础的总体已经被瓦解了，现在存在的是混合物。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怎么样思考重组的可能性呢？索列尔的回答集中于客观体系中不再扮演结构定位作用的社会阶级上，即他称之为“集团”的集合体。社会同一的可能性因而涉及影响他们经济观念的某些团体的意志。事实上，索列尔的哲学受到

尼采、特别是柏格森的影响,强调行动和意志,未来被看成是不可预见的,取决于意志。进而,斗争力量发现他们统一性的层面是形象或“语言符号”——预示着神话理论——的集合。不过,由“政治观念”巩固的、作为历史力量的阶级统一依赖于他们面临的对立力量,一旦他们的统一不再依赖基础结构的统一过程(在这一层面上只存在混合物),工人阶级就开始依靠与资本家阶级的分离,而这一分离只能在反对资本家阶级的斗争中实现。对于索列尔来说,“战争”因此变成了工人阶级同一性的条件,而且与资产阶级一起寻求共同的领域只能导致工人阶级的软弱。这种分离意识是一种法律意识——索列尔把革命主观性的构成看成是一个过程,在其中无产阶级开始意识到一系列与他的阶级对手相对立的权力,而且建立了一套可以巩固他们这些权力的新制度。^① 但是作为一位法国德雷福斯事件热情的支持者,索列尔并没有看到工人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体系中立场的多样性;他是一个狂热支持民主和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人,甚至认为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当工人阶级与中间阶层在经济上没有联系时,他们可以成为政治重组的一极。

我们在索列尔的发展中清楚地看到这样的模式:与所有反对正统无为主义的斗争一样,他被迫把阶级统一的构成因素转移到政治层而上,但是由于他对“历史必然性”范畴的终结比其他倾向更加激进,他也感到有必要具体说明铸造政治统一的保证。当我们转向他思想发展的第三阶段时,这一点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他此时的思想与随着

^① 见什洛莫·桑: *Lutte de classes et conscience juridique dans la pensée de Sorel*, 《精神》,第3期,1983年3月,第20-35页。

德雷福斯事件支持者联盟胜利产生的巨大醒悟相符合。米勒兰的社会主义被同化到体系之中了，无产阶级的同一性不断地丧失。在索列尔眼中，这个统一的阶级失去了它的活力，它本来有一个可能改造衰落的资产阶级文明的崇高未来。随后，索列尔坚决地变成了民主的敌人，把民主看成是世纪转折时期马克思主义必须紧紧抓住的主体立场消失和分裂的罪人。因此有必要以无论什么样的代价去修复分裂并且重新构造工人阶级主体的统一。众所周知，这导致了索列尔拒绝政治斗争并且坚信总罢工的工团主义神话。“我们知道总罢工确实是我所说过：在这个神话中社会主义将完全实现，也就是说，团体的形象能够本能地激起相应于社会主义反对现代社会的各种宣战的情感，罢工使无产阶级产生他们所具有的最高尚、最深刻和最主动的情感。总罢工把他们全都聚集在协调的情景之中，通过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使他们每个人产生最大的热情，述诸于他们对特别斗争痛苦的记忆，它使呈现给意识的全部细节具有激烈生活的特征。我们因此获得语言不能完全清晰描述的对社会主义的直觉——我们完整地获得它，瞬间理解了它。”^①

工团主义的“总罢工”或马克思的“革命”，在其作为工人阶级同一性的意识形态凝聚点来发挥作用上说，是一个神话，它是在分散的主体立场基础上被构造的。过去一旦政治斗争被放弃，并且一旦考虑到垄断和帝国主义经济——被索列尔看成是包括再封建化的过程——在加剧瓦解的倾向，它一直是保持重建联系的典型。更一般地，人

^① G·索列尔，《对暴力的反思》，纽约1961年，第127页。

们认识到索列尔主张：社会有“自然的”衰落倾向，这一倾向在极大程度上是“人为的”“反自然(anti-physis)”主题，那么暴力就是惟一能够保持马克思所说的对抗性继续有效的力量。“假如资本家阶级充满活力，不停地坚持为自己辩护，它的率直和一贯的反动态度至少极大地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暴力保持自己的特性，阶级分裂正是社会主义的基础。”^① 按照这一观点，不管总罢工是否能够实现，它的角色都是一种控制原则，这个原则允许无产阶级把社会关系的混合体(mélange)看成是按照清晰的划分界限被组织起来的。被作为现实客观描述排除的总体性范畴作为统一工人阶级意识的神话性要素又再次引进来。正如德·保拉所指出的：^②“认识工具”的概念——或表现性证实——一直被扩展到包括虚构，它的人为性质从一开始就被承认了。

那么，对于索列尔，社会二元划分的可能并没有被当作社会结构的基准，而是被视为控制集团斗争的“道德因素”层面上的结构。这里我们开始面临着这样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总是试图结束经济主义并且在一些另外的层面上建立阶级统一。为什么这一在政治或神话性上重构的主体必须是阶级主体呢？由于罗莎·卢森堡的不充分性或拉布里奥拉陷入了经济主义，在他们的话语中为不可见的双重真空创造了条件，只是索列尔的激进反经济主义才使这一真空清晰可见，以至于他的追随者放弃了恢复工人阶级革命的希望，为他们寻找别的能够保障反对颓废资产阶级斗争的神话替代。他们发现了民族主义，通过这条

① G·索列尔，《对暴力的反思》，纽约1961年，第182页。

② 格雷戈里奥·德·保拉，第688页。

道路索列尔的部分知识遗产在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上起了作用。因此他的门徒爱德华·伯斯在1912年能够肯定：“事实上，民族主义和工团主义这两个方面，既平行又同时，会趋向于彻底逐出黄金王国，而且导致英雄主义价值战胜使今日欧洲窒息的资产阶级卑鄙的物质主义。换句话说，唤醒反对黄金的力与血是必要的，这一觉醒的第一征兆是帕雷托显示的，并且索列尔的《对暴力的反思》、莫拉斯的《行动力量的可能性》提供了信号，黄金王国将以富豪统治绝对失败为终结。”^①

当然，这只是从索列尔的分析之中可能引出的一个方面，而且它可能是一个历史的欺诈，而且依靠没有根据的分析不可能得出必然的结果。^② 历史欺诈是指，索列尔在许多方面产生了影响，例如，它在葛兰西思想的形成中至关重要；没有根据的分析是指，那样一个目的论解释假定了从阶级到民族的转变必然由索列尔的思想结构所决定。尽管民族极其特殊和原始的特征完全是神话构造的主体所具有的非决定论的、非先验的特点。此外，不确定性并不是理论的弱点，因为它表明了社会现实本身是不确定的（混合物，*mélange*），而且它的任何统一都以集团重组这一实践为转移。在此意义上，没有理论根据可以表明神话的重构会走向法西斯，同样也不能排除它在另一个方向上的发展——例如布尔什维克的思想，索列尔受到狂热的欢迎。关键的一点是，那使得索列尔成为第二国际最丰富和最原创的思想家的，是每一个社会代理人的特性变成了非

^① 引自泽夫·斯特恩赫尔，第105页。

^② 尽管斯特恩赫尔知识丰富，正是这唤醒了他的分析（*Ni droite ni gauche*）。他所描述的历史看来围绕着特别简单的目的论组织起来。按照它，每一个与唯物主义或实证主义观点的对立只能被当成是法西斯主义的先驱。

决定性的,而且它的每一个神话式的特性建立在斗争基础之上。从这一观点来看,当“领导权”的概念出现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之中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也提出了偶然性的逻辑——它更缺少激进性。列宁和托洛茨基都没有怀疑社会代理人必然具有阶级特征。只是在葛兰西那里,两个传统汇集在他的“历史集团(historical bloc)”概念之中,在其中来自列宁的“领导权”概念和来自索列尔的“集团”概念得到了新的综合。

领导权：新政治逻辑的艰难浮现

在此有必要澄清两重真空之间的关系，这些真空出现在第二国际的实在论话语以及构成政治反应的领导权争论这个特别混乱阶段之中。让我们以详细说明那些双重真空的特征开始，这将使得它们与领导权缝合的相互比较成为可能。^① 首先，真空以二元论的形式出现：它的创始话语并不寻求确定在社会地形学中有效性的不同程度，而是要建立每一个地形学结构化规定和接受能力的限度。因

^① 我们要经常使用的“缝合”这一概念取自精神分析。在拉康的整个理论中它的作用还不够明显，它的明确运用应归功于雅克·阿兰·米勒（“能指逻辑的缝合因素。”《银幕》，1977/78年冬，第18卷，第4期，第24~34页）。它被用于指明在话语链基础上的主体生产，即表明主体与他者——符号——之间的不一致防止了后者作为完满的封闭存在（因此，作为边缘的意识构造在主体和他者之间进行连接和区分）。“缝合命名主体对于话语链的关系，我们应该看到，在持续性的形式中它是缺乏的因素，这一缺乏并非完全简单地不在场。缝合——就扩展来说——缺乏与它作为其中要素的结构上的一般关系，以至于它意味着位置的替代（米勒，第25,26页）。然而，这一要素的缺乏只是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缝合意味着充实。正如斯蒂芬·希斯所指出的，“缝合不仅命名结构中的缺乏，而且还指主体的可获得性、某一个封闭……没有什么令人惊奇的……因此拉康自己对‘缝合’这个词的运用……赋予了它冒充一致的含义，把它定义为‘想像和符号的功能’，关键的东西是明显的，‘我’是一个区分，但仍然进行联结，替代在结构之中是缺乏，但是仍然同时存在着与要替代的之间一致的可能性。”（希斯，《关于缝合的笔记》，第55,56页）正是这一双重的要素是我们要在政治领域缝合概念的范围内所要强调的。领导权实践在它们运作的领域是受社会公开性和每一个能指根本上不固定的特征决定的，这个根本上的缺乏正是领导权实践要充实的。完全被缝合的社会将是这样的社会，在那里，充实会得到它最终的结果并且因此将其自身看成是透明的封闭象征秩序。我们将会看到，那样的封闭社会是不可能的。

此,这种表述就像“基础结构并不决定一切,因为意识也干预历史”或者“一般理论不能解释具体情况,因为每一个预言都有语形学的特征”一样。二元论是通过未确定的本质构造的,作为未确定,逃脱了结构控制的本质被理解为结构的否定性反面,这就是构成二元论双边关系的东西。然而,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观察,这个回答根本没有结束结构的控制,它只涉及到结构决定作用的限度。例如,它完全可以既讨论逃离了经济决定论的广大社会生活领域,又可以讨论它的影响起作用的有限领域之中经济活动必须按照决定论的典型来理解。但是这一讨论显然存在着问题:为了确证某些事情绝对地受到决定以及在这些事情和非决定的事情之间建立明确的分界线,建立决定的特殊性是不够的。它的必然性特征也必须得到断定。由于这个理由,被信以为真的二元论实际上是伪造的:它的两极不在同一水平之上。决定的一面,把特殊性建立在必然性之中,限制了不确定性多样性;不确定的一面因此被还原到只是决定性的增补。^①

47

其次,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个表面化的二元论是对下面事实的反应:结构决定没有给在其中斗争能够被立即发动来反对分裂倾向的政治逻辑提供基础。不过很明显,惟一允许那个逻辑特征被思考的领域已经从下面这个图画中被抹去:因为每个理论中的决定性特征被归于基础结构领域和其决定的阶级体系,任何其他的逻辑消失于偶然变化的一般领域,或者交给了逃脱理论决定的存在,例如意

^① 在雅克·德里达曾经谈到的“增补的逻辑”这个意义上,假如特殊性与必然决定之间的关系被打破,“非决定的”增补就消失了。我们曾经看到,这正是索列尔神话中所发生的。然而,在他那种情况下,使得二元论出现的可能性领域也消失了。

志和伦理选择。

第三,最后,在第二国际的话语之中,社会代表的阶级统一依赖于镜式游戏这一更弱的基础:经济分裂不能构成阶级统一并且把我们引向政治重组,而政治重组不能发现社会代表的必然性阶级特征。

综合发展与偶然性的逻辑

现在我们来比较一下出现在第二国际理论话语中的全部分歧与领导权概念要缝合的断层。佩里·安德森^①曾经研究了在俄国社会民主党那里出现的领导权概念——共产国际的理论家从俄国社会民主党那里得到了它,葛兰西通过共产国际获得了它——而且他的研究结果是清楚的:领导权概念填补了危机带来的空白,按照普列汉诺夫的“阶段”概念来看,这一危机是普遍历史发展。由于这个原因,实现领导权的任务或全部政治力量属于历史偶然性领域。在欧洲社会民主党那里,主要的问题一直是工人阶级立场的分散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要求的统一受到损害。正是资产阶级文明的成熟程度把它的结构化秩序表现在工人阶级之中,破坏了工人阶级的统一。与出现在俄国环境下的领导权理论相对照的是,资产阶级文明不充分的发展逼迫工人阶级冲破他们自己,承担不是他们自己本身的任务。问题因而不再是确保阶级统一,而是在由于资产阶级结构性虚弱产生的偶然性历史中,把他们的任务确定为实现工人阶级斗争政治作用的最大化。

^① P·安德森:第15页及其后。

我们来分析领导权概念是怎样一步步出现的。在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的作品中,领导权这一术语被引用来描述这样的过程:俄国资产阶级无力进行他们“正常”的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而迫使无产阶级果断介入来实现这一目标。在任务的阶级本质与执行任务的历史代表之间存在着分裂,产生了一个非决定性的空间,它的维度极大地多样化了——在普列汉诺夫那里是最少的,在托洛茨基那里它们被最大化地扩展了。但是无论怎样,这个空间是非常多样化的,从它那里各个革命的方向被区分开来。俄国革命,反对“资本”的革命,像葛兰西所说的,必须通过最大化地扩展争取领导权的斗争来证明它的策略是正当的。结果是在内在必然(与“正常”历史发展一致的阶级任务)与外在偶然(在一个给定时期他们必须承担的全部任务与社会代表的阶级本质背道而驰)产生了对立。

正统典型的历史错位与我们在西欧发现的情况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在两者之中,错位导致了置换。但是尽管西欧在同一阶级内包含着从经济层而到政治层面的置换,由于在俄国它出现在两个不同阶级之间,这一置换比西欧更为彻底。除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面临着复杂的民族形势所表现出的阶段错位,在西欧,我们遭遇到同时存在的典型结构要素的分裂。因此对分裂的思考不能像俄国社会民主党那样,采取叙事的形式。最后,尽管典型的分裂和危机在其他情形中是消极现象,但是在俄罗斯却成了积极现象:资产阶级的任务与资产阶级完成任务的能力之间的不协调是无产阶级夺取权力的垫脚石。由于同样的原因,欧洲的错位形式不能通过归结为必须被克服的消极范畴——短暂无常和偶然性——被纯粹地概念化,但是

在俄罗斯的情形之中，由于错位本身表现为允许无产阶级发展的积极性的危机——把自己渗入历史的某种方式——使无产阶级与它必须在特定时刻承担的不同任务之间表现出新型关系具有特色就成为必然的了。这种不规则的关系就被称为“领导权”。

现在我们必须仔细分析俄国社会民主党话语中领导权关系的特殊性。事实上，在这里，“领导权”比一种关系更多地指明由不同关系之间的张力所控制的空间：(1)被领导的任务与它的“自然的”阶级代表之间的关系；(2)被领导的任务和领导它的阶级之间的关系。如果不严格概念形式下这两种关系的共同存在足以给“领导权”概念一个有关的空间，它们逻辑连接的明确规定构成了“领导权”转换成理论范畴的必要条件。但是，在这种情形下，为了观察到它们没有任何逻辑联结，必须细心分析这两种关系。

首先，在反对绝对主义的斗争中，没有任何社会民主党的分析提出资产阶级的任务在被无产阶级承担时不再是资产阶级的任务。阶级的同一性在生产关系上构成：对于正统，正是在基本结构内，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才形成。由于其运动是矛盾的而且倾向于自我取消，这一基本结构像叙事——我们可以称之为“第一叙事”——那样把自己组织起来。在这一叙事的结构化之中，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就是情节，而人物，作为完全被指派的角色，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历史的透明性被不规则的出现所破坏：资产阶级不能完成他的角色，而且必须被其他人物取代。我们可以用考茨基的术语——不断革命——称这一角色替代为第二叙事，这两种叙事之间的结构关系

是什么？简短地了解一下策略的讨论就足以使我们确信，它们在理论领域出现的连结是由第一个的优势标志的，三个方面的考虑足以证明这一点。(1)任务出场的顺序没有被第二叙事改变：假如资产阶级不能实现“他的”任务，这些任务就必然交给无产阶级——然而，如果人们承认整个进化计划在第一叙事水平上构成，过渡的必要性就是明显的；(2)任务的阶级本质并没有因为它们被这一阶级或别的阶级承担的事实所改变——甚至当它们的历史代表是无产阶级时，民主的任务仍然是资产阶级的。(3)正是社会代表的同一性是由他们在第一叙事中的结构立场所决定的。因此在两种叙事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关系：领导权关系增补阶级关系。用索绪尔所说的差别来看，我们只能说，领导权的关系永远是言语(parole)事实，而阶级关系是语言(language)事实。

领导权任务的意义和同一性以及使领导权发挥作用的代表完全被包含在下面的关系之中：(1)正如上面所定义的，关系的两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2)只能是外在性之一。现在，可以在下面两个方面考虑这一外在性的关系：作为外在性的关系以及作为外在性的关系。第一个方面没有困难，假如它的成分的同—性完全在关系之外被构造，关系就是外在性之一。至于关系的因素，为了那个关系可以成为严格外在性之一，概念的特性不被归结于它将是必要的(否则那样的特性会变成结构上可定义的因素。既然这需要与同样构成阶级的其他结构要素特殊连接形式的理论，阶级同一性将必然被更改)。换句话说，外在关系只能被看成是纯粹偶然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第二国际的话语之中所发现的伪造二元论出于同样的理由在

领导权理论中被再生产出来。关系(1)和关系(2)不能被概念化地连接,只是因为后者没有任何积极的概念化特性,而且被还原到在自身之外被构成的代表之间关系的偶然变化领域。但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可能被认为的是:从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德到列宁和托洛茨基,存在着一个积极的、复杂性不断增加的领导权理论。这是真实的,但是没有反对我们的论点,因为那样的积极性和复杂性涉及到使阶级关系中的领导权关系得以可能的形势类型学,而且涉及到在特定危机中活动的社会团体的关系多样化。然而,像那样的领导权联系的特殊性从来没有被讨论过,也许有狡猾的戏法使它被掩盖起来。

- 51 为了认识这个戏法是怎样出现的,我们应当集中研究“标准的”发展形式对历史的控制以及领导权因素占据着一个明显边缘化的地位(普列汉诺夫就属于这种情形,他看到了工人阶级的介入是一种通过向资产阶级施加压力来实现自己任务的方法)。更中肯的是在其他的研究中,领导权任务的转移成了革命的实质,所以让领导权联系的特殊性掩盖起来是相当难的。在这一意义上,考茨基的文本具有典型的清晰性,因为它们特别强调俄国发展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不同的特别性,众所周知,大量的作品在俄国1905年革命前后被出版,^①托洛茨基提出,工人阶级政府可能将承担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转变,以对抗孟什维克所主张的随着沙皇制度崩溃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前景,而且布尔什维克的工人和农民政府这个概念将限制孟什维

^① 关于托洛茨基持续进化的论题原初的形式,见A·布罗萨 *Aux origins de la révolution permanente: la pensée politique du jeune Trotsky*, 巴黎1974年;米歇尔·勒维:《多样化和不平稳发展的政治》,伦敦1981年,第2章。

克转向资产阶级的民主模式。这种可能性存在于俄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之中——资产阶级和城市文明的不足,作为军事官僚机构的国家不合比例的发展,产生于“落后特权”的资本主义高级形式的介入,无产阶级刚刚产生、缺乏传统、依赖复杂的文明社会等等,由于资产阶级很晚才承担反对绝对主义的历史任务,无产阶级成了实现它们的主要代表。这一阶段论典型的错位以及因而发生的领导权转让是托洛茨基理论的轴心。

看来没有比领导权关系更大的中心,因为革命的可能性正是以它为中心的。然而我们要更仔细地检查托洛茨基话语中的这一中心。他的分析在两个基本方面上而对着抵制严格阶级还原论——即关系的必然特征——的社会关系特殊性:(1)在两个方面,他回避了那将决定这一特殊性的理论发展。第一点在于资产阶级结构上的弱点以及俄罗斯社会历史形成过程中国家扮演的特别角色,而对

52

布尔什维克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提出的理论挑战——他从不成熟的经济学观点出发,强调承认国家的重要性会使国家与它的阶级基础分离——托洛茨基没有以对不同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成过程中的国家相对自主性进行理论分析来给予回答,而是诉诸于灰色的理论和积极生活:“波克罗夫斯基同志的思想被僵硬的社会范畴所控制,他把它们放在活的历史力量之中——那里并没有‘特殊的特征’,没有历史,只有冒充的唯物主义几何学。代替了对活的和变化的经济发展的研究,它只满足于关注几个外在的征兆,并且使它们适应于已经准备好的陈词滥调。”^① 由国家

^① 托洛茨基,1905年,伦敦1971年,第333,339页。

相对于阶级的自主性构成的“特殊的特征”因此被置于从一开始就严格限制其作用的领域：我们现在正在对付的情况，属于非常实际的秩序，并且能被合并到一个故事情节中去——因而就有了托洛茨基分析中的主要叙事调子——但是那不能以概念的方式来掌握。

即使所有的社会规定都属于同样的分析，也不必然是消极的，因为托洛茨基随后将不得不去叙述——在俄国特殊性的层面上——经济对于所有社会关系起最终决定作用的过程。然而这没有发生，尽管有对于“特殊性”的叙事，被当成是每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成过程的一般特征并不隶属于叙事性分析，经济在历史过程中的最终决定对于托洛茨基和波克罗夫斯基一样，都是以教条的方式建立在特殊历史层次上的。“本质”的秩序不可避免地遭遇到“情况”的秩序，而且两者都产生于同样的社会代表，在他们那里对于历史变化有可能的东西被还原到使它们偏离一般典型的全部特征上去了——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无产阶级的刚刚产生，等等。然而“特殊的特征”并没有以任何方式削弱典型的有效性：在社会代表规定他们同一性的范围，它继续施加影响，而且特殊的特征只是实现在“本质”层而预先建立的阶级目标的有利或不利的现实条件。

53 在托洛茨基对领导权的分析触及的还原论阶级概念的第二个根本方面之中，这一点清楚地显示出来。正如先前我们看到的——而且这对托洛茨基的分析也适用——存在着历史任务“自然的”阶级代表与具体执行这一任务的代表之间的分裂。但是我们也看到，对于承担历史任务的代表，任务的阶级本质并没有因为这一分裂被改变。因此代表与承担的任务并不一致，他们与任务的关系仍然处

于间接话语的层面上——甚至在开创新时代的情况下。任务的分裂只是不影响其本质的经验现象，代表与任务的关系也是经验性的，而且在代表同一性的“内部”与“外部”之间分裂永久地发展着。我们在托洛茨基那里从来没有发现这样的观念：民主和反对群众绝对的同时性构成了特殊的主体立场，在其中不同的阶级可以连接并在连接中修改他们自己的本质。没有实现的民主任务只是工人阶级向更确定的阶级目标发展的垫脚石。这样，不仅仅为领导权联系的特殊性被系统地用魔法来除掉创造了条件（即使它符合实际和环境要求的特征避开了概念化的结构），而且也给它的隐匿提供了条件。当然，领导权关系介入到调整和重组的叙事之中，介入到不能被包容在重复原则下的连续性之中，似乎为概念化的容易消失的存在提供了意义。这样一来，俄国特殊性在其中被提出来的历史叙事形式，扮演了一个暧昧的角色：一方面，它把它们限制在事实的领域，另一方面，甚至在不可靠的叙事形式下，它们能够被思考的事实给它们提供了组织原则，某种话语的存在。然而这是一个特别短暂的存在，因为领导权的传奇故事迅速地结束了，即使对于托洛茨基或列宁，除非社会主义革命在欧洲爆发，除非胜利的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来帮助俄国革命，没有可能保证苏维埃国家生存下来的特殊性。因此，俄国阶段性断层的“异常性”与“正常的”西方历史联系起来，我们所称之为“第二叙事”的又重新完整地进入了“第一叙事”，“领导权”马上发现了它的限度。

“阶级联盟”：在民主与权力主义之间

作为外在于代表阶级同一性的领导权联系这一概念当然不是托洛茨基主义所独有的，也是全部列宁主义传统的特征。对于列宁主义来说，领导权包括阶级联盟之中的政治领导，领导权联系的政治特征是基本的，意味着联系本身建立起来的领域不同于社会代表被构成的领域，由于阶级构造的特殊领域存在于生产关系之中，政治领域中阶级的存在只能被理解为利益的代表。通过代表他们的党，他们在一个阶级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在联盟中反对共同的敌人。然而，这种间接的统一并没有影响构成联盟的阶级的同一性，因为它们的一是围绕着“利益”构成的，严格说来，最终是不相配的（“共同罢工但是分开游行”）。被纯理论地认为是处于“利益”之下的社会代表的同一性以及代表方法对于被代表的透明度是允许被建立起来的领导权联系的两个外在性条件。这一外在性是那些具有战斗精神的共产主义者发现自己身陷其中的荒谬形势的根源。民主自由斗争的领导者通常仍然不能识别它们，因为一旦“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结束，他将要首先废除它们。

在这一点上，记住这一不明确性以及列宁主义话语之中来自领导权中心的矛盾作用是重要的。一方面，这个概念无疑与更严重的权力主义和列宁主义传统消极的倾向联系起来，因为它假定在大众范围内，领导因素和被领导的之间明确地相互分离（这种分离在考茨基主义正统的革命策略中明显是不存在的，在其中政治领导与社会基础完全共同存在使领导权重组没有必要）；但是另一方面，领导

权关系使潜在的比第二国际传统更民主的政治概念成为必要,在经典的经济主义那里,相应于不同阶段的任务和需要现在被看成是共同存在于相同的历史危机之中。这导致了接受当前的政治对于复杂的对立和分裂的合法性,结果,革命的合法性不再惟一地被集中在工人阶级之中了。因此在“大众”和“阶级”之间出现了结构断层,表明了前者与控制因素分离的界线并不是阶级剥削。多样化的不平衡发展首次允许马克思主义去提出社会斗争的更复杂本质这一概念。

那么我们怎样来解决这一自相矛盾呢?正当大众斗争的民主维度被扩展时,在社会主义实践中还要更加强调先锋成反民主的概念吗?答案相当简单,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给予工人阶级的本体论优先权从社会基础变成了群众运动的领导权。在列宁主义的概念中,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并没有通过与多样化的民主要求结合起来改变他们的阶级同一性,这些多样化要求是通过领导权实践在政治上被重组的。相替代的是,他们把这些要求当成是条件、追求他们自己利益的必要短期步骤。在这样的条件下,“先锋队”和“群众”的关系只能有根本外在性的和操纵的特征。因此在民主要求变得更加多样化、群众斗争领域更加复杂化的情况下,继续与“无产阶级的客观利益”保持一致的先锋队必定扩大了它自己的同一性与它企图领导的那部分之间的裂缝。在严格经典的概念中,正是群众运动民主潜能的增长导致了权力主义政治实践,当大众斗争的民主化依赖于溢出阶级界限的断裂点增殖时,政治集权主义在此刻浮现出来了,大众运动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差别被建立起来,给阶级领导权提供了基础。假如这

一差别建立在争取实现整个运动共同分享的目标这个斗争中自我组织的更大实践能力上，结果并不必然就是权力主义。但是，正如我们所见，它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中实际地被提出来了，一个阶层了解历史的基本运动，并且了解把群众团结为一个整体的需要具有的暂时性特征。赋予给工人阶级的中心性不是实际的，而是本体论的中心性，同时它也是认识论特权的所在：作为“普遍”阶级，无产阶级或者它的党是科学的保管人，在这一点上，阶级同一性与群众的同一性之间形成了持久分裂，转向权力主义的可能性从正统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以某种方式被提出来了，即从那个被限定的演员——工人阶级——被提升到“普遍阶级”的时刻就开始了。如果说没有一个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向权力主义这个方向发展，那是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工人阶级的政治中心性不得不与其他社会阶层的无产阶级化相一致，而且没有阶级与群众分裂的空间。所有这些对于权力主义开始变成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然而，夺取权力应该被理解为比阶级行动更为宽泛的群众行动，而在正统派的术语中，阶级行动的政治中心性被看成是原则。

现在我们把几个方面的联系综合起来。领导权概念所包含的两种关系——被领导的任务与进行领导的阶级之间的关系，以及被领导的任务与作为“自然的”代表那个阶级之间的关系——陷人紧张而从来没有有效的概念可以把它们连接起来的原因已经很清楚。经济主义阶段论的维持工人阶级统一和同一的条件——惟一能构成“普遍阶级”的领域——在于被领导的任务不应该改变领导权阶级的同一性，而是凭借它进入外在的实际关系。此外，确

定关系外在特征的惟一方法在于使被领导的任务与它的“自然的”阶级代表之间联系更紧密。领导权关系领域因此根本上属于实用主义的话语。所有列宁主义和第三国际引入到马克思主义之中的术语上的创新都是一种军事上的术语(战术联合,战略阵线,前进几步与退几步),没有一个涉及到葛兰西后来用历史集团、完整国家等概念所强调的社会关系结构。

现在,包含在领导权概念之中的两种关系之间的紧张与我们所说的民主和权力主义领导权实践之间的不明确性没有不同。只要民主的任务被结合到不同的阶级、经济主义典型的必然阶段时,领导权阶级和民主的任务或需要之间的关系就承担了一个外在的操纵特征。反过来说,如果在这一结合被打破的情况下,在允许领导者与群众之中被领导者之间严格的分离出现的条件被打破时,民主的潜能就能得到发展。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提出这样的条件:它允许在民主或权力主义的领导权实践中存在的原初不明确性被克服。

57

民主实践。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领导权重组领域给民主的扩展和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深化带来了潜力。没有领导权,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只能集中在无产阶级的需要和利益上。但是只要阶段错位迫使无产阶级在群众领域行动,它就必须放弃自己的阶级局限,使自己成为在自己之外多样化对抗和需要之中说话清楚的人。从我们所说的每件事来看,很明显,群众民主实践的深化——它避免领导者操纵、阶级领导权与民主的任务之间关系的外在性——只有在意识到这些任务并没有必然的阶级特征,贯穿一切的阶段论被放弃——才能实现。有必要结束这样的

观点：民主任务只局限在资产阶级阶段——这样妨碍社会主义与民主之间持久结合的障碍才会被消除。首先，正是阶级同一性被它们自己所承担的民主任务所改变：内部与外部之间严格的界线划分瓦解了；其次，由于群众民主的需要失去了必然性的阶级特征，领导权领域不再包括阶级性和游戏基础上的最大化作用。“阶级联盟”的概念也是明显不充分的，因为领导权允许社会代表同一性这一结构，而不只是在事先确定的代表中的理性主义的“利益”一致；第三，由于所谓的“代表”限制了被代表的本质（事实上正是代表这一透明的概念站不住脚了，这里实际上成问题的是基础/上层建筑这个模式本身），不再可能把政治领域当成是“利益的代表”；最后，社会代表的同一性不再仅仅通过他们介入生产关系被构成，而且在大量的主体立场中成了不稳定的连接，实际上暗中受到挑战的就会是社会代表和阶级之间的同一性。

- 58 权力主义实践。这里的条件是对立的。每一个要求或任务的阶级本质必然事先被固定下来。存在着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小资产阶级的要求，等等，而且他们相对的进步性通过以传统的阶段模式分析每一个危机和不平衡联结带来的变化这种政治考虑建立起来。在无产阶级领导权任务与其阶级同一性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完全分离。政治的军事化术语支配着话语策略领域，但是由于真正的工人阶级当然没有与“历史的利益”完全一致，阶级的物质性与提出其“真正同一”的政治要求之间产生了持久的分裂。从列宁的《怎么办》到第三国际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化共产党，这条划分线越来越严格，而且被反映在政治的权力主义转向之中。重要的是要弄清楚什么使得这一转向难

以避免,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决定性需要政治媒介,我们没有以阶级自发的社会决定这一神话基础上的工人利益观来反对这一点。决定性的东西是如何理解政治路线的实质。很明显,列宁主义并没有力图通过斗争构造任何历史规律不能事先决定的大众同一性,相反,其主张存在着可以接受有知识的先锋的“自为”阶级——他们的态度倾向于工人阶级是完全可以受教育的。权力主义的政治基础存在于对科学与政治的编织之中,结果,把党当成阶级——不是现实的阶级,而是“历史利益”构成的圆满现实——的代表不存在任何问题。不管领导权的民主实践日渐要求怀疑代表过程,权力主义实践仍然给代表关系变成政治基本机制提供基础,一旦每一个政治关系被当成是代表关系,逐级的替代就从阶级走向了党(无产阶级客观利益的代表),并且从党走向苏维埃国家(共产主义世界利益的代表)。军事概念化的阶级斗争因此包括在末世论的史诗之中。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阶级统一转移到政治领域的根源返回到第二国际的正统。在列宁主义中正如在考茨基主义中一样,政治要素的基本特征并不需要把主要角色归因于上层建筑,因为给予党优先权的不是“地形学的”,而是“认识论的”:在构造社会关系中它不仅建立在政治层面的效力上,而且还建立在由特定阶级观点享有的科学垄断上。这个科学垄断在理论层面上保证了资本主义可见的倾向与它的根本进化之间的分裂被克服。考茨基主义与列宁主义之间的差别在于对前者来说分裂完全是暂时的和阶级内部的,而且克服它的过程被看成是存在于资本主义积累的内在倾向之中。而对于列宁,那个分裂存在于阶

级与群众之间的结构错位领域，这一错位永远清楚地规定了资本主义时代政治斗争的条件。

最后一点是决定性的：领导权的任务逐渐成为共产主义策略的中心，因为它们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条件有密切联系，对于列宁来说，世界经济不仅仅是经济事实，还是政治现实：它是资本主义链条上的环节，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观点看，破裂点不是表现在那些最发达的道路上，而是积累了大量矛盾的地方，在那里最大量的对抗倾向——在正统的观点看来，它们属于不同时期——出现于正在破裂的统一体之中。^①然而，这意味着，革命的过程只能被理解为不同要素的政治连接，不存在没有外在于阶级绝对对抗的社会复杂性的革命，换句话说，不存在没有领导权的革命，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当人们遭遇到旧有的一致日渐增长的分裂和社会关系的政治化时，这一政治连接的要素就开始变得越来越根本了。列宁清楚地认识到向新的资产阶级群众政治的转变——他给它贴上了劳埃德·乔治主义的标签^②——深刻地改变了阶级斗争的

^① 自然或历史中不存在奇迹。但是历史中的每个突然转向，不但适用于每一次革命，而且提出了大量的内容，打开了无法预料的斗争的特殊结合形式，使得对立力量结合起来，以至于对世俗精神来说那就是奇迹……革命进行的那样快，而且——似乎乍一看来——那样彻底。只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完全特殊的历史局势，绝对不同的过程，绝对不同的阶级利益、完全矛盾的政治和社会斗争已经以特别协调的方式结合起来。列宁：《远方来信》，“第一封信，首次革命的第一阶段”，见《著作选》，第23卷，第297、302页。

^② “政治民主的结构在相同方向上发挥作用。在我们这一时代离开选举，大众什么也做不了，而且在印刷和议会时代，离开广泛分布的、系统控制的、装备精良的奉承系统、谎言、欺骗、歪曲和时髦的大众口号，不可能得到群众的追随。而且，只要放弃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就会保证全部改良并且保佑左派和右派的工人，我称之为英国大臣劳埃德·乔治之后的劳埃德·乔治主义，他是在‘资产阶级劳动党’传统领域中这一系统最主要和最机敏的代表。”作为头等资产阶级的军火商、狡猾的政客、会讲任何你喜欢的話、甚至对于对劳动者可以讲革命的受欢迎的雄辩家，他会说顺从的工人在实现改良中能够获得面包（保险，等等）。劳埃德·乔治极好地为资产阶级服务，正像他为无产阶级服务一样，把资产阶级的影响带到无产阶级之中，在那里，资产阶级最需要这一影响，而且在那里也发现了要顺从于大众道德是极困难的。”列宁：“帝国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分裂”，《著作选》，第23卷，第117、118页。

历史舞台。这一无可怀疑的连接的可能性,改变了得到许可并且可以想像的社会和政治同一性,逐渐瓦解了传统阶段论逻辑范畴的明确性。托洛茨基想得出这样的结论:多样化和不平衡的发展是我们时代的历史条件。这只能意味着领导权任务不停地扩展——这一扩展与极端萎缩的阶级任务是完全对立的。但是假如没有不包含“非正统”要素结合的历史过程,那么什么是标准的历史发展呢?

共产主义的话语本身正在逐渐受到帝国主义时期新历史领域中每个政治主动获得的领导权特征的控制。但是结果是它趋向于在我们所称之为民主的与权力主义的领导权实践之间矛盾地摇摆。二十世纪20年代,经济阶段论被普遍接受,而且由于革命的前景变得模糊,阶级界线变得更加严格了。由于欧洲革命被看成完全是以工人阶级为中心的,而且还由于共产主义的政党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历史利益”,这些政党的惟一功能是在反对社会民主一体化倾向中去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因此,在相对“稳定”时期,它必然要以更大的不妥协去加强阶级屏障。因此,1924年发出了为共产主义政党布尔什维克化战斗的口号,季诺维也夫把它解释为:“布尔什维克化意味着坚定为无产阶级领导权斗争的意志,意味着对资产阶级、反革命的社会民主领导人、温和派、中立派、半中立派、和平派、所有必然失败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强烈憎恨……布尔什维克化是行动的马克思主义,它是对无产阶级专政观念和列宁主义的贡献。”^① 随着经济危机的恶化必然出现革

^① Pyatyi vsemirnyi Kongress Komunisticheskogo Internatsionala, 17 iuniya-8 iuliya 1924g. Stenograficheski otchet, 莫斯科-列宁格勒 1925年, I, 第482, 483页, 引自 M·哈耶克“La bolscevizzazione dei partiti comunisti”, 见 E·J·霍布斯鲍姆等编的 Storia, 都灵 1980年, 第3卷, 第468页。

命的复兴,政治历史时期的划分只是经济危机的反映:稳定时期留给共产主义政党的任务只是去以完全的阶级和决裂的身份来积累力量,一旦危机到来,它将为新的革命行动开辟道路(表现出的特征在于,“联合阵线”政策从下面的情形中得到解释,并且被当成揭露社会民主领导人的机会)。在这些条件下,对其操纵其他社会和政治力量的方法不可能取得优势。

61 结束这一还原论和操纵概念——或者开始结束它,因为它在共产主义传统中还一直没有被克服——被联系到欧洲法西斯主义以及反殖民主义革命周期的经验上。在前一种情形中,自由民主国家的危机以及极右大众意识形态的出现,形成了对资产阶级天赋民主权利和自由观念的挑战,而且同时,反法西斯的斗争创造了普及的和民主的群众主观性,可以与社会主义的同一性持久地融合在一起。用我们先前分析中的话来说,把领导权任务与它的“自然的”阶级代表统一起来的联系开始瓦解了,而且把那个任务与领导权阶级的同一性融合起来变得不可能了。在这个新的方面,领导权被理解为围绕着新的阶级核心的民族民主重构,这一倾向后来被各种国际范围内对纳粹占领的抵抗经验增强了。但是,第三国际第七次大会上季米特洛夫的报告后,共产主义政策开始发生了变化,第三国际时期“阶级反对阶级”的路线被放弃,大众阵线的政策被引入了。^① 当仅仅明确保留领导权概念为阶级外在的联盟时,新的策略把民主理解为不欢迎社会中任何一部分独占的一般基础。在这些条件下,坚持领导权任务与阶级同一

^① 拉克劳:《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伦敦 1977 年,第 138 页及其后。

之间的严格分离越来越困难了。因为“大众的”和“民主的”在群众斗争的层面上是有形的现实，而不能被归于严格的阶级所有，大量的阐述——从毛泽东的“新民主”到陶里亚蒂的“进步民主”和“工人阶级的民族任务”——尝试把自己定位在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标准难以界定的领域。发生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边缘世界的革命表现为相同的现象：从中国到越南或古巴，大众同一性比阶级同一更为重要，“大众”与“阶级”之间的结构性分裂从列宁主义一开始就慢慢滋长，这时候开始形成了它的完全影响。

在这一点上共产主义话语面对着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多元对抗的特征怎样出现于群众领域而不是阶级领域？一旦领导权力量把群众的需要纳入到自身的特性之中，它怎么能够保持自己严格的无产阶级特征？对第一个问题的主要反应是去补充一套话语策略，由此在超越自身特殊阶级特征的阶级之间建立起关系，而形式上仍然停留在阶级领域，例如，在共产主义话语中使用列举。进行列举从来不是单纯的活动，它包含着意义的根本置换。这一列举出现在统治者与大众阶层两个部分之间对立所带来的分裂之中。两者的同一在列举出他们的基本阶级成分基础上构成，例如，在大众方面将包括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阶层等等，然而，列举不只是肯定在大众领域某些阶级或阶层单独的实际存在，还断定了他们在面对控制时的同等。同等关系并非在对象之中的同一性关系，它绝不是重复，因为它在某些对象之中建立的可替代性仅仅是对于给定的结构环境中确定的位置才有效。在此意义中，从对象本身到它们出现或存在的环境，同等替代了使其自身成为可能的同一性。不过这意

意味着在同等关系之中，对象的同一性被分裂了，一方面，它坚持自身的实际意义，另一方面，它象征着它作为其中替代性要素的环境中的位置。这正是那一话语中所出现的：从严格的阶级观点来看，在大众中没有任何同一性，其中每一个都已经分化了，而且是相互对立的利益。但是同等关系建立在它们之中，在它们对立于控制的环境中，构成了不可还原于阶级立场的大众立场。在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中，没有同等的列举，对于考茨基来说，在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中，每一个阶级的阶层占有一个特别的有区别的位置，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基本特征之一总是把“人民”看成是无组织和不严密的范畴，而且把每一个对立还原到在其自己的现实主义中耗尽自己的阶级对立上，没有任何同等的维度。至于“多样化和不平衡发展”的话语，我们已经看到，阶段的错位和领导权的重组只是被当成阶级之中更复杂的运动，其实际的特征给例外的叙事而不是特殊性的概念化提供了空间。在罗莎·卢森堡那里，我们接近了象征性同等的分裂破坏了每一个具体斗争的实际意义，不过正如我们所见，她把阶级的必然性特征归因于社会代表严格地限制了同等逻辑扩张的结果。只是在大众阵线时期的列举实践中，“人民”——19世纪政治和社会斗争的代表中心——再度出现在马克思主义领域，虽然开始时是胆怯的。

从我们已经说过的那里可以清楚地看见，共产主义话语中作为政治代表的“人民”出现的条件，一直是那个分裂了阶级同一性并且因此构成了新型分化的同等关系，现在这个过程完全发生在领导权实践领域。共产主义的列举不是肯定了实际的情况，而是具有实行的特征。全体阶层

的统一不是事实,而是要在政治上构造的计划。那样一个全体的领导权化因此并不包括简单的结合或者暂时的一致,它必须建构新的不同于阶级关系的结构性关系。这说明用“阶级联盟”的概念去揭示领导权的特征与仅仅靠计算砖块描述建筑物一样不充分。不过按照它的内在逻辑,同等的关系不能只通过其术语的偶然替代性来显示其存在,它必须提出普遍的同等,在其中那样的关系要同样象征性地具体化。正是在我们正分析的政治情形中,民族化的大众或大众民主的象征浮现出来去构造不同于阶级立场的主体立场。而后,领导权关系最后失去它实际的、偶然的特征,变成每一个政治话语构造中的稳定成分。在此意义上,毛泽东对矛盾的分析——尽管它们的哲学价值不多——确实有把社会斗争领域当成丰富的矛盾领域的巨大优点,而不是完全返回到阶级原则上去。

共产主义话语所面对的另外一系列问题涉及到怎样坚持领导权阶层的阶级同一性。用最一般的术语来说,问题是这样的:假如在新概念中领导权关系改变了领导权阶层的同一性,假如帝国主义时期社会斗争的条件使那些出现在受控于重组实践的日渐复杂领域的东西成为必要,那么接下来的不是要对领导权主体的同一性产生怀疑吗?到什么程度我们才可以继续把阶级核心当成各种主体立场的连接原则?这里有可能给出两个答案或者是两种得到答案的方法,最终它们依赖于我们先前所描述的两个领导权概念——民主和权力主义。对于表明了多数共产主义传统特点的这两个问题,答案可以在可笑的代表模式的现实中发现,每一个都代表另一个,直到最后达到假定给出了整个系列意义的阶级核心。这种回答明显地否认了

所有政治关系的模糊性和不透明性,这个政治关系是空的舞台,在它们——阶级——之外被指定的角色发动了它们斗争。进而,以这种方式被代表的阶级只能是这个阶级“本身”,决定性的方面存在于党的“科学的”宇宙观之中,即具有本体论优先权的代表那里。这样一来,所有关于代表的实践的具体问题被简单地排除了。另外一个回答接受了代表深入于其中的多样性结构关系,而且以那样的连接取代了代表原则。这些代表之间的统一就不是一般潜在本质的表现,而是政治建构和斗争的结果。如果作为领导权代表的工人阶级围绕自身连接了大量的民主要求和斗争,这不是由于先验的结构特权,而是由于阶级方面的政治主动性。因此,领导权主体只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才是阶级主体:在阶级立场的基础上,某种领导权形态是实践上被连接的,但是,在那种情形中,我们所涉及的是具体的工人,而不是由“历史利益”所构造的圆满现实。在第三国际的世界中,只有一个思想家,在他那里,作为连接的政治和领导权概念找到了——带着它的含糊性和局限性——理论上充分考虑的表达,当然我们是指安东尼·葛兰西。

作为分水岭的葛兰西

葛兰西思想的特殊性通常以两种不同和明显矛盾的方式被提出来。在一种解释中,葛兰西是位不寻常的意大利理论家,他的概念创新涉及到意大利背景下的特殊条件:构造统一民族国家的复兴运动失败,工业化的北方与农业的南方之间明显的地区差别,由于梵蒂冈问题没有把天主教群众一体化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资本主义的不充

分和矛盾的发展,等等。简而言之,葛兰西是“不平衡发展”的第一位理论家和政治策略家,但是他的概念几乎与发达资本主义情况没有关系。第二种完全不同的阅读提出他是位西方革命的理论家。^① 他的策略性概念建立在发达工业文明的复杂性和它们的社会政治关系的不透明基础上,他的解释者之一走的更远,以至于把他看成是一个1929年世界性危机后研究资本主义调整以及在政治与经济日渐交织在一起这样环境下大众斗争复杂性的理论家。^②事实上,由于把葛兰西的理论创新置于更一般的水平上,所以这两个解释都是可能的——一部分有效的。由于提供了超越列宁主义“阶级联盟”范畴的领导权联系理论,葛兰西比同时代的其他理论家更大地拓宽了政治重组和领导权的领域。在发达工业国家和资本主义的外围,政治斗争的条件越来越离开传统阶段论的想像,而葛兰西的范畴却正适合这两种情形,由于这些的范畴的恰当性,它们因此被看成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层面,而且不可能涉及特殊的地理环境。

然而,葛兰西的起点属于严格的列宁主义探索,《南方问题笔记》(1926年)是第一个使用了领导权概念的葛兰西文本,他说:“无产阶级能够变成领导和统治阶级,只要它成功地创造可以动员大多数劳动群众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的联盟体系。在意大利,在这里存在的实际阶级关系中,这意味着它在争取广大的农民大众支持上要取

^① 参看《葛兰西与国家》中比西·格吕克斯曼那一章,伦敦1990年。

^② B·德·乔瓦尼:《列宁和葛兰西:国家、政治和党派》,见C·墨菲编的《葛兰西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伦敦1979年,第259~288页。“对乔瓦尼概念的批评,”见墨菲在上书中的导言。

得成功。”^① 这一领导角色的前提条件是工人阶级不应该继续局限在保护狭隘的社团利益上，而应该吸收其他阶层，但是，这一逻辑仍然预先构造了完全适合阶级联盟概念的阶层利益。正如在列宁那里一样，领导权只是政治的而不是“道德和知识分子的”。

正是从“政治”到“知识分子和道德”层面的运动，向超越了“阶级联盟”的领导权概念的决定性转换形成了。因为，鉴于政治领导权可以建立在联结起来的一致利益上，在其中参与者保持他们自己的身份，道德和知识分子的领导权就需要被大多数参与者分享的全体“观念”和“价值”，或者用我们自己的术语来说，某些主体立场横贯了大量的阶层。根据葛兰西的观点，知识分子和道德领导权构成了较高的综合、“集体意志”，通过意识形态，它们变成统一“历史集团”的有机混凝土。所有这些新的概念对列宁主义的观点有一个置换作用，领导权联系的合理特性不再是隐藏的，相反是完全可见的和理论化的。这一概念化分析定义了一套新的团体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曾经使那些团体在革命和经济关系的计划中的位置不清楚，同时表明意识形态正是这些关系被构成的领域。

因此，每件事情都依赖意识形态怎样被理解。^② 葛兰西在此引发了两个对经典问题的新的根本置换，第一个是他的意识形态物质性的概念。意识形态并不是社会代表的“观念体系”或“错误意识”，它是有机的、关系的整体，具

^① 葛兰西：《南方问题笔记》，见 Q·霍尔译的《1921—1926 年政治作品选》，伦敦 1978 年，第 443 页。

^② 关于葛兰西的领导权、意识形态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见墨菲的《葛兰西的领导权和意识形态》，引自《葛兰西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第 168—204 页，以及墨菲的《葛兰西的领导权和完整国家：走向新的政治概念》，引自 C·布里奇和 R·布伦特编的《银色层：80 年代的策略》，伦敦 1981 年。

体化于制度和机构之中,它围绕着许多基本的连接原则把历史集团焊接在一起。这排除了对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式的阅读。事实上,通过历史集团的概念和作为有机混凝土的意识形态,新的总体化范畴使我们超越了基础/上层建筑的区分,不过这是不够的,因为道德和知识分子领导权还可能被阶级的所有附属阶层理解为领导权阶级意识形态的灌输。在那样的情形之中,不会存在横贯阶级的主体立场,因为任何那样的做法事实上都会成为统治阶级的附属,而且在其他阶层中这种意识形态的存在可能只被当成是错误意识现象。正是在这至关重要的一点上,葛兰西进行了他最重要的第三个置换:结束意识形态的还原论。对于葛兰西来说,政治主体严格地说不是阶级,而是合成的“集体意志”,同样,领导权阶级所连接的意识形态要素没有必然的阶级属性。关于第一点,葛兰西的立场是明确的:集体意志是政治意识形态连接分散和破裂的历史力量的结果,“一个人可以由此推论出‘文化方面’的重要性,甚至在(集体)实践行为中。历史活动可能只被“集体的人”所执行,而且这预示了通过有不同目标的多样分散意志以一个目标被焊接在一起,在同等的和共同的世界观基础上达到了文化——社会的统一。”^① 没有再比列宁主义阶级联盟的概念更远离“集体的人”,“用单一目标焊接起来”了。关于第二点,对于葛兰西同样明显的是,有机的意识形态并不代表纯粹阶级的和封闭的世界观,它通过并不具有任何必然阶级属性的要素的连接而构成。关于这一点,我们来分析一下关键的一段:“重要的是新历史阶段的主

67

^① 葛兰西: *Quaderni dal Carcere*, V·格拉塔纳编,都灵1975年,第2卷,第349页。

要代表提出的合成意识形态所从属的批评。这一批评使得旧的意识形态通常具有的相对重要的分化和改变过程成为可能,那些先前是次要和附属的,甚至是偶然的,现在成为主要的东西——即成为新的意识形态和理论综合的核心。由于从属的部分有了社会发展,旧的集体意志分解成它的矛盾因素。”^①“另一方面,这些被假定为自主意识的理论意识会是怎样形成的呢?每个人是怎样选择和综合那些要素来构成自主意识的呢?每一个被强加的因素会被合理地拒绝吗?因为是强加的,所以必然被拒绝,但是并不完全如此,就是说,有必要给出新的形式,这些形式对于特定团体是专有的。”^②

我们由此可以弄清楚划分葛兰西与那一时期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的其他反经济主义立场的界线的关键之处。例如,卢卡奇和柯尔施也都有传统上属于上层建筑的东西,但是他们是在把革命主体等同于工人阶级这个阶级还原论观点起作用的范围内考虑这些内容的,以至在连接意义上的领导权完全是不可思议的。正是葛兰西引入了这样的概念,它激进地颠覆了第二国际二元论最初出现的条件以及在第三国际扩展了的话语规模上它的再生产。一方面,历史偶然性的领域比先前任何话语更完全地渗透到社会关系之中:社会片段已经失去了那些把它们当成阶段论典范的要素的本质联系,而且它们自身的意义依赖于没有得到历史规律保证的领导权连接。在我们先前的分析
68 所使用的术语之中,我们说到多样化的“要素”或“任务”除

^① 葛兰西: *Quaderni dal Carcere*, V·格拉塔纳编,都灵 1975 年,第 2 卷,第 1058 页。

^② 葛兰西: *Quaderni dal Carcere*, V·格拉塔纳编,都灵 1975 年,第 3 卷,第 1875 页。

了它们与领导它们的力量之间的关系之外不再有任何同一性；另一方面，这些不确定的连接形式开始获得命名，被理论思考，而且被合并到社会代表的同一性之中。这说明了葛兰西对于“民族大众”和构成“完整国家”那样的概念的重要贡献，在这些概念之中，统治阶层通过领导权实践规定了它的本质和身份。对于葛兰西来说，阶级并没有夺取国家权力，而是变成了国家。

看来这里似乎要提出我们称为领导权民主实践的全部条件，但是，整个解释依赖于根本上没有逻辑联系的概念，这些概念不可能充分克服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二元论。对于葛兰西来说，即使多样化的社会要素具有惟一的关系同一性——通过连接实践得到的——在每一个领导权形态中必定总会存在着一个单一的统一原则，而且它只能是基本的阶级。因此社会秩序的两个基本原则——单一性的统一原则以及它的必要的阶级特征——不是领导权斗争的偶然结果，而是在每一次斗争中出现的必然性结构框架，阶级领导权不是整个斗争实践的结果，而是具有最终的本体论基础。经济基础不可能确保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因为这依赖于它获得领导权的能力。然而，工人阶级领导权的失败只能伴随着资产阶级领导权的重构，所以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最终还是一个零和博弈。这是葛兰西思想之中持续存在的本质内核，为解构领导权逻辑确立了界限。然而，由于断言领导权必须永远与基本的经济阶级相适应不仅仅是肯定经济的最后决定，还重申了只要经济结构是社会重构领导权的潜力的限度，经济空间的基本逻辑本身就不是领导权的。因此，把经济视为由必然规律统一起来的均质空间的自然主义偏见再次显示了它的全部力量。

69 这一根本的不确定性可以在葛兰西的“阵地战”这个概念之中看得更清楚。我们已经指出经典马克思主义话语之中军事性修辞的功能，而且这样说不是夸大其词：从考茨基到列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概念大量地依靠对克劳塞维茨的想像。^① 这一主要的结论是可以叫做分离作用（segregation effect）的东西，因为，假如一个人把与其他社会力量的关系理解为军事关系，那么他就可以保持自己独立的身份。从考茨基的“消耗战”到布尔什维克化运动的极端军事主义以及“阶级反对阶级”，严格分界线的建立被看成是政治的条件——“政治”只被理解为阶级斗争的领域。相反，对于葛兰西来说，“阵地战”包括文明的逐渐瓦解以及围绕着另一个新的阶级核心的建构。对立面的统一，远不是从一开始就被准备好的，它在过程中不停地变化。很清楚，这与严格军事意义上的“阵地战”没有关系，敌方的力量并没有不断地转到另一方面那一边。无疑，军事性的修辞在此是在相反的方向上被修辞化的：假如在列宁主义之中存在着军事化的政治，那么在葛兰西那里就正好存在着对战争的去军事化。^② 然而，转向非军事化的政治概念正是在争论新的领导权的阶级核心仍然不停地贯穿整个过程之处达到了它的限度。在此意义之上，在对立之中存在着连贯性的要素，而且斗争双方的修辞仍然可以保持它们的生产力。

^① 见 Clausewitz en el pensamiento marxista 中的论文，墨西哥 1979 年，特别是克莱门特·安科纳的作品：La influencia de De la Guerra de Clausewitz en el pensamiento marxista de Marx a Lenin，第 7～38 页。不过这些论文更多地涉及战争和政治的关系，而不是军事概念的政治隐喻。

^② 在实际的意义上，它自身中包含了武装对抗，从毛泽东开始，“人民战争”就被当成大众“集体意志”形成的过程，在其中，军事方面从属于政治方面，“阵地战”因此超越了军事斗争与和平斗争的选择。

葛兰西的思想因此似乎在工人阶级状况的根本不确定性面前终止了,这一不确定性最终导致了矛盾的立场。一方面,作为政治中心的工人阶级具有历史偶然性的特征:它需要阶级超越其自身,通过连接到多样化的斗争和民主需要上去改变自己的同一性;另一方面,这一连接作用看来是经济基础指派给它的——因此,那一中心性具有必然性特征。人们不可避免地感到从形态学和拉布里奥拉方式的本质概念到激进历史相对论^①的转变,并不是连贯地实现的。

无论如何,假如我们比较葛兰西思想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各种经典化倾向,他的领导权概念非常明显是全新的。在战后,考茨基^②以布尔什维克的经验为相反的模型阐述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民主概念,在他的观点中,由于布尔什维克在俄罗斯那样落后的条件下进行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它就对不可避免的独裁实践负有责任。但是他所建议的选择是等到资本主义发展规律使社会对抗简单化:“群众”和“阶级”之间的错位、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任何分裂存在的条件消失。相反,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接受了作为政治斗争条件的社会复杂性——而且通过置换列宁主义的“阶级联盟——建立与多样社会主体相适应的民主

70

^① 阿尔都塞错误地把葛兰西的“绝对的历史相对主义”等同于 20 世纪的其他“左倾实践”形式,例如,卢卡奇和柯尔施的作品。在别处,我们已经争论过(见拉克劳:“陶里亚蒂与政治,”《权力与政治》,第 2 卷,伦敦 1980 年,第 221-258 页),这种等同建立在误解之上,尽管葛兰西所说的“绝对的历史主义完全是激进地拒绝任何形式的本质主义和先验目的论,而且它因此与“错误意识”的概念是完全相反的。关于葛兰西在这方面介入的特殊性,见前面的比西·格吕克斯曼。

^② 对战后考茨基所采取的立场的充分研究,特别是关于十月革命,可以在 A·贝古尼乌和 B·马宁的 *La social-démocratie ou le compromis* 中看到,巴黎 1979 年,第 73-104 页。

政治实践基础。”^①

至于伯恩斯坦，葛兰西分享了他对政治首要性的肯定，接受了不可还原到阶级属性的多样化斗争和民主需要的观点。但是与伯恩斯坦不一样的是，对于后者来说，这些单独的斗争和需要只是在划时代的水平上通过一般发展规律的介入才统一起来，而葛兰西没有给进化(Entwicklung)原则留下余地。意义来自领导权连接及其进步特征——从社会主义的观点看——的斗争，在发展中并没有得到担保。历史因此没有被当成是连续上升的民主形式，而是被当成领导权或历史集团不连续形成的系列，按照我们先前得出的差别，葛兰西也许分享了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但是肯定不是他的“渐进主义”。

关于索列尔，情况变得更为复杂了。无疑，在他的“集团”或“神话”概念中，索列尔比葛兰西更激进地打断了作为基础的历史形态学，而葛兰西的历史集团概念代表的是退步。但是同时，葛兰西的观点也明确标志着在索列尔基础上的发展，因为他的领导权理论留下了民主的多元性这个遗产，而索列尔的神话注定要去再造阶级的统一，对这一神话的继承企图保护社会内部彻底的分界线，而且从来没有通过领导权的重新聚集过程构造新的完整国家。“阵

^① 这就是为什么萨尔瓦多里对意大利共产党理论家进行的批评(“葛兰西和意大利共产党：领导权的两个概念，”见《葛兰西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第237~258页)是那样的不可信。按照这一批评，欧洲共产主义不可能合法地声称葛兰西的传统是民主策略的来源，因为葛兰西的思想不断把权力的分裂和夺权看成是具有根本重要性的。葛兰西因此构成了适合于西欧条件的列宁主义的最高要素。无疑，葛兰西的“阵地战”只是“运动战”的序幕，这也不证明葛兰西的“结构化列宁主义”这种论调，这一点被证明的惟一条件是，假设改良或革命、和平或暴力道路的选择是惟一相关的差别，但是正如我们所见，葛兰西思想的整体走向了消除这一选择的绝对特征和重要性。在更为重要的方面，葛兰西的政治主体性概念或领导权联系的概念化都与列宁的“阶级联盟”理论不一致。

地战”这个观念与索列尔的观点一直是不同的。

社会民主：从停滞到“计划主义”

转向领导权政治所要填补的政治和理论真空，也可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民主党的实践中发现。在他们那里，严格的阶级任务与运动的新政治任务之间存在的错位具有特别的形式：被战后危机推上台的社会民主党面对着受到限制的需求与来自劳动者运动中的提议之间的矛盾、政治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一新的“不平衡和多样化发展”的特别形式不得不绝望地在把赌注全部压在生产力的渐进发展上的社会力量中发挥作用，附带条件是当客观条件成熟时，这会带来权力。社会民主党狭隘的阶级思想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后果。很显然的是，社会民主党在大范围的民主要求和来自战后危机的对立中实现领导权的能力是有限的，“从世纪的转折点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革命党为掩饰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只是作为议会工具的工团主义，它的现实活动被限定在工会问题上，它的建设性活动只是工资、劳动时间、社会保险、税收问题，至多还有选举权的改革。”重要的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以及防止战争的爆发对于党的工作只是附带性的。^① 这种思想状况控制着社会民主党从战后到大萧条时期的主要活动，例如，在德国，从1918年起，社会主义的人民代表议会所通过的大多数法令几乎完全涉及的是工会的要求、税

71

^① A·斯特姆撒尔：《欧洲工人阶级的悲剧，1918 - 1939年》，伦敦1944年，第23页。这部早期作品具有高度洞察力，力图建立社会民主政治和工会社团精神之间的联系。

收系统改革，没有任何是面对关键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的。这种狭隘的阶级论思想状况也反映在全面缺乏激进民主政策的那些已经实现社会民主的政府之中。阶级论的思想——改良的或革命的都没有多少关系——关闭了通往新的大众领导权集团内构造连接各种民主要求和对立的集体意志的道路。军队和官僚机构都没有进行任何改良。至于外交政策，社会民主党的政府——最重要的是，加入内阁并且受其他政治力量控制的社会主义部长们——把他们自己束缚在追随没有阐明任何政治选择的倾向中。

72 在严格的经济领域，战后社会民主党的主要政策是国有化(被称为“社会化”)。在《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Der weg zum Sozialismus)^①中，奥托·鲍威尔提出渐进的国有化和民主管理企业。国有化计划出现在许多其他国家中，在这些国家中，例如德国、英国、瑞典建立了委员会研究社会化计划。然而这一活动没有得到什么结果。“尽管社会民主党人在几个国家中组成或者进入了政府，总的社会化努力的结果是零。除了法国1936年的军事工业以外，在两次大战之间西欧没有一个企业被社会民主党政府国有化。”^②在国有化失败后，直到大萧条时期，社会民主党没有任何替代的经济计划。

存在着许多失败的原因，但是都可以归结为两个主要的因素：第一，缺乏领导权计划：没有建立广泛的民主斗争阵线，而只是热心于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社会民主党发

^① 维也纳1919年。

^② 普热沃尔斯基：“作为历史现象的社会民主”，《新左派评论》，第122期，1980年7-8月，第48页。

现自己没有力量去改变国家官僚机构的社会和政治逻辑。在这一点上,清楚地出现了一个选择,即,是参与资产阶级的内阁以便获得最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社会措施,还是开始对立并因此加重资产阶级的虚弱。代表工会利益的压力集团,社会民主的典型,几乎总是选择第一个。

第二,社会民主党在结构变化方面软弱的原因是:它持续了第二国际的经济主义,认为经济构成了一个由必然规律控制的同质性空间,不受有意识调节的影响。斯特姆塔撒尔深刻地评论说:“奇怪的是,在赫尔曼·缪勒和其他右翼领导人那里还在起作用的激进马克思主义传统开始固执地支持放任的自由主义。社会民主党从一开始就构想与中产阶级改良运动相区分的信条‘资本主义不可能被改良’是马克思主义的信条之一。资本主义被假定遵循它自己的规律,只有社会主义革命……会扫除旧社会体系的罪恶。这一理论明显的含义是信仰革命而不是民主方法,甚至在社会主义运动接受了民主时,它也没有完全放弃原来理论的基本意识形态。资本主义政府不得不按照这一观点来管理,在资本主义经济的传统框架之内……因此赫尔曼·缪勒支持激进分子,否则他们会完全不信任他。”^①

73

正是大萧条迫使这一观点发生了变化,而且同时为社会民主政治的重新定义提供了基础。1930年的“计划论”是新的态度首次表达,在创造了新的财富国家经济形式时,凯恩斯主义的执行允许工人阶级的利益作为普遍利益来被接受,因为高工资政策有利于累积总需求,刺激了经

^① 斯特姆塔撒尔:第39~40页。

济增长。^①

达到了顶点的计划论——正如在它的解释者亨利·德·曼的著作中所阐述的^②——已经不仅是经济方案了，它试图以反经济主义的全新的观点来彻底改造社会主义的目标。在德·曼那里我们看到所有经济主义和还原论版本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要素被呈现出来：对建立在“经济利益”基础上的主观理性概念的批评——他是首先认真研究精神分析、对阶级还原论的批评、比工人阶级更广泛的大众集团的必要性、需要把社会主义作为国家的选择以便在新的基础上重新构造国家、需要索列尔意义上的神话以便粘合社会主义集体意志中多样化内容的社会主义者之一。因此，“计划”不是简单的经济工具，它是重构与腐朽资本主义社会斗争和反法西斯主义的历史集团的轴心（1938年后，德·曼本人支持赞同法西斯主义的立场，而且同样发生变化的还有法国马塞尔·德亚的社会主义，这些对法西斯主义赞同的立场不应该使我们忘记那些萧条和大战后不定的社会气氛中努力重获社会主义政治动机的计划论的含义，它的许多主题成了1945年后社会民主的共同遗产——特别是它的经济——技术专家治国论方面；而它的更激进和革新的政治见解往往被完全抛弃了）。

74 这方面对于唤起人们经常关注二战后位于社会民主政治核心的不确定性是有益的。^③ 左翼支持者的计划论设计是要建立混合经济，以便在其中可以使资本主义部分逐渐消失，因此，他们把计划论看成是通往社会主义可行的

① 普热沃尔斯基：《社会民主》，第52页。

② 特别要参照 *Au-delà du marxisme*（1927年）和 *L'Idée socialiste*（1933年）。

③ 例如，参见 A·贝古尼乌和 B·马宁，第118-120页。

道路。然而对于更多不同的技术专家治国论者来说,这一观点只是开创了以国家干预——特别是通过控制银行——来纠正资本主义国家固有的不平衡。这些难以选择的观点清楚地表明,左或者右的抉择与经济政策有关,而激进民主的设计和构造新的集体意志都是不够的,它们都处在边缘位置上。1945年前,正是社会民主运动中根深蒂固的阶级论禁止任何领导权的连接,1945年后,随着财富国家的形成,阶级论极大地减弱了,这当然不是民主化过程加深的结果,而是由于凯恩斯主义国家膨胀过程中各个不同阶层的利益不再按照严格的阶级界线划分了。在此意义上,社会民主变成了在现有国家形式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建设选择,而不是激进地选择国家的形式(很明显,在此我们不仅指“革命”的选择,包括暴力推翻现存国家,而且还指在国家和公民社会内深化和连接多种允许用“阵地战”反对统治权形式的对抗)。由于缺乏领导权的选择,社会民主把自己还原为下面两个方面的综合:一方面有工会被给予特权的实用关系;另一方面,或多或少的左翼技术专家治国政策,总是使每一件事情依赖于国家层面的解决手段。这成了那些荒谬观念的根源,计划的“左”的程度甚至可以用有多少公司打算国有化来判断。

本质主义的最后堡垒:经济

先前的分析可以从两个不同的方面来理解,严格地说,是得到补充。第一,我们已经描述的图景是正统的典型发生断裂带来的分裂和破碎过程。但是典型过去所占领的空间中并非什么也没有剩下。第二,同样的过程也可

75 以被理解为领导权逻辑的新连接和重构方面的出现和扩张。然而,我们看到这个扩张遇到了限制。无论是被当成阶级联盟政治领导者的工人阶级(列宁),还是历史集团连接的核心(葛兰西),它的根本特性是在不同于领导权实践在其中运作的领域之中形成的。因此存在一个任何策略性领导权概念没有办法跨越的界限。假如经济主义的典型在某些情况中继续得到维持——尽管最后决定就像历史合理的基础一样——领导权连接就必然只能被理解为是偶然的。这一最后的合理基础,给历史提供了有倾向性的意义,它在社会地形学——经济层面——上有特殊的位置。

但是经济层面要扮演构造领导权实践的主体必须满足三个明确的条件,第一,其运动规律必须是严格内生的,而且排除所有来自政治或其他外在于干预的不确定性——否则,构造功能不会专门归于经济。第二,在经济层面上构造的社会代表的统一和均质性,必须来自这一层面的运动规律(任何需要在经济之外重构的分裂和分散立场都被排除了)。第三,这些生产关系代表的立场必须具有历史利益,因为那些其他社会层面代表的存在——通过代表和连接的机制——必须最后在经济利益的基础上得到解释,后者因此不能被束缚在确定的社会领域,而要依靠社会的全局性方面。

甚至那些艰苦努力地去克服经济主义和还原论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也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维护我们刚才所描述的本质主义的经济空间结构概念。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内部经济主义和反经济主义之间的争论必然被还原到在确定的社会过程中属于上层建筑的第二个重要问题。然而

最为“上层建筑的”概念仍然保留着自然主义的经济观——甚至当试图限制这种观点的作用时。在本章剩下的部分里,我们将探查正统本质主义的最后堡垒。关于某些当代的争论,我们将力图证明:经济空间本身被结构化为政治空间,而且在其中,就像在任何其他社会层面上一样,我们描述为具有领导权特征的那些实践完全是有效的。在我们开始完成这一任务前,有必要区别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在对经济主义的批评中它们经常被混淆。第一个涉及到经济空间的本质和构成,第二个与第一没有任何关系,涉及经济空间在社会过程的规定中外在于它本身的相对重要性。第一个是决定性的问题,而且也是激进地结束本质主义典型的基础。第二个,我们在本书中要说明的理由,不可能在一般社会理论层面上被确定下来(断言在特定危机中出现于所有社会侧面上的东西绝对地由经济层面决定,严格地说并不与我们对第一个问题的反经济论的回答根本矛盾)。

由经济层面最终构成领导权主体的三个条件相应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基本论题:经济运动规律的内生特征相应于生产力中心地位这一论题;社会代表在经济层面上的统一相应于工人阶级贫困的普遍化论题;生产关系应该成为超越经济领域的历史利益所在地的条件,相应于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根本利益的论题。我们将要证明这三个方面是错误的。

对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在历史向社会主义进化中扮演关键的角色,它表明“过去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

主义成为可能,而且它们未来的发展使社会主义成为必然。”^①它们是产生大量受剥削农民的基础,这些农民的历史任务是占有和集体管理高度发达的社会化生产力。现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对于这些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可克服的障碍,因此,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经济矛盾的社会政治表现,它使生产力发展的普遍规律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发展规律结合起来。按照这一观点,假如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和合理的基础,应该归于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经济可以被理解为独立于人类活动发挥作用的客观现象。

为了生产力发展的普遍规律可以充分发挥作用,所有生产过程中的要素服从它的决定是必要的。为了保证这一点,马克思主义不得不述诸于虚构:把劳动力想像为商品。桑·鲍尔斯和赫伯特·金蒂斯已经说明了这一虚构是怎样使得马克思主义看不到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要素的劳动力的完整特征。劳动力不同于生产的其他必需要素,资本家必须比简单地购买付出的更多,他还必须使劳动力进行生产劳动,但是这一本质性的方面逃出了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劳动的劳动力概念。因为假如劳动力与其他商品一样只是商品的话,他的使用价值显然就会从购买他的那一时刻起自动发挥作用。“把劳动定义为对于资本的使用价值掩盖了对人的社会实践能力所进行的生产投入与为了资本所有权足以保证消费劳动力提供的生产服务

^① G·A·柯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牛津1979年,第206页。

所进行的持续投入之间的绝对差别。”^① 大部分资本主义劳动组织可以被理解为从资本家购买的劳动力中榨取劳动的必然结果。假如资本家需要在生产过程的核心之处进行控制没有被认识到,那么生产力的发展就变得不可理解了。当然这会导致怀疑作为自然的、自发进步现象的整个生产力发展的观念,我们因此可以看到经济主义观点中的两个方面——劳动力是商品和作为自然过程的生产力发展是相互增强的。无疑,对于劳动过程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长期被轻视了。

正是布雷弗曼的《劳动和垄断资本》一书的出版^② 最终引发了讨论。他辩护了这样的观点: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的指导原则产生了更加退化和非技术化劳动的概念与实行之间的分离。泰勒制是与资本家控制工人和劳动过程进行斗争的决定性因素。布雷弗曼假定,正是位于对资本的需求背后的资本积累规律从直接生产者那里夺取了对劳动过程的控制。然而他没有成功地提供真实的解释:为什么这是通过不停地毁灭劳动者的技能以及把他们还原到仅仅是执行者来实现的。毕竟,他把这种统治的逻辑当成无所不在的力量,影响发展过程——没有任何障碍地发挥作用——好像资本的经济力量不许工人阶级去抵抗。在此,完全从属于资本逻辑的旧商品劳动力概念还在继续发挥它的作用。

78

与布雷弗曼的论点相反,对于使用价值在于劳动的商

^① S·鲍尔斯和H·真蒂莱:“劳动价值论中的结构和历史”,见《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第12卷,第4期,第8页。这个观念已经在卡斯托里亚迪1961年的文章 *Le mouvement révolutionnaire sous le capitalisme moderne*, (见 *Capitalisme moderne et révolution*, 巴黎1979年,第1卷)中受到批评。

^② H·B·布雷弗曼:《劳动和垄断资本》、《20世纪劳动的衰变》,纽约1974年。

品劳动力概念的批评使我们可以认识资本对控制劳动过程的需要。事实上，一旦劳动力被购买，必然会从中得到最大化的劳动。因此劳动过程不可能脱离一系列的控制关系而存在，同样，在垄断资本主义出现以前，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必然成为生产的技术和控制的技术。已经有大量的著作一直在强调这一方面，例如，斯蒂芬·玛格琳和凯瑟琳·斯通，^①他们认为劳动的分化和专门化与追求效率没有任何关系，而是资本对劳动过程控制的结果。因为工人能够从事社会实践，他们可以抵制任何强加的控制机制并且迫使资本家运用不同的技术。因此，并不纯粹是资本的逻辑控制着劳动过程的发展，后者不只是资本发挥控制作用的场所，它还是斗争的基础。

79 近来西欧和北美所进行的大量研究从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工人抵制的角度分析了劳动过程的发展。这些研究显示了“生产的政治学”的存在，对单独发挥作用的竞争和积累危机规律这一观念提出了挑战。理查德·爱德华在《角逐的领域》^②一书中区分了三种主要的控制形式：简单的治安控制；与工人从属于生产装配线上机器的节奏相一致的技术控制；最后，通过等级制官僚政治权力进行的控制，这种控制不再依赖劳动过程的实际结构，与前面的情形一样，它建立在社会结构上。他主张，工人的抵制说明了资本尝试新控制形式的必要。同样，让·保罗·戈德马尔区分出了在法兰西存在的四个技术统治阶段：“全面控制的阶段；存在于工厂内外的广泛惩戒阶段；以劳动过程机械

^① S·玛格琳：“老板们在做什么？”见《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第6卷，第2期，1974年。K·斯通：“钢铁工业劳动结构的起源”，见《评论》，1974年，第6卷，第2期。

^② R·爱德华：《角逐的领域：20世纪工厂的变革》，纽约1979年。

化形成惩戒内在化的双重化过程为基础的阶段,我把它称为机械主义的惩戒阶段;最后,契约惩戒阶段,其中内在化戒律以刻板不变的部分授权形式发挥作用。”^①就意大利来说,它在二十世纪60年代盛行的劳工保护(*operaista*)证明了资本主义发展为何远不是盲目地把它自身的逻辑强加于工人阶级,而是顺从了后者的斗争,例如马里奥·特龙蒂^②指出:工人阶级的斗争已经迫使资本改变其内在构成及其控制形式——因为通过强制限定工作日,他们迫使资本从剥削绝对价值走向榨取相对剩余价值。这一点使潘谢里提出了这样的论题:生产是一种“政治机制”,而且必须要分析“建立了阶级力量关系的技术和劳动组织。”^③这些作品的共同观念是资本主义控制的特别历史形式应该作为总的社会关系来加以研究,而且劳动过程组织形式的变化不能仅仅被当成是采取了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不同形式。进而历史比较分析显示了各个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别,例如,英国强大的工会比其他地方进行了更强大的反抗,促进了变化。按照这种形式理解的工人斗争,显然不能按照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来加以解释,因为他们的推动力量不能被归结为劳动力的“商品”形式。但是,假如资本的逻辑与工人反抗的逻辑之间的分裂影响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组织,它必定也严重地影响了生产力扩张的特征和节奏。因此,生产力是中性的以及它们的发展可以被理解为自然的和单线的这一主题,是完全没有基

① J·P·德·戈德马尔: *L'ordre et la production. Naissance et formes de la discipline d'usine*, 巴黎1924年,第24页。

② M·特龙蒂: *Ouvriers et capital*, 巴黎1977年。

③ 潘谢里,引自B·科里亚: *L'operaismo italiano*, 《辩证法》,第30期,第96页。

础的。这也瓦解了经济只能被理解为自动的和自我调节的领域这一观点的基础。在社会代表的构成中,给予经济领域以独有特权这一首要条件因此并没有被满足。

80 这一结论已经使我们想到那第二个条件也不能实现,因为经济不可能通过它本身并不具有的单一规律来构成统一的主体。不过,研究多样化的、离中心的(decentring)“工人阶级”主体的不同立场是重要的,首先,正是马克思的工人阶级这一概念包含着两个与他们本身运动规律不同的关系:通过出卖劳动力建立起来的工资关系——它使工人变成了无产阶级;以及产生与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的位置的关系——使他成为体力劳动者。布拉沃伊提出的^①这一分裂的关系强化了生产关系与生产中的关系之间富有意义的差别。如果对于马克思来说这些差别是不明显的,那只是因为这两个关系在他的直接历史经验中趋于一致。但是,由于把劳动力看成简单的商品,他也倾向于从劳动过程中已经建立的关系那里取消自主性和相关性。这两个关系确实已经以不同的方式得到发展,使得把它们统一起来的“工人阶级”这一共有的标签成了问题,尽管发达资本主义之中的工资形式已经普遍化了,工业无产阶级在数量和重要性上却已经下降了。这一不对称是支配着近期关于对工人阶级的限制这个问题讨论的不确定性的基础。

一旦作为构成工人阶级统一特殊机制的贫困化理论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两个发现这个统一的经济基础的新尝试就提出来了:一个集中在“非技术化”(布雷弗曼)现象

^① M·布拉沃伊:“竞争的领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工厂和国家”,见《社会主义评论》,第58期。

上,而另一个试图找到构成“真正”工人阶级范围的更有限的工人核心(波朗查斯)。布雷弗曼从他对泰勒制的分析开始,认为来自概念和实行之间分化的劳动退化在无产阶级的工人阶级内产生了更广泛的工人分层——他们被商品生产部门雇佣或者相反。^① 按照他的观点,马克思所预见的两极分化因此正处于实现的过程之中,而且正在退化的劳动条件将推动工人阶级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反对体系的斗争。然而,对北美工人阶级的研究很少涉及布雷弗曼的这一主题,普遍的倾向是坚持主张工人阶级的分化和分裂。例如,爱德华、戈登和 M·赖希^② 的著作证明了劳动过程的控制形式怎样把种族和性别结合起来开创了一个分割的劳动市场,其中工人阶级明确地分成了几个部分。^③ 西欧的类似著作^④ 也使渐进论对社会结构的简单化变成了无效的,而且确认了现在的一般趋势是经济的两个成分之间的两极化:高工资并且受保护的首要部分;生存没有安全的无技术和半技术工人。如果我们加上第三部分,那就是数量正在增长的结构性的失业的工人,同质化的论点确实不可能再维持了,进而,无技术并没有显示布雷弗曼归于它的一般特征:尽管在一些部门它正在增长,

81

① 安德鲁·布雷弗曼那里常见。

② D·戈登, R·爱德华和 M·赖希:《工作分化,分化的工人》,剑桥 1982 年。

③ 与三个不同部分的工人阶级相应,他们区分了三种劳动市场的存在。第一种包括专业类型的大多数职业,它是享受具有提升可能性和相对较高收入的稳定职业的中间阶层领域。这些特征也可以在第一附属市场中发现,他们与下面这部分的工人是不同的——与传统的工人阶级在一起的第三领域的半技术工人——只具有企业所需要的特殊技能,而且他们的工作是重复的、紧紧与机器的节奏相联系的。第三,我们遇到的是“第二种市场”中没有技术的工人,没有提升的可能,没有雇佣保障,只有低工资。这些工人是没有联合的,更替很快并且黑人和妇女占有很高的比例。

④ 参见:例如, M·帕西: *Mercato del Lavoro e classi sociali in Italia: Ricerche sulla composizione del proletariato*, 博洛尼亚 1973。关于工业社会的更一般观点,见 S·伯杰和 M·皮奥里:《工业社会中的二元论和不连续性》,剑桥 1980 年。

还平行存在着一个新技术增长的过程。

此外，二元化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必定涉及到资产阶级防止工人反抗的策略，而且它不能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简单结果。因此，安德鲁·弗里德曼说明了在英国的情形之中，资产阶级怎样按照不同群体的工人抵制权威的能力使用了不同的策略。^① 在特定国家和相同的公司内，可以形成中心化工人和边缘化工人的差别，他们属于不同的劳动市场，工资和工作条件反映了他们不同的反抗能力。弗里德曼认为这一分裂不是阴谋地区分工人阶级的结果，而是统一本身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力量关系的结果。工人阶级内的这一分化因此比许多愿意承认的有更深的根基，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工人阶级自己实践的结果，它们是政治的，而不仅仅是经济的分化。

今天不可能谈论工人阶级的同质性，更不必说(a fortiori)把它追溯到资本积累规律中所描述的机制上去了。为了坚持主张工人阶级围绕着来自生产关系中的阶级普遍利益的同一，我们先前提到的第二种倾向因此一直试图通过更严格限定的方法找到真正的工人阶级。分裂的现实被完全接受了，而且整体的同一被归于片段之一。在此方面，研究一下埃里克·奥林·怀特与尼克拉斯·波朗查斯之间的对立是有益的。^② 按照波朗查斯的观点，生产劳动是识别工人阶级的标准，^③ 而挣非生产性工资的工人构成

^① A·L·弗里德曼：《工业和劳动，劳动和垄断资本的阶级斗争》，伦敦1977年。

^② 波朗查斯：《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NLB，伦敦1975年；奥林·怀特：《阶级、危机和国家》，伦敦1978年。

^③ “生产劳动”的概念在波朗查斯那里比在马克思那里受到更严格地限制，他定义之为：“在直接生产物质资料时，作为剥削关系基础的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由于生产增加物质财富的使用价值，它直接地包含在物质生产之中。”第216页。

了“新的小资产阶级。”在波朗查斯的范畴中包含的部门的异质性并没有向他提出特别问题,因为在他的观点之中,阶级不可能只在经济层面上定义。而由于老的和新的的小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来说有相同的意识形态立场,他认为把他们放在一个阶级范畴内是相当公正的。这一研究已经受到埃里克·奥林·怀特的批评,他不仅反对波朗查斯对生产劳动定义,而且还反对用那样的标准定义工人阶级。他的论点是,生产和非生产劳动并没有以任何方式指出非生产劳动的工人具有不同的阶级利益并且与社会主义无关。他声明:“对于在以经济标准为基础把劳动的社会区分看成是不同阶级之内的两个立场,意味着他们在经济层面上有根本不同的阶级利益。”^① 他提供的回答是要在“不确定”与“确定”的阶级立场上进行区分。后者表现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特点。^② 与这三个确定的立场一起,怀特区分了他所谓的“矛盾的阶级立场”、在两个确定立场之间的立场。在经济标准矛盾的地方,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在定义阶级利益中将扮演决定性的角色。

这一对“真正”工人阶级的狄奥根尼式研究的原因在于,政治的对象是要确定工人阶级——他们的经济利益把他们直接联系到社会主义的前景上,而且他们因此注定是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领导阶级——这一范畴。然而这些以严格定义工人阶级为起点的研究存在的问题是,他们还

^① 怀特,第48页。

^② 属于无产阶级的标准是:(1)缺乏对物质生产方法的控制;(2)不能控制投资和积累;(3)不能控制别人的劳动力。相反,资产阶级被定义为它行使上述三方面的控制。而小资产阶级控制投资、积累过程和物质生产方法——它并不控制别人的劳动力。

在以“客观利益”——这一概念缺乏任何理论基础，而且按照这些分析家的观点，还包含着某类社会代表独有的利益这一属性——的概念为基础。在正统派的观点中，阶级统一是围绕利益构造的，但是它不是社会结构中的参照点，而是来自与生产力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生产力发展和无产阶级的统一过程。布雷弗曼所说的通过去技术化(deskilling)形成的无差别处于同样的解释水平上。客观利益是历史的利益，因为它们以服从科学知识的合理的必然历史运动为基础，这是不可能放弃末世论的历史概念的，坚持“客观利益”这一概念只是在末世论之中才会有意义。看来波朗查斯和怀特都主张工人阶级的分裂是不同社会代表的立场分裂，他们都没有注意到正统马克思主义清醒意识到的真正现实：即立场的分裂存在于社会代表本身之中，而且这些社会代表因此缺乏最终的合理同一性。政治与经济斗争之间的张力——以及对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化的理论分析或者伯恩斯坦所主张的通过民主化的过程工人阶级停止无产阶级化而且变成公民，等等——意味着工人阶级被许多无力被整合的、常常矛盾的主体立场所控制。这里的选择是清楚的，或者是按照彻底排除矛盾复杂性以及工人阶级绝对统一——将在千年拯救时刻彻底实现来掌握历史理论——在此情形之中工人阶级的“客观利益”从一开始就被决定了；否则，必须废除：理论或凭借理论，在确定“客观”利益整体代表中给某种特权化主体立场提供基础——在这一情形中整体代表这一概念变得毫无意义了。在我们的观点之中，为了在社会对抗之中发展，有必要去分析多元的变化和经常矛盾的立场，放弃完全统一和同质性的代表这一观念，例如正统话语中的“工人阶级”。对于“真

正”工人阶级及其界限的探求是一个错误,而且缺乏任何理论和政治的中肯。

明显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是不一致的,而是与此完全不同的论点:社会主义的根本利益不可能从经济过程中的决定性地位逻辑地推导出来。相反的观点——那样的联系是在反对资产阶级占有经济剩余中工人阶级利益所提供的——只有在下面的进一步假设中才是有效的:(1)工人是与资本家一样要使经济剩余最大化的财产管理人(homo oeconomicus);(2)或者,工人是自发合作的,他渴望自己的劳动产品被社会分配。然而,尽管那样,这些似是而非的假设没有一个能提供必需的证据来证明:在生产关系之中的位置与生产者思想状况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工人阶级对某种统治形式的反抗将建立在他们在社会关系总体内占有的立场之上,而不仅仅是生产关系。在这一点上,很明显的是,关于领导权代表的最后两个条件是惟独由经济领域构成的——在这一领域之中,它们应该被完全构成为主体,而且应该被赋予源于他们阶级立场的“历史利益”——也没有实现。

84

面对结论

现在我们得出结论。经济领域不是一个内生的自我调节的空间,那里也不存在着可以被固定在根本阶级核心上的社会代表的构造原则,更不存在由历史利益定位的阶级立场。从这一点看来,意义很快随之产生了。从考茨基以来,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的决定作用没有自发地产生,而是依赖于知识分子这一中介。然而那

95

样的中介过去没有被理解为连接(articulation)——也就是说,从不同的因素来进行政治构造。它有一个认识论基础: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在工人阶级中理解其客观命运。在葛兰西那里,政治最终被理解为连接,而且通过他的历史集团的概念,丰富的和彻底的多样性被引进到社会理论之中。然而即使对于葛兰西,领导权主体同一性的根本核心是在它进行连接的领域之外构成的:领导权的逻辑并没有显露它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所有解构作用。然而,我们已经看到,阶级还原论最后防线的崩溃,正是在阶级主体的统一和同质性被分裂成一系列谨慎结合的立场范围内,一旦生产力的核心特征这一论题被放弃,这些谨慎的立场与任何未来必然统一的观点就不可能再相关了。领导权的逻辑,作为连接的偶然性逻辑,已经开始决定领导权主体真正的同一性。由此形成了大量结论,是我们随后分析的出发点。

85 1.不固定性已经成为每一个社会同一性的条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最初的领导权理论之中,每个社会因素的固定性都源于领导权任务和被假定为其自然代表的阶级之间所存在的不可分离的联系,而使领导权任务和阶级之间的结合只是事实性和偶然性的。但是,在任务不再与阶级有必然联系的范围内,它的同一性就通过在领导权形态内的连接单独地被给予它,它的同一性就变成了纯粹关系性。而且当这一关系体系本身不固定和不稳定时——从而使领导权实践成为可能——每个社会同一性的含义立刻就出现了延期,“最后”缝合的时刻永远不会到来。然而,与此相伴随的是,不仅必然性范畴崩溃了,而且它也不再可能根据纯粹偶然性说明领导权关系,因为使得

必然性/偶然性对立可以被理解的空间消失了。领导权联系可以通过单一事实经验被理论掌握的观念被证明一直是个幻想,相替代的联系必须根据新理论范畴来界定,新范畴的缝合作用,在去领会理解那些永远不能与自己本身同一的关系类型范围内,是个疑难问题。

2. 我们简单涉猎一下社会不确定性发挥作用的维度。第一个维度属于政治主观性领域,我们已经看到,在罗莎·卢森堡那里,连接不同的对抗和分裂的政治观点的象征性维度是一个新的社会力量矩阵——被葛兰西叫做“集体意志”。社会形态的象征性逻辑在形态学层面上遇到了经济主义历史概念持续的明确限制。然而,一旦这一限制被瓦解,溢出的由各种社会主张形成的阶级连接就能够自由的运作(就斗争和需要的先验阶级特征来说的自由,很明显不是指在特定事态中每一个连接都是可能的)。如果这是事实的话,总是可以从我们的分析之中得出三个重要的结果。第一个与社会主义和具体的社会代表之间的联系有关。我们已经证明,社会主义目标和生产关系中社会代表的立场之间没有逻辑的必然关系,而且它们之间的连接是外在的、并非来自把它们统一起来的每一个自然(natural)运动。换句话说,它们的连接必须被看成是领导权关系,由此而来的是,从社会主义的观点看,工人阶级斗争的方向并非始终如一地是进步的;正如任何其他社会斗争一样,它依赖于已有领导权环境中它的连接形式。出于同样的理由,在与工人的需要平等的关系上,其他各种分裂的观点和民主对抗可以被连接到社会主义的“集体意志”。反资本主义斗争的“特权化主体”的时代——在本体论而非实践的意义上——已经明确被淘汰了。第二个结论与

近十年一直被大量讨论的“新社会运动”本质有关。这里有两个主要思想倾向与我们的立场是矛盾的，第一个在令人怀疑的社会变革特权主体这一问题范围内研究这些运动的本质和作用，在其中，他们被当成是工人阶级（正统观点中是根本的主体）的边缘或外围，或者，被当成是对被整合到体系之中（马尔库塞）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性替代。然而，迄今为止我们所说的每件事情都表明，对于发动社会政治实践来说不存在特权，它依赖于艰难地从大量不同观点中构造的“集体意志”。因此我们也不能同意讨论新社会运动中的其他主要倾向，它们存在于对进步本质的先验断定之中。生态斗争、性少数的运动所具有的政治意义并非从一开始就给出的，它完全依赖与其他斗争和要求的领导权连接。第三个结论涉及到对不同主体立场之间关系的理解形式，在这些理解形式中我们的分析倾向于去总体化（de-totalize）。然而，如果去中心（decentred）活动在这一点上被断定，我们就只能设法去确认固定性的新形式：各种去中心的主体立场。假如它们本身是不固定的，很清楚，去总体化的逻辑就不能只断定不同斗争和需要之间的分离，而且那一连接不能被理解为不同的和完全被构造的因素的联结。正是在此，多元决定概念的激进化将给我们提供对特殊社会逻辑的解答。

3. 我们进行分析的逻辑看来似乎意味着正是“领导权”概念会被置于疑问之中。话语领域的出现以及这一范畴的有效性被根本地限制在理论领域的分裂之中。在本质层而上构成的阶级面对着迫使它承担不同于其本质的任务的历史偶然性。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一方面，那个分裂可能拯救面临崩溃的这两个平面之间的差别；另一方

面,只要在民主的方向上存在着发展,被领导权化的任务就改变了领导权主体的同一性。这意味着领导权只是过渡概念和本质主义话语瓦解中的一个因素吗?在下面两章中,我们将要说明这并不是一个充分的回答,而且内在于领导权概念之中的张力也内在于每一个政治实践之中,严格地说,存在于每一个社会实践之中。

3

超越社会的实证性：对抗和领导权

我们现在必须在理论上构造领导权概念。迄今为止，我们的分析已经提供了比作为切入点的明确话语领域更多以及更少的东西。更多的东西，由于领导权空间并非在局部上“未经充分思考”的；它还突然超出把不同要素还原到封闭典型内部的那种认识基础上的整个社会概念。更少的东西，因为领导权关系得以出现的不同方面没有融洽地汇集起来，去构成需要新概念来填充的理论真空，相反，它们中的一些看来成了这个概念分解的表面：因为，每一个社会同一性的关系特征都意味着在其中可以发现领导权连接的水平差别、连接与被连接之间不均衡的结束。构造领导权概念因此不是简单地在一致的环境下所做的努力思考，而是需要在相互矛盾的话语层面上进行协商的更复杂的策略运动。

从迄今为止所说的每件事情得出的是，领导权概念意味着由连接范畴所控制的领域，以及由此那些被连接的要素可以被个别地确定（稍后，我们将研究怎样可能独立指定被连接的总体的要素）。无论如何，只要连接是实践，而且不是特定关系复合体的名称，就必然意味着一些实践进

行连接和重组的要素分离存在的形式。在我们要分析的理论化类型中,连接实践的对象本来是被当成丧失结构和组织总体的碎片来详细说明的。在18世纪,德国浪漫主义的一代以所获得的分裂和分化的经验作为他们理论反思的出发点,由于17世纪作为人在其中占据确定位置的有意义秩序这一宇宙观的崩溃——以及这种观点被自我决定的主体概念所代替,主体成了维持与宇宙其余部分(韦伯所说的去除了魔力的世界)外在关系的实体——导致了浪漫主义狂飙运动的一代急切地去寻找失去的统一性和可以克服分化的新的综合。作为完整总体表达的人的概念试图要终结17世纪以来理性主义的所有二元论——肉体/精神、理性/情感、思想/感觉。^①众所周知,浪漫主义把这个分裂的经验理解为与下面的情况有紧密关系:社会根本上被区分和分化为阶级,建立起与其他社会生活领域外在性关系的官僚国家的复杂性日渐增长。

由于要被重新连接起来的要素被指定为失败的统一体的碎片,很清楚,重组会有一个人为的特征,与希腊文化特有的自然有机统一体不同。荷尔德林说到:“有两个我们存在的理想:一个是伟大的质朴状态,在其中,只是通过自然组织,而不是我们自己所做出的行动,我们的需要与其他人、与我们的力量以及每一件与我们相关的事情相协调;另一个是最高教养的状态,在其中,这种协调将通过我们自己能够给自身提供的组织在无限的多样化与增长的需要、力量之间产生。”^②现在所有的事情都依赖于我们怎样理解“我们自己能够给自身提供的组织”,以及给出新统

① C·泰勒:《黑格尔》,剑桥1975年,第23页以及第1章。

② 荷尔德林:《亥伯龙神片段》,引自C·泰勒;第35页。

形式要素的组织,这些组织都是偶然的,而且外在于它们本身的组成片段,否则的话,组成片段与组织都是超越它们的总体的必然要素。很清楚,只有第一种形式的“组织”可以被理解为连接,第二种形式严格说来只是一个中介。但是在哲学话语中这一个与另一个之间的差别一直更多地被当成不确定的模糊领域,而不是更多地被当成是明确的分界线。

94 从我们现在的观点看,这是黑格尔的思想在对辩证统一和分裂的研究中提出的不确定性。他的著作同时是德国浪漫主义的最高成就和对社会的第一个现代反思——就是说是后启蒙的。它不是从乌托邦出发的社会批评,也不是把秩序当成是必然和给定的机械论描述和理论化,相反,黑格尔的反思开始于不透明的社会对立难以捉摸的合理性形式,而且只有参照使分裂返回统一的狡黠的理性才能看透的可理解性。黑格尔因而处在两个时代的分界线上,在第一方面的意义上,当他试图在理性的范围内排除二元论去接受万物差异的总体时,他代表了理性主义的最高点。因此,历史与社会具有合理的可理解性的结构。但是,在第二方面的意义上,当历史合理性的确证只能以把矛盾引入到理性领域之中为代价时,综合性包含了所有分裂的种子。因此足以说明:为了让黑格尔的话语变成完全不同的一系列非逻辑的偶然变化,而要求不断违背它自己需要的方法是不可行的——就像在17世纪被特伦德伯格所证明的。^① 这里正是黑格尔的现代性所在:对于他来说,同一性绝不是肯定的和封闭

^① A·特伦德伯格:《逻辑研究》,希尔德斯海姆1964年(第1版,1840年)。

在自身之中的，而是作为转变、关系和差异被构造的。然而，假如黑格尔的逻辑关系变成偶然的变化，它们之间的联系不可能被确定为优先的或被缝合的总体性，而意味着它们是连接。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之中，不确定性领域在“辩证法”概念的矛盾运用之中被显示出来：一方面，在试图逃避逻辑决定时，就会无批判性地求助于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在把先验变革的必然特征看得比开放关系的不连续因素更重要的地方，“辩证法”发挥了封闭作用。要是正像特伦德伯格已经指出的一样，那些不明确和不严格性出现在黑格尔本人那里，我们就不应该对马克思主义过于苛求明确性和严密性。

那么，这个由话语“辩证法”的使用所构成的不明确领域是首先必须要废除的。为了使我们自己坚定地置身于连接领域，我们必须拒绝建立部分过程的总体“社会概念”，因此我们必须把社会开放性看成是构造的基础或存在的“否定性本质”，把各种不同的“社会秩序”看成是不稳定的或根本上不可驯化的差异领域。从而，社会的多样性不可能通过中介体系被理解，“社会秩序”也不能被理解为根本原则。社会没有被缝合的特别空间，因为社会本身没有本质。这里有三点是重要的：首先，有两个概念意味着社会不同的逻辑：在“中介”的情形之中，我们处理的是逻辑变化的体系，在其中对象之间的关系被理解为遵从概念间的关系；在另一种情形之中，我们面对的是我们必须确定其本质的偶然关系。第二，在批判被必然规律统一起来的全体这个社会概念中，我们不能只讲要素之间关系的非必然性特征，因为，我们仍然保留着要素本身同一性的必然性特征。拒绝对社会关系进行的任何本质主义研究这

一概念,还必须说明每个同一性的不稳定特征以及在最后的意义上完全精确地确定“要素”含义的不可能性。第三,只是在与假定其统一性的话语相对立的意义上,要素的全体才被分裂和瓦解。在任何话语结构之外,显然不可能谈论分裂,甚至也不可能详细说明要素。但是,话语结构不是“认识的”或者“思想的”实体,它是构成和组织社会关系的连接实践,因此我们才可以谈论发达工业社会日渐增长的复杂性和分裂——不是在永恒的含义上它们比以往的社会更复杂,而是在它们按照根本的不对称被构造这一意义上。这是一个存在于日渐增长的差异之中的不对称——“社会”意义的过剩——也是任何企图去把那些差别固定为稳定的连接结构要素的话语遭遇到的困难。

因此我们必须开始分析连接这一范畴,它将为我们提供建立领导权概念的出发点。范畴的理论构造需要我们采取两个步骤:建立详细说明进入连接关系的要素的可能性;确定构成连接的相关要素的特性。尽管这一任务可以从大量的不同点被提出,我们还是更愿意做一下迂回。首先我们将详细分析那些理论话语,在其中存在着我们所要详细阐述的概念,但是在其中它们的发展仍然被本质主义话语的基本范畴所禁止。在此意义上,我们以激化阿尔都塞学派的某些主题这个方式来研究他的基本概念,考查这一学派的演变。我们将尝试构筑允许我们提出让人满意的“连接”概念的基础。

社会形态和多元决定

阿尔都塞以彻底把他的作为“复杂构成的整体”这个

社会概念与黑格尔的总体概念相区分开始他的理论轨迹。黑格尔的总体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它的复杂性总是围绕着自己展开的单一过程的要素的多样性。“黑格尔的总体是理念的异化发展,因此,严格地说,它是一个现象,持续存在于它的所有显现中的,而且甚至是存在于准备返回自身的异化之中的单一原则的自我显示。”^① 通过把差异与必要的中介视为同一起来使真实还原为概念,这一概念具有的规则与阿尔都塞的内在于多元决定过程的复杂性完全不同。由于后来对阿尔都塞这一概念不加选择和不准确的应用,有必要详细说明其本来的意义以及它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应该发挥的理论作用。这一概念来自精神分析,而且具有比表面的修辞特征范围更多的内容,在这方面,阿尔都塞是非常明确的:“我没有发明这个概念,正如我所指出的,它是从已有的两个学科即语言学和精神分析学中借用的。在这些学科之中,它有着客观的辩证‘内涵’,而且——特别是在精神分析中——完全涉及到了它在这里指明的并非任意借用的内容。”^② 对于弗洛伊德,多元决定并非至多通过类比自然世界进行比喻的普通“融合”或“合并”过程,它是包含象征维度和多元意义的非常明确的融合形式。多元决定这一概念在象征领域构成,而且在此之外没有任何意义。因此,阿尔都塞说每件事物存在于社会多元决定基础上所具有的非常丰富的潜在意义是社会把自己构成为象征性的秩序这一主张。象征——也就是多元决定——社会关系的特征,因此意味着它们缺乏使自己还原到固有规律必然要素上的根本精确性。并不存在两个

97

^① L·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伦敦1969年,第203页。

^② 同上,第206页(脚注)。

水平：本质和不同的表面现象，因为不存在确定使象征会成为次要派生意义的根本精确意义的可能性。社会和社会代表没有任何本质，而且他们只是由伴随着确立某种秩序的相对不稳定的固定形式组成。这一分析看来打开了从多元决定的社会关系开始详细阐述新的连接概念的可能性。但是这并没有出现，多元决定这个概念趋于从阿尔都塞的话语中消失，而且日渐增长的封闭带来了新的不同的本质主义。这一过程从“论唯物辩证法”已经开始，到《阅读资本论》达到了顶点。

假如多元决定这一概念不能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之中产生它对总体的解构作用，这是因为，从一开始就存在着要适应阿尔都塞话语之中另一个中心因素的企图。严格地说，即适应经济的最后决定作用。我们来考虑一下这个概念的含义，假如这个最后的决定是一个对每一个社会都有效的真理，这个决定与使其有效的条件之间的关系不可能通过偶然的历史连接得到发展，而会构造一个先验的必然性。重要的是要记住讨论的问题不是经济应该有它存在的条件，这是同义反复，因为，假定某个事物存在，那是因为已有的条件给出了它的可能性。问题在于，如果经济对每种类型的社会是最后决定性的，它必须是独立于任何特殊类型的社会被定义的，而且经济存在的条件也必须脱离任何具体的社会关系来定义。然而在那样的情况下，那些惟一现实的存在条件将成为经济存在和决定性角色的保证，换句话说，它们同样将成为经济的内在要素，不会有

什么差别。^①

然而还有更多事情,阿尔都塞从断言不需要使抽象具体化开始,提出没有不被多元决定的现实。在此意义上,他赞同地引用了毛泽东对矛盾的分析 and 马克思在 1857 年导言中对抽象“生产”的拒绝(这一抽象只是在社会关系的现实体系形式中才有意义)。然而,阿尔都塞陷入了他所批评的错误之中:存在着抽象的普遍客体——发挥现实作用的经济(最后的决定作用);而且同样存在着另一个抽象客体(存在的条件),其形式历史地变化着,但是被预先建立起来的保证经济再生产的主要角色统一起来;最后,因为经济和它的集中性在任何社会可能安排的常数,就有可能对社会进行定义。在这里,分析转向了更仔细的考虑。假如经济是一个可以最终决定任何社会类型的客体,这意味着,至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对的是单一的决定,而不是多元决定。假如社会有一个最后的因素决定它的运动规律,那么多元决定与最后决定之间的关系肯定按照后者简单的、一个维度的决定来理解。从这里我们可以推断多元决定的领域是非常有限的:它是作为与根本决定对立的偶然变化的领域。而且,如果社会确实有最后的和根本的决定,差别就不会构成,社会就会被统一在理性主义典型所缝合的空间之中。因而,我们面对的是完全同样的二元论,它从 19 世纪结束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再生出来。

这是阿尔都塞理性主义开始脱落的地方。重要的是记住矛盾的二元论起点会转到那些无可奈何地面对自身

^① 正如可以被观察到的,我们的批评在某些方面与英国的海因兹和赫斯特学派是一致的。但是我们确实与他们的研究有一些根本的不同,在后面的论述中我们将会涉及到这些不同。

原初计划崩溃的理论形式中去。实际上,形成了两种可能性:第一个是要去发展多元决定这一概念的全部含义,揭示“经济的最后决定”这一概念的不可能性,肯定每一个同一关系的不稳定特征;第二个可能性是要证明假定的社会总体要素之中的必然性联系的逻辑矛盾,从而通过不同的道路揭示作为合理地统一起来的总体的客观“社会”的不可能性。实际遵循的道路是后者。结果,在否定合理性的社会概念时,对理性主义的批评本身接受了理性主义分析所做的假设。解构扩大的结果是使连接这一概念变得完全不可思考了。正是对这一思想路线的批评为我们提供了构造我们连接概念的不同基础。⁹⁹

打破阿尔都塞理性主义典型不同因素之间逻辑联系的这一尝试是巴利巴尔在自我批评中开始的,^① 而且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流派中得到了最后的结果。^② 巴利巴尔自我批评的模式包括引入关于《阅读〈资本论〉》的争论中不同观点之间的裂缝——对于这个裂缝,逻辑过渡一直有伪造的特征。但是,他通过使被假定为导致了从抽象到具体转变的实体多样化来填补这些裂缝。这样,理解从一种生产方式到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转变就需要阶级斗争领域的扩展,这一领域的不平衡防止了把阶级斗争还原到个别生产方式的单一规律上去。争论的东西正在于上层建筑再生产的需要能够被还原到那个规律,以及联结的各个方面的不平衡必须按照结合起来的方式来理解,在这种方

^① E·巴利巴尔:Sur la dialectique historique. (Quelques remarques critiques à propos de Lire le Capital), in Cinq études du matérialisme historique, 巴黎 1984 年。

^② B·海因兹和 P·赫斯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伦敦 1975 年;《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伦敦 1979 年;A·卡特勒, B·海因兹, P·赫斯特和 A·侯赛因:《马克思的资本和今天的资本主义》,伦敦 1977 年,第 2 卷。

式中,参与因素的抽象统一瓦解了。然而很清楚,这些分析只是在扩大的规模上再生产了原有表述的困难。其所进行的斗争必定导致变革过程的阶级实际上是什么呢?如果他们是围绕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利益构成的社会代表,他们活动的合理性和政治算计形式可能是由生产方式的逻辑决定的;假如相反,这没有穷尽他们的阶级同一性,那么他们的同一是在什么地方构成的呢?同样,知道上层建筑对生产过程的干预并没有使我们走的更远。如果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它们是上层建筑,在社会地形学(the topography of the social)中就会有指派给它们的位置。沿着这一解构线索进一步能够在巴里·海因兹和保罗·赫斯特的著作中发现,“最后决定”和“结构因果关系”概念属于一种破坏性的批评。由于确立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非必然一致的特征,他们得以总结出必须放弃马克思主义话语中生产方式概念这一合法的客体。一旦任何总体化的方面被废除,存在于具体社会形态之中的连接类型就以下面的形式被提出来:“社会形态不是被组织原则、最后决定、结构性因果关系或任何别的什么所控制的总体,它应该被明确地理解为由与经济、政治、保障他们存在条件的文化形式在一起的生产关系构成,但是并不存在那些条件被保障的必然性,而且也没有社会形态的必然结构使得其中的那些关系和形式必须结合起来。至于阶级……假如他们被理解为经济的阶级、拥有明确的与生产方式不相连接的所有权立场的各种经济代表,那么他们也不能被理解为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形式,或者被它们代表。”^①

100

^① 卡特勒等人,第1卷,第222页。

我们在此提出了社会形态这一概念来详细说明经典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某些对象——生产关系、生产力等等——而且使那些“保障存在条件”的对象之间的连接重新概念化了。我们想证明的是：(1)指定客体的标准是不合法的；(2)以共同“保障它们存在条件”的形式使那些事物之间的关系概念化，并没有提供任何连接概念。

关于第一点，库特勒等人从没有争议的命题开始——除非我们陷入企图在概念化层面上断定社会形态再生产普遍机制的教条理性主义——满足这些条件或者被它们采用的特殊形式的必然性，不可能来自某种概念化规定的关系的存在条件。可以由此得出下面的观点是完全不合逻辑的：特定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可以脱离保证它们存在条件的具体形式得到说明。我们来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只有在那些条件是不能满足的情况下承认这些生产关系的存在才可能是矛盾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在的条件——例如，保证私有财产的合法条件——才是存在的逻辑条件。同样可以得出这样的逻辑结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概念中没有什么东西表明它们能保证自己的存在条件。确实，在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概念当成客体的同样话语的层面上，资本主义存在的条件就可以外在地得到保证。但是，正因为这一点，提出下面的观点是不恰当的：在每一种情况下，由于存在着生产关系与存在条件之间的差别在抽象生产关系概念的话语内是逻辑差别，并没有成为具体的多样性，因而不知道这些生产关系将怎样得到保证。由此，假如说到英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在的条件得到这样或那样制度的保证，就陷入了双重不合理的推理变换：一方面，主张某种具体话语和制度实践保证那个属于

另一种推理顺序的抽象实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存在条件；另一方面，如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抽象的术语过去习惯于用来指英国的生产关系，那么很明显，在某种话语中指定的客体就被用作一个名称来指出其他话语和实践构造的客体——那些构造英国生产关系总体的客体。但是在此情形之中，因为不仅仅存在着“一般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有话语和实践的多样性，所以不再存在任何在其中生产关系对它们存在条件的外在性可以被先验确立的领域。进而，由于指出客体之间差别的可能性被建立在逻辑标准上，构成问题的正是这个标准。假如像库特勒等人所主张的那样，概念之间的关系并不意味着在那些概念中被详细说明的客体之间的关系，那么，对象之间的分离也并非来自概念之间的分离。但是库特勒等人只通过指定某种话语的对象之一以及不同话语之中的其他对象来主张特殊的同一性和分离的客体。

现在我们转向第二个问题。被称为“保证存在的条件”的联系能被理解为要素的连接吗？无论什么样的具有连接关系的概念，都必须包括不同立场构成的体系。而且假如这个体系建立了一个结构，它所包含的要素同一性的合理或不合理特征这些问题就会产生。有可能去考虑“保证存在的条件”为引起这些由相关要素提出的问题构造被充分分析的领域吗？显然不能。保障存在的条件会满足客体存在的逻辑要求，但是并不能建立起两个客体之间的存在关系（例如，某些司法形式可能有利于某些生产关系存在的条件，即使后者实际并不存在）。假如一方面，我们考虑存在于客体和保证其存在条件的情况之间的关系，很明显的是这些关系不能在那些情况下保证客体存在条件

的基础上被概念化,因为这一保证并没有构造关系。因此,如果人们要想认识连接关系的特殊性,就必然转向不同领域。

赫斯特和伍利主张:“他(阿尔都塞)把作为总体(totalities)的社会关系理解为由单一决定性原则控制的整体,这一整体必须保持自身的一致,并且必须使在它的范围内的所有代表和关系从属于它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们把社会关系理解为制度、组织形式、实践和代表的集合体,它们没有回答任何单一因果关系原则或逻辑连贯性,这些原则和连贯性能够并且确实在形式方面不同,而且彼此并非是必不可少的。”^①这一段话表明由纯逻辑学家的解构引起的全部问题,由于涉及使假定总体的要素统一起来的连接的非本质性特征,总体这一概念遭到了拒绝。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不同意见,但是,像“制度”、“组织形式”、“代表”那样的要素一旦被指定,就会立即产生问题。假如这些组合体——与总体相比——被理解为合法的社会理论化对象,我们就必须断定它们中每一个的内在组成部分中的关系是实质性和必然的吗?假如答案是肯定的,无疑我们就离开了总体的本质主义和要素的本质主义。除了上帝这一角色不再在要素之间建立和谐而只是为了保证要素的独立性以外,我们仅仅是用莱布尼兹置换了斯宾诺莎。相反,如果那些内在要素之间的关系既不是本质性的也不是必要的,那么,除了不得不详细说明以纯粹消极方式表现其特征的关系的本质之外,我们还被迫去解释为什么这些“合法”客体内在组成之中的非必然性关系不能存在于

^① 赫斯特和伍利:《社会关系和人的特征》,伦敦1982年,第134页。

合法客体本身之内。假如这被证明是可能的,某种总体概念就会被再次复活,差别只是它不再包含一个统一“社会”的根本性原则,而是开放关系的复杂性中的全部总体化作用。但是假如我们单独活动在“本质性关系或非理性的同一”这个选择之中,所有的社会分析就会包括对不可连续分割下去的逻辑原子无限后退的这个妄想的追求。

103

问题是关于要素和客体之中分离的整个讨论一直逃避先验的和基础的问题:分离出现的领域问题。这样,正统的二元选择问题已经暗中溜进了分析之中,每个客体都被分离为概念上离散的要素——在此情形之中,我们正在面对的是逻辑上的分离,不然的话,它们就被分离为经验上特定的客体——在此情形之中,不可能躲避“经验”范畴。这样一来,由于没有详细说明客体统一或分离在其中发生的领域,就再次退回到赫斯特和伍利要千方百计避免的“理性主义或经验主义”二元选择之中。这一无法令人满意的情形实际上从开始就预先注定了,即,在批评阿尔都塞理性主义的过程中采用了批判在不同的“总体”要素中假定的逻辑联系时,就注定了。因为,假如没有联系的“要素”被概念化地说明和固定,或者更确切地说,假如完全明确的同一被归于它们,逻辑的解构就只能被贯彻了。惟一剩下的出路是社会的逻辑破碎,再加上不可知论在理论上对“具体情况”的描述。

然而,在最初阿尔都塞主义者的规划之中,所预示的是完全不同的理论担保:不仅通过其范畴的逻辑崩溃——其结果是固定被解体要素的同一性——而且还通过对各种固定性类型的批评,通过肯定每个同一性的不完整性、开放性和政治上的可协商特征来终结正统的本质主义。

113

这就是多元决定的逻辑。根据它，每一个同一性的意义都由于所有实际呈现为根本上被颠覆和被超越的东西而被多元决定，根本不存在一个本质主义的总体化或者在客体中的本质主义分离，在其他客体中存在的一些客体防止了它们的任何同一性被固定起来，被连接客体的出现并不像钟表机械中的零件那样，而是由于它们在其他客体之中的存在妨碍了它们同一性的缝合。在此意义上，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说明了完全不同于天真实证的“科学社会主义”所描述的景象，在其中社会代表完全围绕着利益构造起来，发动由透明的决定因素限定的斗争这种理性主义的游戏根本不存在。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阶级在把自身构造为历史主体时的困难，其立场的分化和分裂，社会和政治的再聚合——“历史集团”、“集体意志”、“群众”、“大众阶层”——形式的出现，规定了新的客体和新的构造逻辑。因此，我们正处在一些实体被另一些实体多元决定的领域之中，而且典型的固定性被驱逐到最后的理论地平线上去。正是这个特殊的连接逻辑是我们现在必须要确定下来的。

连结和话语

在这一讨论的环境之中，我们把任何建立要素之间关系的实践称之为连结，那些要素的同一性被规定为连接实践的结果。来自连接实践的结构化总体，我们称之为话语。不同的立场只要在话语之中被连接起来，我们就称之为因素(moments)。相对应地，我们称任何没有被话语连接的差别为要素(element)。为了进行正确的理解，这些差别

需要三种主要说明：关于话语形态特有的连贯性；关于话语的维度和范围；关于被话语形态展示的开放性和封闭性。

1. 话语形态既没有被统一在要素的逻辑连贯性中，也没有被统一在先验主体的先验之中，或者胡塞尔提供的赋予意义的主体之中，或者经验的统一之中。我们所归于话语形态的连贯性类型接近于——后面我们将指出带着差别——表现福柯在“分散中的规则性”中所阐明的“话语形态”概念特点的东西。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否定了关于统一话语形态的四个原则——归于同一个对象；叙事生产中的共同风格；概念的持久性和归于共同的主题。相替代的是，在形成规则和分散叙事存在的复杂条件控制的范围内，他使分散本身成为统一原则。^① 注意到这一点是必要的，规则控制的分散可能从两个对称性对立的方面被理解，首先，就分散来说，关于要素可以被当成分散化的，需要确定参照点（在福柯那里，可以只通过参照围绕一般对象、类型、概念和主题构造起来的缺席的统一形式来谈论分散）。但是话语形态也可以从分散中的规则性这个方面被理解，而且在此意义上被看成是所有不同立场的全体。这个全体不是任何外在于其本身的根本原则的表达——例如，它不能通过解释学阅读或者结构主义的组合来理解——但是它构造了一个结构，可以在外在的某种环境中被表示成一个总体。由于给定了连接活动的原则，正是这第二个方面特别使我们感兴趣。

106

既然在被连接起来的每一个要素占有一个不同位置

^① M·福柯：《知识考古学》，伦敦 1972 年，第 31～39 页。

的话语总体中——在我们的术语中，其中所有要素都被还原为总体的因素——整个同一性就是表示关系的并且所有关系都具有必然性特征。例如，本维尼斯特就索绪尔的价值原则说道：“说价值是‘相对的’意味着它们相互之间是相对的，既然如此，那不正好是它们的必要性的证明吗？……无论谁说到超越和解释其要素的结构中组成部分之间的协调和一致。每件事情在其中都是非常必要的，以至于对整体的限制和对细节的限制相互为条件。价值的相对性最好地说明：在总是被威胁、被修复的系统同步性中，它严格地建立在各个价值相互间的关系之上。重要之处在于所有的价值都是对立的，而且只有通过它们的差异才能被规定——假如语言与不稳定概念、随便发音的偶然混合物不同，正是因为这一必要性内在于它的结构中就像内在于整个结构中一样。”^① 因此，必然性并非起源于根本的概念原则，而是来自结构化位置体系的规则性。在此意义上，关系不可能是偶然和外在的，因为，其要素的同一性会在关系本身之外被说明。但这只是要肯定，在话语结构按此方式的形成中，连接活动会是不可能的：后者包含着对要素的作用，而在此我们只是被置于封闭和完全构造的总体的因素之前，在这个总体中，每一个要素从一开始就被归于重复原则之下。正如我们所见，假如偶然性和连接是可能的，这是因为话语形态不是被缝合的总体，而且要素转变成因素从来都是不完整的。

2. 我们的分析拒绝话语和非话语实践之间的差别，而肯定了(1)每个对象被构造为话语对象，只要对象不是在

^① E·本维尼斯特：《普遍语言学中的问题》，迈阿密 1971 年，第 47、48 页。

每一个出现的话语条件之外给定的；(2)通常被叫做语言与社会实践行为方面之间的任何差别，或者是错误的差别，或者应该在意义的社会生产中发现它是以话语总体形式被结构化的区别，例如，福柯试图确定为分散话语形成的规则提供基础的关系总体（他曾经主张的——在我们看来那是不相容的——是话语和非话语实践之间的差别^①），但是他只能在话语实践形式上这样去做：“[临床医学]必须被看成是关系的建立，在医学话语之中，在大量不同的要素之间，一些关系涉及医生的身份，其他的涉及到话语得以进行谈论的制度和机制，主体的理解、观察、描述、讲授的立场，等等。可以说这些不同要素（一些是新的而另一些是已有的）之间的关系受到临床话语的影响，临床作为实践在它们之间建立了并非是‘实际’给定或先验构造的关系体系，而且假如有一个统一体，假如它使用或者造成的阐述模式没有被简单地被并置为一系列历史偶然，那是因为不断地利用了这些关系群。”^② 这里有两点必须要强调，首先，假如所谓非话语的复杂性——制度、技术、生产组织等等——被加以分析，我们只会发现，在那些并非来自构造它们的系统之外的必然性并且因此只能被理解为话语连接的客体中，或多或少存在着有差别的位置

^① 在对福柯知识考古学方法限度的深刻研究之中，B·布朗和 M·卡曾斯说：“（福柯）没有把现象的分类变成两种存在，话语和非话语的。对于他说，问题总是在于特殊的话语形式的同一性。在特殊话语形式之外的就落入这一同一性之外。因此其没有加入到存在的一般形式——即非话语——之中。”（“语言学的缺点：福柯知识考古学的情形”，《经济与社会》，1980年8月）关于可能的“把现象的分类变成两种存在”即关于可以在总体内建立局部区分的话语无疑是真实的，但是这并没有排除话语理解形式方面这个问题，接受非话语实体不仅仅与术语有关，也限制性了话语概念。

^② M·福柯，第53-54页，H·L·德雷福斯和 P·拉宾诺，在他们论福柯的书中（《米歇尔·福柯，超越结构主义和解释学》，芝加哥1982年，第65-66页），意识到这一段落的潜在的重要性，但是草率地拒绝了作为“非话语”的制度概念。

的复杂形式。第二,福柯关于临床话语连接本质方面的论点意味着被连接要素的同一必须至少部分地被连接所限制,即,分散的范畴只部分地允许我们去思考规则的特殊性。被分散实体的状况在要素和因素的某些中间区域被构成。^①

我们在此不可能讨论所有话语理论的复杂性,但是至少应该指明下面的基本点,以避免更常见的误解。

(1)每一个客体被构成为话语客体的事实与是否存在外在于思想的世界、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对立没有关系。地震或一块砖头的落下是当然存在的事件,在眼下出现的意义上,独立于我的意志。但是不管它们是否作为客体的特性按照“自然现象”形式或者按照“上帝惩罚的表达”形式被构成,总是依赖话语领域的结构化。被否定的不是外在于思想的客体,而是能把自身构造为外在于任何出现的话语条件的对象这一不同主张。

(2)话语的精神特征存在于以往偏见的基础上。与其相反,我们肯定每一个话语结构的物质特征。要显示的对立面在于要去接受外在于任何话语介入构造的客观领域与由纯粹思想表达构成的话语之间的正统二分法,这正是

^① 严格地说这里指的正是“形态”这个概念。这个问题可以用最一般的方式阐述,像下面这样:假如表现形态特色的是分散中的规则性,那么怎么可能来确定对形态的限制?让我们来假设,存在着话语实体或外在于形态的差别,但是在外在性内它是绝对规则的。假如关键的单一标准是分散,怎么可能建立差别的“外在性”?在那种情形下,第一个要被决定的问题在于限制的确立是否依赖于把自己添加到考古学的事实上的“形态”概念。如果我们接受了第一种可能性,我们只是简单地采用与那些过去一直从一开始就在方法论上排除的“作品”、“传统”等标准同样的实体。如果我们接受了第二种可能性,很清楚,在考古学的材料本身内,就必定存在着某种逻辑,它能够产生构成限制并且因此建构形态的总体作用。正如我们将在本书中进一步讨论的,这是由同等(equivalence)的逻辑完成的任务。

当代思想潮流一直试图打破的二元论。^① 例如,言语行动理论强调表述行为的特征。在维特根斯坦那里,语言游戏在不可分解的总体内包括语言和行动被相互连接,“A正在用建筑石料进行工作,有石块、柱石、板石和石梁。B必须递送这些石料,而且要按照A需要它们的顺序递送。出于此目的,他们使用由“石块”、“柱”、“层板”和“梁”这些词组成的语言。A大声叫出它们,B随叫随到地递送他已经知道要递送的某种石料。”^② 结论是必然的,“我也将称由语言和行动编织成的整体为‘语言—游戏’。”^③ 很明显,每个客体的物质特性是维特根斯坦所谓的语言游戏的一部分,是我们称之为话语的东西的一部分。构成不同立场并且因此与某种言语要素在关系上同一的东西不是建筑石料或层板石的观念,而是它们本身(我们知道,与“建筑石料”观念的联系对于建筑一个建筑物来说从来是不够的)。言语与非言语要素不仅仅是并列的,而且构成了不同的结构化的位置体系——即话语。因此,不同的位置包括完全不

① 从现象学出发,梅劳·庞蒂把存在主义现象学的计划当成是要克服“自在”和“自为”之间的二元论,而且要确立一个克服被萨特哲学当成是不可克服的对立领域。现象因此被理解为建立了“事物”和“精神”联系的地方,而且知觉被当成了比认识(Cogito)更为主要的基本层面。意义概念的限度内在于每一个现象之中,只要其以生活的不可还原性为基础,必定使我们不会忘记它的这个形式——而且特别是在梅劳·庞蒂的著作中——我们发现一些要终结内在于二元论形式中的本质主义的最激进企图。

② L·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牛津1983年,第3页。

③ 同上书,第5页。

108 同物质要素的散布。^①

在此情形中可能被争论的是，话语统一是目的论计划的统一，但是并非如此，客观世界在并不必然具有终极意义，而且大多数情形下实际根本不需要任何意义的相关顺序就被结构化：某些规律性建立起相区别的位置使我们足以能谈论话语形态。由此而来的两个重要结论：第一：话语的物质特征在构造主体的经验或意识中不可能被统一，相反，不同的主体立场分散地出现在话语形成之中。第二个结论是，连接的实践，作为差异体系的固定/打乱，不可能由纯粹的语言现象构成，而是必须通过话语形态被结构化来打破各种各样制度、例行习惯和实践的整个不透明性。对复杂性及其话语特征的认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化领域开始离开了模糊的方式。从葛兰西到阿尔都塞，它的特有形式是逐渐地肯定意识形态的物质特征，因为不存在简单的观念体系，意识形态具体化于制度、习惯等等之中。过去所做的这些是涉及到意识形态领域的，即形成的同一性是在“上层建筑”概念下思考的，然而，现在变成了理论上充分阐述直觉的障碍。正是这个先验统一与其分散的物质性相对立，所以它需要既求助于统一的阶级角色（葛兰西），又需要求助于对再生产规律的功能性需要（阿尔都

^① 为了反对认为话语原则会使“唯物主义”受到怀疑的某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只想建议去游览一下马克思的文本，特别是《资本论》，不仅包括论劳动过程那一章中关于蜜蜂和建筑师的著名段落，还包括整个对价值形式的分析。在那里正是商品生产的规律——资本积累的基础——被描述为严格的社会规律，它通过在根本不同的客体之间建立同等关系强加于社会本身。从第一段开始就陈述了这一点——评论巴尔本的主张——“物都有内在的长处（这是巴尔本用来表示使用价值的专门术语），这种长处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如磁石吸引铁的长处就是如此。”（尼古拉·巴尔本《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1696年伦敦版第6页）磁石吸引铁的属性只是通过它发现了磁极性以后才成为有用的。”（《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8页。——中译者注）

塞)。但是一旦这些本质主义的假定被放弃,连接范畴就需要一个不同的理论身份:现在连接是没有先于或外在于分散的被连接要素的基本层面的话语实践。

(3)最后,我们必须考虑我们已经确定的话语范畴中心所具有的生产力和意义。通过这一中心,我们使客观性领域有了重大扩展,而且创造了条件,使我们可以通过前面几章的分析来思考大量置于我们面前的关系。假设我们试图在自然科学话语构造的客观性形式基础上分析社会关系,这就会立即对那种话语内可能构造的客体和关系产生严格限制,某些客体和关系预先就被排除了,例如,隐喻不可能成为两个实体之间的客观关系。但是这排除了概念化地阐明大范围社会和政治领域客体间的关系,例如,我们所描述的“共产主义列举”建立在被分成两个阶级阵营的社会空间范围内不同阶级成分之间同等关系的基础上。但是这个同等假设了在真正不同的内容之中类推原则的作用——这除了隐喻变换外还能是什么呢?重要的是要看到,那些通过共产主义列举构成的同等并非是话语之外构成的现实运动的表达,相反,这一列举话语是有利于塑造和构成社会关系的现实力量。一些类似的事情以“矛盾”那样的概念出现——下面我们将回到那里。如果我们从自然主义的典型方面考虑社会关系,矛盾被排除了。但是如果我们把社会关系当成是话语构造的,矛盾就变得可能了,因为,尽管正统的“真实客体”排除了矛盾,矛盾关系还可能存在于两个话语对象之中。终结话语/非话语二分法的主要结果是放弃思想/现实的对立,以及由此而来那些说明社会关系的范畴领域较大的扩展。同义词叠用、转喻、隐喻不是给主要的、基本的现实社会关系增加

第二层意义的思想形式,相反,它们是社会在其中被构成的主要领域本身的一部分。对思想/现实二分法的拒绝必须一起伴随着再思考和直到现在还一直被当成唯我独尊的那些范畴的互相贯通。

3. 假如相关的不同话语总体的逻辑没有任何限制地流行起来,转向我们称之为“话语”的关系总体并不能解决我们原来的问题。在那种情形下,我们会面对着纯粹的必然性关系,而且正如我们指出的,任何连接都不可能导致每个“要素”不加限定地成为“因素”。然而,只有假设我们允许相关的话语逻辑没有任何外部限制地被贯彻它的最终结论,这一结论才可以强加于其本身。^① 相反,如果我们接受话语总体从来不以简单给定和划定的实证形式存在,相关的逻辑就会是不完整的并且被偶然性打破。从“要素”到“因素”的转换永远不会完全地实现。一个使得连接
110 实践成为可能的无人领域(A no man's land)因此出现了,在其中,社会同一性没有被保护以免于使它发生改变的话语外部并且防止它完全被缝合。同一性和关系都失去了它们的必然性特征。作为系统的结构化全体,关系不能吸收同一性,但是由于同一性纯粹是关系性的,这只是说不存在可以完全被构造的同一性的另一种方式。

这样一来,所有固定的话语变成了隐喻性的,事实上真正的东西首先是隐喻。

在此我们已经达到了论述中的决定点(decisive point)。每个总体不完整的特征必然导致我们放弃分析领域中作

^① 我们不是用“外部”再提出特别的话语范畴。外部是通过其他话语被构造的。正是这个话语的外部本质提供了每种话语脆弱性的条件,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最终保护它,对抗它的差异系统由于话语连接从外部作用带来的变形和不稳定。

为被缝合并且自我规定的总体“社会”这一前提。“社会”不是有效的话语对象，不存在单一根本原则的固定——而且因此组成整个差别领域。不可解决的内在性/外在性之间的张力是任何社会实践的条件：必然性只作为偶然性领域的局部限制存在。正是在这个总体内在性和总体外在性都不可能的领域之中，社会被构成。出于同样的原因，社会不能被还原为被固定的差异体系的内在性，纯粹的外在性也是不可能的。为了相互完全是外在的，实体对它们自己必须是完全内在的，即要有一个不被任何外在性破坏的被充分构造的同一性。但是这正是我们刚刚拒绝的。这个从来没有被充分固定的同一性领域，是多元决定领域。

因此，绝对的固定性和绝对的不固定性都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开始以不固定性考虑这两个连续的因素。我们已经称“话语”为有差别的实体——即因素——体系。但是我们已经看到那样一个体系只作为颠覆它的意义过剩的局部限制而存在。作为内在于每一个话语情况之中的这个“过剩”对于每个社会实践的构造都是必要的领域，我们称之为“话语的领域”。这个术语指出了它与每个具体话语的关系形式：它同时决定着任何客体必然的话语特征以及任何特定话语进行最后缝合的不可能性。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分析遭遇到大量的当代思想潮流——从海德格尔到维特根斯坦——他们一直坚持确定终极意义的不可能性。例如，德里达就从激进地打断结构概念的历史出发，这一打断出现在这样的要素之中，在其中，中心——超越性所指在它的多样化形式：理念、本原、目的、潜能、本质、真理等等之中表现出来——被放弃，而且确定了为差

异流动提供基础意义的可能性。在这一点上，德里达在与我们本文一致的意义上概括了话语概念：“有必要既思考莫名其妙地控制着寻求结构构造中心的欲望的规律，又思考置换、替代中心性在场的规律的规律的意义过程——但是作为从来就不是其自身的中心性在场，一直总是从自身被放逐到它的替代之中。替代从来不用自己本身去替代以某种方式一直在其之前存在的任何事情，因此，就必然开始考虑到并没有中心，中心不可能以当前存在的形式被思考，中心没有天赋的场所，它不是一个固定的焦点，而是一个功能，一种非焦点，在其中，无限多的符号替代进行着活动。这是语言侵袭普遍问题的时刻，在中心或起源缺席的时刻，每件事情都变成了话语——使我们对这个词达成一致意见——就是说，中心在其中被表示的体系、起源或超越性所指，从来不是绝对地在差异体系之外到场，超越性所指的缺席无限扩展了意义的领域和游戏。”^①

我们来考虑第二个维度。意义最终固定的不可能性意味着必须存在局部的固定——否则，差异的流动将是不可能的，甚至为了去区别、去颠覆意义，都必须存在一个意义。如果社会不设法在可理解的社会构成形式中确定本身，社会就只是作为一种构造不可能客体的努力存在着，所有话语都被建成为控制话语领域、阻止差异流动、构造一种中心的企图。我们将把被赋予特权的局部固定性的话语点称为关节点。[拉康一直通过他的缝迹间的突出点 (points de caption) 这个概念——固定表意链意义的被赋予

^① J·德里达：《写作和差异》，伦敦，第280页。

特权的能指——强调这些局部的固定。这个表意链生产力的限度建立起使得预言成为可能的出发点——不能产生任何固定意义的话语是关于精神病的话语。]

在索绪尔的分析中把语言看成是没有绝对词项的差异系统,在此系统中,词项的意义纯粹是关系性的并且只被它与所有其他项的对立所决定,因此中心概念是价值。但是这告诉我们:呈现给我们的是封闭系统可能性的条件:只有在其中才可能以那样的方式固定每一个要素的意义。当语言学模式被引入到一般人文科学领域时,正是由于这个系统性作用的控制,结构主义才变成了新形式的本质主义:一种对构成了任何可能变化的内在规律的根本结构的寻求。对结构主义的批评包括终结构造充分的空间这一观点,但是由于它也拒绝返回到像词汇表那样通过参照一个对象给定了划分的统一体概念,结果产生的概念就属于那种不能如此构造自己本身的空间——通过期待总是最终缺席的结构所控制的领域。符号是对分裂、所指与能指之间不可能缝合所进行的命名。^①

112

我们现在具有了详细说明连接概念的所有必要分析要素。既然所有特性都是相关的——即使关系系统没达到稳定的差别系统这一被固定的状况——也由于所有的话语被溢出它的话语领域颠覆了,从“要素”到“因素”的转

^① 对于这个关于缝合不可能性的概念以及因此每一社会关系最终的内在可理解性是不可能的这方面的概念,近来大量的著作已经把它们扩充为传统上描述为纯结构逻辑模式的体系,即语言。例如,F·加代和M·佩舍已经指出,就索绪尔来说:“关于使特殊效果的诗脱离整体的语言的理论,索绪尔的著作……使诗渐渐成为语言固有的:索绪尔所建立的不是古代拉丁诗体的功能,甚至也不是诗的功能,而是语言本身的功能”(La langue introuvable,巴黎1981年,第57页)。参照F·加代:‘La double faille’,Actes du Colloque de Sociolinguistique de Rouen,1978年;C·诺曼德:L’arbitraire du signe comme phénomène de déplacement,《辩证法》,巴黎1972年,第1-2期;J·C·米尔纳:‘L’amour de la langue’,巴黎1978年。

变就不可能是完整的。“要素的身份”是漂移的能指，不可能被整个连接到话语链上，而且这个漂移的特征渗透到每个话语的（即社会的）同一性之中。但是如果我们接受了所有话语固定性不完整的特征，同时又承认每个同一性的关系特征，那么，能指的不明确特点和它对于任何所指的不固定性只能存在于所指增殖的范围内，这并不是所指的贫乏，相反，是导致话语结构断裂的意义分歧。这就是建立了多元决定的东西和每个社会特性的象征维度。社会从来没有形成与自身的同一，因为每一个关节点在溢出它的交互性内被构成。连接实践因此由部分上固定意义的关节点构造，而且这一固定的部分特征来自社会开放性，接着的结果是所有话语由于话语领域的无限性不断的溢出。

因此，所有社会实践——在它的一个维度上——是连接，当它不是自我决定的总体内在要素时，不可能仅仅是已经获得的某事的表达，它不可能整个被纳入到重复原则之下。相反，它总是存在于新的差异结构之中。在“社会”
113 是不可能的范围之内，社会是连接。前面我们说过，对于社会，必然性只作为限制偶然性的局部成果存在，这意味着“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不能被理解为被划分的并且相互外在的两个领域之间的关系——例如，像在拉布里奥拉的形态学预言中那样——因为偶然性只存在于必然性之中。这个偶然性在必然性中的存在我们先前称之为颠覆，并且它表明自身是改变和怀疑所有必然性精确特征的象征、隐喻、反论。必然性因此并不具有根本和基础的原则形式，而是为确定关系系统差别性进行解释的结果。社会必然性是纯粹关系同一性固有的必然性——正像在

语言学的价值原则中那样^①——它不是自然“必然性”或分析判断的必然性。在此意义上的必然性仅仅等同于“缝合领域不同立场的系统”。

研究连接问题的方式看来包含着解决我们面对的领导力逻辑明显矛盾的所有必备要素,一方面,每个社会同一性敞开的不完全特征允许它对不同历史话语形态的连接——即对索列尔和葛兰西意义上的“集团”的连接;另一方面,每个连接力量的同一性在普遍话语领域中被构成——这就排除了牵涉任何先验或本源主体。然而,在阐明我们的领导力概念前,需要解决另外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在我们对范畴的分析中“主体”确切位置的;第二个是关于对抗概念的,这一概念的重要性来自这样的事实:在它的一个关键维度上,领导力连接实践的特殊性由它面对的其他对抗特征的连接实践提供。

“主体”范畴

对这个范畴的讨论需要我们区分近来讨论中一直被混淆的两个不同问题:话语问题或主体范畴的前话语特征问题;不同主体立场之间的关系问题。

114

第一个问题已经一直被注意到了,而且进一步带来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归结于“人类个体”的“基本”角色这个问题,这个批评基本上对准了三个概念目标:对作为代表的合理和透明主体的认识;假定的统一和它的所有立场的同质性;作为社会关系本源和基础的主体概念(严格意

^① 参照我们在前面关于本维尼斯特对索绪尔批评中所说的。

义上说的基本问题)。我们不需要详细涉及这些批评的主要维度,其经典成分——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是众所周知的,更近一些的是福柯曾一直在说明“对限制的分析”的紧张状态、他所谓的“人的时代”的特征怎样分解为一系列对立——经验/先验、我思/未加思考的、退场/回到本源——在作为统一主体被维持的“人”这一范畴内它们是不可克服的。^① 其他分析已经指出了终结“本源主体”时存在的困难,“本源主体”不断潜回到试图修补其带来的断裂的那些概念之中。^②

关于这个二难选择及其多样化基本要素,我们的立场是清楚的。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在本文中使用了“主体”范畴,在话语结构中都是在“主体立场”的意义上去做这样做的。因此主体不可能成为社会关系的本源——甚至在被赋予了给出可能性经验的权力这一有限意义上也不能——因为所有经验都依赖严格的话语可能性条件。^③ 但是这只是回答了我们的第一个问题,而决没有涉及解决第二个问题。从所有主体立场的话语特征那里,没有任何关于存在于其中的关系类型方面的事情可以得出来。由于每一个主体立场都是话语立场,带有所有话语的开放性特征,结果,在封闭的差异体系中不同立场不可能完全被固定。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些不同问题被混淆起来。既然断定每一个主体立场的话语特征被连接到拒绝作为本源和根本的总体主体概念上,必然盛行起来的分析要素就是

① 参照 M·福柯:《事物的秩序》,伦敦 1970 年。

② 关于这一点,参照 B·布鲁斯特:“《资本论》中的拜物教和阅读《资本论》”(《经济与社会》,1976 年,第 5 卷,第 3 号)与 P·赫斯特:“阿尔都塞和意识形态理论”(《经济与社会》,1976 年,第 5 卷,第 4 号)。

③ 同上。

那些分散的、去总体的、去中心的某种关于他者的立场，其中每个连接或关系的因素削弱了分散化修辞的认识作用，并且导致了对于将会秘密再引入被统一或进行统一的主体范畴再总体化的怀疑。从这里出发不过是把主体立场的分散变成在其中有效的分离的第一步。然而，分散变成分离显然带来了我们前面揭示的分析问题——特别是在以要素的本质主义置换总体的本质主义之中固有的那些问题，如果每个主体立场是话语的立场，分析就不可能免除他者的一些立场的多元决定形式——正如我们一直看到的，所有必然性的偶然特征是内在于任何话语差别之中的。

我们来考虑近来一直在引起重要讨论的两种情况：涉及到明显的抽象范畴[首先是“人”(Man)];也涉及到女权主义的“主体”。第一个处于近来关于人文主义的整个讨论的中心，如果“人”的地位是本质性的，^①它相对于“人类”(human being)其他特征的定位就会处在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范围内。这会给所有以“异化”和“误识”观点来分析具体情况的常见把戏打开道路。但是如果相反，“人”是一个话语构造的主体立场，其假设的抽象特征就绝没有预定与其他主体立场的连接形式(这里的范围是无限的，而且它向任何“人文主义”的空想挑战，例如在殖民地国家中，“人权”与“欧洲的价值观”之间的同等是话语构造的帝国主义控制可接受性经常和有效的形式)。E·P·汤普森在

^① 含糊性来自使用“人”这个概念同时去指“人类”，而且“人种的男性成员”是我们要说明的话语含糊性的征兆。

攻击阿尔都塞中所引起的混乱，^① 完全建立在这一点上。当涉及“人类主体”(human subject)时，汤普森相信，假如人文主义价值的本质地位被否定，那么它们就被剥夺了所有历史合法性。然而，实际上重要的是要设法说明在现代时期“人”怎样一直被生产出来，“人类主体”——即无差别人类同一性的承担者——怎样显现在某种宗教话语之中，被具体化在司法实践之中，并且在其他领域被多样化地构造。对这个分散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各种脆弱的“人文主义”价值本身，它们通过与其他价值同等地连接起来而滥用的可能性，它们对某些群体——例如财产占有阶级或者男性人口——范畴的限制。远不是认为“人”具有本体地位——其就像是来自天堂的礼物——那样的分析可以向我们说明其出现的历史条件和现在所具有的弱点的理由，因此使我们能更有效地斗争，排除幻想，保卫人文主义价值。但是同样明显的是这个分析不能简单地在分散的时刻存在着，因为“人类同一性”不只包括分散立场的集合，还有存在于其中的多元决定形式。从 18 世纪以来，“人”是一个基本的关节点，大量社会实践的“人性化”从中产生出来。固守“人”一直从其中生产出来的分散立场只是构成了第一阶段，在第二阶段中，有必要说明多元决定

^① E·P·汤普森：《诗的理论》，伦敦 1978 年。然而，我们立即得出结论：汤普森只是一直在误读阿尔都塞。问题是相当复杂的，因为假如汤普森通过反对以假定人类本质为基础的人道主义，而且反人道主义建立在对人类本质的否定基础上提出了错误的选择，那么阿尔都塞对人道主义的分析没有给任何东西留下余地，而不是把它转到意识形态领域就同样是真实的。因为，如果历史具有一系列的生产方式提供的可理解结构，而且假如正是这一结构可以受到“科学”实践的影响，那么这只能伴随着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构造的“人道主义”概念——这个没有被理解为错误意识的平面在本体论上是不同的，而且从属于由生产方式的规律所构造的社会再生产机制。走出这两个本质主义——围绕着“人”和“生产方式”构造的——引向死胡同的道路是现象与本体这一区别的瓦解。在此意义上，人道主义话语既不是被先验地赋予特权的，也不从属于其他话语。

关系和建立于其中的整体化。话语差异的非固定和开放性使类推和互相贯通作用成为可能。

可以说女权主义“主体”的情况是类似的。对女权主义中包含的本质主义的批评一直在进行着,特别是英国的杂志《男人/女人》,大量重要的研究一直反对预先构造的“妇女的压抑”这一范畴——不管其原因是来自家庭、生产方式或者别处——而且一直试图研究“妇女这一范畴从其中被生产出来的特殊历史因素、制度和实践”。^① 一旦否定存在一个单一的妇女压抑机制,巨大的妇女政治行动领域就会打开,人们就可以理解反对任何构造性别差异的压制形式这一分散化斗争的重要性。这一斗争处在“女性”范畴不断生产出来的法律层面上、社会政策层面上或者各种文化形式上,因此我们处在分散的主体立场领域之中。然而,这一研究的困难来自单方而强调给出了分散的因素——单方而使得我们只剩下通过相互无关的实践构造的不同系列的性别差异。既然如此,当怀疑后天的社会实践之中提出的固有性别区分是绝对正确的时候,也有必要认识到多样化的性差别中存在的多元决定产生了性区分的系统化影响。^② 每个性差别的构造,无论它们多么复杂和不同,总是把女性构造为从属于男性的一极。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才可能谈及性/性别体系(sex/gender system)。^③ 把

117

① 《男人/女人》,1978年,第1期,短评。

② 参照 C·墨菲“性/性别体系与妇女从属性的话语构造”,见 S·亨尼恩和 L·帕尔丹编的《意识形态的再思考: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讨论》,柏林 1983年。从这种观点对女权主义政治历史的介绍可以在萨丽·亚力山大的“妇女、阶级和性差异”(《历史研讨》,1984年春)中找到。关于性政治问题更为一般的论述,见杰弗里·威克斯:《性、政治和社会》,伦敦 1981年。

③ 这个概念已经被盖尔·鲁宾的“买卖妇女:评性‘政治经济学’”发展了,见 R·R·赖特编的《走向妇女人类学》,纽约,伦敦 1975年,第 157~210页。

妇女作为范畴生产出来的全部社会实践、制度以及话语没有被完全隔离开，而是相互补充和彼此依赖地发挥作用。这意味着并不存在女性从属地位的单一原因。我们的观点是，一旦女人的性(female sex)开始意味着具有特殊特征的女人性别(a feminine gender)，这个“想像的意义”就在多样化的社会实践中产生具体作用。因此，在作为给构成“女性特质”意义集合以活力的一般范畴的从属性与构成具体从属性形式的多样化实践自发的不平衡发展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后者不是永恒女性本质的表达，但是在它们的构造之中，与特定社会中女性地位连接起来的象征主义扮演了基本的角色。具体从属的多样化形式反过来通过有利于维持和再生产这种象征主义来发挥作用。^① 因此有可能对男人与女人之间根本对抗、本质上存在性区别的观念进行批评，而不否认在“女性特质”的各种构成形式之中，存在着具有性区分形式的强大多元决定作用的一般要素。

现在让我们继续考虑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社会决定和政治主体一直采用的不同形式。这个起始点和不变的主题是清楚的：主体是社会阶级，它的统一是围绕着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决定的利益来构造的。比坚持这个一般的主题更重要的是，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和理论上对多样化和分散主体立场典型统一形式的正确反应方式。第一种反应的类型——是最基本的——由下面提到的不合逻辑

^① 这方面并没有被《男人/女人》的编辑完全忽视，因而，P·亚当斯和J·明森说：“存在着某种‘全能’的责任性可以覆盖多数社会关系——人们被普遍控制在‘有责任’、复杂的评价之中（消极的一面是被‘不负责任’控制）。但是不管这个全能的责任性显得多么扩散，它仍然从属于满足一定的社会条件，而且‘全能’的责任必须被分解成各种不同的情况。”见“女权运动的‘主体’”，《男人/女人》，1978年，第2期，第53页。

辑的段落组成,例如,它包括,主张工人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由具体的社会代表——引导进行两种斗争的工人阶级——统一起来,这种类型的思考——不仅在马克思主义之中是普遍的,而且总体上在社会科学中也是如此——的基础是荒谬的,“工人阶级”这一措词以两种不同方式被使用:定义生产关系中特殊的主体立场;命名持有主体立场的代表。由此形成的含糊性允许逻辑上不合理的结论不知不觉地误认为这些代表持有的其他立场也是“工人阶级的立场”(在第二种意义上它们明显是“工人阶级”,但是在第一种意义上并非必然如此)。关于统一和每个社会代表的意识透明性这种绝对性假设适合于增加这种不明确性——而且有利于增加混淆。 118

然而回避事实只能在试图肯定特定的经验立场中存在的统一时起作用。而在试图解释——就像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最为经常的情形那样——关于其余的一些立场中本质上的异质性(即“假意识”特有的裂缝)时就不起作用。在这种情形中,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阶级统一被理解为未来的统一;统一在其中表明自己的方式在于:通过代表这一范畴,现实的工人和他们利益的客观需要之间的分裂需要后者通过领导党加以表现来解决。既然如此,每个代表关系就被建立在虚构之上——在某种严格说来并不在其中的层面上在场的虚构。但是正由于它同时是组织起实际社会关系的原則和神话,代表是一个其结果并没有从一开始就被预定的游戏领域。在可能性系列的一个终端那里,我们将发现代表虚构特征的消解,所以,代表的方法和领域对于其所代表的将完全是透明的。在另一个终端那里,代表和被代表之间会有一个完全不透明物:虚构将变

成严格精确意义上的神话。重要的是注意到这些情况中没有一个是不可可能的,因为两者都具有充分确定的可能性条件:代表可以从属于那种变成神话的虚构,正是代表虚构性的支配性条件,而且在相反的方面,控制的完全缺席可以使代表成为完全的虚构。马克思主义关于先锋党的概念说明了这样的特性:党不体现现实的代表,而是他们的历史利益,而且由于代表和被代表都通过同样话语在同样层面上构造,因此不存在神话。然而,这种重叠的关系以其特殊的形式只存在于声称自己要成为无产阶级先锋的很小层面上,而无产阶级当然并没有意识到他有一个先锋。在每一次具有某种意义的政治斗争之中,相反存在着明确的努力要去取得现实社会代表对他们假设的“历史利益”的忠诚。如果既构造被代表又构造代表的单一话语重叠被放弃,就必然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代表与被代表是在不同层面上被构造的。首要的诱惑将是使分离的层面整体化,而且从其虚构特征中得出代表关系的不可能性。因此一直被声明的是:“否定经济主义就是要拒绝阶级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统一这个经典概念。就是要主张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不能被理解为经济的阶级的斗争,没有中间道路……阶级‘利益’并没有通过经济被给予政治和意识形态,它们形成于政治实践之中,而且被确定为政治实践的明确形式。政治实践不承认阶级利益以及对它们的代表:它建构它代表的利益。”^①

然而,这一主张可能只有政治实践是一个其与经济的边界是更几何化划定的领域时才能被赞同,也就是说,要

^① A·卡特勒等,第1卷。

假定我们排除或接受作为实质原则的来自经济的政治多元决定(反之亦然)。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分裂不能只在本质主义概念中被先验地建立起来,本质主义从概念的分离中得出要素中的现实分离,把对同一性的概念说明转变成了完全绝对地相区别的话语立场。然而,如果我们接受每一个同一性的多元决定特征,情况就改变了。存在一条不同的道路——尽管我们不知道是否它是中间道路——它无论如何都还是第三条道路。很简单,“代表对他们历史利益的争取”是构造在其中集团——工业劳动者——的具体要求被理解为走向包括战胜资本主义的全面解放步骤的话语的连接实践。无疑,这些对以此方式被连接的要求不存在根本的必要性,因为正如我们所见,连接关系不是必然的关系。“历史利益”话语所做的是要实现某种要求的领导权化。在这一点上,库特勒等人是绝对正确的:政治实践构造它所代表的利益。但是假如我们更仔细地观察,就会注意到: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分裂远不是被统一起来,而是因此被排除了。因为,按照社会主义的解读话语直接经济斗争连接了政治和经济,并且因此废除了存在于两者之间的外在性。清楚存在的二难选择是:是政治与经济的分离发生在保证其先验性的特别话语层面外,还是这一分离是话语实践的结果并且不可能从每一构造其统一性的话语中免除先验性。如果立场的分散是任何连接实践的条件,就不存在为什么分散会必然采取社会代表政治和经济特性之间分离形式的理由。假如经济特性和政治特性被缝合了,代表关系的条件显然就会消失:我们就会转向在其中代表和被代表是单一相关特性要素的重叠情况。与此相反,让我们接受:代表的政治特性或经济特性

都没有明确成为统一话语的差别要素,而且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充满张力的不稳定统一。我们已经知道这意味着:阻止稳定连接的意义分歧导致了对每个术语的颠覆。在此情形之中,经济既是又不是体现在政治之中的,反之对政治来说也是如此,关系不属于原原本本的区别,而是两个术语间的不稳定类推。既然如此,通过隐喻变换到场的形式是那个幻想的代表试图要思考的对象。代表因此没有被构造成明确的关系类型,而是不稳定的摆动领域,正如我们所见,其尽头是:由于代表和被代表之间所有联系的破裂使代表关系成了真正的神话,或者由于它们被兼并为单一同一性的因素而使两者各自的特性消失。

所有这些都向我们说明了:通过使分散的主体“立场”绝对化或者通过围绕“超越性主体”使它们绝对主义平等式地统一起来,主体范畴的特征不可能被建立。主体范畴由于多元决定支配着它的每个话语特征而同样浸透着暧昧、不完整和意义分歧。由于这一理由,在其“客观的”层面上没有给出的、封闭的话语总体的因素在“赋予意义的主体”层面上不可能被建立,因为代表的主观性被同样的不稳定和表现在其他一部分含义中的话语总体在其他任何含义上的缝合中的缺席所渗透。“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整体论”和“个人主义”是对永远被拖延的“完满性”期待的对称性表达式。由于这个最终缝合的缺席,主体立场的分散不能得到解决:由于它们中没有一个能根本上把自己强化为个别的立场,在它们中存在着多元决定的游戏,在此浮现了不可能总体的地平线。正是这一游戏使得领导权连接成为可能。

对抗和客观现实

封闭的不可能性(也就是“社会”的不可能性)到此为止一直被描述为每个宣称自身为差异连续运动的同一性所具有的不稳定性。但是现在我们应当问自己:难道不存在某些“经验”、某些话语形式,在其中被表明的不再是“先验所指”的连续拖延,而是这一拖延的毫无价值、任何稳定差别以及由此而来的客观性最终是不可能的?答案是存在。客观性限度的“经验”确实具有明确的话语存在形式,它就是对抗。

对抗在历史和社会学的著作中一直被广泛研究。从马克思到各种形式的“斗争理论”,关于在社会中怎样以及为何出现对立的整个解释范围已经被给出。然而各种理论中确实显示出共同的特征:讨论一直专门集中在描述对抗和它们的最初原因上,只有很少的尝试致力于我们的核心问题:什么是对抗关系?它包含了什么类型客体中的关系?让我们以很少几个提出这个问题的讨论之一开始,即由卢西奥·葛莱蒂对社会对抗的特性和主张“现实的对立”、“矛盾”范畴能够说明这个特性所做的分析发起的讨论开始。^①

葛莱蒂是以康德对现实的对立(Realrepuganz)与逻辑矛盾之间的区别为起点的。首先与对立原则相一致并且应答了公式“A-B”:其中每一项有其自己的确定性,独立于其同另一个的关系。其次是矛盾范畴和对公式“A—非 A”

^① L·葛莱蒂:“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新左派评论》,1975年9、10月,第93期,第3-29页,以及 Tamonto dell'ideologia,第87-161页。

的应答：每一项与另一项的关系都耗尽了两者的各自的真实性。矛盾出现在命题领域，只可能在逻辑概念的层面上成为矛盾。相反，第一种类型的对立出现在现实对象领域，因为现实对象没有由于它与其他对象的对立耗尽自身特性，它有自己的现实性，独立于它的对立物。^① 葛莱蒂然后得出结论说，鉴于黑格尔作为唯心主义哲学家把现实还原到概念上，把矛盾引入到现实之中，因此这与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从现实的非精神特征出发的唯物主义哲学是矛盾的。按照这一观点，马克思主义由于把对立看成是矛盾面导致了可笑的混淆。葛莱蒂的计划是按照现实的对立来解释黑格尔。

我们要指出，葛莱蒂是从一个惟一的二难选择出发的：是对立还是矛盾。这来自他的世界只为两种实体——现实的客体和概念——提供机会这一事实，而且这个出发点和他的全部分析中不变的假设是思想和现实的分离。这伴随着我们将要说明的大量的结论，毁掉了对能够解释对抗的“现实的对立”和“矛盾”两个范畴的信任。首先，很清楚的是，对抗性不可能是现实的对立，在两个交通工具的碰撞中没有任何对抗性：它是一个服从实证物理规律的物质性事实，将这样的原则运用到社会领域就等于是说，

^① 在下面四个原则中，康德总结了现实对立与矛盾之间不同的特征。“首先，彼此对立的规定必定会在同一主体中找到：实际上，如果我们提出，一个规定在一个事物之中，而另一个规定——无论是哪一种——在另一事物之中，现实的对立并没有随之产生。其次，在现实的对立中，对立的规定之一不可能总是另一个相矛盾的反面，因为在那种情形中，差别会具有逻辑性质，而且正如我们先前看到的，矛盾是不可能的。第三，一个规定不可能总否定由另一个提出的不同东西，因为在后者中可能没有任何对立。第四，假如它们是对立的，它们没有一个会是否定的，就像在后者的情形中，没有一个会提出被另一个否定的事情。正因此，每一个现实的对立中两个断言必须都是肯定的，但是在此方式内，在它们合并到同样主体之中，结果是相互否定对方的。因此，在被认为每一个是另一个的否定的那些事物中，当它们被综合在同样的主体之中时，结果是零。”I·康德：Il concetto delle quantità negative，见 Scritti precritici，巴里 1953 年，第 268 - 269 页。

警察殴打工人斗士、议会中团体阻止对立部分成员发言的叫喊,这些阶级斗争中的对抗是物理活动。“对立”在此是一直被隐喻地扩展到社会世界的关于物理世界的概念,或者反之亦然。但是显然不存在足以解释两种情况中固有关系类型的共同意义核心。这一点甚至是更清楚的:假如为了谈到社会起见,我们用“敌对的力量”替换“对立的力量”——对于此种情况,对物理世界隐喻的调换,至少在后荷马时代的世界中并没有发生。可能受到反对的是:要考虑的不是对立的物理特征,而只是它的附加逻辑特征。但是关于社会对抗特性的理论怎样可能建立在与两个社会力量冲突和两个石头碰撞所共享的逻辑矛盾相对立的基础上,甚至是更不清楚的。^①

此外,正如 R·埃奇利^② 和 J·埃尔斯特^③ 已经指出的,两个不同的主张在这个问题中被混淆在一起:(1)现实的是矛盾的,并且(2)矛盾存在于现实之中。关于第一方面,这个命题无疑可能是自我拆台的。波普尔对这种辩证法的著名批评是:^④ 从这种观点出发是不会受到任何反对的。然而第二个主张是不可否认的:在现实中有可以只根据逻辑矛盾描述的情况是一个事实。命题也是客观存在的一部分,而且只要矛盾的命题经验地存在,矛盾存在于现实之中就是显然的。人们认为,而且在一系列的社会实践之中——规范、信仰等等——能够接受命题的结构,它

① 汉斯·凯尔森在与马克斯·阿德勒的争论中清楚地认识到,在表现社会世界对抗特征时,应该走出在现实对立与矛盾之间进行惟一的选择。参照 R·拉奇纳罗对凯尔森立场的总结: *e il dibattito su democrazia e parlamentarismo negli anni Venti-Trenta*; 对凯尔森的介绍,见 *Socialismo Stato. Una ricerca sulla teoria politica del marxiam*, 巴里 1978 年,第 cxxii-cxxv 页。

② R·埃奇利:“辩证法:葛莱蒂的矛盾”,《批评》,1977 年,第 7 期。

③ J·埃尔瑟:《逻辑和社会:矛盾与可能世界》,奇切斯特 1978 年。

④ “什么是辩证法?”见《猜想与反驳》,伦敦 1969 年,第 312-335 页。

们不会导致矛盾的主张是没有理由的(在这一点上,埃奇利明显荒谬地相信,矛盾命题现实存在的可能证明了辩证法的正确性,辩证法是关于现实基本矛盾本质的学说,而不是现实中矛盾的经验存在)。

因此看来,矛盾范畴在现实中得到担保,而且它提供了说明社会对抗的基础。但是一点反思就足以使我们确信并非如此。我们都参与了大量相互矛盾的信仰体系,可是对抗没有从这些矛盾中出现。因此矛盾并不必然意味着对抗性的关系。^①

但是,假如我们已经排除了作为说明对抗性的“现实对立”和矛盾,那么看来后者的特殊性就不可能被理解。在社会学和历史文献中关于对抗的通常描述巩固了这样的印象:他们解释了使对抗成为可能的条件,但是没有同样解释对抗(描述通过像“这引起了反作用”或“在那种情况下 X 或 Z 发现自己被迫起反作用”这些表达来进行),换句话说,从解释到要求我们的常识或经验去完善文本的意义之间存在一个突然跳跃,就是说,解释被中断了。

我们试着来阐明这一中断的含义。首先,我们必须问自己,是否把对抗比作现实的对立或矛盾的不可能性并不是把它比作这些关系类型所分享的东西的不可能性。它们事实上确实有所分享,而且那是成为——第二种情形中的概念化客体之间,以及第一种情形中的现实客体之间——客观关系的事实。但是在这两种情形之中,正是客体所成为的某物,使得这个关系可以被理解,即在此两种情

^① 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意见不同于本书作者之一的早期著作中表达的观点,在那里,对抗概念被等同于矛盾(E·拉克劳:“民粹派的破裂和话语”,《电视教育》,1980年春),在重新思考我们的早期观点方面,埃米利奥·德·艾波拉在大量对话中进行的批评性评论,已经被证明是非常有用的。

形之中,我们关心的是完全的统一。在矛盾的情形之中,因为 A 完全地是 A,非 A 才是矛盾——和不可能性。在现实对立的情形之中,正因为 A 也完全是 A,它与 B 的关系才产生了客观决定的作用。但是,在对抗的情形之中,我们面对的是不同的情况:“另一个”的存在阻止我成为完整的自我,关系并没有从完全的总体中产生,而是来自于它们构成上的不可能性。另一个的存在逻辑上是可能的:它存在着,所以不是矛盾,但是它也不能被当作因果链中确实不同的因素,因为在那种情形之中,关系将通过每个存在的力量形成,而且不存在对这个存在的否定(正因为物理力量就是物理力量,另一个同样的抵销力量就不再起作用,相反,正是因为农民不可能成为农民,与把他们从土地上赶走的土地所有者的对抗才存在)。只要存在着对抗,我就不能成为一个自身完整的存在,不过与我对立的力量也同样如此:它的客观存在是我的非存在的一个象征,而且在此方式中,它充满着防止它变成完全确定的多样化含义。现实的对立是可确定、可定义事物中的一个客观关系,矛盾同样是概念之中可定义的关系,对抗构成每个被展现为局部的、不稳定客观化的客观性的限度。假如语言是一个差异系统,对抗是差异的断裂:在此意义上,它使自己处于语言的限制之内并且只能作为语言的中断存在——即作为隐喻存在。我们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社会学和历史叙事必须打断它们自身,而且求助于超越它们自身范畴的“经验”来填补它们的裂缝:因为每种语言和每个社会被构造为对刺穿它们的不可能性的压制。对抗逃避通过语言来理解的存在可能性,因为语言只作为企图固定对抗所颠覆的事物而存在。

远非客观关系的对抗是一种在其中每个客观性限制被显示出来的关系——在维特根斯坦过去常说的不可言说的意义中被显示。但是假如，正如我们已经证明的，社会只作为局部构造社会的努力而存在——即，客观的封闭差异系统——对抗，作为不可能最终缝合的证据，是对社会限制的“经验”。严格地说，对抗不是内在的，而是外在于社会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构造了对社会的限制以及后者完全构造自身的不可能性。只不过在我们秘密引入某种必须从我们的理论观点出发小心排除的假定基础上，这一说法看来才可能是荒谬的。特别是两个这样的假定会使得我们关于对抗的理论立场的主题成为荒谬的，第一个是“社会”与生活在特定领域中自然存在的代表的集合之间的同一。假如这个同一标准被接受，很明显，对抗出现在那些代表之中，并且并非外在于他们。但是从代表的经验共存中，并不必然伴随着他们之中的关系会按照客观上可理解的模式塑造而成（社会与指示物之间同一化的代价将排除掉它的任何理性上可以说明的内容）。然而，如果接受“社会”是一个可理解的客观集合，我们会引入另一个与我们的分析相矛盾的假定，即使我们把合理总体归结于被理解为经验总体的社会基本原则的特征。因为随后将不再有可能存在第一个因素被再吸收的第二个方面。在那种情形之中，对抗与所有其他事情一样，将不得不成为实证的社会内部因素，并且我们将会回到黑格尔的狡黠理性那里去。但是假如我们继续维持作为没有被完全缝合空间的、在其中所有实证性是隐喻和可颠覆的领域这一社会概念，那么就决不会把对客观立场的否定归之于可以对它进行说明的根本实证性——假定它是偶然的或具有

任何其他形式。很简单,作为否定特定秩序的对抗正是那一秩序的限度,而且不涉及到对抗两极会构成不同的——即客观的——局部情况的更广泛总体要素(可以这样来理解:使对抗成为可能的条件可以被实证地描述,但是对抗同样也是不可还原为它们的)。

我们必须从两个不同观点来考虑对社会限制的经验。一方面,作为失败的经验,假如主体通过语言被构成为与象征化秩序的局部和隐喻的结合,任何对那个秩序的怀疑必然地构成同一性危机;但是,另一方面,失败的经验不是进入不同本体论秩序和对差异进行超越的原因,只是因为不存在超越。社会的限制不可能被描述为分离两个领域的边界——因为边界的概念假定了对将必然成为客观和实证的超越了它的东西——即新的差异的理解。对社会的限制必须在作为颠覆社会、摧毁它构造完整存在的社会本身内的某些东西之中进行。社会永远不可能成为完全的社会,因为,其中的每件东西被它的限度所渗透,阻止了它把自己构造为客观现实。我们现在必须考虑这一颠覆被话语构造的方式。正如我们所见,这将需要我们去决定由同样存在的对抗所假定的形式。 126

同等和差异

这一颠覆是怎样出现的?正如我们所见,完满存在的条件在于:存在着每一个不同立场被固定为特别不可替代因素的封闭空间。因而,为了阻止封闭,颠覆这个空间的首要条件是:每一个立场的特别性应该被瓦解。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先前关于同等关系的谈论完全是中肯的。我

们来举一个例子,在被殖民国家中,统治权力的日常存在通过不同的衣着、语言、肤色、习俗等各种内容变得非常明显,由于这些内容中的每一个在它们与被殖民人民有共同区别方面是同等的,它就失去了有区别的因索的条件,并且获得了要素的不固定特征。因此,同等创造了通过寄生在第一种意义上来颠覆这种意义的第二种意义:差异在其被用于表达为其全部存在提供基础的同样事物范围内相互抵偿。问题是要确定在各种形式同等之中出现的“同样事物”的内容,假如,通过同等的链条,所有对其形式不同的客观决定已经丧失了,那么,同一性只能通过给它们全部提供基础的实际决定或者通过对外在事物的共同参照被给出来。这些可能性中首先被排除的是,共有的实际决定直接表现出来了,不需要同等关系。但是共同的外在参照不可能要成为实证的东西,因为在那种情形下,两极之间的关系可能也以直接实证的方式被构造了,而且这将使得由总体同等关系表示的全部差异被消除成为可能。例如,马克思对同等关系的分析就是这种情况。作为价值实质的劳动非物质性通过根本不同的商品等同被表现出来,然而,商品的物质性和价值的非物质性相互之间并不等同。正是因为这一点,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的区分可以按照不同的实际立场来理解。但是如果所有客体的不同特征已经变成了同等的,就不可能表示关于客体的任何实证的东西。这只能意味着,通过同等,客体所不是的某些事情得到了表达。因此,吸收了所有与被殖民者相反的殖民者的实证性规定的同等关系,并没有创造出两者之间实证性的不同立场,只是因为它瓦解了所有的实证性:殖民者在话语上被构造为反被殖民的。换句话说,同一性已经成

了纯粹否定性的了。正由于否定的特性不能以直接的方式——实证的方式——被描述,它只能通过其不同要素之间的同等被间接地描述。因此,渗透于每个同等关系中的不明确性:两个方面,要成为同等的,必须是不同的——否则,将成为简单的同一性。另一方面,同等只通过颠覆那些方面不同的特征这一行动存在。这正是先前我们所说的,偶然的東西通过阻止自身完全地构造自己颠覆了必然的东西。这种差异系统的非构成性——或偶然性——被显现在同等引入的不固定性之中。这个不确定性的根本特征,所有差别根本上的不稳定会因此在总体的同等关系之中显示自身,在其中它的所有关系的不同实证性被瓦解了。这正是对抗的形式,它因此把自身建立为对社会的限制。我们应该记住,在这种形式之中,并非那种情形,作为被定义为实证性的一极面对着否定的一极,因为一极的全部不同规定性已经通过它们否定性地参照另一极瓦解了,它们的每一个都专门地显示了它所不是的东西。

我们再次强调:要成为某种东西永远不是要成为别的东西(要成为 A 不意味着要成为 B),这一陈旧的说法不是我们正在断言的东西,因为它被置于完全由矛盾原则支配的逻辑领域:不是某种事情只是成为某种不同事情的逻辑结果。存在的实证性控制着话语总体。我们所肯定的是不同的东西:某种分散的形式,通过同等,废除了所有客体的实证性并且同样为否定性提供了真实存在。这个真实的不可能性——否定性——已经获得了存在形式。由于社会被否定性所渗透——即被对抗性所渗透——它没有获得透明性、完满在场的同一性,而且它的同一性的客观性不停地被颠覆。从这里出发,客观性和否定性之间的

不可能关系已经变成了社会的结构。然而,关系的不可能性仍然存在,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它的关系的共在必须不仅被理解为边界的客观关系,相反还必须被理解为对它们的内容的颠覆。

最后这一点是重要的:假如否定性和客观性只通过它们的相互颠覆而存在,这意味着,既不是全部同等的条件也不是那些全部不同的客观性被更完全地实现了。完全同等的条件在于话语空间应该被严格地区分为两个阵营。对抗性不承认中间物(*tertium quid*),其原因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假如我们能够分辨不同于其所对立的一些事情这一同等的链条,其关系就不可能专门以否定的方式被定义。我们过去一直想判定它在关系系统之中的特殊位置,即我们一直想赋予它新的客观性。差异的颠覆逻辑一直要在此发现一个限度。但是就像差异的逻辑从来没有构成完全被缝合的空间一样,同等的逻辑也没有实现这一点。通过同等压缩的社会代表立场不同特征的瓦解,决不是完全的。如果社会不是完全可能的,它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使我们可以总结出下面的结论:如果社会由于不能把自己构成为客观领域,它对于自身绝非是透明的,那么对抗也不是完全透明的,因为它没有完全瓦解社会的客观性。

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继续从同等和差异对立的逻辑观点来考虑政治空间的结构,让我们考虑极端情况的例子,在其中这个或另一个占有优势。一个同等逻辑的特别例子可以在千禧年运动的例子中发现,在那里,通过并列的同等体系,世界被区分为两个阵营:代表这一运动特性的是农业文化,而城市文化是罪恶的肉身化。第二个是第

一个否定性的反面。一个最大化的分离被达到了：除了那些与另一个系统要素对立的那些要素，同等的体系之中没有一个要素进入到关系中。存在着不是一个而是两个社会，而且，当千禧年的造反发生时，对城市的攻击是狂热的、彻底的和不加选择的：那里不存在能够在同等的链条内建立差异的话语，在这些链条之中，它的每一个要素都象征着罪恶（惟一的选择是向另一个区域大迁移，以便建立起上帝之城，完全与现实世界的腐败绝缘）。129

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相反的一个例子：19世纪迪斯雷利（英国著名政治家和小说家，1804—1888，中译者注）的政治学。作为一个小说家他从两种国民的概念出发，即完全把社会区分为贫富两极。对此我们必须加上对欧洲政治空间在“古代专制”与“人民”之间同样的彻底划分（19世纪的头一半，在工业革命与民主革命结合起来的作用下，是同等链条最初的时代）。这是迪斯雷利要改变的，而且他的第一个目标是要克服对社会空间并列的区分——即，构造社会的不可能性，它的规则是清楚的：“一种国民”。对于此，有必要打破从共和主义伸展到全部社会和多样化政治要求的虚构大众革命、主观性的同等体系。这个断裂的方法，即不同要求的合并，把它们与大众链条中的同等链条隔离开，而且使它们转变为系统内的客观差异——即把它们转变为“实证的”而且由此把对抗的边界置换为社会的边缘。这一纯粹差异空间的构造要成为发展趋向，后来被财富国家扩展并且肯定。这是实证主义幻象的因素，全部社会被合并到可理解的和社会预定的框架之中。

因此我们注意到，同等的逻辑是政治空间单一化的逻辑，而差异的逻辑是它扩充和复杂性增长的逻辑。如果用

一个语言学的例子比较的话,我们就可以说差异的逻辑倾向于去展开语言中的语言组合轴、可以进入到组合关系以及与大量位置彼此连贯的关系,而同等逻辑扩展了替代这一极——即要素可以被另一个替代——因此,被还原的大量位置能被结合起来。(关于语言结构中隐喻和换喻的两轴,请参见张祖建译的雅各布逊“隐喻和换喻的两极”,《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伍蠡甫、胡经之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下卷,第430页。——中译者注)

- 130 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在谈论对抗,我们一直让它保持在单独状态中,以便使我们的意见更加简明些。但是很清楚的是,对抗并不必然出现在单独一点上:差异体系之中的任何位置,只要被否定,就可能变成对抗的场所。因此,社会之中存在大量可能的对立,它们中的许多都是相互对立的。重要的问题在于同等的链条会按照对抗被包含这一点而彻底改变,而且它们可能以矛盾的方式起作用并且渗透于主体同一性本身之中。这导致了下面的结论:越是不稳定的社会关系,就越不可能成为明确的差异体系,而且对抗点越会增殖。这一增殖会使任何中心性的构成更加困难,而且因此建立起不统一的同等链条(即近似于葛兰西以“组织危机”描述的情况)。

由此看来,在分析作为对抗基础的政治空间时,我们的问题可以被还原到确定破裂点和它们的可能连接方式。但是在此我们进入了一个危险领域,在其中,我们论证中的轻微置换就会带来根本错误的结论。因此我们要从会给人印象深刻的描述出发,然后尝试着确定那个被描述的景象正确性的条件。发达工业社会与资本主义世界的边缘之间重要的不同特征将呈现出来:在前者之中,对抗点

的增殖允许民主斗争的增殖,但是这些斗争由于具有多样性,并没有倾向于构成“人民”,即进入到与另一个相互同等的关系之中并且把政治空间区分为两个对抗领域。相反,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帝国主义的剥削、极其残忍和中心化的统治形式从一开始就使大众的斗争具有一个中心、惟一明确规定的敌人。这里划分成两个领域的政治空间从开始时就出现了,但是民主斗争的多样性更多地是被减少了。我们要使用大众主体立场这一术语来指涉划分成两大阵营的政治空间基础上构造的立场,用民主的主体立场来指没有以那种方式划分社会的明确划定的对抗场所。

这里描述的差别使我们面对着一个严重困难,因为, 131
假如民主斗争没有把政治空间区分为两个阵营,即两个并列的同等序列,伴随的就是民主的对抗在与其他要素关系的体系之中具有一个明确的位置,那个实证的关系体系在它们之中被建立,而且减少了隶属于对抗的否定性负荷。这不过是主张:民主斗争——女权主义、反种族主义、同性恋运动等等——是次要的斗争,而经典意义上“夺取权力”的斗争是惟一真正激进的斗争。因为它提出了把政治空间区分为两个阵营。不过,困难产生于这一事实:在我们的分析中一直没有给出“政治空间”这个概念,所以这个概念一直被暗中等同于经验上特定的社会形态,当然这种同一化是不合法的。任何民主斗争都出现在立场的集合之中,出现在由实践多样性所构成的相对缝合的政治空间中,这些实践的多样性没有耗尽作为它们一部分的代表的经验现实和它们所涉及到的。由于构造允许把政治空间区分为两个阵营的总体,因而需要对某些领域进行界定,

相对封闭的空间对于话语对抗的构造是必需的。在此意义上,社会运动的自发性就超过了某种斗争没有干预地发展这一需要:它是同样要使对抗出现的需要。女权主义斗争的政治空间在造成不同形式妇女附属地位的实践和话语集合内被构成。反种族主义的斗争则在构成种族歧视实践的多元决定的集合之中被构成。但是在它们每个相对自主化的空间中,对抗把它们区分为两个阵营。这解释了这样的事实:当社会斗争没有被引导来反对在它们自己的空间中被构成的对象,而是反对简单的经验标志时——例如,作为生物学标志的男人或白人——他们就会发现自己处于困难之中,因为那样的斗争不顾民主对抗性出现于其中的其他政治空间特殊性,例如,轻信把作为生物学现实的男人表现为敌人的话语。当有必要发展像争取表达自由这样的斗争,或者反对经济垄断这样的对抗时,两者都影响了男人和女人,那么这种话语会发生什么影响呢?至于对另一个来说是自发的那些空间的领域,部分上是由话语形式构成的,这些话语形式已经使各种从属形式制度化了,而且部分上是斗争本身的结果。

一旦我们构造了可以解释民主斗争激进对抗特征的理论领域,剩下的就是“大众”阵营的特殊性吗?“政治空间”与作为经验标志的“社会”之间存在的不一致难道没有废除“大众”与“民主”之间惟一的区分标准吗?答案是大众政治空间出现于这种情况之中:在那里通过民主同等的链条,政治的逻辑趋向于填补政治空间与以经验为标志的社会之间的裂缝。以此种方式来理解,大众的斗争只出现在统治集团与其余团体之间极端外在性的关系这一情形之中。在我们前面提到的千禧年说那种情形中,这一点是

明显的。在农业共同体和占优势的城市社会之间实际上不存在共同的要素,而且在此意义上,所有城市文化的特征可以成为反共同体的象征。如果转向西欧大众空间构造和扩张的周期,就会注意到所有那些情况与权力的外在化或内在化现象一直是一致的。在法国,人民爱国精神的开端出现在百年战争期间,即在像外国权力那样外在的东西导致的政治空间划分期间。在西欧,作为历史代表的“人民”出现的首要因素之一,在于通过像圣女贞德那样平民人物的行动,民族的空间才象征性地构成。在古代专制和法国革命的情形中,大众的界线已经变成了固有的边界,而且它的条件是君权、贵族阶层相对于其他人民的分离和寄生。但是通过我们已经指出的过程,在19世纪以来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中,民主立场的多样化和不平衡发展已经冲淡了它们围绕着大众一极简单和自发的发展。部分上由于他们的非常成功,民主斗争越来越少地倾向于按照“大众斗争”被统一起来。成熟资本主义中的政治斗争条件正在日渐远离19世纪清楚划分“政治界限”的模式,而且倾向于采取我们下一章中所要分析的新模式。在最后一次被需要的参照结构中,“边界效应”的产生——它是渗透到对抗之中的否定性扩展条件——因此不再被建立在明显的和特定的分离之上。这个结构的产生,将必然对抗性地面对另一个的同一性的结构,现在变成了首要的政治问题。这极大地拓宽了连接实践的领域,而且把任何边界转变成根本不明确和不稳定的、属于不断置换的东西。由于达到了这一点,我们具有了所有必要的理论要素来确定领导权概念的特性。

领导权

现在必须来考虑我们不同的理论范畴是怎样联系到“领导权”概念形成之上的。领导权出现的一般领域是连接实践的领域,即“要素”具体化为“因素”的地方。在关系同一性的封闭体系内,每一个因素的意义是绝对确定的,不存在任何领导权实践的地方,一个排除了任何漂浮能指的完全成功的差异体系,不可能进行任何连接,在这样的体系内重复的原则会控制每一个实践,而且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领导权化。正是因为领导权假定了社会的不完整和开放性特征,才可能只在连接实践控制的领域进行领导权实践。

然而,这立即暴露出问题:谁是进行连接的主体?我们已经看到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从列宁到葛兰西,一直主张——带有所有我们先前分析到的差别和区分——领导权力量的根本核心由基本的阶级构成。领导与被领导力量之间的差别作为本体论上所有结构层面上的差别被提出来。领导权关系是以先于它们的形态学范畴为基础的结构关系。但是,很清楚,这不能作为我们的答案,因为正是那个层面上的差别是我们先前所有的分析力图要瓦解的。实际上,我们再一次面对着内
134 在性/外在性的二难选择,而且如果我们把它作为独一无二的来接受,我们也面对着两个同样根本的解答,领导权主体,作为任何连接实践的主体,必须部分地外在于它所连接的东西——否则,根本不会有连接;然而,另一方面,像两个不同本体论层面之间存在的那样,一个外在性不可

能得到理解。因此,看来那个答案是要再次引入我们在话语与一般话语领域之间所做的区别:在那种情形之中,领导权力量和被领导要素的集合将在同样的层面上——即一般话语领域——构成它们自身,而外在性会是那与不同的话语形式一致的。无疑就是如此,但是必须进一步强调的是,这个外在性不可能与两个被完全构造的话语形式一致。因为,赋予话语形式以特征的东西是分散中的规则性,而且假如外在性是两个形式之间的规则性特征,它会成为新的差异,并且两个形式严格说来不会是相互外在的(而且由此,连接的可能性会再一次消失),所以,如果连接实践假定的外在性被置于一般话语领域,它不可能与两个完全构造的差异的体系一致,它必须因此成为存在于被安置在某种话语形式以及没有明确话语连接的“要素”之内的主体立场之间的外在性。正是这一不明确性使得连接成为可能,这种可能的实践构成了在有组织的差异体系之中,部分地固定社会意义的关节点。

我们现在必须在一般话语实践领域之内考虑领导权实践的特殊性,让我们从不具有领导权连接特征的两种情况出发。在第一种情况中,我们可以提及遵从效率和合理性的官僚机构的功能的集合和重组。这里存在着任何连接实践的核心要素:组织起来的差异体系的结构是从崩溃的和分散的基本要素开始的。然而在此,我们还不能说到领导权,原因在于,要谈论领导权,连接的因素是不充分的。还有必要的是,连接会通过面对对抗性的连接实践而形成——换句话说,领导权会出现在交错对抗的领域,而且因此意味着同等现象和边界效应。但是,相反,不是每一个对抗都意味着领导权实践,例如,在千禧年说的情形

之中,我们有最纯粹形式的对抗,而且由于没有漂浮能指的连接而不存在着领导权:两种社会之间的距离是直接给定的并且从开始就是所需要的,而且它并不意味着连接构造。同等的链条并没有构造共产主义的空间,而是在预定的空间中发挥作用。因此,领导权连接的两个条件是对抗力量的存在和把它们分离的不稳定边界。只有漂浮要素的广泛领域以及把它们连接成对立阵营的可能性的存在——它意味着后者的不断重新定义——构成允许我们把实践定义为领导权的领域。没有同等和边界,就不可能严格地说到领导权。

在此很清楚的是我们可以怎样恢复葛兰西分析中的基本概念,尽管有必要在引导我们超越葛兰西的方向上激化它们。关系系统的普遍弱化限定了特定社会或政治空间,结果存在着漂浮能指增殖发生于其中的事态,按照葛兰西的分析,我们称之为组织危机的事态。它不是出现在单独一点上,而是事实的多元决定结果,而且它不仅在对抗的增殖中显示自身,还在社会同一性的普遍危机之中显现出来。通过关节点的形成和有倾向性的关系同一性构造得到的相对统一的社会和政治空间,是葛兰西称之为历史集团的东西——不是任何先验历史形式的统一,而是分散中的规则性——与我们的话语形态这个概念相一致。只要我们从构造历史集团对抗领域的观点来考虑历史集团,我们就会称之为领导权形态。

最后,因为领导权形态意味着边界现象,阵地战这个概念显示了它的全部意义。通过这一概念,葛兰西带来了两个重要的理论影响,第一个是要肯定社会的封闭是不可能的:因为边界对于社会是内在的,在可理解的社会形式

下,不可能包括作为经验参照的社会形态。每个“社会”通过区分自身来构造它自己的合理性和可理解性形式,即通过在自身之外排除颠覆它的过剩的意义来构造。但是另一方面,只要在“阵地战”中边界随着功能而变化,每个对抗参与者的同一性也跟着变化,而且因此不可能在它们之中发现我们通过被缝合的整体没有找到的最后停泊点。前面我们说过阵地战这个概念导致了战争的非军事化,实际上还有更多的东西:它把阻止它在任何透明所指中被固定的彻底不明确性引入了社会之中。这是阵地战显示其限度所在的地方。阵地战假定了社会空间划分为两个阵营,而且把领导权连接描述为分离它们的边界的迁移性逻辑。然而,显然的是这一假定是不合法的,两个阵营的经验在某种意义上是领导权连接的作用,而不是它的先验条件——因为,假如它是这样的条件,领导权连接在其中运作的领域本身将不会成为连接的结果。葛兰西的阵地战假定了政治空间区分的类型,我们先前曾经把它描述成大众的同一性。它的发展超过了19世纪的“人民”这一概念,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之中:对于葛兰西来说,那样的大众同一性不再是简单给定的,而是必须要构造领导权连接的逻辑。然而,根据旧的概念,还存在着结构总是在二分的政治空间内扩张边界这个基础上运作观念。这是葛兰西的观点变得不可接受的地方,正如我们先前指出的,这些政治空间的增殖以及它们连接的复杂性和困难,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核心特征。我们将因此保留来自葛兰西的连接逻辑和边界作用的政治中心性,不过,我们会除去对于那些现象形成是必然结构这样的单一政治空间的假定。因此我们会谈论意味着政治空间多样性的民主斗争,

以及在其中某些话语倾向于把单一政治空间划分为两个对立领域的多样性大众斗争。但是很清楚的是，基础概念是“民主斗争”这个概念，而且大众斗争只是来自于民主斗争中同等作用多样性的特殊局面。

上述所说中很清楚的是，我们已经离开了葛兰西思想的两个关键方面：(1)他所坚决主张的领导权主体必然在基本阶级的平面上被构造；(2)他所假定的，除了由组织危机构造的暂停时间外，每一个社会形态围绕着单一的领导权中心建构它自己。正如先前我们所指出的，这两方面是残存于葛兰西思想之中的最后两个本质主义因素。但是作为放弃它们的结果，我们现在必须面对并非起因于葛兰西的两个连续的系列问题。

第一个涉及到层面的分离，即像任何连接关系一样的、领导权所需要的外在要素。正如我们所见，这并没有向葛兰西提出任何问题，因为，在他的分析之中，“集体意志”的最终阶级核心不是领导权连接的结果。但是，一旦作为最终核心的本体论特权已经被瓦解，事情会是怎样呢？假如在领导权取得成功的情形中连接实践已经成功地构造了差异和关系同一性的体系，领导权力量的外在特征也没有消失，难道它不会变成历史集团中新的差异吗？答案无疑必须是肯定的。差异体系已经被完全焊接在一起的情况意味着领导权政治形式的结束，在这种情况下会存在着从属或权力关系，但是严格说没有领导权关系。因为，随着层面分离的消失以及外在性因素的消失，连接实践的领域也会消失。领导权的政治维度只作为社会增殖开放和非缝合的特征扩展。在中世纪的农业共同体之中，向不同连接开放的区域是最小化的，而且因此不存在领导

权连接的形式：当共同体发现自己受到威胁时，没有从封闭差异体系内的重复性活动到正面的绝对同等的转变。这就是为什么在现代时期开始阶段之中，当不同社会领域的再生产发生在不断需要建构新的差异体系这一持续变化的条件之中时，只有领导权的政治形式占优势的原因。因此，连接实践的领域被大大地扩展了，从而对差异完全固定的可能性减少了。每一个社会同一性变成了多元连接实践的汇合点，在它们之中存在许多对抗。在这些情况下，完全填补连接者和被连接者之间的裂缝不可能达到彻底的内在化。但重要的是要强调：连接力量的同一性继续保持分离和不变都是不可能的，两者都属于持续颠覆和重新定义的过程。这就是甚至同等体系也没有免于被转变为新差异的危险那种情况。人们知道许多团体与体系的正面对立对于它可能不再是外在的，而且只是变成了一个矛盾，而不是那个系统中的内在立场——即另一个差异。只要对抗的力量接受那个作为其否定的基本形态的连接体系，领导权形态也包含与它对立的東西，但是否定的立场是通过形式本身的内在要素被定义的，所以，政治领导权形态消失条件的理论规定也解释了现代时期它持续扩张的原因。

138

第二个问题涉及到领导权中心的单一性。一旦我们拒绝把领导权铭刻在社会中心和社会本质的本体论层面，就明显不能继续坚持领导权关节点的单一性这种观念。很简单，领导权是政治的关系形式，要是像有些人所期待的那样的话，也是政治形式，但是在社会地形学内并没有决定性的地位。在特定社会形态中，可能存在着多样化的领导权关节点。显然，它们中的一些可能是高度多元决定

的,它们可能构成大量社会关系的浓缩点,而且因此是总体化作用多样性的焦点,但是只要社会是不可还原于任何基本统一原则的无限物,社会惟一中心的观念就根本没有意义。一旦领导权概念和社会特有的多元性的地位被重新限制在这些条件之中,我们就必须对自己询问那些存在于它们中的关系形式。这个不可还原的社会多样性一直经常被理解为自发性领域和斗争形式,这需要我们简短地分析一些关系到“自主性”概念的问题。近年来一直存在着关于“国家相对自主性”的重要讨论,^①但是大部分是以引向死胡同方式被提出来的。一般来说,那些解释“国家相对自主性”的尝试是在接受了被缝合的社会这一假定的框架中进行的——例如,通过经济的最后决定——而且相对自主性问题——国家的或任何实体的——变成了不可解决的。因为,任何一个社会的基本决定构造的机构框架不仅说明了自主性的限度,也说明了自主性实体的本质——在那种情形之中,实体是另一种结构决定的体系,而且“自主性”概念是多余的,要不然自主的实体就不是由系统决定的,在那种情形中,就必须解释它是在何处被构造的,并且被缝合的社会的前提也必须被放弃。正是要使这一前提与同它不一致的自主概念结合起来的愿望,一直妨碍着最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讨论——特别是波朗查斯的著作。然而,假如我们与社会最终的封闭这一假设断绝关系,就有必要从不涉及任何最终单一基础的政治和社会多样性出发。多样性不是要被解释的现象,而是分析的起点。但是,正如我们所见,如果这些空间的每一个同

^① 关于当代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研究国家相对自主问题的各种方式,见 B·雅索普:《资本主义国家》,纽约和伦敦 1982 年。

一性总是不稳定的,不可能只肯定自主性与分散之间的同等性。因此,全部自主性或全部从属性都不是合理的答案。这清楚地指明,在稳定的差异体系中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自主性和从属性——以及他们的不同相对性程度——都是那种只在连接实践领域获得了它们意义的概念,只要这些活动在政治领域中通过对抗交叉往来。连接实践不仅发生在特定社会和政治空间之中,还发生在它们之间。总的说来,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暂时假定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统一体来谈论——建立在只能是连接实践结果的政治空间构造之上。而且我们可以谈论类似于统一的程度、存在于不同分支和国家机构中的自主性这些情况,即某些领域的自主性并不是结构的必然作用,而是构造了自主性的连接实践的结果。远非与领导权一致的自主性是领导权的构造形式。

近年来对于自主性概念的其他重要运用可以谈论的类似事情是:被联系到新社会运动发展所需要的多元论上的自主性。这里我们处于同样的情况之中。假如变成自主的主体同一性或社会力量曾经被一次性地构造,问题就会仅仅以自主性形式被提出来。但是如果这些同一性依赖某种社会和政治的存在条件,自主性本身就只能以更广泛的领导权斗争形式被辩护和扩展,例如,女权主义或生态政治的主题在某些方面与任何其他的社会同一性、漂浮的能指是一样的,而且它们完全得到保证,构成它们出现的分散条件的领域不可能被颠覆是危险的幻象。会引起对某种运动自主性威胁的领导权问题因此是一个严重问题。严格地说,这个不相容性只在假如社会运动是单一性的、相互间没有联系的情况下才存在,但是假如每个运动

140

的同一性永远不能被实际地获得,那么对于外在于它所发生的不可能是无关紧要的。在某种情况下,英国白人工人的阶级政治主观性是由种族主义者和反种族主义者的态度多元决定的,这一点对于移民工人的斗争显然是重要的。这会对工会运动的某些活动产生影响,反过来这些活动会在大量的国家政策方面形成影响并且最后会反过来影响移民工人本身的政治同一性。这里存在着明确的领导权斗争,只要工会中白人工人的战斗性与种族歧视或反种族歧视之间的连接没有从一开始就得到限定。但是这一由反种族主义运动采取的斗争形式会部分地经历某种活动和组织形式的自发性,部分地经历与其他力量的联盟体系和不同运动内容同等体系的构造。因为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比多元决定稳定形式的构造更能够巩固反种族主义斗争,在这些构造中那些像反种族歧视、反男性至上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并不必然倾向于集中起来。自主性再一次没有与领导权对立起来,而成为更广泛领导权活动的内在要素(很明显,这一活动并不必然通过“党派”构成,也不通过制度和任何形式的先验安排构成)。

假如领导权是典型的政治关系,而不是地形学概念,很清楚的是它也不可能从一个被赋予特权的点出发被理解为影响的扩散。在此意义上,我们可能说,领导权基本上是换喻的:它的实现总是形成于来自置换活动的意义过剩(例如,工会或宗教组织可以在社会中具有超出归于它们的传统实践活动的组织作用,而且被对立力量所反对和抵制)。这一错位的因素对于任何领导权实践都是本质性的:我们已经从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出现的这一概念中看到它为了领导权任务采取了阶级同一性的外在性形式,而且

我们的结论是不存在被完全获得的社会同一性——这是个事实,它给予连接性领导权要素以充分的中心性标准。这个中心性的条件因此在于内在与外在之间、偶然与必然之间明确分界线的崩溃。但是,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这样的结论:没有领导权可以成为社会总体性的原因并且构成它的中心,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新的缝合一直会被产生出来,而且正是领导权概念会消除它自身。社会的开放性因此成了每个领导权实践的前提。既然如此,这必然会导致第二个结论:领导权形态正如我们所理解的,不可能涉及到单个社会力量的特殊逻辑。每个历史集团——或者领导权形态——是通过分散中的规则性被构造的,而且这个分散包括每个不同因素的增殖:部分地限定了关系同一性的差异体系;颠覆了后者,但是只要对抗本身的空间变成规则性的并且以此方式构成新的差异,就可以进化式地恢复同等链条、集中了权力和抵抗权力的不同形式的多元决定形式,等等。要点在于,通过同等和差异之间对立的逻辑,每个权利形式是以实际的方式被构造的,而且对于社会是内在的,权力从来不是基本的。权力问题因此不能以构成领导权形态中心的阶级或统治阶层这一形式被提出来,假如那样的话,通过定义,那样的中心永远会躲避我们。但是提出社会中作为选择性的多元论或权利的完全分散同样是错误的,因为这会导致盲目地分析存在的关节点和每个具体社会形态中存在的部分集中性权利。这是许多经典概念——“中心”、“权力”、“自主性”可以被再次引入的地方,前提是它们的情况被重新定义:它们全部都是同样需要在明确关联和关系的环境中获得它们意义的偶然性社会逻辑,在这些环境中,它们会被其他的——通

142 常是矛盾的——逻辑所限制，但是，在定义一个不会反过来被颠覆的空间或结构因素的意义上，它们中没有一个绝对有效。因此在那些概念的绝对化基础上不可能得到社会理论。假如社会没有通过单一的一元实证逻辑被缝合，我们对它的理解就不能给出那种逻辑。

在我们得出结论之前还有重要的一点。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谈到作为经验对象的“社会形态”和作为被连接起来的差异整体的“领导权形态”，同样的词——“形态”——在完全不同的意义上被使用，而且我们必须力求排除产生的不明确性。更一般形式的问题可以被总结如下：如果经验上特定代表的集合（在社会形态的情况下）或者话语因素的集合（在领导权形态的情况下）被包含在形态概念暗示的总体之中，那是因为通过那个总体不可能就外在于后者的事情来区别它们。由此，正是在它自己的限制基础上，形态被塑造为总体。假如我们在领导权形态的情况下提出这些限制的构造问题，我们就会必然地区别两个层面：一个涉及到每个“形态”可能性的抽象条件，另一个涉及到领导权逻辑引入到它之中的特殊差异。我们从作为相对稳定差异体系的形态内部空间出发，很清楚的是，差异的逻辑对于构造限度是不充分的，因为，假如它完全是占优势的，超出它的东西不可能只是另外的差异和那些会把它们改变为部分形态本身的规则性。假如我们继续停留在差异领域，我们就仍然存在于使我们不能思考任何边界的无限之物的领域之中，并且由此瓦解了“形态”概念，即限度只存在于差异的系统集合可以被超出它们的总体所取代这一情况下，而且，它只是通过取代构成自身为形态的总体才存在的。如果从已经说到的来看，很清楚的

是那个超出不能由实际的事物构成——在新的差异之中——那么惟一的可能性是它将由否定的东西构成。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同等的逻辑把否定性引入社会领域,这意味着形态只通过把限制改变为边界,通过把超出限制的东西构成为它所不是的东西来构造同等的链条表示它自身(即同样构造了它自身)。正是仅仅通过否定性、区分和对抗,形态把自己构造为总体化的地平线。

143

然而,同等的逻辑只是每个形态存在最抽象和普遍的条件。为了能够谈论领导权形态,我们必须引入先前分析所提供的另一个条件,即社会和政治空间的连续规定和那些构成社会区分的限制持续的置换过程,它们是当代社会所特有的。正是在这些条件之下,被塑造的总体通过同等的逻辑获得了领导权特征。但是这似乎意味着,在这个不稳定趋向于使社会边界不稳定的范围内,形态范畴本身受到了威胁。而且这正是所出现的:假如每个边界消失了,并不意味着形态更难以识别,因为总体不是事实,而是构造。当有一个同等的构造链被打断时,整体不是隐藏自己,而是瓦解掉了。

由此而来的是“社会形态”这一术语,当被用于指定一个对象时,是没有意义的。社会代表作为对象没有构造任何形态,例如,假定“社会形态”这一术语要以明显核心化的方式指定生活在特定领域之中的代表,那个领域的限度问题立即就会被提出来,而且这里有必要规定政治的边界——即在不同于简单涉及到的代表实体这一层面上。因此存在两种选择:是政治的限制被认为是外在的简单事实——在这一情形之中像“法国的社会形态”或“英国的社会形态”难以比“法国”或“英国”更多地指明什么,而且术语

“形态”是多余的，要不然，代表就被重新建成为构成他们的形式——并且在此情形之中没有为什么这些会与国家边界一致的理由，某些连接实践会使它们同样与形态的限制相一致。但是无论在那种情形之中，这都是建立在塑造特定空间并且同时活动于其中的多元领导权连接上的一个开放过程。

我们在这一章中的几个论述要点，一直要说明的是为否定性提供了重要基本特征的社会开放性和非决定性，并且我们还假定了连接和领导权实践的存在。现在我们必须再次回到前两章中的政治争论线索上，并且说明社会的非决定性和连接的逻辑，怎样允许对以新的术语提出的领导权与民主之间的关系进行提问。

4

领导权与激进民主

1937年11月,流亡纽约的阿蒂尔·罗森贝格对于法国大革命^①后的欧洲历史的沉思已接近尾声。这种沉思结束了他战斗的知识分子生涯,他的基本沉思主题是社会主义与民主没有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二者之间建立有机统一的努力已付诸流水。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双重失败,对他而言,是一个逐渐疏离的过程。“民主”,最初被设想为大众的行动,是历史对抗中的主角,支配着1789至1848年之间的欧洲生活。这些“人民(people)”[在平民(plebs)而非在公民(populus)的意义上使用该词]是几乎没有被组织起来的分化群众,正是他们左右了1789年和1848年的街垒战、英国的宪章运动、意大利的马志尼和加里波第运动。后来,19世纪50年代长期的倒退造成了严重断裂。当倒退结束时,大众的主张开始恢复,主角已经发生了变化,工会和新生的社会民主党最先出现于德国和英国,然后出现于欧洲其他地方。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中,工会和社会民主党不断巩固了自己。

^① A·罗森贝格: *Democrazia e socialismo, Storia politica degli ultimi centocinquanti anni*, (1879-1937年), 巴里1971年。

就其决定性的因素而言,民主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断裂经常被说成是向着更高政治合理性的转变。19世纪上半期,“民主”的不确定性及其在社会经济基础中缺乏根基,使其本质上易受攻击和变换不定,在反抗既定社会秩序的斗争中,无法使自己稳定发展和不受损害。只有“人民”的这种不定性土崩瓦解,并代之以工人阶级稳固的社会基础,民众运动才能走向成熟,使其能够进行反抗统治阶级的长期斗争。然而,这种虚构的转变走上社会成熟的更高阶段,产生了工业化;同时,也走向更高水平的政治控制,在这种控制中,阶级政治活动的合理性和稳固性,将取代“民众”的无政府主义。对罗森贝格来说,这似乎是一个悲惨的玩笑。在他著书立说的时候,西班牙爆发了内战,希特勒吞并了奥地利,墨索里尼正在入侵埃塞俄比亚。罗森贝格认为,这种不同阶级间的密切合作,导致了欧洲工人运动的历史罪恶。工人不能成为历史的主体,这是社会民主的根本缺陷,也是他解开1860年后曲折历史过程之谜的“阿里阿德涅之线”。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复杂化和制度化,人民当家作主的建立不仅没有丝毫地简单易行,反而更加困难。诚如葛兰西所言,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市民社会的掩体和堡垒”,使得那些能够“在人民中”统一起来的因素重新分化组合。社会复杂性不断增长的过程,在1789至1848年间,已经十分明显。

1789年,民主的任务就是引导没有土地的农民阶级与拥有土地的贵族阶级进行斗争,引导贫穷市民与资本所有者进行斗争。在那个时候,这一任务要比1848年时更容易进行。事实上,在这两个时期之间,尽管大多数工业无产阶级仍然从事小规模工业劳动,但无产阶级已经变得非常

重要,以致使无产阶级与资本家对抗中的所有政治性问题暴露无遗……这一点要求民主党具备一种特殊的战略技巧,以达到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联合。如果民主党忽视农民所有者对于大多数小佃农和劳动者所起的作用,那它就需要既非常实际又非常复杂的策略。因此,在罗伯斯庇尔之后的50年中,社会民主的任务变得越来越困难,而同时民主党人又不能理智地解决那些问题。^①

当然,建立反制度大众一极只是在1848年之后才逐渐变得困难起来。事实上,罗森贝格试图使自己适应新的领域,他自己并未完全意识到一种激烈的转变支配着他:作为最初不可改变事实的社会分化为两个对立阵营的政治形式的衰退,先于一切领导权的建立。^② 向新的形势变化,是政治空间根本上不稳定的特点,各种斗争力量的同一性总是服从于经常变化的形势,并要求不断地重新定义的过程。换言之,罗森贝格用一种非凡洞见而又犹疑不定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政治领导权形式的普遍化过程——一旦连接实践决定了社会分化的原则,这一过程自身就作为社会团体同一性出现的条件强加于自身——同时也向我们表明,“阶级斗争”是自发的、先验的,这条原理是毫无价值的。

严格说来,人民与旧制度的对立是两种对抗的社会形式各自以清晰和经验地划定阵线的方式表现自身的最后时刻。从那时起,内部和外部的界限划分,以及由此形成

^① A·罗森贝格: *Democrazia e socialismo. Storia politica degli ultimi centocinquanti anni*, (1879~1937年), 巴黎1971年,第119页。

^② 严格说来,这一断言当然是令人不快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力量组合也要求领导权的作用。这种组合意味着一些联盟的变化,可以用旺代时期作为参照。只有从历史视角,并与领导权话语(成为后来欧洲历史的特性)的复杂性相比较,才能说明法国大革命过程中分离与对立的基本结构相对的稳定性。

的旗鼓相当的对立,逐渐变得脆弱和模糊,而这种对立的
重建,则开始成为政治生活的决定性问题。这就是说,从
那时起,没有领导权,就没有政治。这种状况使我们能够
理解马克思的介入学说的特征:他的反思是从人民与旧制
度之间的二元政治空间分化耗尽了自身生产能力的时刻
开始的,这种分化无论如何都不能再产生一种政治远见来
体验工业社会所特有复杂性和多元性。因此,马克思试图
根据新的原理——阶级对立——来思考社会分化的首要
事实。然而,新的原理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严重缺陷,这种
缺陷来源于以下这个事实:阶级对立不能使社会总体分化
为两个相互对立的阵营,不能使自身自行成为政治领域分
化对立的界限。正是由于这一原因,阶级斗争作为政治分
化的基本原理总是需要一种补充性假设加以证实。这是一
种把其自身的适用性归之于将来的社会历史学假说——
151 社会结构的简化导致现实政治斗争与作为生产关系
层面上的代表的阶级之间的斗争相互一致,也导致了关于
代表的意识——把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的阶级意识——
的假设。总之,重要的事情在于,马克思主义所引入到社会
分化政治原则中的变化,保留了雅各宾主义的本质部分,即
关于根本分裂因素和党派政治得以构成的独特领域的假
设。只有这个时间维度已经发生了变化,作为社会和政治
立即被分成两个阵营的划分被委托给未来,同时提供给我
们一套关于会产生这个划分的过程的社会学假说。

在这一章里,我们将要辩护的主题在于:正是雅各宾
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关于激进民主的政治学说之间的连续
性因素应该被激进民主的计划置于怀疑之中。拒绝被赋

予特权的分裂点和把斗争汇合到一个被统一的政治空间,相反,接受社会的多元性和非决定性,对我们来说,是两个基本之点。在此基础之上,一种新的政治学说才可建立。彻底的自由主义和它比传统左派更没有限定地渴望实现它的目标,也是我们要接受的。这就需要首先描述他们得以出现的历史环境,我们将称这一环境为“民主革命”领域。

民主革命

我们已经提出的尚有疑问的这一理论,不仅排斥把社会斗争汇聚到被赋予特权的先验代表,而且还涉及到任何总的原则或人类学自然这一下层基础,它们同时把各种不同主体的性质统一在一起,用一种恒久不变的特性反对从属的各种不同形式。因此,在反对权力的不同斗争中,不存在任何恒常不变或天生如此的东西,在每一种情况下,都必须对事物出现的原因以及它们可能采取的调整做出解释。反对从属斗争,不可能是从属自身形势发展的结果。虽然我们能够像福柯那样断言,任何存在权力的地方都存在着抵抗,但是必须认识到,抵抗形式可能是极其多样化的。只有在某些场合下,这些抵抗形式才真正呈现出政治的特性,使斗争朝着结束从属关系的方向发展。如果说人类整个历史都存在着多种形式的女性对男性控制的反抗,那么,只是在某些条件下、以一些特别的形式才能出现要求平等(首先是法律面前平等,然后才是其他领域的平等)的女权运动。显而易见,当我们这里谈论这些斗争的“政治”特性时,我们不是在政党和国家所要求的那种狭

152

窄的意义上来谈论的。我们所指的是一种行动方式,其目的是在从属关系中确立一个主体的那种社会关系的转变。例如,当代某些女权主义实践的目标,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通过政党和国家来改变女性和男性之间的关系。当然,我们并不试图否认,某些实践需要政治——在严格意义上的——方面的干预。我们希望指出的是,作为一种创造实践,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和变革不能限定在固定的社会水平上,因为,政治问题就是社会制度问题,也就是在交错对抗的领域中规定和连接社会关系的问题。

我们的中心问题是确定指向反对不平等斗争和挑战从属关系的集体行动得以出现的话语条件。也可以说,我们的任务就是指明从属关系转变为支配关系的条件,以使从属关系构成对抗的场所。在这里,我们进入了一个通过众多术语变化建立起来的领域,这一变化领域已经通过使“从属的”、“压迫的”和“支配的”这些术语成为同义词被终结。十分显然,使这种同义化成为可能的是“人的天性”和被统一主体的假定:如果我们能够先验地确定主体的本质,那么,每一种否定它的从属关系就自动转变成压制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拒绝本质主义的这个观察视角,那么,我们就必须把“从属”从“压制”中分离出来,并解释使从属变为压制的那些精确条件。我们应该通过从属关系理解:在这种关系中,代表必须服从另外一个的决定——例如,受雇者对雇主的关系,在某些家庭组织形式中的女性对男性¹⁵³的关系,等等。与此相对,我们所讲的压制关系,指的是那些从属关系,它们已经转变为社会对抗的场所。最后,我们所讲的控制关系,指的是那样一系列的从属关系,从外在于它们的社会代表者的视角或者判断来看,这些关系

被视为不合法的关系,作为一种结果,它们与特定社会形式中实际存在的压制关系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因此,问题就在于要对如何从从属关系中建立起支配关系进行阐释。从属关系,从其自身来看,不能成为对抗性的关系,原因正在于此。简言之,从属关系在社会代表之间建立了一系列彼此不同的立场,我们已经知道,差异系统使每个实证的社会同一性不仅不能是对抗的,还产生了消除社会对抗的理想条件——我们将会面对一个被缝合的社会空间,其中每个同等不会被排除。正是在从属主体实证的不同特征被颠覆这个范围内,对抗才可能出现。“农奴”、“奴隶”等等概念,其自身并不能标明对抗性立场,只有在一种不同的话语形态中,比如“天赋人权”,这些范畴的不同实证性才可能被颠覆,从属关系才能被构建为压制关系。这意味着,没有从属的话语得以被解释的话语“外在性”,就不会有压制关系。^① 在这个意义上,同等的逻辑置换了某些指向他者的话语作用。如同17世纪之前的妇女情况一样,如果把她们构造成为主体的全部话语完全简单地把她们固定在从属地位上,那么,作为反对妇女从属地位斗争运动的女权主义就不会出现。我们的主题是,只有当民主话语可以连接抵制从属的不同形式时,反对各种类型不平等的斗争的条件才会存在。就妇女问题来说,我们可以把英国的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作为例证。她的著作《为妇女权利而辩》出版于1792年,书中对女权主义一词的使用,通过民主话语从公民之间的政治平等转移到两性之间的平等领域,确定了女权主义的诞生。

^① 关于“中斯”这一概念,参见D·希沃曼和B·特罗德的《物质概念》第1章,伦敦1980年。

但是为了以这种方式进行斗争,平等和自由的民主原则首先必须使自身成为新的社会想像的发源地;或者用我们的术语说,必须使自身成为政治构造中的关节点。西方社会政治想像中的这一决定性转变发生于200年前,可以用这些观点来说明:同等的逻辑被转变成社会生产的基本工具。这一转变,用德·托克维尔的话说,可以称为“民主革命”。我们用这一术语来标志一个等级制和不平等类型的社会的终结,这是一个神学—政治逻辑统治的社会,社会等级秩序扎根于神的意志之中。在这样的社会中,社会被想像为一个整体,个体被固定在各自不同的地位之上。因为只要那样一个社会制度的整体模式占统治地位,政治就不能超过再生产同样从属主体类型的不断重复的等级关系。民主革命开端中的关键因素可以在法国大革命中发现,正如弗兰西斯·菲雷(Furet)已经指出的那样,法国大革命肯定了人民所拥有的绝对权力,把某种真正创新的东西带进社会想像之中。在菲雷看来,正是在这里,真正的断裂才能被发现,在新的合法性确立之中,在民主文化的创造之中:“法国大革命不是一种变革,而是一种起源,一个起源的幻象。它之所以独特,在于构成了它的历史影响的东西;更甚者可以说是,正是它的‘独特’要素已经成为普遍性的了:它是民主革命的最初经验。”^① 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说的那样,如果“正是法国大革命而非美国革命使世界激动起来”^②,那也仅仅是因为,正是它有史以来第一次把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人民上。因此,它首先建立了克劳德·勒福尔(Lefort)曾经说明的那种新社会制度模式。这

① F·菲雷:《对法国大革命的思索》,巴黎1978年,第109页。

② H·阿伦特:《论革命》,伦敦1973年,第55页。

以《人权宣言》为象征结束了古代专制,提供了把各种不平等形式看成是不合法的和反自然的话语条件,并因此把它们看成同样是压制的形式。这里存在着民主话语深刻的颠覆性力量,能把平等和自由不断扩大到更加广泛的领域,因此,能够作为一种酵母,激发各种反对从属关系的斗争。这种力量,这里我们暂且不论。19世纪,许多工人的斗争是在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要求的。例如,英国的宪章运动,在运动的形成和确定其目标方面,受到法国大革命深远的影响。^① 加里斯·希特德曼·琼斯的研究已经表明,英国激进主义者的理想在宪章运动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对普选的需要具有的核心作用,并没有把宪章运动解释为社会基本特征的表现和新工业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表达)。

156

从对政治不平等批判,通过不同的社会主义话语,置换成经济不平等的批判,走向了对其他从属形式的怀疑,并产生新的权利要求。因此,社会主义的要求,应当被看做民主革命的一种内在要素,只有在后来建立起来的同等逻辑基础之上,这种要求才能得到理解。这一启发,在许多不同的发展中发挥了多重作用。就女权主义而言,它成为这样一个问题:妇女首先要取得政治权利,然后,要取得经济权利。对于当代女权主义来说,则是获得两性平等的问题。正如德·托克维尔所指出的那样:“难以相信,平等不能像在政治领域那样在其他领域广泛实现。不可能把人类本身理解成在某一方面是永远不平等的,而在其他方面却是永远平等的。在某个历史阶段,人们会在所有方面

^① G·希特德曼·琼斯:《宪章运动再思考》,见其《阶级话语》,英国剑桥,1983年。

实现平等。”^①

在任何情况下,把从属关系建立一个封闭的差异体系都是不可能的——这种不可能性指的是使从属者与从属相互同一的外在性,而不是指通过他们的立场而被吸收进体系中——这种立场以压制关系为基础。在这一方面,考虑到工人斗争对抗潜力经历的变革是有意义的。毫无疑问,19世纪存在着反资本主义的激进斗争,但它们不是无产阶级的斗争——如果我们按照“无产阶级”理解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工人,而不是那些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因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建立而受到威胁的手工业工人的话。这些“反动的激进派”——用克雷格·卡尔霍恩的话来说——的斗争具有强烈对抗特性,它们对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产生了疑问,下述事实说明了这一问题:这些斗争表达了一种抵制倾向,抵制手工业工人身份的丧失和与之共存的一整套社会、文化和政治形式的解体。从那里产生了对156于资本主义正在建立的新型生产关系的总体拒绝,存在于社会组织两个系统之间完全的外在性,使社会分化为两个阵营,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这一分化正是每种对抗能够形成的条件。卡尔霍恩在关于E·P·汤普森(Thompson)《英国工人阶级的兴起》一书所作的批判中已经令人信服地表明,那只是一些异质的社会团体,给它们贴上“工人阶级”的标签,是没有充分认识到“老”、“新”工人在目标和运动方式方面的深刻差异。卡尔霍恩认为,“前者是在坚强团体的基础上进行斗争,反对经济变化产生的压倒一切的威力。后者的斗争虽然社会基础较弱,但却是在自然产生

^① A·德·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巴黎1981年,第1卷,第115页。

的工业化秩序内部进行的。这一区别,对于持续的发展和工人不断增强的激进化观念,产生强烈影响。”^①

正是在19世纪中叶的英国和19世纪末的欧洲,出现了可以被严格地称为资本主义产物的工人运动;但是这种工人运动倾向于越来越少地对——已经稳固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怀疑,而是集中在为改革生产关系所进行的斗争上。这些斗争,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可以称之为“改良主义”,与过去的社会斗争相比,被视为一种倒退,在其现实性上,与其说与那些激进的先驱所进行的斗争相一致,不如说与工业无产阶级运动所采取的方式更加一致。因此,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从属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被作为合法化的不同立场,纳入一个统一的话语空间。

如果我们把注意力转向激进工人运动的另一个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意大利和德国出现的工人自治运动时期,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运动根本上具有一系列的多元决定条件:战后社会秩序的瘫痪,工厂的军工化,泰勒管理体制的推行以及生产中熟练工人角色的转换,所有这些都或者关联着弱化了差异逻辑领导权力量的组织危机;或者关联着对传统工人同一性产生疑问的基础上的变革。例如,我们不应忘记的是,熟练工人在这些斗争中发挥的中心作用是这样一种作用,它是被整体上认识到的,而不是以不同方式解释的。^② 对某些人来说,它是这样一个问题,保护这种熟练技能,以对抗泰勒体制已经出现的危险。 157

^① C·卡尔霍恩:《阶级斗争问题》,芝加哥1982年,第140页。

^② 关于这一主题,参见C·西里安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工人管理》,《理论与社会》9:1(1980)和C·萨贝尔:《工作与政治学》,英国剑桥1982年,第4章。

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它是那些工人在战争期间获得的一种经验,使他们思考自我组织生产过程的可能性,以及迫使他们与雇主进行对抗。但是,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它都是对工人已经获得的使他们成为反叛者的同一性(他们的技能或他们在生产中的组织功能)的辩护。因此,我们可以与上面提到的“激进反动派”作一个比较,因为他们也是为了保卫某种受到威胁的同一性。

然而,从单纯“阶段”意义上理解这种力量的外在下,好像被超越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内的事实一样是激进主义斗争的必要条件,将会是错误的。如果情况真的如此,那么,那种激进主义就会带有只进行防御性斗争的特点。如果上面提到的那些“与时代不合的”斗争,很好地说明了作为每个对抗条件的力量外在下,那么,某些社会变革就能够在作为外在强迫要求和压制形式——直到那些社会转变发生时一直没有受到怀疑的从属关系——的话语构造基础上构成新的激进主体性形式。正是在这一点上,民主的想像所特有的同等置换才开始发挥作用。来自过去激进斗争的想像是完全不现实的,它的相当大一部分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年间的新资本主义的快乐症,它似乎要提供部分体系变革的无限吸收能力,并且展示走向任何对抗性的潜能都将被消解殆尽的一个同质社会的单一趋势,而且每一个集体同一性都被固定在差异体系之中。与此相反,我们将要指明的是,在福利国家鼎盛阶段满足广泛社会要求扩展过程中出现的复杂性和经常矛盾的方面,远远不能保证那个不稳定的主导性领导权形态一体化,相反却经常使一整套从属关系的专断本性暴露无遗。因此,使平等主义同等新的扩充成为可能,并因此使民主革命沿着

新方向扩充的领域被创造出来。正是在这样一个领域中，已经产生了政治同一性的新形式，在近来的讨论之中，这一新形式经常被归到“新社会运动”的名义下。我们将因此研究民主的潜在力量和这些运动的不确定性，也研究它们赖以出现的历史环境。 158

民主革命和新的对抗

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同等置换——是对抗得以出现的条件——可以这样来表现自身，首先，它可能成为业已存在的从属关系问题，由于民主想像的置换，这些从属关系被重新表述为压制关系。再以女权主义为例加以说明，正是因为民主意识形态原则上对所有公民承认的权力否定了作为女人的女人，才出现了从属的女性主体构造中的裂缝，在这个裂缝中对抗才可能形成。要求其公民权的少数民族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形。然而，对抗也会在其他情况中产生——例如，当后天获得的权利受到怀疑时，或者当一直没有在从属形式下被构建的社会关系开始在某些社会变革的影响下开始构建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这一情形中，因为它被带有新的不平等形式的实践和话语所否定，主体的立场就可能成为对抗的场所。但是在每一种情况下，拒绝接受集体斗争特点的形式是外在话语的存在，它阻止作为差异的从属稳定化。

“新社会运动”一词是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术语，它把一系列极端不同的斗争汇集在一起，这些斗争包括都市的、生态主义的、反权力主义的、反制度化的、女权主义的、反种族歧视的、少数民族权力的、地区的或性少数的斗争，

它们的共同点就是它们与被当成“阶级”斗争的工人斗争有所区别。强调那个成问题的阶级斗争概念是毫无意义的,这一概念在生产关系的水平上混合了一系列非常不同的斗争,在这一水平上,这些斗争由于有特权的“阶级”地位非常清楚地显示出来这个理由而从“新的对抗”中被分离出来。因此,我们对于新社会运动的兴趣,不是它把各种斗争归属为与阶级观念相对的一个范畴,而是它在把迅速消融的社会冲突解释为越来越多的关系方面所起的新作用。这种越来越多的关系,是高度发达工业社会的特征。这就是我们试图通过上述成为问题的理论要分析的,这些分析使我们把这些运动理解成为民主革命向所有新的一系列社会关系的扩展。至于这些运动新的特性,是由于它们对从属关系新的形式产生怀疑而被赋予给它们的。我们应当区别这一关系连续/断裂的两种方面,连续性方面本质上包含这样的事实: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转变为西方社会的“常识”,为逐渐地挑战曾被托克维尔称为“同等条件”的等级原则提供了基础。正是这种平等的想像的持久性,允许我们在19世纪反对旧制度所遗传的不平等的斗争与当前的社会运动之间建立起一种连续性。但是从另一个观点来看,我们可以谈论断裂,因为随着相当大一部分的新政治主体通过其与新近的从属形式之间的对抗关系被建构,这些新的从属形式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和扩张以及国家日渐增长的干预中。我们正是要把自己引向这些新的从属关系和在它们之中被构造的对抗。

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社会重组这个环境中,社会关系层面上发生一系列变化,新的领导权形态

得到巩固。后者在劳动过程中被连接起来的规定性、国家形式和文化传播主导方式,带来了现存社会交往方式的极大变革。如果我们从经济学观点分析这一问题,决定性的变化就是米歇尔·阿列塔所说的那种由外在积累制度到内在积累制度的转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扩展为一整套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从属于追求利益的生产逻辑。阿列塔认为,这种转变的基本因素就是引进了福特制,他将其描述为“把生产过程和消费方式连接起来的基本原则”。^①更加突出的是,这是这样一种连接:在半自动生产线上组织起来的劳动过程与以个体获得从私人消费目的出发的大规模生产的商品为特征的消费方式的结合,其中的商品,就其较大规模来说,是完全为了私人消费生产的。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渗透,最初开始于20世纪初,在40 160年代之后逐步发展,把社会变成一个巨大市场。在这个市场中,新“需求”被不停地创造出来,越来越多的人类劳动产品被转变成商品。社会生活的“商品化”,摧毁了过去的社会关系,用商品关系取而代之,通过商品关系,资本主义的积累逻辑不断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领域。今天,个体从属于资本,不仅是劳动力的出卖者,而且通过他们所属的公司而融入大量的社会关系之中,文化、休闲、疾病、教育、性,甚至死亡,都是这些社会关系的内容。不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渗透的个人生活或集体生活是不存在的。

但是,“消费社会”既没有像丹尼尔·贝尔(Bell)所预言的那样导致意识形态的终结,也没有像马尔库塞所担忧的那样产生单向度的人。相反,无数新的斗争已经表明反对

^① M·阿列塔:《资本主义管理理论》,伦敦1979年,第117页。

新的从属形式的倾向,它们来自新社会的核心。因此,正是自然资源的浪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以及生产至上的恶果促成了生态保护运动的诞生。曼纽尔·卡斯特尔(Castells)称之为“城市的”^① 其他斗争表现了反对资本主义占领社会空间的各种不同形式。伴随经济发展出现的普遍城市化,是大众阶级向城市边缘的迁移或者是他们被驱逐到衰败的城市中心,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匮乏等大量新的问题,影响了工作之外整个社会生活的组织。因此,正是从这种复杂多样的社会关系中产生了对抗和斗争,居住环境、消费和各种服务行业都成为反抗不平等和要求新权利

的领域。

这些新的要求也必定会在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的环境中被提出来,因为福利国家的建立已是战后另一个重要事实。毫无疑问,它是一种含混、复杂的现象,原因在于:如果为实现资本主义积累制度所要求的一系列功能而必须建立福利国家,那么,它也是鲍尔斯(Bowles)与金蒂斯(Gintis)所说的那种“战后资本与劳动之间协调”^② 的一种结果,因此也是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变化的斗争的结果。例如,正是传统共同体团结网络和家庭类型(请不要忘记,这种类型是以妇女的从属地位为基础的)的瓦解,迫使国家介入医疗、失业、养老等各种不同的“社会服务”。在另外的地方,迫于工人斗争的压力,国家通过干预确保实行新的劳动政策(最低工资、日工作时间长度、事故和失业保险、社会开支等)。如果我们接受本杰明·科里亚(Co-

① 参照 M·卡斯特尔:《论城市问题》,巴黎 1972 年。

② S·鲍尔斯与 H·金蒂斯:《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危机》,《政治与社会》第 1 卷第 1 册(1982 年)。

riat)^① 的观点,认为国家计划干预劳动力的再生产目的在于使其从属于资本的要求,而现实的集体斗争和磋商协定也使工资得到提高,那么,与此相同的是,再生产过程的利润也为工人带来了实际的和重要的收益。

但是,国家在更加广泛的再生产领域实行的干预也伴随着官僚主义的产生。在实践中,官僚主义已经登上舞台,随着商品化的深入,它成为不平等和社会冲突的一个重要根源。在国家干预的所有领域,社会关系的政治化成为许多新的对抗的基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张和新的官僚化国家的形成引起的社会关系的双重转变,在所有发达工业国家的各种团体中都可发现。它们的影响正在逐渐加强。克劳斯·奥菲已经提出,政府提供的服务如何与社会开支联系起来,能够在“消除商品化”的方向上发挥一些作用。^② 后一种现象可以反过来影响资本主义的积累利润,竟然能达到使公共部门成为获得利益的活动范围。在奥菲看来,这种与“非无产阶级化”相关、来自使工人不必被迫不惜代价出卖劳动力就可以维持生存的多样化报酬的现象,是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重要因素。但是,这里使我们关心的东西严格说来是研究作为新对抗基础的那种官僚主义化后果。重要的事实在于多样化干预形式的强迫性和以前一直被理解为私人领域组成部分的社会关系中的那些控制。“公共”与“私人”之间的民主界线的转换,产生了含混的影响。一方面,这一转换揭示出社会关系的政治特性(广义的),这从来都是给它们提供了形式和意义的制度的结果;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干预的官僚主

① B·科里亚:《工厂和计时工作制》,巴黎1979年,第155页。

② C·奥菲:《福利国家的矛盾》,J·基恩编,伦敦1984年,第263页。

162 义特征,“公共领域”的创造就不是通过真正民主的形式实现的,而是通过新的从属关系的强制性实现的。正是在这里,我们必须寻求一个领域,反对官僚主义国家权力的斗争就是在这个领域出现的。但是,这不应当使我们盲目地走上指向相反方向的其他方面,使福利国家的特性含混不清:以“积极自由”为特征的新权利的产生,也深刻地改变了占优势的常识,为一系列经济平等和新的权力要求提供了合法性。皮文和克罗沃德研究的美国的“福利权力运动”,就是对国家的要求扩张的例子,国家要为公民的福利负责。正是公民这一概念本身已经和社会国家一起被改变,因为“社会权利”被赋予给公民。作为一种结果,“正义”、“自由”、“公正”和“平等”这些范畴被重新定义,自由—民主话语因为权利领域的扩大得到了根本修正。^①

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的商品化和官僚主义化,另一方面则是争取平等的斗争不断扩展所导致的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变革,如果不处在这样的语境中,就不能理解当前社会冲突的广度。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我们认为,对抗性斗争的增殖及其导致的对从属关系的怀疑,应当被看做深化民主革命的关键因素。这也受到了赋予战后领导权形态以特征的第三个重要社会关系变化的刺激,即与大众交往方式扩展相联系的新文化形式。这使得深刻地动摇传统同一性的新大众文化成为可能。然而,在这里,这种影响同样是含混不清的,因为伴随着不可否认的整体化和一致化作用,这种传媒文化包含着颠覆不平等的有力因素:消费社会的主流话语把它看成是社会进步和民主发展,以

^① 参照 F·皮文与 R·克罗沃德:《贫困人民的运动》,纽约 1979 年。

至于大多数人有权使用更加广泛的物品。鲍德里亚正确地指出，“与物相比，我们正在更加远离平等”，^①平等的强烈表现和作为传媒活动不可避免的结果的文化民主化，使建基于旧的身份形式之上的特权发生了动摇。平等者的能力像消费者一样受到质问，更多的团体被推动去拒绝继续存在的现实不平等。毫无疑问，“民主的消费文化”激发起了新的斗争，它们在抵制旧的从属关系中发挥重大作用，这种情况与美国黑人运动要求公民权利的斗争十分相似。青年问题非常有趣，没有理由怀疑他们已经成为新对抗的轴心。为了提出新的必然性，他们不断被构造成一个特殊的消费者范畴，激励他们寻求社会没有条件赋予他们的经济自主性。相反，经济危机和失业使他们处于一种十分困难的境地。如果再说到家庭细胞的瓦解及其向纯粹消费功能的不断还原，以及伴随的这些“新主体”受到现存等级普遍存在的问题的撞击，丧失了统一的社会形式，上述变化是随着这种统一的社会形式的丧失一起出现的，那么我们就难怪理解那些工业社会中青年一代所采取的反叛方式。

这些“新的对抗”是对商品化、官僚主义和社会生活自身不断同质化的反抗形式。这一事实说明了他们为何通过特殊主义的增殖和具体化为自主要求一再证明自己的原因。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才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物价稳定措施，才创造了新的同一性，试图赋予“文化”标准以特权（服装、音乐、语言、地区传统，等等）。在民主学说的两大主题——平等和自由——的范围内，平等占据着传统

^① J·鲍德里亚：《物体系》，巴黎1968年，第183页。

的突出地位,而自主要求日渐把核心作用赋予自由。由于这一原因,许多对抗不是通过集体斗争的方式表现自身,而是通过逐步加强个人主义而表现出来的(当然,左派仍然不愿意采取这种斗争形式,即使在今天,他们也试图把它们作为“自由主义”加以消除。因此危险在于,它们很可能被右派话语或特权辩护表达出来)。但是无论如何,对抗无论通过什么样的政治倾向具体化(这建立在构造它的同等链条上),诸如此类的对抗形式,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同一的。这就是说,对抗总是存在于社会构造之中——多元决定的主体立场——在一系列要素或价值之间同等的基础上,这一同等排除了或者外在化了它们所对立的它者。在这里,我们又一次面临着社会空间的分化。

这些“新的社会运动”中最新的、无疑也是当前最有活力的社会运动,是和平运动。在我们看来,这种运动完全陷入了我们曾经指出的一种理论桎梏之中。随着 E·P·汤普森所说的那种“灭绝的逻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所有权利最重要的基础,即生存权利,已经成为严重问题。另外,在海外国家大规模部署核武器,而其使用又不受国家的控制,产生了根植于国家防御民主控制原则领域的新要求,在这一领域公民有资格在政治上运用权力。随着民主自治原则的丧失,与国家安全政策——传统上受到军事和政治精英保护的——相关的话语遭到颠覆。

我们迄今为止为之辩护的中心观念是,新的斗争——和诸如女权主义或少数民族斗争之类老的斗争的激进化发展——应当从战后以新领导权形态为特征的社会关系变化并且围绕自由—民主话语平等学说的作用这一双重视角加以理解。正是这一点,为质疑各种从属关系、要求

新的权利,提供了必须的理论框架。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民主学说在大量提出新的要求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新保守主义完全理解了这一点,他们谴责“民主过剩”,他们观点中的“平均主义”浪潮,在西方政治制度中产生了沉重的负担。1975 年,萨缪尔·亨廷顿在给“三边委员会”的报告中认为,1960 年代,美国争取更大平等和更多参与权的斗争,引起了“民主的巨浪”,使社会“失去控制”。他得出结论说,“民主观念的力量提出了民主政体问题”。^① 在新保守主义看来,对于真正平等不断增长的要求,已使社会走上“平等主义绝境”的边缘。正是在这里,他们发现了双重转变的源泉。他们认为,这是平等观念的双重转变:它已经从机会平等转向结果平等,从个体之间的平等转向团体之间的平等。丹尼尔·贝尔认为,“新平等主义”把平等观念置于危险之中,其目标不能是结果平等,而只是一套“漂亮理论”。^② 因此,当前这种作为“价值危机”后果的危机,是“多样的文化”发展和“资本主义的文化冲突”的结果。

165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阐明了新对抗的出现以及与民主革命扩大普遍紧密相关的政治主体的出现。事实上,它可以被看做我们所分析的那种政治作用在其他领域的扩展。特别是那些对抗的增强,能够使我们用一种新的观点去看待社会斗争“统一”主体的分裂问题。在 19 世纪末,马克思主义通过这种斗争清醒地看到自身面临的危机。从这个角度看,关于重组工人阶级统一性的战略的所有讨论,仅

^① S·亨廷顿:《民主的骚乱》,见 N·格莱泽与 I·克里斯道尔编《美国民主》,纽约 1976 年,第 37 页。

^② D·贝尔:《精英统治与平等》,《公共利益》1972 年秋季号。

仅只是对于社会复杂性初步的认识活动——尽管很不情愿,但事实在于:社会的多元性和政治同一性非缝合的特征。如果我们重点(sous rature)解读罗莎·卢森堡、拉布里奥拉和考茨基的文本,将会发现,在他们的话语中,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不可同化的复杂性因素,破坏了他们所用范畴的一致性。这种多样性,并不必然成为分裂性的否定因素,或者也不像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所认为的那样,是资本主义逻辑必然导致的人为分裂的一种反映,而恰是使民主革命的深化成为可能的真正领域。这是显而易见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民主革命的这种深化甚至是在含混和困难中展现出来的,这些含混和困难是每一种连接实践和重组所必须面对的东西。一旦抛弃作为统一体的、透明的和被缝合实体的主体范畴,就会为认识建基于不同主体之上的对抗特殊性开辟道路,并可能深化多元的和民主的概念。对统一主体范畴的批判和对于每个主体立场赖以建立的话语分散性的认识,会包含比一般理论立场更多的东西:它们是思考多样性的必要条件。民主革命遭遇到某些障碍,而多样性则使对抗产生出来。这

166 给予我们一个理论空间,能够在激进的和多元的民主概念——这是我们从这一点出发进行论述的核心——的基础上,发现理解民主的首要条件。主体概念不能回到肯定的和统一的原则,只要接受这一点,多元主义就能被视为一个激进的概念。统一体的多元性在其自身发现自己的原则的有效性,只有在这一范围内,多元主义才是激进的。如果没有这一点,那就必须在透明的和肯定的基础上寻求它们的不同意义及其合法性保证。多元主义每个术语的自身构建,是改变平等学说的一种结果,只有在这个意义

上,这种激进的多元主义才是民主的。因此,在首要的意义上,激进的和多元的民主计划只是在同等—平等主义逻辑普遍化的基础上为自主性领域最大化进行斗争。

这种探讨能够使我们重新界定并公正地对待工人斗争。工人斗争在被作为整体与“新的政治主体”的斗争相对照时,其特性遭到歪曲。一旦拒绝了作为“普遍阶级”的工人阶级概念,才有可能认识发生在被归于“工人斗争”标签下的那些领域中的对抗多元性,并且认识它们大多数对于深化民主进程具有的重要性。工人斗争一直是由多数人组成的,而且一直呈现了作为国家角色转换功能、不同工人范畴的工会实践、工厂内外的对抗、现存领导权均衡形式的多样性。1960年代末期,法国和意大利出现的所谓“新的工人斗争”,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例证,它们有力地说明了工厂之内的斗争形式在何种程度上要依赖一种话语环境,这一环境要远远超过生产关系的范围。斗争的突出影响和学生运动的口号,文化背景与老一代工人完全不同的青年工人扮演的中心化角色,法国和意大利南部移民的重要性,所有这一切都向我们表明,工人置身其中的其他一些社会关系将会决定他们在工厂之内的反应方式。不能为构建一个单纯的工人阶级而消除这些关系的复杂性,因此,也不能把工人的要求还原为与其他社会和政治主体根本区别开的单一的对抗。 167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论述了对抗的多样性,它的作用:汇聚和多元决定,在我们所讲的“民主革命”的结构内表现出来。但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必要的是必须清楚,民主革命只是这样一个领域,得到平等主义想像支持的置换规律在其中发挥着作用,但是它不能预先决定这种想像发

挥作用的方向。如果能够预先决定这种方向,那么,我们就能够轻易地构建新的意识形态——我们就将处在一个与伯恩斯坦的进化领域相似的领域。但是在那种情况下,就丝毫不会存在领导权实践的空间。与此相反,意识形态不能表达社会要求的原因在于,民主革命的方向,一方面为形形色色的右翼民粹主义和极权主义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也为激进民主开辟了道路。因此,如果我们要构建领导权话语以使我们不至偏离激进民主的方向,那么,我们必须从其突出的异质性角度来理解民主领域自身所开辟的那些可能性。

新的对抗和权利的增殖正在使战后的领导权形态陷入危机,这是无可怀疑的。但是危机可能得以克服的那种形式远不是可以预定的,因为权利被重新规定的方式以及反从属关系的斗争所采取的形式都不能明确地建立起来。这里,我们面对着一个真正充满歧义的领域。例如,女权主义或生态主义就以多种形式存在,这些形式依赖对抗的话语构造方式。因此,既有攻击男人的女权主义;也有与此不同的力图重新估价“女性气质”的女权主义;而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则把资本主义作为主要敌人,并把它与不可改变的父权制联系在一起。因此,在不同的女性从属方式上存在着构造对抗的话语形式的多元性。同样,生态主义也有多种形式。它可以是反资本主义的生态主义,反工业主义的生态主义,权力主义的生态主义,自由主义的生态主义,社会主义的生态主义,也可以是反动的生态主义,等等。因此,每种对抗的表现形式无法预先决定,而是领导权斗争的一种结果。这一断言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意味着:这些新的斗争并不必然地具有进步特征;因此认

为它们自然地发生在左翼政治的语境中是一个错误。1960年代以后,许多这样的斗争都把自己投身到寻求新的将要取代工人阶级并且被赋予特权的革命主体的斗争,认为工人阶级没有能够完成自己历史的解放使命。生态主义运动、学生运动、女权主义和边缘群体,曾经成了完成这一新任务的最流行的候选人。但是,这种处理方式不能消除传统的疑难问题,而只是简单地取代了它,这是显而易见的。不存在一种独一无二的被赋予特权的立场,从其影响的统一连贯性会相应地产生,使整个社会发生变革。所有斗争,不论是工人斗争还是其他政治主体的斗争,都自行其是,带有局部特征,而且因此可以被表达成完全不同的话语。正是这种表达,而不是它们的出发点,赋予它们各自的特点。因此,没有任何主体——进而言之,也没有任何“必然性”——是绝对激进的和不可被统治秩序还原的,也没有任何主体构成总体变革的受到担保的出发点(同样,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永久地保证现存秩序的稳定性的)。与此相关,我们认为,阿兰·图林和安德烈·戈兹(Gorz)的分析非常有趣,但是他们的观点却没有在打破传统问题时走得很远。例如戈兹,即使他赋予“非工人的非阶级(non-class of non-workers)”一些无产阶级没有的特权,他也只不过是在颠倒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而图林则要寻求一种社会运动,这种社会运动能够在“程序化的社会”中起到工人阶级在工业化社会中所起的那种作用。他的寻求清楚地表明,他没有怀疑那种独一无二的社会力量的观念,即在一个既定社会中,这种社会力量能够产生根本性的变化。

对于新的从属关系的反抗形式是有多种解释的,而且

完全可以表达成民主的话语。近年来,“新权利”运动的发展,能够充分地证明这一点。它的新颖之处在于,它成功地表达了反对社会关系变化的一系列新自由民主话语。里根和撒切尔取消福利国家的计划得到了广泛支持,这可从下述事实中得到解释:他们在反对福利国家时,成功地激起了反对新国家组织官僚本性的活动,这一点得到了公众的认同。任何领导权连接造成的同等链条可能具有的完全不同特性,被新保守主义话语清楚地证明了,围绕官僚主义化所进行的对抗被表达为替传统的性别和种族不平等进行辩护。这种对特权的辩护建立于白人优越、男性优越的基础之上,这加深了保守主义的反动性,并因此拓宽了领导权的影响范围。因此,反抗在下述两极中间构建起来:一极是“人民”,包括所有保卫传统价值和企业自由的人;另外一极是他们的对手,包括国家和一切颠覆分子(女权主义者、黑人、青年人和“容许”上述人们的人)。对抗于是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历史集团,在其中,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多元性被连接起来。例如,斯图亚特·霍尔(Hall)曾经指出:撒切尔的民粹主义“把英国保守主义的响亮主题——国家、家庭、责任、权威、准则和传统主义——与复活的新自由主义好斗的主题——自我利益、竞争的个体主义和反国家主义——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①在美国则是这样一种情形:阿兰·亨特尔(Hunter)指出,新权威主义对于福利国家的攻击有一个基点,在这个基点之上,文化批判和经济批判走到一起,二者断言:国家妨碍了特殊平等主义名义下的带有经济和道德特征的市场。“他

^① S·霍尔与 M·雅克编:《撒切尔主义政治学》,伦敦 1983 年,第 29 页。

们也攻击福利自由主义对人民私人生活和社会道德结构的干预,使儿童和两性关系被社会化了。”^①

准确地说,正是每一个对抗的这种多义性特征使它的意义在相当程度上要依靠领导权连接才能完成。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领导权实践的领域来自于社会根本上的不确定性,无论孤立地还是通过其在关系系统中的固定来考虑,都无法以权威方式构建出任何一种斗争的意义。我们已经看到,存在着领导权实践,因为这种彻底的不固定性使得人们不可能认为政治斗争这种游戏中对立力量的同一性在一开始就被构造了。这意味着,任何具有领导权期望的政治永远不可能把自己当成是一种纯粹内在性空间中的复制品,而总是必须在多元层面上移动自己。如果每一种斗争的意义不能在开始时给定,那么,这就意味着,只是在斗争走出自己本身,而且通过同等链条在结构上与其他斗争联系起来这个范围内——它才被部分地固定。每一个对抗,自身包含着对抗,是一个漂浮的能指,都是一种没有预定与社会形态中其他要素连接形式的“滋生”的对抗。这一点,能够使我们在当前的社会斗争与民主革命前的社会斗争之间建立起一种根本差别。后者总是发生在拒绝既成的和相对稳定的同一性环境之中;结果,对抗的边界能够轻易地看到,但却不需要加以构造——政治的领导权维度因此模糊不清。但是在当前的工业社会中,广泛的不同分裂点的增殖,所有社会同一性的不稳定,也导致了边界的模糊不清。因此,民主阵线

170

^① A·亨特:《新权威主义思想体系》,载《公共危机》,纽约1981年,第324页。关于当前美国政治危机的深入分析,参见D·普劳特克:《转向新民主的美国》,载1980年《社会主义评论》第54卷和《政治的转变:转变中的美国》,载1981年《社会主义评论》第55卷。

的构造由于强烈的不稳定性而变得十分明显，边界的变化和社会的内部分化也变得非常突出。正是在这个范围内和从这一视角，新保守主义计划才得到了它的所有领导权维度。

反民主攻势

新保守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新权利”所怀疑的正是这样一种连接类型：这种连接把民主的自由主义引向去证明在反对不平等的斗争中，国家干预的正当性以及福利国家设置的正当性。对这一变革的批判不是最近才发展起来的。早在1944年，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对国家干预和当时各种各样的计划经济发起了猛烈攻击。他宣称，西方社会处在走向集体主义的进程中，并因此要求抛弃集权主义。在他看来，集体主义的界限在法律而不是控制、管理控制和管理方法被利用来把新权力归于自身，并且促进官僚主义扩张时就被超越了。从这种观点来看，法律的权力将难免衰落，而官僚主义的权力将得到加强。事实上，这种新自由主义批判所争论的问题是自由主义和整个19世纪实施的民主之间的连接问题。^① 作为各种不同形式斗争结果的这种自由主义的“民主化”，终于对人们所理解的自由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洛克的传统自由定义——“自由就是摆脱他人的束缚和暴力”——经过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我们已经接受了作为自由重要内涵的“政治”自由和民主参与概念。再后来，在社会民主党的话

^① C·B·麦克弗森分析了这种联合，参见《自由民主的生活和时代》，牛津1977年。

语中,自由概念开始意味着做出某种选择和欢迎一系列选择的“能力”。因此,贫困、缺乏教育和生活条件的巨大悬殊,在今天被认为是违反自由的。

新自由主义试图怀疑的正是这种变革。毫无疑问,哈耶克最吃力地把自己投入到重新形成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的努力之中,目的是要反对允许拓宽和加深自由概念的这些变化。他试图把自由主义的“真正”本质重新解释为这样一种教条,即试图把国家权力减小到最少的程度,以便最大化这样的核心性政治目标:个人自由主义。他再一次消极地把自由定义为“人的状况,在其中社会上他人的强迫尽可能地减少”。^① 显而易见,政治自由表面上被排除在这个定义之外了。哈耶克认为,“民主本质上是一种手段,是保护内部和平和个人自由的功利手段”。^② 这种回到传统自由概念的企图,以不干预无约束占有和资本主义市场机制为特征,竭力毁坏每个可能成为潜在极权主义的“积极”自由概念的名誉。它断言,自由的政治秩序,只有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框架中才能存在。在《资本主义和自由》一书中,密尔顿·弗里德曼宣称,这是尊重个体自由原则的惟一社会组织,因为它构建了惟一的经济制度,能够使绝大多数人的活动相互平等而无需诉诸于高压手段。一切国家干预,除了市场不能调控的那些事务之外,都被视为对个人自由的攻击。社会或再分配的公正性概念,只要被用来证明国家干预是正当的,就成了新自由主义喜欢攻击的目标。哈耶克认为,它是一个自由社会完全无法理解的概念,因为“在那样一种每个人都能够利用自

① F·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芝加哥 1960 年,第 11 页。

② F·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伦敦 1944 年,第 52 页。

172 己的知识达到自己目的的制度中,‘社会正义’的概念必然是空洞的和毫无意义的。原因在于,在这样的制度中,没有谁的意志能够决定不同人们的相对收入,或者阻止他们部分地依赖偶然性”。^①

罗伯特·诺齐克从“自由主义”的视角质疑了这样一种观念:国家能够提供分配公正。^② 他认为,国家要保护那种法律上属于我们的东西,这是惟一与自由相一致的国家功能,然而这不能使它具有这样一种权力,即建立超出管理活动要求的税收制度。美国的极端唯意志自由论者拒绝一切国家干预,在这一点上,诺齐克与他们正相反,他认为把国家职能缩小到最低限度是正当的——这就是说,国家功能应限定在法律和制度的范围内。但是,超出这个范围的国家是不合理的,因为一旦如此,它就会践踏个人权利。无论如何,诺齐克认为,任何可以得到的东西不可能是国家合法分配的,因为每种东西,只要存在,则或者为个体所有,或者在他们的立法控制之下。

另一种攻击自由和民主之间连接所产生的颠覆性作用的方式,是新保守主义采取的方式,它重新定义民主概念,限制其应用的领域,把政治参与限制在非常狭窄的范围内。因此,布热津斯基提出:“逐渐把政治制度从社会中分离出来,把它理解为两个分离的实体”。^③ 其目的在于,逐渐把公众决议从政治控制中移出来,使公共决议只成为专家的职责。在这种情况下,这一举措的作用在于,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基本决议将完全非政治化。他认为,这

① F·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2卷,芝加哥1976年,第69页。

② 参见R·诺齐克:《无政府主义,国家和乌托邦》,纽约1974年。

③ 参见Z·布热津斯基和P·斯特恩菲尔兹编:《新保守主义》,纽约1979年,第269页。

样一个社会将是自由主义意义上的民主社会。但“民主不是在政策制定方面训练基本选择,而是为个体自我表现保持某些自治领域”。^① 布热津斯基虽然没有公开攻击民主观念,但却试图抽空它的所有实质内涵,他所重新定义的民主,事实上是要使某种制度合法化,在这个制度中,政治参与实际上并不存在。

在法国,新右派理论家对民主进行了极端蛮横无理的正面批判。新右派的代言人阿兰·德·伯努瓦公然宣称,法国大革命标志着西方文明倒退的一个重要阶段——这种倒退开始于基督教,那是一种“古代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他进一步认为,必须抛弃的正是1789年《人权宣言》精神本身。从1968年的政治运动中,阿兰·德·伯努瓦熟练地找回一系列自由主义的主题。他认为,在赋予普遍选举一种重要作用时,民主把所有个体置于一种等同的水平之上,不能认识他们之间的重要差异。因此,公民被无差异化和大众化,并被强加于一种单一标准,这种单一标准表明了民主所必然具有的极权主义特征。在这个平等链中,平等 = 统一 = 极权主义,而新的权利则要求一种“权利差别”,它肯定的序列是:差异 = 不平等 = 自由。阿兰·德·伯努瓦写道:“我所说的‘右翼’是这样一种态度,它肯定世界的多样性,并因此认为不平等,是一种善。而集权主义意识形态喜欢并培育的那种世界的同质化则是一种恶。”^② 173

低估这些重新定义诸如“自由”、“平等”、“正义”、“民主”之类概念的企图所具有的重要性,将是一种错误。左

^① 参见 Z·布热津斯基和 P·斯特恩菲尔兹编:《新保守主义》,纽约1979年,第270页。

^② A·德·伯努瓦: *Les idées à l'endroit*, 巴黎1979年,第81页。

派传统的教条主义认为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是次要的,它把自身建立在那类问题的“上层建筑”的特性之上。最后,左派只对那些与经济基础相关的少数问题和与建基于这个基础之上的主体相关的少数问题感受兴趣;而整个广泛的文化领域和建基于其上的现实规定性,以及不同话语形态领导权再连接的全部努力,则大方地给右派提供了主动权。实际上,如果像右派那样,自由—民主国家概念的整体仅仅被视为资产阶级统治的上层建筑形式,那么,考虑与此不同的一种态度的可能性——而不陷入极度的机会主义——则是十分困难的。然而,一旦我们放弃基础/上层建筑的差别,也拒绝存在着一种解放的政治实践得以开始的具有优先权的出发点这个观点,显而易见的是,领导权构造留下的选择只能来自于复杂的集中过程和政治构造,对政治构造而言,在社会现实领域中构造的领导权连接可能具有中立性。在政治哲学领域,用何种形式定义自由、平等、民主和正义这些概念,将可能在各种其他话语层面上产生重要后果,而且对于大众常识的塑造是决定性的。当然,这些辐射作用,不能被看做哲学观点在“观念的”层次上简单的采纳,而更应当被视为一整套更复杂的话语领导权运作,这种运作包括了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通过这种运作,某些“主题”,被转变为话语形态(历史集团的)的关节点。如果新自由主义观念已经得到了盲目的政治反响,那也正是因为它允许连接起对社会关系不断官僚主义化的抵制。我们在上面已经谈到这一点。因此新保守主义成功地把自己瓦解福利国家的纲领描述为保卫个体自由以反对作为压迫者的国家。但是,对一种哲学来说,要想成为“有机的意识形态”,就必须在它所建构

的主体类型与在其他社会关系层面上构造的主体立场之间保持某种类似。个人自由的主题,撇开它与民主构想的连接不论,如果能够非常有效地被动员起来,那也正是因为自由主义不断成为麦克弗森(Macpherson)所说的“占有的个人主义”的个人生成的源泉。“占有的个体主义”把个人权利构造为先于社会存在的、经常与社会相对抗的东西。在这一范围内,越来越多的主体在民主革命的框架内要求这些权利,不可避免地破坏占有的个体主义的源泉,因为某些人的权利开始与他人的权利发生冲突。正是在这种民主自由主义发生危机的环境中,必需给消除自由主义和民主之间连接所具有的颠覆潜力定位,重新肯定自由主义的中心地位,以保卫个人自由,反对来自国家的所有干预,并且反对那些建立在平等权力和大众主权上的民主因素。但是,这种限制民主斗争领域的努力和保护大量社会关系中不平等的努力,要求保卫那些被自由主义本身危及的等级制的和反平等主义的原则。这就是自由主义者为什么要不断求助于从保守哲学得来的一系列主题,正是从这些主题中,他们找到了证明不平等是正当的所必须的因素。我们因此目睹了一个新领导权计划的出台,那是一种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话语的设计,它试图把新自由主义对于自由市场经济的捍卫和根深蒂固的反平等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的社会传统主义结合在一起。

175

激进民主:新左派的抉择

保守主义的反动因此具有一种明显的领导权特征。它试图使政治话语的概念发生根本改变,创造一种新的

“现实的定义”，在捍卫个人自由的名义下，这种新定义将使不平等获得合法性并且恢复为过去时代的斗争所摧毁的等级制关系。在此，危险的东西是事实上所形成的新历史集团。由于转向了有机意识形态，通过围绕个人主义的权利定义和消极自由概念，使多样主体统一起来的同等体系，自由保守主义构建起了新的领导权连接。因此，我们再一次面临着社会边界的置换。在与福利国家一致的领导权形态中，作为合法差异接受的一系列主体立场从社会确定性领域中被排除，并且被构建为一种否定性——社会安全上的寄生虫（撒切尔夫人所谓的“小偷”）、与工会特权联系在一起的无能、国家补助，等等。

因此，显而易见的是，左派的抉择只能由不同的同等体系结构来组成，这种结构在新的基础上建立了社会划分。在面临等级社会的重建计划时，左派的抉择应当是完全把自身定位在民主革命领域，发展反压迫斗争之间的同等链。因此，左派的任务不是放弃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相反，是在激进的和多元的民主方向上深化和扩大民主。在下文中，我们将解释这一任务的范围。但是，这个事实——不可能来自谈论个人权利的自由话语的意义——并不是最后被固定起来的，而且正是由于这个不固定性允许它与保守主义话语要素连接起来，它也允许不同的连接和强调民主因素的重新规定形式。这就是说，组成自由话语的要素从来没有像任何其他社会要素一样被具体化，并且可能成为领导权斗争的领域。不是在放弃民主的意义上，相反，而是在同市民社会和国家的整体进行民主斗争的范围内，才有左派领导权策略存在的可能性。然而，如果它要完全在民主革命领域、深奥的意识和提出连接需要的领

导权连接中为政治实践提供基础，重要的是去理解左派政治想像中必要变革的彻底程度。这一任务中的主要障碍，就是我们在本书开头一直要引起关注的那个障碍，即本质主义的先验论、社会在某个点上被缝合的信念。由此出发，不靠任何连接实践就能独立确定任何事件的意义。这导致了不能理解使社会形态结构化的关节点的不断置换，也形成了以“被先验特权化的点”的逻辑形式组织起来的话语，这种形式严重限制了左派行动和政治分析能力。特权化点的逻辑一直在不同方向上起作用。正如我们所知，从根本对抗的规定这种观点来看，基本的障碍是阶级论，即工人阶级扮演了特权化代表的观念，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被看成就存在于代表那里——而没有理解工人阶级的真正定位要依赖于各种力量的政治平衡和相当程度上决定于本阶级之外的多元民主斗争的激进化。从引起变化的可能性集中在社会标准上这个观点来看，根本的障碍一直是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认为国家作用的扩张是解决问题的万应灵药，以及经济主义（特别是它的专家治国的观点）——认为成功的经济策略必然伴随着可以明确指出的政治作用。

但是，如果要寻找这种本质主义固定性的根本核心，我们就将在一直激发左派政治想像的主要关节点上发现，这一核心就是按照雅各宾派模式铸造的经典“革命”概念。当然，假如我们用这个概念来理解政治断裂点上的一系列斗争的多元决定作用，这个断裂会伴随着横贯整个社会结构的多样化作用，那么对于“革命”概念不会有任何异议。如果这就是它所包含的一切，那么，毫无疑问，在许多情况下，用暴力推翻一个旧压迫制度正是民主发展的条件。但

是,传统革命概念的含义远远超过这一点;它包含着革命行动的根本特征,即建立一种权力集中的制度,由此社会能够被“合理地”重新组织起来。这个观点与激进民主所要求的多元性和开放性是矛盾的。通过使葛兰西的某些概念更加完全,我们找到了允许我们重新提供革命行动标准的理论工具。“阵地战”这一概念完全意味着每种激烈变革都具有过程的特征——革命行动只是这一过程的内部因素。政治空间的扩大和避免权力集中于一点,是每个社会真正民主变革的前提。社会主义的经典概念假定了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消失会产生一系列的作用,会在整个新的历史时代中消灭一切形式的从属关系。今天,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例如,在反男性至上主义和反资本主义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二者之间的统一性可能只是领导权连接的结果。由此可以推出,在它们各自进行的斗争的基础之上建立这种连接,只是一种可能性,这些斗争只在某些社会领域发挥了同等的和多元决定的作用。这要求斗争领域的自主化和政治空间的多样化,这种多样化与权力集中和经典雅各宾主义及其变种意味的知识是矛盾的。当然,每一个激进民主计划都暗含着社会主义方向,因为它必然要终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则是大量从属关系的基础;但是社会主义是激进民主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反过来却并非如此。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谈论作为激进多元民主策略要素之一的生产资料社会化时,人们就必须坚持这种社会化不能意味着它仅仅是工人的自我管理,因为存亡攸关的是所有主体真正参与决定在生产的过程之中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采用何种形式分配产品。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产品的社会占有才能存

在。把这个问题归结为工人的自我管理,就会忽略这个事实:工人的利益可以用这样一种方式构成,他们不重视生态的要求或其他集团的需要,这些集团不是生产者,但受到生产领域里的决定的影响。^①

从领导权政治的观点看,传统左派观点的最主要局限在于,它试图先验地决定变革的代表、社会领域中有效性的层面、断裂因素和特权化的点。所有这些障碍最后都汇聚到一个共同核心,那就是拒绝放弃被彻底缝合的社会这个假定。但是,一旦抛弃了这个假设,就将引起一系列我们现在要解决的新问题。所有这些可以概括为三个问题,我们将逐一论述:(1)如何确定激进民主计划将包括的对抗出现的层面及其连接形式?(2)激进民主特有的多元性在何种程度上与同等的作用相一致?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同等的作用是每个领导权连接的特征。(3)民主想像的置换中固有的逻辑在何种程度上足以弄清楚领导权计划?

关于第一个问题。由于蕴含在社会地形学里的先验论已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因此,先验地定义对抗得以出现的层面是不可能的。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虽然一些左派政治学可以在某些环境中设想出来或加以说明,但是没有任何一种左派政治学,其内容能够脱离环境因素来加以确定。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试图先验地确定其内容的所有尝试都必然是片面的和任意的,因而在大多数情况中是无效的。破除政治独一无二的意义——与综合和不平衡发展相联系——消除了根据左派与右派之间的分化确定

^① 参见 R·达尔:《多元民主的困境》,纽约和伦敦,1982年;C·林德布卢姆:《政治与市场》,纽约1977年。

所指的任何可能性。如果我们试图定义构成其所有使用基础的左派一词的根本内涵,我们将永远不会找到一个不表现出例外情况的内涵。如果我们正处在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理论的领域之中,我们能得到的那最为相近的则是“家族相似”。让我们来分析几个例子。近年来,更多被谈论的是必须更加明确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分界线。但是,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建议没有给左派提供一种能够被普遍化的对抗表现层面的理论。这似乎意味着:每一种统治形式都在国家中体现出来。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市民社会也是大量压制关系存在的场所,因而也是对抗和民主斗争存在的场所。结果,大体上是清楚的,一些理论,如阿尔都塞(Althusser)对于“国家机器”的分析,试图创造一个概念框架来思考统治领域中的置换现象。在女权主义斗争的情形中,国家是实现进步的重要工具,经常对抗市民社会,在立法上与男性至上主义相对抗。在许多不发达国家,作为中心的国家,其功能的扩张是在反对拥有土地的寡头的极端剥削的斗争中建立一个边界的手段。进而言之,国家不是一个同质化的媒介物,与市民社会被一道鸿沟隔开;而是一系列不平衡的部门和功能,只被发生在其中的领导权实践相对结合起来。最重要的是,不应当忘记国家能够成为大量民主对抗存在的场所,在国家中的一套职能——例如,专业的或技术的职能——可以成为与权力中心相对抗的关系,在国家自身内寻求对国家的限制和改变。当然,这种方法决不是说,在某些情形之中,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分化不能构成民主的基本政治阵线,例如,在东欧或索摩查斯(Somozas)的尼加拉瓜,国家变成官僚主义毒瘤,通过暴力强加于社会其他领域之上,它成了军事

机器支撑的独裁者。不管怎样,显然不可能先验地把国家或市民社会指定为民主对抗表现出来的领域。从左派的政治观点来看,当确定积极或消极的特征成为疑问时,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例如,让我们考虑“政党”这种形式。在某些情况下,作为政治制度的政党可能成为官僚主义具体化的一个实例,是群众运动的阻碍;但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分散的和政治上幼稚的群众的组织者,并因此能够成为扩大和加深民主斗争的工具。重要之点是,由于“一般社会”领域作为政治分析的有效框架已经消散,所以在社会地形学范畴——这就是说,用不变方式把某些出现在复杂关系中的差异的意义永恒地固定起来——的基础上建立普遍政治理论的可能性也随之消失。

从这一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先验地说明对抗出现的层面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有层面都因其他因素的决定性影响而不断被颠覆,因此存在着某些领域的社会逻辑特征转向其他领域的社会逻辑特征这种不断的置换。在其他情况中,这是我们已经从民主革命情形中所看到的“示范作用”。民主斗争能够使自己在其中发展的一些空间成为自治的,并且在不同的政治空间中产生与其他斗争同等化的作用。激进民主计划所关联的正是这种社会多元性,其可能性直接来自于社会代表偏离中心的特性,直接来自于把自身构成为主体的话语多元性,而且也直接来自于发生在多元性中的置换。民主思想的最初形式,与积极的和统一的人类本性概念相关,而且在这个范围内,它们试图构造一个惟一的空间,人类本性将在其中显示它的激进自由和平等的作用,并因此构建一个与市民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公共领域。公共/私人的区分,在一个差异被市民普遍平

等消除了的领域和保持那些差异的充分力量的多元的私人领域之间,构建了分离。正是在这一点上,与民主革命联系在一起的那种多元决定性作用,开始置换了在公共和私人之间的民主界线,使社会关系政治化,即,使新的同等逻辑在其消除不同社会实证性的空间中得到了增殖。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从19世纪的工人斗争延伸到妇女斗争,形形色色的反种族歧视斗争和反性别歧视斗争,形形色色的边缘团体的斗争和本世纪新的反传统斗争。因此,惟一的政治构造空间本身的现实性和观念被突破了。我们亲眼见到的政治化远远超过了我们以往所知道的,因为这种政治化,不是统一起来的公共领域侵犯私人,而是采取了全新的和富有差异性的政治空间形式,要消除的是公共和私人之间的区分。我们面临着一种主体多元性的出现,只有放弃进行统一和被统一的“主体”范畴,才可能思考它的构成形式和分散性。

但是,政治的这种多样性难道不与作为对抗前提的那种来自同等作用的统一相冲突吗?或者,换言之,激进民主所特有的政治空间增殖与根据同等逻辑建立的集体同一性之间难道不存在矛盾吗?这里我们又一次面对的显然是在上一章已经提到的自主性/领导权的两分,现在我们应该考虑它的政治含义和作用。让我们从两个方面来思考这个问题:(1)两分把自己描述为是惟一领域这种观点;(2)考虑这种惟一领域出现的历史条件和可能性的观点。

我们从考虑同等作用和自主性之间的不相容这一领域开始。首先来看同等的逻辑。我们已经指出,由于对抗不仅产生于构成它的空间两分而且来自于总是溢出两分

空间的社会多元性领域,因此只有通过来自其自身以及使外部要素领导权化,对抗两极的同一性才得到巩固。因此,特定民主斗争的增强需要向其他斗争延伸的同等链的扩展。例如,反法西斯主义、反性别歧视和反资本主义之间的同等连接就需要有一个领导权结构,这个领导权结构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成为巩固每一个斗争的条件。那么,如果走向最后的结果,同等的逻辑将意味着产生这些个别斗争的领域自主性消失不是必然的,因为这些斗争中的某一种斗争成为其他斗争的从属部分,而是因为所有这些斗争严格说来都已成为一项特殊的、不可分割的斗争的相同象征。由此,对抗就获得了完全透明的条件,以至于不平衡被消除,而且每个民主斗争在其中被构造的空间不同的特殊性也消失了。

第二,自主性的逻辑。每项斗争都是在与其他斗争相比较中获得自己不同的特殊性。每项斗争所产生的政治空间是各不相同的,相互之间也难以沟通。但显而易见,这种明显的自由主义逻辑只在新的封闭的基础上才能维持。因为,如果每项斗争都将其特殊性因素转化为同一性的绝对原则,那么所有这些斗争加在一起就只能是孕育于一个绝对的差异体系之中,而这个体系则只能是被封闭的总体。这就是说,社会透明只是从同等体系的惟一性和可理解性被转换到差异体系的惟一性和可理解性。但是,在这两种情形中,我们涉及的都是企图通过它们的范畴来控制作为总体的社会。在两种情形中,总体的因素就不再是地平线,而是成为一种基础。正是仅仅在这种合理的领导权空间里,同等逻辑和自主性逻辑才被看成是已经得到的和被固定的。因此只有在这里,两个根本矛盾的社会逻辑

才找到了在其中根本作用可以充分发展的领域。然而,这种终极时刻永远不会到来。同等和自主性的不相容消失了,各自的地位变了:它再也不是社会秩序的基础,而是社会逻辑的基础,在不同程度上介入到每个社会同一性的构成之中,并部分地限制它们相互间的影响。从这里我们能推断出激进自由主义政治概念的一个基本前提,即拒绝控制每一个假定的社会“根本基础”——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政治上。每一个寻求将自己建立在对这种基础的认识之上的概念,都迟早会发现自己将面对卢梭式的悖谬,即人会被强迫成为自由的。

某些概念地位的这个变化,即转变成先前是社会基础的社会逻辑,使我们得以理解作为民主政治基础的多样化维度。首先,它使我们能够正确地把意义和我们也许能够称之为“民主同等原则”的界限视为一体。我们能够说明意义,是因为平等主义想像的惟一置换不足以产生置换得以起作用的团体同一性变革。在同等原则的基础上,法人性的团体能够要求其与其他团体平等的权利,但这里有一个限度,不同群体的要求是不同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要求是不相容的,而这并不能导致各种民主要求之间任何真正的平等。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占有性的个人主义都是不同团体同一性产生的发源地,这种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要有“民主平等”,则其他的東西是必需的,即构造一种新“常识”,以改变不同群体的同一性。这样,每一个团体的要求就能与其他团体同等地连接起来——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就是说,在其并不仅仅建立特定利益联盟,而是限制参加联盟的力量的同一性这个范围内,同等总是领导

权的,因为在损害妇女、移民和消费者的情况下,工人阶级的利益并没有得到捍卫,必须在不同的斗争之间建立起同等。只有在这个条件下,反对权力的斗争才能是真正民主的,对权利的要求才能不是建立在充满问题的个人主义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其他附属团体平等权利的尊重基础上。然而,如果这就是民主同等原则的含义,那么它的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完全的同等从来就不存在。每一种同等都会受到来自社会不平衡的结构不稳定的渗透。就此范围而言,这种不稳定要求通过自主性逻辑得到补充或限制。正因此,平等的要求是不充分的,需要用对自由的要求来平衡,这就引导我们来谈论激进的或多元的民主。激进的非多元民主,在同等逻辑无限制运作基础上建立单一的平等空间,没有认识到不可还原的空间多元性因素。这种空间分离的原则,是要求自由的基础。多元的原则正是存在于其中,并且多元民主才能和自由原则联系起来。这种原则不是会产生问题的自由主义,对于作为保护个人自由以实现个人的能力的伦理原则,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效。然而,如果自由的维度是由每一个民主和解放的计划构成的,那么在对过多的“整体论”进行反驳中,它就不会使我们单纯和简单地回到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辩护中去。这里包含的是另一种个体,他不是占有性个人主义基础上产生的。应该抛弃“自然”权利优先于社会权利的观念——以及虚构的个人/社会这个二元整体,代之以提出权利问题的另一种方法。我们从来不可能孤立地去定义个人权利,只有在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能做到。因而,总是要涉及到参加同一社会关系的其他主体的权利问题。必须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民主权利”这个概

184 念,因为存在着只能集体地加以贯彻的权利,而这些权利也承认他人平等权利的存在。不同社会关系构造的空间可以发生巨大的变化,这要看它涉及什么样的关系,比如生产关系、公民关系、邻里关系或夫妻关系等等。因此,民主的形式应是多样化的,因为它必须适合社会空间——直接民主不可能是惟一的组织形式,因为它只适用于简化的社会空间。

因此有必要拓宽超出传统“公民”有限领域的民主权利的贯彻这一领域。至于民主权利从传统“政治”领域到经济领域的扩展,是一个反资本主义特殊斗争的领域。与那些主张经济是“私人”领域的经济自由主义相对立,自然权利的位置和民主的标准在其中没有存在的理由。社会主义理论,捍卫作为生产者而不仅仅是作为公民的社会代表的平等权和参与权。多元论理论家,如达尔和林德布卢姆等,^①在这个方向上已经取得了进展,今天他们认识到,在跨国公司时代,还把经济说成是“私有的”领域已毫无意义,因此在企业运营中必须接受某种形式的工人参与。我们的观点当然完全不同,因为我们所质疑的正是那种认为可以有自然的“私有”领域的观点。公与私、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区分只是领导权连接的某种形式而已,它们的界限随一定时刻既存的力量关系而不同。例如,明显的是,新保守主义话语今天正在致力于限制政治领域,并且重新肯定近几十年面临的不同民主斗争对之提出缩减要求的私人领域。

再来讨论一下我们关于同等和自主性相互之间必要

^① 参看 R·达尔:《多元民主的困境》,纽约和伦敦 1982 年;C·林德布卢姆:《政治和市场》,纽约 1977 年。

限制的这个论点。只有在封闭体系的假设下,政治空间多元性概念才与同等逻辑不相容。但是一旦这个假定被放弃,它就不可能产生于空间的增殖、表示其自身是总体的社会的不确定性和不可能性、总体化因素与激进民主计划之间的不相容。凭借同等作用的政治空间的构造不仅与民主斗争相容,而且在许多情形之中是需要它的。在而对新保守主义的攻击时,民主同等链条的构造是左派在当前环境下争取领导权的斗争之一。因而,不相容性并不存在于作为社会逻辑的同等之中,它只产生于同等空间不再被当成是他者之间的一个政治空间并且被理解为中心的时候,这个中心从属并组织了所有其他的空间。不相容性出现在这种情形之中,在那里不仅在某种社会层面上产生了同等的结构,还使这个层面转变成了统一的原则,把他者还原成内在于它的不同因素。因而我们看到,自相矛盾的是,在当今社会,正是公开性和对差异的民主颠覆的逻辑,创造了比以往激进得多的封闭的可能性:这种激进到了对传统差异体系的拒绝被打破的程度,不确定和模糊将更多的社会要素转化为“漂浮的能指”,产生了要使中心制度化的可能性,这个尝试要激进地消除自主性的逻辑并围绕自身重构社会团体的总体。如果说19世纪每个激进民主尝试的限制存在于残存的贯穿于社会关系中的旧的从属形式之中,那么现在那些限制来自于一种新的可能,而这种可能恰恰产生于民主领域,即极权主义的逻辑。

克劳德·勒福尔已经说明了作为包含象征层面丰富转换的新领域的“民主革命”,意味着社会新的制度化形式。在早期社会,按照理论——政治逻辑组织起来的权力由君主个人体现出来,君主是上帝的代表——完全的正义和至

高无上理性的代表。社会被认为是一个团体,其成员的等级结构建立在无条件的秩序上。按照勒福尔的观点,民主社会带来的根本差别在于这种权力的所在地已成为空洞的地方,与超然的保证者之间的关系消失了,一起消失的还有基本的社会统一的代表。结果,权力、知识和法律之间的要求发生了分裂,它们的基础不再得到保证。这样便出现了没终结的疑问过程的可能性:“没有能被固定的法律,其规定易受到质疑;总之,没有社会中心的代表;统一不再能消除社会分化。民主带来了社会不能被理解和控制的经验,这个社会声称人民拥有最高权力,但是在其中他们的同一性不能确定,而仍然只是潜在的。”^① 在勒福尔看来,正是在这种环境之中,应该看到存在着出现极权主义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由重建民主已经破坏的权力、法律和知识之间的统一这种企图构成。一旦通过民主革命消除了与特别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一个纯粹的社会权力就会出现,它把自身表现为总体,并且独自从自身之中引出法律原则和知识原则。由于这种极权主义,而不是已经指明的空场,权力寻求使自身具体化为整个人民的代表机构,在实现人民统一的借口下,由于民主的逻辑形成的明显社会分化被否认了。这个否认构成了极权主义逻辑的中心,而且在一个双重的运动中被实现了:“国家和社会分裂的标志的取消,以及社会内部分化标志的取消,这些意味着影响政治社会构造的要求的差别被取消。被从权力当中分离出来的法律和知识再没有最高标准。”^②

如果按照我们的问题来分析它们,就可能把这些分析

^① C·勒福尔:《发明的民主》,巴黎 1981 年,第 100 页。

^② 同上书,第 100 页。

和我们已经指出其特征的领导权实践领域联系起来。正因为不再存在来自超验秩序的受到保证的基础,因为再也没有能把权力、法律和知识联系在一起的中心,才有可能和有必要,通过领导权连接,来统一某些政治空间。然而,这种连接总是局部的,而且总是容易受到质疑,因为再也没有一个最高的保证者。任何建立最后缝合、否认民主逻辑所制定的社会彻底开放特征的企图,都会导致克劳德所说的“极权主义”,即由建立社会可以被完全掌握和了解的出发点组成的政治构造逻辑。这是一个政治逻辑,而且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组织形式得到过如下事实的证明:它不能被归因于特别的政治倾向:它可能是“左”的政治的结果,按照这一点,每个对抗都可能被排除,而且社会呈现出完全的透明性,或者在国家建立的等级制上固定社会秩序的极权主义结果,就像法西斯主义的那种情况一样。但是,在两种情形中,国家或者以无产阶级的名义或者以民族的名义,都把自己上升到社会秩序真理惟一拥有者的地位,并试图控制所有的社会网络。在民主所开创的根本不确定性面前,这实际上是企图重新强加一个绝对的中心,并重建能够因此恢复统一的封闭性。 187

然而,如果威胁民主的危险之一毫无疑问是极权主义试图跨越对抗的构造特征,并且在试图恢复统一中否认多元性,那么还有相对称的另一个危险,即对这种统一缺乏了解。因为,即使不可能,这仍然是个地平线,由于导致社会关系失去连接,它必然要阻止社会的破裂和任何共同参照点的缺席。这种由象征结构解构所引起的社会结构拆解,是政治消失的另一种形式。与以极权主义方式强加不变的连接这个危险相对照,这里的问题是缺少那些能允许

建立不同社会主体共有的意义的连接。在完全同一的逻辑和纯粹差异的逻辑之间,民主的经验应该由承认社会逻辑的多样性,以及它们连接的必要性组成。但这种连接必须不断地再造和协调,而且没有取得最后平衡的终点。

这将把我们引向第三个问题,即民主的逻辑与领导权设计之间的关系问题。很明显,从目前我们所说的一切中可以看到,民主的逻辑并不足以形成任何领导权。因为民主的逻辑只不过是平等主义想像对更广泛社会关系的同等置换,而且同样的是,它只是不平等从属关系消除的逻辑。民主逻辑不是社会实证性的逻辑,因而它不能建立任何形式的关节点来重建社会结构。但是,如果民主逻辑的颠覆性因素和社会制度的肯定因素不再被任何人类学基础统一起来,这一人类学基础把它们转变成阵线和单一过程的反面,那么,非常明显的是,两者之间每一个统一的可能形式都是偶然的,并且因此是连接过程的结果本身。这正是这样的情形:没有任何领导权设计能绝对地建立在民主的逻辑之上,而是还必须由一系列实证性的社会组织方案组成。如果从属集团的要求完全被看做为对某种秩序的颠覆性否定要求,与任何可见的重建特殊社会领域的可行计划没有联系,那么,从一开始他们的领导权行为能力就被排除了。这就是“对立策略”和“重建新秩序策略”之间的差别。在前一种情况下,某一社会或政治秩序的否定要素占优势,但是这种否定要素并没有任何真正去建立关节点的企图,从这种关节点出发,社会结构的不同实证性重构有可能实现——而且结果是,这一策略被宣告是边缘性的,这个情况就是“飞地政治”的另一版本,而不管是意识形态的还是社团的。相反,在新秩序构造策略的情形之

中,社会实证性要素占优势,但是这个事实带来了不稳定的平衡以及与民主的颠覆性逻辑持续的张力关系。领导权的情况将是这样的,在其中,社会实证性的安排和不同的民主要求的连接已经达到了最大的综合——对立的情况,在其中社会的否定性导致了每个稳定的差异体系的瓦解,这种情况与组织危机是一致的。这将使我们领会这样的意义,在其中我们能够谈论由左派选择的激进民主设计。这不可能由来自边缘立场的一系列的反体系要求的主张构成,相反,它必须使自己建立在对两种情况的平衡点的探寻之上,这两种情况是:在广泛领域之中民主革命的最大化发展;领导权指导的能力和部分从属团体在这些领域中实证地重构。

因此,每一个领导权立场都是建立在不稳定平衡基础上的:构造是从否定性开始的,但只有当它成功地构造了社会实证性时才能得到巩固。这两种因素在理论上并没有被连接,它们勾画出了矛盾性张力空间的轮廓,这个张力构造了不同政治事态的特殊性(正如我们所见,这两个因素的矛盾特征在我们的意见中并不意味着矛盾,因为,从逻辑的观点看,两个不同的和矛盾的社会逻辑共存,采
189
取了相互限制它们作用的方式,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如果这种社会逻辑的多元性是张力的特征,那么它也需要在其中它们将被构成的空间的多元性。在构造新秩序策略的情形之中,可能在社会实证性中引入的变化,不仅建立在追求这一策略的力量的或多或少的民主特征上,而且取决于一系列由其他逻辑所建立的结构性的限制。这里重要的是不能陷入不同形式的乌托邦理想之中——乌托邦理想试图不顾构成那些结构性限制的空间多元性;也不能陷

入政治冷淡症之中——它由于有限的变化特征可能在其中实现而拒绝传统的政治领域。但同样极其重要的是,不能寻求把政治领域限定在社会实证性的安排上,并且只接受那些现在能够进行的变化。近年来,有许多关于需要“政治世俗化”的议论,如果一个人照此理解了对传统左派本质主义的批评,即左派继续“政党”、“阶级”、“革命”类型的绝对范畴,这个人就不会持有异议。

但是那个“世俗化”常常意味着不同的东西:把乌托邦从政治领域完全驱逐出去。现在,如果没有“乌托邦”,没有否定秩序的可能性,这个秩序超出了我们能威胁到的它的部分,也就根本没有任何构造激进想像的可能——无论是民主的还是其他的形式。作为使某些社会秩序总体化为否定性的一系列象征意义的想像存在,对所有左翼思想的构造是绝对必要的。我们已经指出,政治领导权形式总是认为在这种想像和社会实证性的安排之间存在着不稳定平衡,但这种张力是透明社会不可能性被证明于其中的形式之一。每个激进民主政治应该避免:由极权主义理想国神话和改革者无法实施的实证主义方法代表的两个极端。

这种导致社会基本上不完善和不稳定特点的张力和开放性,正是每一个激进民主计划应该使其制度化的。使民主社会具有特点的制度多样性和复杂性,应该以完全不同于复杂官僚系统特有的功能多样化这种方式来想像。在后者那里它完全是一个实证社会的安排问题,而且每个多样化因此发生在控制一系列领域和功能的合理性之中。黑格尔的作为普遍阶级的官僚机构是这个观点完美的理论具体化。只要社会之内的标准多样化——伴随着功能

主义、结构主义或任何其他类似的观点——与这些作为概念总体构成因素的标准的一个个的概念联系起来，它总体控制这些概念并提供意义，它就已经被转变成社会学的平面了。但是在激进民主特有的多元论情形中，多样化已经转变成多元性了，因为每个不同的要素以及标准不再是超越它们的总体的表达。空间的增殖和伴随它的制度多样化不再由合理的功能支撑组成，它们确实也不再服从构成所有变化合理原则的隐蔽的逻辑。但是它们确实表达了对立：通过不可还原的多样性和多元性特征，社会构造了典型和对它自身不可能性的安排。每个安排的妥协、不稳定特征和对抗是主要的事实，而且正是在这个不稳定性内，实证的因素和它的安排发生了。激进民主方法的设计的发展因此迫使合理透明的社会神话逐步退出社会的地平线。这变成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地方(non place)，它自己不可能性的象征。

然而，正因为这个原因，统一起来的左派话语的可能性也消失了。如果多样化的主观立场、不同的对抗和分裂点构成的是多样性而不是多样化，那么很明显，它们不能被带回到它们能够从中被单一话语包含和解释的地方。话语的中断变成主要的和构成的。激进民主的话语不再是普遍的话语，“普遍”阶级和主体凭之言说的认识论壁龛被根除，并且它被复调的声音所代替。每一个声音构成了它自己不可还原的话语同一性。这一点是决定性的：不存在不拒绝普遍性话语及其固有的接近真理的特权的激进多元民主，那种普遍话语之中真理只能被少数主体获得。在政治术语中，这意味着，正如没有什么层面被对抗的出现赋予特权一样，也没有什么激进民主程序能先验排除的

191

作为可能性斗争领域的话语领域。司法制度、教育体系、劳动关系以及边缘人口抵抗的话语构成了社会抗议的最初不可还原的形式,并且由此贡献出了所有激进民主被建立于其上的话语复杂性和丰富性。传统社会主义话语具有完全不同的类型:它是普遍的话语,把某些社会范畴转变为政治和认识论特权的场所;它也是关于有效性不同层面的先验话语——而且同样地,它减少了它认为是可能的和合法的那些话语层面的范围;最后,它是涉及到这样特权点的话语,在这种特权点中,历史变化在运转中——革命、总罢工或者进化——被规定为使不可还原的部分发展的累积统一起来的范畴。激进民主的每一个设计,正如我们所说,包含了社会主义的维度——就是说,废除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但是它拒绝必然伴随着这个废除而来的其他不平等被消除的观念,结果,斗争和话语差异的去中心和自主性、对抗的增殖、可以在其中确定自身发展的空间多元性构造,都是传统社会主义理想不同成分——无疑,它应该被扩展和再形成——可以获得的可能性的必要条件。正如我们这里已经充分讨论的,这个空间多样性并不否认,而是需要在某种标准上它的作用的多元决定,以及随之而来的在它们之间的领导权连接。

让我们来得出结论。本书是围绕着领导权概念、社会内部固有的新逻辑、从列宁到葛兰西都妨碍了对其激进政治和理论潜力做出理解的“认识论障碍”的兴衰变迁构思的。只有当社会开放的和没有被缝合的特点被充分接受时,当总体的本质主义和要素的本质主义被拒绝时,这种潜力才能变得清晰可见,而且“领导权”才能开始为左派政治分析构成一个基本的工具。这些条件最初源自于我们

所说的“民主革命”领域,但只是在激进民主设计中,它们在自己的所有解构作用中被最大化了,或者换言之,是在这样一种政治形式之中,这种政治形式并不建立在任何教条假定的“社会本质”上,而是相反,建立在每个“本质”的偶然性和不明确性上,建立在社会分化和对抗的基本特征上。这是对只有通过否定其基本特征才能生存的“基础”的证实,对只存在于混乱的局部限制之中的“秩序”的证实,以及对在无意义面前当作过剩和自相矛盾被构造的“意义”的证实——换言之,政治领域作为从来不是“零和”博弈的空间,是因为规则和选手从来都不是完全明确的。193
 这一躲避概念的游戏确实至少有一个名字:领导权。

索 引

(英文版页码)

A

麦克斯·阿德勒,第 28 页。

米歇尔·阿列塔,第 160 页。

雅克·阿兰·米勒,第 9 页注释。

路易斯·阿尔都塞,第 97~104,109,147,179,第 70 页注释,第 115 页注释。

佩里·安德森,第 48 页。

汉娜·阿伦特,第 155 页。

奥匈帝国,第 27 页。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第 27~29,49 页,第 27 页注释。

阿克塞尔罗德,第 49,51 页。

B

尼克拉·巴达洛尼,第 26 页,第 26 页注释。

E·巴利巴尔,第 100 页。

J·鲍德里亚,第 163~164 页。

奥托·鲍威尔,第 27,28,29,73 页。

丹尼尔·贝尔,第 161,167 页。

E·本尼维斯特,第 106 页。

柏格森,第 38 页。

伯恩斯坦,第 29~36,37,3871,84,168 页,第 10,30 页注释。

爱德华·伯斯,第 40 页。

布尔什维克主义,第 42,52,59,61,70,71,173 页。

伯梅尔布里,第 30 页注释。

桑·鲍尔斯,第 78,161 页。

H·B·布雷弗曼,第 78~79,81~82,83 页。

B·布朗,第 107 页注释。

Z·布热津斯基,第 173 页。

米歇尔·布赖沃伊,第 81 页。

C

卡尔霍伊·克雷格,第 156~157 页。

曼纽尔·卡斯特尔,第 161 页。

宪章派,第 149,155~156 页。

中国,第 62 页。

克劳塞维茨,第 70 页,第 70 注释。

克罗沃德,第 163 页。

卢西奥·葛莱蒂,第 122~123 页。

第三国际,第 48,57,59,62,65,68,134 页。

本雅明·科里亚,第 162 页。

M·库赞,第 107 页注释

克罗伊策,第 11 页注释。

克罗斯,第 26,38 页。

古巴,第 62 页。

库诺,第 32 页。

卡特勒(等编),第 101~102,120 页。

D

达尔,第 185 页。

达尔文主义,第 20 页。

迈克·戴维斯,第 17 页注释。

阿兰·德·伯努瓦,第 173 ~ 174 页。

米歇尔·德·塞尔托,第 44 页。

亨利·德·曼,第 70 页。

G·德·保拉,第 40 页。

A·德·托克维尔,第 156,160 页。

德亚·马塞尔,第 74 页。

雅克·德里达,第 112 页,第 48 页注释。

季米特洛夫,第 62 页。

德雷福斯事件的支持者,第 39 页。

E

埃奇利·罗伊,第 123 ~ 124 页。

理查德·爱德华,第 80,82 页,第 79 页注释。

乔恩·埃尔瑟,第 123 ~ 124 页。

F·恩格斯,第 26,27,32,第 20 页注释。

爱尔福特议会,第 29,30 页。

爱尔福特纲领,第 14 页。

欧洲社会民主党,第 48 页。

F

古列尔莫·费雷罗,第 24 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第 72,157 页。

福特制,第 160 页。

福柯,第 105 ~ 106,107,145 ~ 146,152 页。

法国大革命,第 133 ~ 134,149 - 52,155 ~ 156,173 ~ 175 页,第 151 页注释。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第 97 页。

安德鲁·弗里德曼,第 82 页。

米尔顿·弗里德曼,第 155 页。

G

- F·加代,第113页注释。
让·保罗·戈德马尔,第80页。
皮特·杰伊,第33页。
德国工会总委员会,第17页。
金蒂莱,第26页。
诺曼·赫拉斯,第12页。
德国浪漫主义,第93~95页。
德国社会民主党,第14页。
德国,第72页。
赫伯特·金蒂斯,第78,161页。
D·戈登,第82页,第81页。
安德烈·戈兹,第169页。
安东尼·葛兰西,第3,4,7,23,31,36,41~42,48,57,65~71,76,85,86,109,114,134,136~138,150,178,192页,第10,71页注释。
大萧条,第73~74页。

H

- 霍尔·斯图尔特,第170页。
哈耶克,第171~172页。
斯蒂芬·希斯,第47页。
黑格尔,第27,94~95,123,191页。第20页注释。
黑格尔主义,第20,97页。
海德格尔,第112,115页。
巴里·希尔弗丁,第100页及其下。
保罗·赫斯特,第170页。
荷尔德林,第94页。
萨缪尔·亨廷顿,第165页。
胡塞尔,第105页。

I

意大利,第 66 页。

J

雅各宾派成员,第 2, 152, 177, 178 页。

K

[-康德,第 27, 28, 122 页,第 123 页注释。

考茨基,第 14 ~ 18, 19 ~ 25, 28, 30, 32, 33, 37, 55, 60, 63, 70, 85, 166 页,第 15, 19, 20 页注释。

凯恩斯主义,第 74 ~ 75 页。

柯尔什,第 68 页。

L

安东尼·拉布里奥拉,第 18, 25 ~ 27, 41, 70, 114, 166 页,第 26 页注释。

拉康,第 112 ~ 123 页,第 47 页注释。

拉加代勒,第 18 页。

勒福尔·克洛德,第 155, 186 ~ 187 页。

莱吉恩,第 17 页注释。

莱布尼茨,第 103 页。

列宁,第 3, 20, 25, 31, 42, 51, 54, 59, 76, 134, 192 页。第 60, 70 页注释。

列宁主义,第 4, 7, 55 ~ 7, 60, 61, 62, 66, 67 ~ 68, 70, 71 页。

林德布鲁姆,第 185 页。

利奥德·乔治,第 60 页,第 60 页注释。

G·卢卡奇,第 68 页。

罗莎·卢森堡,第 8 ~ 14, 15, 25, 26, 33, 36, 37, 41, 6 ~ 64, 86, 166 页,第 12 页注释。

M

马赫,第 27 页。

C·B·麦克弗森,第 175 页。

毛泽东,第 62,64,98 页,第 70 页注释。

H·马尔库塞,第 87,161 页。

斯蒂芬·马格林,第 79 页。

卡尔·马克思,第 16,27,32,40,99,146,151,183 页,第 20,36,83 页注释。

托马斯·马萨里克,第 18 页。

莫拉斯,第 41 页。

梅劳·庞蒂,第 108 页注释。

孟什维克党人,第 52 页。

意大利南方,第 65 页。

男人/女人,第 117 页,第 117 页注释。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第 172 页。

米勒兰,第 39 页。

雅克·莫诺,第 20 页注释。

米勒·赫尔曼,第 73~74 页。

N

纳粹,第 62 页。

《新左派》,第 25 页。

尼加拉瓜,第 180 页。

尼采,第 39,115 页。

罗伯特·诺齐克,第 173 页。

O

克劳斯·奥菲,第 162 页。

P

潘谢里,第 80 页。

帕雷托,第 41 页。

M·佩舍,第 147 页。

皮文,第 163 页。

普列汉诺夫,第 19, 24 ~ 25, 27, 37, 48, 49, 51, 52 页。第 34 页
注释。

波克罗夫斯基,第 53 页。

卡尔·波普,第 124 页。

波朗查斯,第二阶段 1, 83 ~ 84, 140 页,第 82 页注释。

亚当·普热沃尔斯基,第 16 页。

R

罗纳德·里根,第 169 页。

M·赖希,第 82 页,第 81 页注释。

伦纳,第 29 页,

(19 世纪解放和统一意大利的)复兴运动,第 65 页。

阿蒂尔·罗森贝格,第 149 ~ 151 页。

俄国革命,第 52 页及其下。

俄国社会民主党,第 7, 42, 148 页,第 48 页及其下。

S

M·萨尔瓦多里,第 71 页。

J·P·萨特,第 4 页,第 108 页注释。

索绪尔,第 51, 106, 113 页,第 114 页注释。

第二国际,第 4, 8, 11, 20, 47 ~ 48, 51, 55, 57, 60, 63, 68, 70, 73, 166
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第 75, 158, 160 页。

社会主义的人民代表议会,第 72 页。

索摩查斯,第 180 页。

索列尔,第 29,37~42,71,74,114 页,第 25 页注释。

社会民主党,第 30 页,第 17 页注释。

斯宾诺莎,第 20,103 页。

斯大林,第 4 页。

加雷斯·斯特德曼·琼斯,第 155 页。

斯特恩赫尔,第 37 页注释。

凯瑟琳娜·斯通,第 79 页。

皮特·斯特鲁韦,第 25 页。

A·斯特姆撒尔,第 73 页,第 72 页注释。

T

泰勒制,第 79,157~158 页。

玛格丽特·撒切尔,第 169 页。

第三世界,第 13 页。

E·P·汤普森,第 116,157,165 页。第 116 页注释。

T·托多洛夫,第 11 页。

陶里亚蒂,第 62 页。

阿兰·图林,第 169 页。

特伦德伦堡,第 95 页。

第三国际,第 165 页。

马里奥·特龙蒂,第 80 页。

列昂·托洛茨基,第 42,49,50,51,52~53,55,60~61 页,第 53 页注释。

V

维柯,第 37 页。

越南,第 62 页。

W

财富权利运动,第 163 页。

财富国家,第 75,169 - 170,175,176 页。

维特根斯坦,第 108,112,179 页。

伍利,第 103 页。

玛丽·伍尔斯德克拉夫特,第 154 页。

艾利克·奥林·怀特,第 83 ~ 84 页。

Z

季诺维也夫,第 61 页。

译后记

拉克劳和墨菲与奥菲、奥林·怀特、奥康纳、哈贝马斯、希尔斯、戈兹等人一样是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两人将后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力求回答当代发达社会中社会主义的实践问题。比较葛兰西、阿尔都塞、列维·斯特劳斯、波朗查斯、德里达、福柯等人,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他们的思想在这方面的特点。读者对这些自会有分析和鉴定,希望本书的翻译会有益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外国哲学的研究工作。

翻译他们的著作,对我们深入了解当代西欧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现状和理论背景有重要的参考作用,也会进一步加深我们对当代世界发展的认识。

Laclau 和 Mouffe 积极协助我联系了他们著作的版权,并就翻译中的问题给予了详细的解答。他们还在百忙之中寄来了新版序言和新照片。

在联系版权的过程中, Verso 的 Alice Mcneill 女士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并且提供了热心的帮助,使版权问题尽快地得到了解决。

拉克劳的助手 Noreen Harburt (Centre for Theoretical Studies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Essex) 尽快地将第二版序言寄给了我,使翻译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为我们理解本书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本书的版权申请和翻译得到了中国博士后科学研究基金、黑龙江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科研基金、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基金的支持。

特别要感谢的有：

北京大学哲学系赵家祥教授、赵敦华教授、丰子义教授、靳希平教授、王东教授、杨武栓副教授、吴增定博士、聂锦方博士、张立波博士后。

黑龙江大学的衣俊卿校长、张奎良教授、丁立群教授。

还要感谢黑龙江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的诸位顾问和特聘研究员的支持。

鉴传今博士和我共同翻译了本书，全书最后由我校对和定稿。我们与参加本套丛书翻译的孔明安博士、刘振怡女士的愉快合作和讨论使得整个工作得以顺利进展。

感谢我的妻子明媚，她乐观和坚强地面对生活。感谢那些热情帮助了我们的朋友。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陈春江社长、外文编辑室的魏杰恒副编审、李兵主任在立项、联系版权和出版方面全力支持了这套翻译丛书。杨雪平女士出国前在立项上也给予了积极支持。

尹树广

2002年冬于北京大学承泽园

本书的版权申请和翻译得到了中国博士后科学研究基金、黑龙江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科研基金、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基金的支持。

特别要感谢的有：

北京大学哲学系赵家祥教授、赵敦华教授、丰子义教授、靳希平教授、王东教授、杨武栓副教授、吴增定博士、聂锦方博士、张立波博士后。

黑龙江大学的衣俊卿校长、张奎良教授、丁立群教授。

还要感谢黑龙江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的诸位顾问和特聘研究员的支持。

鉴传今博士和我共同翻译了本书，全书最后由我校对和定稿。我们与参加本套丛书翻译的孔明安博士、刘振怡女士的愉快合作和讨论使得整个工作得以顺利进展。

感谢我的妻子明媚，她乐观和坚强地面对生活。感谢那些热情帮助了我们的朋友。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陈春江社长、外文编辑室的魏杰恒副编审、李兵主任在立项、联系版权和出版方面全力支持了这套翻译丛书。杨雪平女士出国前在立项上也给予了积极支持。

尹树广

2002年冬于北京大学承泽园

本书的版权申请和翻译得到了中国博士后科学研究基金、黑龙江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科研基金、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基金的支持。

特别要感谢的有：

北京大学哲学系赵家祥教授、赵敦华教授、丰子义教授、靳希平教授、王东教授、杨武栓副教授、吴增定博士、聂锦方博士、张立波博士后。

黑龙江大学的衣俊卿校长、张奎良教授、丁立群教授。

还要感谢黑龙江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的诸位顾问和特聘研究员的支持。

鉴传今博士和我共同翻译了本书，全书最后由我校对和定稿。我们与参加本套丛书翻译的孔明安博士、刘振怡女士的愉快合作和讨论使得整个工作得以顺利进展。

感谢我的妻子明媚，她乐观和坚强地面对生活。感谢那些热情帮助了我们的朋友。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陈春江社长、外文编辑室的魏杰恒副编审、李兵主任在立项、联系版权和出版方面全力支持了这套翻译丛书。杨雪平女士出国前在立项上也给予了积极支持。

尹树广

2002年冬于北京大学承泽园